



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

仅以此书告慰在毛泽东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作者 于松然

摄于 2006 年准备开始撰写本书时的北京教堂前

作者出身草根，成书后，曾与多家出版商联系自费出版，可能嫌本书过于敏感，无果。无奈，只好自我出版，取名《三自社》，即自个自鸣自乐出版社。因非专业，谬误颇多，敬请指正！

（★一选阅时作者向读者推荐的篇章）

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上）

仅以此书告慰在毛泽东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上卷目录

代序（笔者想说的题外话）	4
一、八十抒怀	4
二、迟到的纪念	5
三、总算发完了	15
四、本书步履艰难	16
前言（文革概述）	18
序幕：文革前民主、赤化革命简史	31
附注 A	44
附注 B（图文）简评文革前简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	44
第 01 章：未加冕的帝王毛泽东	103
一、帝王意志：专断奢靡	103
二、帝王意志：寡人好色	109
三、帝王意志：权力放纵	119
四、帝王意志：伦理共识	122
第 01 章附注	129
第 02 章：“七千人大会”受挫	131
一、庐山会议后的形势	131
二、骇人的“信阳事件”和饿殍	133
三、召开大会的目的	144
四、为什么会犯错误？	146
五、毛、刘、邓的不同反思	149
六、林彪讲话和毛的“出气”权术	154
第 02 章附注	161
第 03 章：反击谋略之一：以阶级斗争为纲	162
一、以退为进——静观事态的发展	162
二、主动出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65
三、明修栈道——“四清”	167
第 04 章：反击谋略之二：棒打文艺界	173
一、两个批示——先拿弱敌问罪	173
二、批“有鬼无害论”	176
三、八个样板	179
四、批《海瑞罢官》	182
五、文艺座谈会和《二月提纲》	186
第 04 章附注	192

第 05 章：反击谋略之三：丑化知识分子	195
一、憎恶知识分子言行	195
二、“书读得越多越蠢”论及其他	200
三、问鼎诺贝尔奖金	205
第 06 章：反击谋略之四：大搞造神运动	210
一、学雷锋运动	211
二、工业学大庆运动	214
三、农业学大寨运动	220
四、全国学解放军运动	230
五、学《毛主席语录》运动	245
第 07 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252
一、《五一六通知》	252
二、批斗开国元勋朱德元帅	258
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262
四、《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	271
五、第一波自杀风潮	275
第 07 章附注	280
第 08 章：利用红卫兵再造神	283
一、毛泽东的红卫兵	283
二、“接见”红卫兵	287
三、敕训红卫兵	292
四、“三忠于、四无限”	299
第 08 章附注	310
（上卷完）	310

代序（笔者想说的题外话）

代序目录

1、八十抒怀	★2、迟到的纪念	★3、总算发完了	4、本书步履艰难

八十抒怀

——笔者抒于 2015 年 4 月 5 日八十生辰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人生如梦”，我不懂。那些年，我怕挨饿受冻没学上，又怕在人的屋檐下睡觉，更怕在那里做梦，因在那里老做噩梦。长大成人后，梦总跟着我，几乎天天都得做，不离形影。

梦，不光有噩梦，还有当了二十年太守的南柯官梦，更有黄粱一枕的美梦，可我从没有做过一个能写成小说的完梦。因为，当我醒来时，留在记忆中的人和事，大多都是断断续续，朦朦胧胧。

我曾是一只苍鹰，已记不清梦中飞翔的情景。

一群苍鹰翱翔在蓝天白云里，远眺龙门山色，近听马寺钟声，沐着洛浦秋风和铜驼暮雨，飞向北邙密林里的上清宫……

啊，那不是梦，那是遥远童年的记忆，我的渴望。但当看见笼架上发呆的苍鹰，我庆幸自己是人，不是鹰。

我曾是一匹野马，已记不清梦中的草原，也记不清如何在草原上奋蹄，驰骋。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春风得意马蹄疾，欲饮琵琶马上催，万马奔腾山作阵，神驹飞来雷万霆……

啊，那不是梦，那是百读不厌的诗，我的向往。但当看见上了笼套的马，我庆幸自己是人，不是玉花骢。

我竟然还曾是一条狗狗，但已记不清在梦中怎样向主人摇头摆尾，纵横痴情。

一条哈巴在进餐，看上去比我三四十年前吃得好；又看见牠身上那套巴儿装，显然比我三四十年前穿得漂亮、干净。

啊，那不是梦，那是都市里的一道风光，我的憧憬。但当看见牠们紧跟主人跳跃起舞时，我庆幸自己是人，不是巴儿因哈得宠。

梦中，我喜欢马的仁厚，赞扬狗的忠义，讴歌鹰飞悠然；醒来，耳濡目染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真假难辩，模糊不清。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梦总缠住你不放，直把你缠得弄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醒。

当看见有人举枪瞄准飞翔的苍鹰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当看见驯马师扬鞭抽打时，我在颤栗，就像当年红卫兵用皮带抽打我时那样彻骨疼痛！当看见被主人们放逐的狗在街头流浪时，仿佛我又跌落井底，盼望“更上一层楼”的先生、朋友们，不要搬石块往井里扔！

我不愿做梦，却深陷于反复无常、诡秘莫测使人浑浑噩噩的梦幻中。

——世代英豪，似梦非梦宛如梦；人间附庸，似醒非醒恍若醒。恰似曹霁《梦》中所题：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2015.4.5 首发于网易博客，后遭封杀）

* * * * *

迟到的纪念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笔者曾计划在2016年5月16日那天发表一篇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但人算不如天算，我的青光眼、白内障等眼疾迅速加重，用放大镜已看不清文字，眼睛近于失明。因青光眼手术失败而不愿再次手术的笔者，犹豫多天后，不得不求助于再次手术，因而计划的纪念文章也不得不推迟。也许是巧合，5月16日那一天，我被送上了手术台。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著名眼科专家余晓临亲自操刀下，眼睛恢复了光明。余教授精湛高超的医术，令人心悦诚服。遵照医嘱，两个月后，我重新开始了这篇纪念文章的写作。）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016年5月16日，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之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在那场大革命中，毛泽东为了强化个人独裁体制，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使他在中共权力内讧中，用“无产阶级文化”亦即用谎言、野蛮、邪恶的马列丛林赤色文化，战胜了刘少奇等党内右派的反抗；在毛、刘左右两派的内讧中，中国人民为其付出了巨大代价：200~300万人丧生，1,000多万人致伤致残，国民经济被革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日子之所以值得纪念**，还因为，毛泽东和中共，在那场大革命中，华夏文明的儒释道文化，受到了丛林赤色文化的恶意歪曲，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文化，遭到了丛林赤色文化的肆意丑化，从而使现代中国

社会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假、恶、丑横行天下，批、斗、杀甚嚣尘上，广大老百姓也因而陷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日子之所以值得纪念**，还因为，文革后重掌权力的中共右派集团，从邓小平的有限反思起，三十年走过了江泽民回避、胡锦涛忌憚到习近平拒绝反思文化大革命之路程，使大陆老百姓缅怀毛泽东暴政下数千万死难者在天之灵的心愿，迄今无法实现。

五十年过去了，曾承认文革为“浩劫”的中共，从不认真反思到拒绝反省的过程，是马列主义丛林文化本质所规定的了，因而是非常自然的。笔者在《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颠覆华夏文明、挑战普世价值的丛林赤色文化大革命，或曰**赤化革命、痞子革命**。从广义上来说，赤化革命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已经开始，迄今尚未终止；从狭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赤化革命的一部分，从毛泽东利用中共组织下令实施《五一六通知》起，到毛泽东死为止。”“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话没错。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转口传入中国的德国和英国货，而列宁主义则是正儿八经的俄国产品。马列主义的传入，使外来挑动仇恨的权力拜物教文化与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混合在一起，熏陶了中国共产党人，从而使他们开始了以颠覆华夏文明、推翻以孙文思想和‘五四’精神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目的的暴力文化革命——赤化革命。这种赤化革命，在1949年10月1日前，表现为武装夺权，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为掠夺和镇压！”

因此，毛泽东死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对文革做了保权的有限反思后，便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力图继续推进和强化赤化革命。但不论在中国抑或在世界各地，赤化革命越来越不得人心，“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等革命口号，早被世界各国人民扫进了垃圾堆，赤化革命陷入危机之中，按照中共御用精英们的说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到了习近平时代，尽管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的核心价值里塞进他们厌恶的“自由”、“民主”等字符，但继续推进和强化赤化革命的目标未变。尽管经过邓、江、胡、习等王朝的经营，共产主义理想已被他们退化成了人们调侃中的笑料，但社会主义道路却被他们塑造成继续推进和强化赤化革命的“**优良**”产品。

社会主义与四大灾难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学思想，主张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一切资源，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广

为流传，发展出众多不同分支，大体上可分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公平、正义；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在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公平、正义被阶级斗争所取代，科学被政治化，变成了服从苏共中央的代词，科学社会主义也因而演变成一党专权的斯大林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斯大林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稍加修剪后，便在中国生根发育，很快成长为毛泽东式的党国社会主义。

党国社会主义是以党国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所谓**党国主义**就是：**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前者，用武力把国家的一切资源据为党产，使中共党变成全国唯一雇主；后者，用武力把党的权力凌驾于国家一切权力之上，用个人崇拜去神化雇主的绝对权威，用自订法律去强化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的不二权力。这种党国主义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的中国化，也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王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于是，在中国，便产生了长达数十年久淫不衰的“大救星”、“党妈妈”、“镇压有理”和“社会主义好”等“理论”。显然，这种党国主义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封建帝王思想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党国主义已蜕变成**党宗主义**。党国主义是把党的权力凌驾于国家之上，党宗主义则把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国之上。在**党宗社会主义**里，毛泽东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一手遮天的结果使人为祸害接踵而来，从而使中国人民为他和他的社会主义付出了惨痛代价：

以镇反、肃反、土改、合作化等运动和每年逢年过节的“严打”为名义的**大屠杀**，全国枪杀、打死约为 500~600 万人，使中国老百姓长期处于红色恐怖中；

以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为手段的**大掠夺**，使国家经济基础各个领域内的全部资源，即土地、矿山、工业、农业、手工业、科学、文化艺术、文教卫生事业等资源，在“国有化”的名义下，统统变成了毛泽东可以任意挥霍的党产，而老百姓则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和奴仆，中国人民自此处于“瓜菜代”的长期贫困中；

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所引发的**大饥荒**，在中国制造了 3,000~4,500 万个饿殍，而官方只承认“非正常死亡”3,767 万人；

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文革**，导致全国 200~300 万人丧生，1,000 多万人伤残，国民经济也被革命到了“崩

溃的边缘”。

历史记录证明，毛泽东的党宗社会主义，既不是先哲们所描述的国家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空想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独裁社会主义，犹如北朝鲜金家王朝社会主义那样。迄今为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给人类没有带来公平、正义和光明，带来的却是野蛮、邪恶和黑暗。毛泽东用他的党宗社会主义给中国制造的四大灾难，证明他是**谎言、野蛮、邪恶**的化身，是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齐名的二十世纪四大杀人恶魔。因此，清算他的罪行，消除他的影响，把他和他的社会主义以及他的文化大革命钉在“**罪恶滔天**”的耻辱柱上，昭示天下以儆效尤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政治任务。

邓小平两策救中共

毛泽东的党宗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制造的四大灾难，使中共处于危机之中。毛泽东死后，为了拯救处于危机中的中共，邓小平设计出了两套拯救中共的大政方针：**一套是否定毛泽东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另一套是保护和美化毛泽东**。邓小平的两策获得了成功，终于率领中共走出了困境。

但邓小平是个党国主义者，他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是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其私利性和权谋性十分鲜明。

首先，他的“拨乱反正”是收买人心的权宜之计。为了战胜当年中共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毛左派，他主持平反了毛泽东时代制造的（不乏有他制造的）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使他有效地控制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为最终罢黜华国锋等毛左派、确立以他为二代权力核心的新体制奠定了基础。但他的“拨乱反正”并不是拨独裁专政侵犯人权之乱，反（返）人类公平、正义之正，因此，当大权在握后，党国主义使他开始了新一轮的赤化革命，人治红祸继续肆虐中国，冤假错案继续繁衍大陆。

相对而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还是比较成功的。“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到2010年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但他是个党国主义者，毛氏党宗社会主义与他的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党国主义的滋蔓，两者本质相同。两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独裁、迫害、经济滞后+百姓共同贫困**；后者——**专制、腐败、经济高涨+官民贫富悬殊**。显然，无论是毛氏社会主义还是邓氏社会主义，由于缺乏公平，排斥正义，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中国人民力图淘汰的制度。在邓氏特色社会主义里，以红二代、官二代为主的权贵们，

以党国雇主的心态把持朝政，据领党、政、军、经、文各域要津，任意挥霍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敛财，贪污腐败横行霸道，从而使中国社会迅速两极分化，民怨沸腾。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中共高层顽固不化，拒绝悔改，死抱住赤化不放，扩编警务，组建武警，加大维稳投入，强化镇压力度，力图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像秦始皇想的那样二代、三代地传下去，传之于千秋万代。

对于中共永保权力的心态，笔者曾在《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历史已经清楚地写下了这样的记录：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暴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政策，是他们用改革开放推翻了毛泽东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引以为荣的反人类的文化大革命；一言蔽之：是他们推翻了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间除一党专政和土地党国所有外所主导的一切！然而，正是他们这些人，却信誓旦旦地说要‘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为什么呢？显然，他们都已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从而终结苏联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教训中，获得了灵感：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永远执政，永享既得利益，就要充分利用权力，千方百计地保护毛泽东这具僵尸，用令人作呕的颂辞去美化这具僵尸，不厌其烦地用重复复重复的谎言去包装这具僵尸；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这面旗倒了，中国共产党就会像苏共一样垮台，他们的权力、爵禄以及他们子女、亲属的既得利益，都会付诸东流。”

因此，邓小平告诫全党，要保护和美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但邓氏四项基本原则使特色社会主义日益走向反公平、反正义因而反人民的歧途。在江、胡、习等几代王朝统治下，官民矛盾日趋尖锐化，民主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自由诉求的潜流汹涌澎湃，使中共再次陷入执政危机之中。显然，邓氏拯救中共的两策，只能暂时缓和中共执政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权非法性所带来的无法稳定的痼疾！

但为了永享既得利益，邓、江、胡王朝，死抱住邓的保护和美化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不放。到了第五代的习近平王朝，保毛媚毛有了进一步发展，两个 30 年“理论”便被炮制了出来。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在一个研讨班上宣布他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即“**不能用后 30 年否定前 30 年**”或曰“**两个 30 年**”的“理论”。这个“理论”，等于下令不准非议毛泽东制造的四大灾难。

不思悔改，继续赤化革命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名言。“解放”后六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无论是前 30 年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后 30 年的邓小平（含江、胡、习）时代，由于党国社会主义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权的，因而是非法的，他们的社会主义也因此而始终处于遭人民唾弃的危机之中。

在毛、邓前后两个 30 年的时代里，他们处理危机的方式基本相同，即软硬兼施的**镇压和欺骗**两手，但也有差别。

为了平息老百姓的反抗，他们对付老百姓的手段首先是镇压。毛泽东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里，被**关**（刑徒入狱）、**管**（管制改造）、**劳**（劳动教养）、**杀**（枪杀打死）的老百姓数以千万计。不仅如此，他在位的二十七年中，利用痞子、流氓无产者等“群众”的冷酷和暴虐，先后发动了 27 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无政府主义的所谓“群众运动”，以“群众”之名，实行批、斗、打、抄、杀的**红色恐怖**，使广大群众处于法西斯式的红色恐怖之中。到了邓小平时代，关、管、劳、杀的镇压规模和形式有所收敛和改变，但镇压回、藏、维等少数民族的枪声、炮声不断，其中“六四”天安门的枪声至今还在人民心中回荡。

同所有专制独裁政体一样，毛、邓、江、胡、习的中共，不忘对老百姓实施软的一手，如以雇主的身分“关心群众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也不忘用“大救星”、“党妈妈”的美名往脸上贴金。直到今天，许多基层党组织还在教训**纳税**的老百姓，不要“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肉是党给的，“不要忘记本”。但要永享权力和既得利益，光贴金、教训不行，还要善于欺骗，让芸芸众生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于是，“**舆论一律**”、“**主旋律**”等人治的洗脑“法规”，都被他们炮制了出来。

在毛泽东时代，“舆论一律”洗脑术是欺骗的主要手段。那些年，所有媒体必须姓党，更要姓毛，否则格罪无论，可以说是**只准党媒散布谎言，不许百姓诉说真情**！到了邓小平时代，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迫使他们改用“主旋律”洗脑术进行欺骗。但媒体必须姓党，接受中宣部统一领导，也就是说，**只准官方利用媒体以假乱真地胡说乱道，不许百姓利用媒体实事求是地陈述真相**。因此，无论是“舆论一律”，还是“主旋律”，都是控制传媒、保障谎言、制衡真话从而使中华民族集体失明的洗脑机制；换句话说，从毛泽东的“舆论一律”，到邓小平的“主旋律”，再到习近平的“两个 30 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封杀老百姓民主、自由权利的洗脑史。

在一党专政下，两个 30 年的“理论”就是政策。于是，以仰头思惟为己任的御用精英们，蜂拥而起，纷纷著书立说，利用官方媒体，颂扬两个 30

年“理论”的“伟光正”，亦即“伟大、光荣、正确”，要老百姓顶礼膜拜。

在中宣部“主旋律”的监控下，原北大副校长**梁柱**成了宣扬“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理论”的干将。他在《攻击、抹黑毛泽东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表现》和《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剑**》等文中，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前夕，代表党国主义者（不排除代表官方）向批判毛泽东的异议人士，发出了批判和镇压（亮剑）的信号。

梁柱在《亮剑》中对异议人士横加指责，他用“**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透过个别现象而否认本质，孤立的分析历史中的阶段错误而否定整体过程**”的“两个否认和两个否定”，抨击批判毛泽东的异议人士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从严格意义上说，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并不准确，因为它否定的是整个历史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某些方面。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都是党国主义者，他们并不讳言他们是站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场上去“亮剑”的，因此，准确地说，他们是伙历史装修主义者，他们要用他们为打扮楼堂馆所等建筑物的装修设计那样去打扮他们想要打扮的历史，并把这种装修设计戴上“**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主流**”和“**本质**”的帽子，并用“亮剑”进行威吓，不许别人摆事实，讲道理，说真话。

历史不断证明，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们，都是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去装修、打扮历史的，这是**解读他们言行的钥匙**。

——当人们指责毛泽东“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残酷枪杀数百万人民群众时，他们便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用“**历史的规律性**”去论证大屠杀的必然性，教训老百姓“要从革命需要出发去理解这种杀戮的‘必然’性，而无庸道德价值判断”。

——当人们质疑五十年代**推行**“三大改造”和八十年代**推翻**“三大改造”的合法性并将其称之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胡折腾**时，他们仍旧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先用“**历史的规律性**”去论证农业合作化、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五十年代“河东”时**推行**“三大改造”革命的**正确性**，而且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但当“三大改造”危及中共生存迫使其不得不作180度大调整时，他们依然站在党国主义立场上，紧紧跟上，随着来了个180度大转身，再用同样的“**历史的规律性**”去论证八十年代“河西”时**推翻**“三大改造”即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到户、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改革的**正确性**，同样也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当“三个代表”登台后，他们不忘党国主义立场，又紧紧跟上，用“三个代表”去论证胡折腾是“**一贯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人们抨击“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所引

发的大饥荒在中国制造了 3,000~4,500 万个饿殍”时，他们的党国主义立场十分坚定，先是否认，后来不得不默认，半个多世纪后，又诡辩说，大饥荒是“支流”，数千万饿殍是“个别现象”，肆虐六亿农民二十五年使其长期处于“瓜菜代”煎熬中的人民公社，是“局部现象”，等等，这些都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主流”和“本质”，因而不能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伟光正”。

——当人们痛斥文化大革命反人类时，他们的党国立场更加坚定，先称其为“浩劫”，后作淡化处理，“两个 30 年”登台后，他们又把长达十余年对老百姓进行批、斗、打、抄、杀从而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上千万人伤残的文化大革命，诡辩为“阶段错误”，抨击不同政见者的异议是否定毛泽东“伟光正”的“整体过程”。显然，他们赞颂的“整体过程”就是毛泽东建立的“独裁、迫害、经济滞后+百姓共同贫困”的党宗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可见，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们维护毛泽东、毛的社会主义和毛的文革是荒谬的，反人类的，其党国主义立场是卑劣的，邪恶的。

今天，处于危机的中共，不思悔改，死抱住毛泽东那具僵尸不放，以为只要毛泽东那面红旗不倒，便能确保他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世袭下去。然而，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面前，任何逆潮流而动的独裁者和专制者，无论他们打的社会主义旗号多么美丽，颂歌唱得多么动听，手中权力多么强大，一旦时势到来，他们也会像当年“柏林墙”轰然倒塌那样，变成一堆人类不齿的垃圾。

厘清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在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中，由于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们的干挠和破坏，造成了诸多认识上的误区，人们务必加以厘清，为批判、清算毛泽东扫清道路。

误区之一是文化观念缺失。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是革文化的命，或者干脆叫武化革命，他们在书写“文化大革命”时，往往要加上个引号，示意不仅仅是引用，而是具有特殊含意的否定。其实，毛的文化大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亦即用马列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丛林赤色文化去批判、丑化、颠覆华夏儒释道文化和普世价值文化的革命。这种丛林赤色文化的突出表现是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亦即悍猴称王的丛林法则和成王败寇的封建思维。今日中国人性泯灭，道德沦丧，是毛的文化革命恶果之一。因此，批判、清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要批判、清算他的**污垢文化**。

误区之二是真假观念错位。同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一样，中共离开谎言便无法生存。为了使谎言畅通无阻，“舆论一律”、“主旋律”成了谎言的可

靠保证；为了塑造谎言的“真实性”，尘封档案又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在长期洗脑实践中，官方和御用精英们，制造了这样一条谎言“法则”：“说假话的是骗子，说真话的是傻子，真话假话掺和着说的是君子，把假话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的是‘伟光正’大师！”于是，善于真假掺和并能在所有媒体上大显身手的御用精英们，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都成了横竖是理的“君子”；把持历史档案禁止老百姓查阅的官方，可以自由地打扮历史，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成了发布历史事实和数据的权威“大师”；敢说真话的“傻子”们，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都被封杀于所有媒体之外，几无立锥之地，更有诸多因言系狱者。于是，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四大灾难，好像压根儿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这种悲剧可能要延续到终结“主旋律”和解封档案的那一天。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许多人（包括一些编导），对民间传说、观点和文章，鄙薄不已，却对中共官方发布的所谓权威信息、御用精英们真假掺和的谎言，青睐有加。这种真假观念上的错位，是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中**必须矫正**的问题之一。

误区之三是正邪观念颠倒。党国社会主义特别是毛泽东的党宗社会主义所制造的四大灾难，是野蛮的、邪恶的，是历史的大倒退，因而其制造者是反人类的反动派。当年曾被毛钦定为反动派的人和集团，其中有许多人虽抨击毛为独裁者，却回避称毛及其集团为邪恶的反动派。这是正义与邪恶观念颠倒的表现。梁柱等御用精英们，学着主人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策略，在批判反毛的异议人士时，信誓旦旦地宣布，他们颂扬毛泽东是“为真理奋斗”，而“真理就是人民的利益”，他们“理直气壮”教训异议者要“光明正大”，不要违犯“起码的道德”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显然，他们是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打着“正义”的旗号去反对异议者的正义诉求。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对毛的党国或党宗社会主义的谎言、野蛮、邪恶本质视而不见，却把毛的罪行压缩成左倾、右倾、缺点和错误，甚至要求批毛者“言词舒缓”，不要“偏激”、“过度”等等，显然，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误导老百姓，使毛的思想、主义远离野蛮和邪恶，增加了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难度。

中共和梁柱等御用精英们造成的误区是是非颠倒的表现。在纪念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

中国的出路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中共统治下已整整生活了七十个年头的笔者，对中国的前途虽不乐观，但不悲观。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目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已经把中国拖入绝境，

政权崩溃指日可待；但出人意料的是，邓小平的两策挽救了中共。八、九十年代，笔者深受**国际绥靖主义**的影响，以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必迫使中共改变专制政体，党内外必然会出现**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哈维尔**等那样的领袖，引领中国走向民主；然而，中共高层顽固不化，使政治形势呈倒退态势。

处于危机边缘的中共，始终处在保权、保党和保社会主义努力之中。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吴的“五不搞”是向老百姓宣战，强硬表示他们不放弃权力，不放弃党的领导，不放弃他们的党国社会主义。从吴的“五不搞”到习不准批判毛泽东的“两个30年”，显现中共高层顽固不化；同时，也显现国际绥靖主义的幼稚，显现他们试图依靠中共高层进行自我政改希望的破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到来之时，中共高层的顽固不化表明，揭露、清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反人类罪行的活动，不能有些许松懈。据笔者观察，今天中国乃止全世界，揭露、清算毛泽东文革反人类罪行的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系统地揭露、清算的文章太少了，而系统地揭露、清算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四大灾难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没有形成声讨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强大压力，这也是处于危机中的中共暂时得以喘息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共高层顽固不化，专制与腐败使官民矛盾日趋白热化；在维稳的高压下，反专制反腐败的风浪此起彼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今日中共，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迫使他们不得不经常用“亡党”“亡国”来警告、教训他们的党员自律；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党内有选择地反腐，将党内几个异己和妄议中央核心的领导干部打成“大老虎”，借以在强化个人权力的同时向老百姓昭示他们的清廉；但为了永保权力，他们却长期拒绝向老百姓公布他们的个人和亲属的财产。在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之际，所有渴望中国新生的志士仁人，要团结起来，消除分歧，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只有清算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反人类罪行，才能顺利清算毛泽东在**大镇压、大掠夺和大饥荒**中的弥天大罪，才能动摇中共一党专政的思想基础。

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长期洗脑下，中华民族处于**集体失明**状态中，因而，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任重而道远。不思悔改的中共当局，正在酝酿第二个毛泽东于襁褓中，迫不及待地高唱什么《**东方又红**》、《**不知该怎么称呼你**》等等，力图把中国拖向第二次文革和其他形式的血腥革命。然而，历史不会去打扮权力，也不会让党国主义者打扮、篡改历史的行径得

逞于永远。“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鉴于此，年迈的笔者，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深信有如人间有许多使人眼睛复明的医生余晓临那样，在批判、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中，中国一定会涌现出许多使民族集体复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率领中国终结党国社会主义，使**天鹅绒**覆盖中国山山水水，让**茉莉花开**遍华夏辽阔大地。——这是人们在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时的共同期待！

一个步履蹒跚年已八十二岁的老人，正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2016.7.26 首发于凯迪网[原创评论]被封杀，继发于明镜博客）

* * * * *

总算发完了

2015年5月16日，笔者在阿波罗发表了“八十抒怀”和“我的墓志铭”两篇短文，意在纪念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四十九周年。自此，我开始按“总目录”顺次，逐章逐篇发表约百余万言的《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迄今已整整四个月。

逐章逐篇发表《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是我的宿愿。但这个简单愿望，在大陆，是可望而无法触及的水中弯月。

诗仙仰天长啸：“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而今大陆诗坛有几人敢这样纵情？笔者一介草根，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因瑟索而小心翼翼：一怕没有写完身先死，二怕没处刊登白搭工，三怕没有人看遭耻笑，四怕没法出版变垃圾。可见，笔者与李白的豪情相比，乃天上地下也！

不过，笔者有草根的自信：他会生长；即使枯萎，也是草料、绿肥。不论幸遇浇灌，还是残遭践踏，笔者都会用自我的视角，去抒发自我的观点，用自我的方法，去批判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的谎言、野蛮和邪恶，撕开他们的画皮，让中国人都能看清他们欺世盗名的真面目。写作自然离不开继承和借鉴，更不能缺乏创新和发展，但在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中，要自我作古，力争写出自我，展现自我。笔者做到了吗？旁观者清，应由读者去评断。

英雄尚有无用武之地，况一草根耳！笔者年轻时自作多情，写些颂扬小品，因颂扬不到位，都被拒于报刊门外。中年投笔从业泥瓦匠，与粗犷同舟共济，与斯文渐行渐远。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退休后忽现博客。这个不用严审便能以文展现自我的新事物，启迪了我，旋弃灰砂而从文字。

但从文亦非坦途：正当我在“博客屋”中纵横驰骋时，突遭“腰斩”；继而又在腾讯、新浪、凤凰中寻觅宽容者，先后均被拒之于门外；所幸网易胸怀较宽，竟容我多年，不料，容到今年5月，也对我痛下封杀之手。我陷入困境。我生在大陆，长在中华，从未离开中国一步。我爱大陆人，钟情于在毛泽东暴政下死难的数千万同胞，因而，我要为他们而写，为他们鞠躬尽瘁，发誓以书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正当环顾前后左右而“疑无路”时，翻墙软件向我展示了“柳暗花明”的境界，使我这个年逾八旬步履蹒跚的一介草根，歪歪斜斜地走进了“太阳神”之家——阿波罗。

远古，太阳神阿波罗，惧于众神领袖宙斯的独裁，不敢借火种给普罗米修斯，却“纵容”他来偷，结果天神“偷窃”成功，给人类送来了光明；而今，阿波罗不畏共产主义的残暴，敢把“火种”交于一介草根，支持他在阿波罗里发表他所写的书，在告慰死难同胞的同时，去唤醒今日中国大陆还在昏昏欲梦中悠然为奴的芸芸众生。

在阿波罗，因眼神不好，笔者用放大镜对句子、错别字、标点等文字上的谬误进行逐篇校勘，力图把常识性错误降到最低水平；又因年老体弱，曾暗暗祈祷：太阳神保佑，不要让我突然倒下，蔽护我在阿波罗里把《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一书发表完。祈祷应验，在阿波罗的支持下，9月16日，书终于在网上发表完，尽管图表瑕疵使版面不尽如人意。

笔者还有个“远大的理想”：求太阳神再保佑，让我再活个三到五年；到那时——在我倒下之前，笔者也许能看到，有众多读者、专家和学者，因阿波罗而愿意评论我的书，有众多出版商，因阿波罗而愿意出版我的书，大陆的老百姓，也因阿波罗而能读到我的书；到那时——在我倒下之前，笔者将同千千万万个志士仁人一起，踏着普罗米修斯的足迹，高举着阿波罗的“神火”，把长夜难明的中华大地照亮！

衷心向阿波罗致谢！

（2015.9.16 发表于阿波罗网）

* * * * *

本书步履艰难

由于笔者年迈，且**高血压曾使我一度搁笔，心绞痛还差点要了我的命**，因此，计划每写成一篇初稿，都要设法发表出去，借以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告慰受难者再天之灵的心愿。

本书最早写成的二三十篇初稿，发表在“博客屋”的博客里。因无留记录，“博客屋”遭封杀后已无法查核。

在网易上建立“一介匹夫博客”始于2006年12月3日，被全面封杀于2015年5月15日，历时八年半。在“一介匹夫博客”里，笔者曾先后发表本书初稿122篇。其中：首先发表的《评说01：学雷锋运动》一文，是在2007年3月10日；遭全面封杀前的2015年5月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评说122：简评人民公社运动》。

当“一介匹夫博客”遭全面封杀后，笔者曾以“rsrr”笔名在凯迪网上发表过51篇本书**删节稿**，但大多数遭到了封杀。

由于在大陆媒体上已无发表本书的希望，只好“越界”出走阿波罗。在阿波罗博客里，历经四个月的努力，到2015年9月16日，把本书**第一稿**全部发表完。

接着，本书**第一稿**又发表在明镜博客上。从2016年1月3日到2016年5月4日，本书拆分成323篇，在那里全部发表完毕。

如今，9月23日，本书**第二稿**修订业已完成，往哪里发表，用什么方式发表，还是个未知数。

由于我的亲属好友多不支持我撰写此书，更有反对者，因此，从开始搜集资料到书写、编辑、修订、校对本书，全由我一人运笔敲键。由于年老、体弱、眼花、健忘，敲键中不断发生常识性错误，运笔中很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有老伴在生活上的悉心照料，使我能够在倒下之前，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和修订！

2016.10.1

（2017.02.13 发表于明镜博客）

★前言（文革概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的和平环境里，发生了一场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或曰赤化大革命，痞子大革命。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不无自豪地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刚两年多一点，那场被他誉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保证中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他的继任人——中共中央右派（1）领袖们，谴责为“十年动乱”和“浩劫”。他的那些左膀右臂们，那些为他冲锋陷阵且荼毒生灵的打手们，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便被党内右派一网打尽，三年后又登上最高法院的特别法庭受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结束了他们长达十多年的自恃、骄横和至尊，成了刑期漫漫的阶下囚。

毛泽东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不假。

六十年代初饿殍遍野大灾难过后，在中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首、国防部部长林彪为副的左派集团和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右派集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居中摇摆于两派之间。在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大量饿死农民——中共官方称“非正常死亡”3,767万人的残酷现实面前，党内右派有良知地、策略地承担了责任，他们在党内中摇派的支持和左派的默许下，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和有效的补救措施，如政治上广开言路的“神仙会”（2）和经济上的“三自一包”（3）等亡羊补牢措施，扭转了局面，当时颇得人心。在饿殍遍野面前的毛泽东呢？由于他鼓吹和顽固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政策，威望遭到重创，权力受到了党内右派前所未有的挑战，被迫退居二线。但崇信枪杆子的毛泽东，不甘人下，他死死抓住掌管枪杆子的林彪、紧紧拉住党内中摇派，终于在1962年9月，打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旗号，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叫，开始向党内右派发难。

制造舆论，以舆论为先导，这是毛泽东夺取权力的拿手谋略。从《新华社》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等文件中可以看到，自1963年到1965年间，毛泽东曾多次批判“**有人不搞阶级斗争**”，说“三和一少”（4）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指派他的夫人江青，借批判《“有鬼无害”论》、《海瑞罢官》等文章，大造舆论，推倒“神仙会”，无情地打击支持党内右派的知识分子，步步逼向党内右派。同时，他还纠集

许多棍子打手，诸如姚文元、王力、戚本禹等，制造耸人听闻的白色恐怖谎言：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分子就会上台，就会使中国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就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批判的噪音越放越大，防修反修的口号越呼越响，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火药味也越来越浓烈，全中国都被拖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中。事实已表明，在那时，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打倒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的战旗已经竖起。到1966年5月，毛泽东依靠军队和舆论力量，剥夺了党内右派的中央领导权。但强大的党内右派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右派反攻倒算的危险，下决心借助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打倒党内右派势力，消灭一切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于是，他软硬兼施，迫使中共中央通过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从而使中国卷入了旷日持久地、一场接一场地、血腥地、大规模地批斗和屠杀中。

在这场反人类的血腥批斗、屠杀中，党内右派包括多数中间派，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最终他们却笑到了最后；不可一世的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左派集团，在文革中横行霸道，但最终却遭到了沉重打击！

在那场浩劫中，上层权力搏斗，使中国老百姓付出了惨痛代价：两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伤残不计其数！历史记录了一场浩劫中的大批、大斗、大屠杀、大改组：

1965年 舆论准备——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年 批“彭罗陆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破“四旧”——**文革第一轮大屠杀；**

1967年 夺权和反夺权、武斗与镇压、“群众专政”——**文革第二、三轮大屠杀；**

1968年 上山下乡、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文革第四、五轮大屠杀；**

1969年 斗、批、改，折磨死刘少奇；

1970年 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文革第六轮大屠杀；**

1971年 批陈（伯达）整风、副统帅林彪出逃摔死；

1972~1973年 批林（彪）整风；

1974年 批林批孔批周公（恩来）；

1975年 再批周公、整顿、石河子镇压、沙甸惨案——**文革第七轮大屠杀；**

1976年 批邓（小平）、“四五”怒潮、毛死、宫廷政变；

1977年 “两个凡是”、邓小平复出，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文革第八轮大屠杀；**

1978年 批“两个凡是”、小岗村农民“造反”；

1979~1981年 文革余波：平反、改革开放、审判闹剧。

那一场接着一场的大规模批斗和屠杀，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回忆起来，至今还心有余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

的5月16日，即中共在1966年通过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文革大屠杀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著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据官方统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虽未正式立案审查但被错误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群众，更是不计其数，仅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多人；集团性冤假错案，全国有近两万起，涉及干部、群众达几十万人。连同其他的冤假错案，共有300多万件；文革十年间，直接遭到非法处理的就达几百万人。

在文革的“横扫”、破“四旧”、夺权、全面内战、上山下乡、“群众专政”、“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夷平沙甸等系列反人类运动中，造成了空前人权大灾难，使数以百万计的死难者，成为毛泽东夺取权力祭坛上的牺牲。死难者大部分被枪杀、打死或自杀，还有相当一部分备受折磨而死。在这些死难者中，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无辜平民百姓，甚至八九十多岁老人和刚满10天的婴儿（湖南道县），都不能幸免于难。

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人权灾难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披露了这样一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中国多数学者认为，文革死难者约在300万以上，史学家丁抒则认为文革死难者不少于200万。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在北大《燕南评论》上撰文《文革学研究》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现在看来，死亡人数也许没有这么多，但无数的人遭受迫害、屠戮，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考据后认为：叶是那么说的；但可能年老口误，把“伤亡”说成“死亡”！

文革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

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总之，人死了**很多**。”看来，在文革资料死不解密、独立调查研究受阻、文革独立调查报告和回忆录遭查封、打压的环境里，文革死亡人数还会继续研究、考证和争论下去。

此外，在浩劫中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人数，许多专家认为在亿万以上。显而易见，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鲜血浇铸的赤化大革命，是对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5）的蔑视和颠覆！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怒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两千多年后的毛泽东，因向刘、邓夺权，一怒之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终致伏尸 200~300 万，血流 960 万平方公里！

文革中的国民经济呢？邓小平和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都说：“**文革末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出于拯救中国共产党的考量，官方拒绝清算毛泽东的滔天大罪，对文革信息实行禁脔和封锁，力图使中国人在流逝的长河里，悄悄淡化、改变乃至最后洗刷掉文革的记忆。今日中国，五十岁以下的中年人，了解这段历史的已少之又少，五十岁以上的老者，许多人对文革历史，也正在悄悄淡化中忘却。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共拒绝清算毛泽东暨文革的谎言、野蛮和邪恶，导致一党专政下的腐败，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扩展，从而使社会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民怨沸腾。其时，那些毛泽东时代的受益者以及他们的遗老遗少们，不去清算文革，反而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美好”，把鲜血淋漓的“横扫”、破“四旧”等红色恐怖，美化成“社会主义大民主”，竭力鼓噪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甚至扬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与此相呼应，党内以十七大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为代表的文革余孽，正在摩拳擦掌，卷土重来。而在文革受难者中，竟然也出现了为文革招魂者。例如，中共十八大常委、现任政协主席的**俞正声**，据说文革中，他的母亲被逼疯，妹妹自杀，株连的亲友死了六七位，但在 2011 年 6 月 20 日下午，他给上海交大学生上党课时，竟推波助澜，说他自己“**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毛当年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人们会附和俞正声的“**动机论**”吗？

不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绝非来自于他的理想主义，那个乌托邦是个美丽的借口，一个克敌制胜的策略；他的动机源于他的本能冲动，而这种本能冲动，源于他心底**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

所谓“权力拜物教”亦即对权生万物的权力崇拜，是马列主义的灵魂，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则是马列主义的灵魂中枢，同君权神授理论一样，都

是权力拜物教演绎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商品拜物教是资产阶级崇拜商品神力的商品情结，那么，权力拜物教则是共产党人迷信权力魔力的权力情结。这种权力情结，是欲望、贪婪、杀戮和恐惧的化身，是深藏于人类右脑中的潜意识，或称为“前意识”、“祖先脑”，亦是人类原始的、低级的、本能的需求，同雄狮竞霸、悍猴争王的丛林法则，没有本质区别。因此，马克思告诫共产党人，要充分运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权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进而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毛泽东则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林彪更直截了当地说：“**有权就有一切。**”凡此等等，一言蔽之，他们都崇拜权力，都对权生万物的“必然性”深信不疑，且走火入魔。列宁赞颂马克思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权力拜物教的毛泽东时代，亦即在中共用权力掠夺了国家全部资源的社会主义时代，人们看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已蜕变成官僚特权阶级的中共各级官僚以物资占有者的雇主身份赐予或分配给佣工赖以生存物资的关系。这种由权力占有全部资源后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都揭示了”毛泽东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失掉物质资源的老百姓依附于“大救星”的关系，“党妈妈”“哺育”八亿“子民”的关系，甚至从“**不劳动者不得食**”发展到“**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关系，一言盖之，就是雇主拥有对奴隶实行物资分配和生杀予夺权力的关系。例如，毛泽东在 1965 年春节谈话中，曾以雇主身份对文艺工作者发出过这样一条命令：“**你下不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与丛林法则不同的是，人类中的天才者毛泽东及其附庸，根据他们的恩师马、恩、列、斯的教导，能制造出许多“伟大、光荣、正确”的理想主义理论，把人类原始的、低级的、本能的权利需求，“论证”成公正的、均富的、科学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来颠覆人类社会区别于丛林兽行的普世价值和真、善、美的华夏文明，亦即用仇恨、杀戮的霸权来颠覆仁爱、宽容的人权，从而达到愚弄、折腾老百姓之目的。因此，就动机而论，如果说鼓吹大跃进是毛泽东以“大救星”自居的权力情结的疯狂，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则是毛泽东要清除异己、屠戮持不同政见者和争当世界领袖的权力情结的暴虐。俞正声用“好心办了错事”亦即用理想主义来替毛泽东贪婪、嗜权成魔的邪恶开脱罪责，是徒劳的，历史也不会答应。因此，我们有责任反其道而行之：

唤醒记忆！
拒绝遗忘！
力主反省！
敦促忏悔！

今日中共党政领导，多是当时的党内右派或党内右派接班人，对于那场反人类浩劫的反省，大多都停留在党内右派官员们遭受不公正待遇上，而置数百万死难百姓于不顾。出于对中共历史形象和既得利益集团合法性的考虑，从而拯救中共，他们千方百计地粉饰毛泽东，把毛泽东的种种罪行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把文革中的文件、文字、影像等资料，封锁于绝密的密室中，只有部分资料恩准少数御用专家据有。但封锁疏漏，有些异议者摆脱监控，使一些文革资料得以散落民间。

三十多年来，学者们虽然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那场灭绝人伦的浩劫，但由于资料和信息被严密控制，少数据有档案资料的专家、学者，又听命于中宣部“主旋律”权力的安排，有意保护毛泽东，淡化甚至绕开“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键的决定性的事实，使得多数人的研究，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晚年错误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这一官方权威性的政治宣传框架之下，使林彪和“四人帮”，几乎全部承担了毛泽东的“错误”，从而使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得不到应有的清算。这种**贬谪臣下、褒美君王**的保卫江山的封建传统，至今还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宣传、教育和文艺舞台。这是对历史的戏弄、玷污和犯罪！

清算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就要打破他对无产阶级的垄断。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权力拜物教理论，说到底，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夺取和保卫权力的理论。到了1957年，“无产阶级”同“人民”合二而一，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符号；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成了强奸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符号。历史证明，不经投票，毛泽东的中共便自封为95%以上人民的代表，并赋予“人民”以新的内涵：“**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样，毛泽东便把他和中共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等统治者，囊括在“人民”或“无产阶级”之内，与其相左的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乃至持中间立场的老百姓，不经调查，便知其为5%，都被他驱赶出“人民”或“无产阶级”范围，钦定为“阶级敌人”，或曰“反动派”、“反革命分子”等等。由此推见，毛氏所谓的“人民当家做主”，囊括在“人民”中的统治者，便当仁不让地“当家做主”；毛氏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囊括在“人民”中的官僚特权阶级，便又当仁不让地接受“为人民服务”。因此，本书要为“人民”一词正名：“人民”是泛指区别于政府官员的工、农、兵、学、商、文、宗教和居民等普通民众，或曰老百姓；无产阶级则是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已变成备受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盘剥、奴役的老百姓。本书的“人民”称谓，与毛氏强加给“人民”一词的内涵绝然不同。

当毛泽东代表 95%以上“人民”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笔者同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被迫身陷于浩劫之中；浩劫中历险和目睹的各种事件，至今还历历在目。当研究了散落于社会上少部分很不完整的资料，以及研究了被官方批准出版的部分个人著作后，笔者认为：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权力拜物教理论，它使谄练帝王厚黑权术的毛泽东个人权欲恶性膨胀，从而使他能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名义，疯狂地、无法无天地排斥异己、镇压反对派和屠戮无辜者。

在“人民”、阶级斗争和党的领导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熏陶下，中国固有的封建忠君文化进一步发展，人质情结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6)进一步发酵，一代共产党人为了尽忠、一代臣民为了表忠，他们争先恐后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呕心沥血，自愿或违心地自残、相残，更有甚者，甘愿为毛虎作伥、当枪使、充炮灰，到头来虽惨不忍睹地成为毛泽东坐鼎江山的祭品，也在所不辞。

从毛泽东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倒刘少奇、林彪和拖死周恩来、到最后想打倒而没能打倒邓小平的**火并**中，在包括那些罹难的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犯罪下，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那些毫无权利的弱势者和那些面对暴政威武不屈的先知先觉的义士们，他们在贫病交迫下，在一波接一波的红色恐怖中，备受煎熬、欺凌、蹂躏和屠戮，为“君臣”之间的争斗从而蔓延致“臣民”之间的争斗，付出了惨痛的、血淋淋的代价。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一部无产阶级专政导致权力失衡因而引发权力重新分配的历史，亦即是一部毛泽东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争权夺利的**内讧史**：文革之始，自封为“无产阶级”的左派，镇压右派，左派上台；文革之末，以“人民”自居的右派，发动宫廷政变，击败左派，右派掌权。在中共左、右两派激烈**火并**中，中国老百姓在“舆论一律”的洗脑下，许多人在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摇旗呐喊中，有两三百万人丧命，一千多万人致伤、致残，亿万多人受到株连、迫害，国民经济也因而倒退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正是：

毛泽东挟私夺权，老百姓蒙昧丧生！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造成的浩劫，是共产党人集体犯罪的结果：他们只认其功，否认其罪。1998年，在列宁主义的故乡，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为列宁下令惨杀的尼古拉二世及子女的安葬仪式上说：“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

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遗憾的是，继承马列主义的中共各级当权派，至今没见一个人为过去的杀戮忏悔。

产自于西方的马列主义与中国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马列毛主义，是权力拜物教文化，也就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美好的均富理想相搀合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它的灵魂，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故乡德国和产地英国，早已被那里的人民所唾弃，因而使那里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发祥地；列宁主义产地苏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改变了颜色，被毛斥为修正主义。（到了九十年代初，苏联修正主义者，纷纷抛弃马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俄共变成为自由竞选的在野党。）但这个早已被西方唾弃的理论，在中共和毛泽东手里，却变成了香饽饽，被他们崇拜得走火入魔。在他们的“科学”包装下，乌托邦共产主义及其灵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两个主要特征，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暴力崇拜”和“目的崇拜”。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蔽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列宁说：“暴力比 100 次辩论更有效。”因而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继而邓小平说（网传待查）：“杀 200 人，保 20 年稳定。”“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等等，就是“暴力崇拜”的吼叫。“目的崇拜”就是“成王败寇”。“罪恶导师”马基雅维里说：“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普列汉诺夫谴责他的学生列宁，为了胜利“甚至可以和魔鬼结盟。”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胜利者不会受责备。”因此，打着虚幻飘渺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天堂”理想主义旗号的革命者，只要胜利了，他们的任何谎言、任何妖魔化敌人的卑劣手段，都是革命者的最佳选择，都应加以美化包装，任何批评、责备，都是对革命的“反动”。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世界造成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这种崇拜丛林法则的理论，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已演变成马列加秦始皇主义，或曰马列毛主义。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颠覆华夏文明、挑战普世价值的丛林赤色文化大革命，或曰**赤化革命**、**痞子革命**。从广义上来说，赤化革命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已经开始，迄今尚未终止；从狭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赤化革命的一部分，从毛泽东利用中共组织下令实施《五一六通知》起，到毛泽东死为止。本书评说的重点是狭义上的文革。这种乌托邦共产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导致制衡缺失、权力腐败，诚信式微，道德沦丧，从而为中华民族招来苦难和两极分化。这是造成今日中国腐败积重难返的根源。

遗憾的是，当今研究文革者，多从左、右来褒贬赤祸中的人物和事件，较少触及赤化的根源：乌托邦共产主义及其中国化了的马列毛主义学说。他们论述文革的长篇大作，远不如普通网民来得干脆：都是马列惹的祸！因此，**不彻底清算文革的谎言、野蛮和邪恶，不推倒压在老百姓头上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两座大山，并用自由主义和民本思想的民主政治取而代之**，今日中国之腐败，将继续恶化下去，直到酿成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犹如当年慈禧为满清自掘坟墓那样：囚禁光绪，扼杀变法，从而酿造了孙中山“**驱逐鞑虏**”的辛亥革命！

文革年代，是痞子当权时代，因而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时代。一个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在被毛泽东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后，未经审判便失去了人身自由，旋即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直到被折磨致死。想想看，一个位高权重、处于“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国家主席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人特别是下层老百姓的命运呢？看看本书各篇，你就会找到答案。

我们不应忘记文革！

我们不能忘记文革！

我们无权忘记文革！

忘记和掩饰历史真相就是背叛：背叛国家！背叛民族！背叛文明！

但是，抨击文革的野蛮，是为了光复仁爱，揭露中共的谎言，是为了恢复诚信，批判马列主义的蛊诱，是为了重修社会宽容，清算毛泽东的邪恶痞积，是为了重塑真、善、美的华夏文明！因此，抨击、揭露、批判和清算的目的，在于还原真相，了解实情，让人们记住历史，吸取教训，敦促开明的政治家和有良心的革命家们，以世人称道的儒释道华夏文明、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四大自由”和以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倡导的宽容、和解、自由、非暴力的现代文明，重塑中国的未来，断不可有**以其人之邪道，还治其人之罪身**的恶念！

本书引用的文章和图片，许多都是从网络上流传的文章和数千张图片中筛选出来的。这些文章和图片，好似闲言碎语，又似苦口良药，但却真实地、生动地记述了那个时代里的愚昧、邪恶、野蛮和疯狂。

本书引用、摘录和笔者改写的原文等资料，大多是从网上复制、下载的。因此，除笔者“评说”和改写的文字外，其他文字、图片，大多是网络社会提供的。如果说网络社会提供的文字不实，图片有假，至少也是当局死不解密档案造成的。因为，有权接触档案的御用学者、专家们，大多

都是以真假搀合来打扮历史的，许多人都是制造谎言的能手，他们甚至以假批假，以黑打黑，从而酿成了“小道消息”的泛滥。因此，在文革大部分资料仍处于官方绝密尘封的条件下，人们对这些文章、图片等资料的真实性见仁见智是可以理解的。在谎言充斥的时代里，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是有选择的，并认同其真实性；但也不排除判断上的失误，特别是在统计数据精准上。

今日大陆所谓“正史”，早已成了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真实历史呢？那些真实的档案纪录，能销毁的大都设法销毁了，能篡改的大都设法篡改了，能回避的也都设法回避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当时明令“不准作纪录”的口头“命令”、“决定”、“通知”、“吹风”和“谈话”等等，随着年深日久，当事人或已作古，或年渐作古，调查越来越困难；他们中虽也有留下回忆录者，但有利害考量或惮于权力“主旋律”的淫威，有的对真实敏感问题躲躲闪闪，有的则为推卸责任而混淆视听，等等，其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待仔细考证；剩下来的那些没法销毁、篡改和回避的真实历史，其中的多数，又被严严实实地尘封于国家绝密文档中，哪许体制外学者接触？怎能叫老百姓翻阅？那些正直而认真的史学家，那些有良心的当事人和旁观者，以及那些备受蹂躏的受害人，他们的专著、回忆录里的任何客观议论和如实描述，都不可避免地要痛诉中共及其领袖们的胡作非为和残忍，必然侵害中共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触忤中共设定的“主旋律”的底线，因此，他们的专著和回忆录，不是被封杀于“摇篮”里，便是被拒于出版界之外，哪容老百姓知晓？那些老百姓容易接近的“文革遗迹”呢？例如，重庆市所剩下的那座全国唯一的红卫兵陵墓，当局曾不顾人民反对，借筹建宾馆的名义准备铲平它，打算彻底消除见证文革的痕迹，使其永远从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只是由于人民的强烈反对，才使这座陵墓暂时得以保存！

历史不应被权力垄断，不应被权力任意打扮。我们有责任不让昨天的权力支配现在，更有责任**不让今天的权力任意打扮过去，强暴现在，遥控未来**。历史的公正性在于：权力虽可以任意打扮历史，但历史不会去打扮权力，也不会让权力打扮、篡改历史的行径得逞于永远。本书之所以为“评说”，是为了揭露谎言，因而，它不屑与那“舆论一律”、“主旋律”或“导向”即权力打扮的“正史”为伍。

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一部聚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反人类罪恶的历史，它从反面警示人类，世界上还存在着谎言、野蛮和邪恶；因而，它又是一部光复真、善、美华夏文明和启迪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教科书。

笔者已老迈，如晚年有幸看到被中共“恩准”解密的文革档案资料，

也许还能来得及修正可能的判断失误，以“评说”正视听。

我期待着。

前言附注：

附 1、右派

这里所说的“右派”是中共党内派别的左、右分类，而非中共制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

附 2、“神仙会”

“神仙会”是六十年代初，中共恩赐给各民主党派发扬民主的方式。他们恩赐在民主党派内，可以实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借以改善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端正民主党派成员中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消除他们的紧张、不安和抵触情绪，团结一致，紧跟共产党。但到 1962 年 9 月，当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恩赐的“神仙会”，旋即消失。

附 3、“三自一包”

在饿殍遍野的“三年人祸”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主持一线工作期间，“修正”了毛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定的“一大二公”指导思想，提出并实行**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简称“三自一包”，缓解了中共与农民的对抗，扭转了农业大幅减产和大面积饥荒的局面。

附 4、“三和一少”

1962 年上半年，中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针对毛泽东的“三斗一多”提出的对外政策建议。“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革命援助要少。**”而毛泽东的“三斗一多”，与此相反，即“**对帝、修、反要斗，对各国革命援助要多。**”

附 5、《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大会于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联合国大会第 217 号决议，A/RES/217）

主要条款摘要：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视为无罪。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干涉或攻击。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以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附 6、人质情结

人质情结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是指罪犯的受害者对于罪犯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赞赏或帮助罪犯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抢劫一家银行失败后，劫持了三女一男银行职员做人质。绑匪在劫持人质达六天的时间里，曾多次威胁被劫持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错综复杂的心理转变下，四名人质竟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并帮助绑匪逃跑。这起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四名遭劫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据说，其中一名遭劫持的女性，曾多次探望服刑中的一名绑匪，并与他订婚。

心理学者认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是：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可以发生在一个或几个孤独人身上，更容易发生在相对封闭社会里的某些群体里。

有心理学者在评论专制社会里的人质情结时说：生活在各种各样风险下的人们，被迫无奈地学会了妥协；对于长期经受着欺负、压制、剥夺的群体而言，一旦有人给予他们点滴的好处，他们或许就会失去理智，黑白不分，甚至不吝感情地去赞美那些直接或间接伤害过他们的人。

序 幕——文革前民主、赤化革命简史

★序幕 附注 A

附 B 图文注释（简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目录：

图注 01：变法殉难者谭嗣同	图注 12：肃反运动
图注 02：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图注 13：反右运动
图注 03：“五四”运动	★图注 14：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
图注 04：瑞金苏维埃政府	★图注 15：大跃进运动
图注 05：抗日战争	★图注 16：人民公社运动
★图注 06：百团大战	图注 17：“四清”运动
图注 07：国共内战	图注 18：高饶事件
★图注 08：土地改革运动	图注 19：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
图注 09：抗美援朝战争	图注 20：“七千人大会”
图注 10：镇压反革命运动	★图注 21：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
图注 11：镇压胡风集团运动	

“打天下，坐天下。”似乎成了中国民众心目中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可是，到了“坐天下，传天下”时，特别是“坐天下”者忘乎所以，或传到不屑子孙时，民众就会对“公理”提出异意，甚至抗争，新一轮的“打”便被提到台面上来。著名学者黄炎培老先生，看到这种周而复始的怪圈，1945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在延安杨家岭的一个窑洞里，不无感慨地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常被人们提到的“窑中对”（1）。

清朝末年，官员贪脏，政府腐败，列强侵略，割地赔款，国库空乏，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腐败的清廷在内外交困中挣扎，被弄得焦头烂额，无以对应；中国国势衰微，遂被列强蔑视为“东亚病夫”和“泥塑巨人”，常遭其干涉和凌辱。

中国何去何从？

康有为、梁启超说要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即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可是，清廷慈禧老佛爷闻听大怒：我爱新觉罗氏的大清天下，岂容你汉奴分享？她在北京菜市口，举刀砍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人头（图注 01：变法殉难者谭嗣同），便给康梁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送了终。

孙中山见康梁变法失败，便提出了“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革命口

号，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标。他先后考察了欧美先进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创立了三民主义（图注 02：**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提出了从军政、训政最后到宪政的民主治国理念。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一声炮响，把统治中国近 300 年的清廷扫进了历史。辛亥革命看似成功了，可是，孙中山临终留下遗嘱却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民国初年，拥兵自重的军阀们，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大小军阀，纷纷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连年混战，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处于虚弱境地。领导八年抗战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与同盟国并肩作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内战中却败在共产党手下，被迫偏安于台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因而才得以存活至今。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发生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著名的“**五四运动**”（图注 03：**五四运动**）。在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们，打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两面旗帜，纷纷向中国民众传播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三民主义被注入了自由主义的新血液，备受军阀混战煎熬和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又看到了希望。然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孔家店”，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也当成糟粕扬弃了，错失了中外优秀文明融合的机会。例如：作家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里，把“仁义道德”斥为“吃人”的恶魔，令人遗憾。马列主义借机传入，扭曲了三民主义的希望。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话没错。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转口传入中国的德国和英国货，而列宁主义则是正儿八经的俄国产品。马列主义的传入，使外来挑动仇恨的权力拜物教文化与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混合在一起，熏陶了中国共产党人，从而使他们开始了以颠覆华夏文明、推翻以孙文思想和“五四”精神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目的的暴力文化革命——赤化革命。**这种赤化革命，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表现为武装夺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为掠夺和镇压！**

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产地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多大市场。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幅轻视自由、反对私有制、掠夺私人财产的乌托邦社会的美丽风景画。这个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被握有生杀大权的弗·伊·列宁把“**党领导一切**”等蔑视自由、民主、人权的丛林法则注入**列宁主义**之后，这个“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怪影”，就变成了魔影：在极权主义面前，身价倍增，变成了横行二十世纪的权力拜物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马列主义，它的灵魂，就是共产党一党独断下的暴力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崇拜权力的马列主义，很快变成了嗜血的**魔鬼**，即变成了镇压人类自由天性的**斯大林主义**：用阶级斗争学说，肆意践踏自由、民主和人权文明；

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学说，掠夺人民财富，破坏先进生产力，挥霍人类物资文明。在中国，自称为斯大林学生的毛泽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推上了峰巅。这种共产主义者独有的赤文化或曰红祸文化，已被近百年世界共产党党史所验证。

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乘国内军阀混战、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和相互恶斗、中央统治权力严重削弱之时，借苏俄党魁斯大林支持之势，乘虚而入，揭竿而起。在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数十万计的卢布（还有大量金卢布）援助下，中共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实施**红色武装割据**，建立了根据地，尔后又成立了由苏俄直接领导的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图注 04：**瑞金苏维埃政府**），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老大哥”和“一边倒”的情结由此而生。国内年轻朋友们可能不相信，将来总有一天，那些“绝密”档案被迫解密时，会叫你恍然大悟：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毛泽东等 12 名中国人外，怎么还有列宁派来的叫**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两个俄国人在指手划脚？在湘赣根据地领导核心的三巨头里，除周恩来、王稼祥外，怎么还有个名叫**李德**的由俄魁斯大林派来的德国人在指挥一切？

芦沟桥事变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政府军在强敌面前，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损兵折将达 320 多万，其中阵亡将士 150 多万，师以上将领 200 多人，最后才获得了元气大伤的惨胜（图注 05：**抗日战争**）。与此同时，中共在高呼全面抗战、大骂汪精卫卖国、狠揭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同时，暗中与日、汪勾结，分享情报，共同对付国民党。例如，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治下的“岩井公馆”及其外围组织“兴亚建国运动”、“上海编译社”、“自强学院”和《新中国报》等，都是中共与日、汪相互勾结的情报组织。岩井利用国共矛盾，把情报组织交给了中共党员**袁殊**、**恽逸群**、**翁从六**、**叶文津**和**刘人寿**等人去领导，用以搜集国民党的情报。抗日胜利后，袁、恽、翁、叶、刘等汉奸，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跑到了解放区。“解放”后，袁殊被任命为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要职。在暗中与日、汪勾结的同时，其军队则秘而不宣地采取“保存实力”、“积极发展”和“坐山观虎斗”亦即“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战略和游而不击、打了就跑的战术。1937 年 9 月，毛泽东向开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第 115 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发出指示说：“**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共抗日将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图注 06：**百团大战**），被斥为“**帮助蒋介石抗日**”，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激烈批判。到抗战末期，中共武装已从 3 万多发展成为 120 余万正规军和 200 多万民兵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了一支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强大武装力量。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军队又获得

了苏俄缴获后移交给他们的数十万件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实力大增，经四年内战（图注 07：**国共内战**），击败国民党政府军，夺得了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等人谈话时，动情地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毛泽东在会见日本首相田中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赞美侵略者说：“皇军有功！”从中共党的利益上去考量，毛泽东这种卖国式的战略战术，无疑是成功的。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树立了共产党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权在握的他，痞性发作，推翻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即民主国理念，“一边倒”在苏俄独裁者斯大林的旗下，全盘接受了“老大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崇尚丛林法则的斯大林主义，全面展开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口号的**赤化革命**。这个赤化革命，是打着均富的旗号、以**打击和清除**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人权普世文化相结合的**现代文明**为目的的。这种赤化革命，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做了必要准备。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著作，可谓车载斗量，读不胜读；但其核心不外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前者为政治手段，后者是经济手段，两者为同一个目的服务——**攫取和巩固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权力**。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分而治之的仇恨哲学，就是要你善于寻找、树立和制造 5% 的阶级敌人，调动一切手段去妖魔化这些敌人，借以恐吓、“教育”从而达到动员 95% “人民”将敌人打倒之目的；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官僚特权阶级的欺蒙哲学，就是以平等、均富等美丽词藻描绘出来的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画饼，并从“理论”上把这种画饼打扮成“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借以达到欺蒙民心、拥护共产党之目的。对中共权贵们来说，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缺一不可。**这个最终目的是：**各级官僚特权阶级披着“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外衣，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和占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的全部资源，即掠夺、占有土地、矿山、工业、农业、手工业、科学、文化艺术、文教卫事业和全部国家权力机构，使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变成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的**雇主**，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则变成雇主的各级代理和**权贵**。在雇主和各级权贵的驱使下，广大老百姓则变成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和奴仆**，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及从事工、农、商、学、文等人类的基本权利，都不得不仰乞于雇主即“大救星”、“党妈妈”和各级权贵的“恩赐”，稍有违拗和反抗，便会遭到雇主和权贵们的歧视、处罚和镇压。

这种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生活等国家全部资源、财富、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就是与法西斯主义(2)异曲同工的共产**赤文化**。这种赤文化，是颠覆真、善、美华夏文明的专政文化，亦是践踏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的独裁文化，因而是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马列毛主义，或曰马列加秦始皇主义。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历经的种种魔难，皆源于此。然而，时至今日，中共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马列主义再塑造，力图淡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性，为构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而忙碌，浪费了大量资源，青、少年学生都必须为这种荒诞理论背书，付出青春代价！

不论中共**雇主**、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怎样连篇累牍地去论证社会主义，说他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平等、均富，如何势所必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包括已经消亡的前苏联、东欧八国和存活到今天中国、古巴、越南、朝鲜等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级的**雇主**、权贵们，在高唱社会主义赞歌的同时，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为根据，即以革命名义剥夺个人财产，以国家名义去任意调动、支配国家和集体资源，甚至把“**不劳动不得食**”变成“**不服从不得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成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法宝，任何政见分歧，任何有悖于“**舆论一律**”、“**主旋律**”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会被**雇主**、权贵们“上纲上线”，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和制造动乱等“罪行”，从而“名正言顺”地将当事人逮捕并科以重刑。

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又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前者是以枪杆子来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后者则是以“**群众运动**”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共，都是搞“**群众运动**”的行家里手。所谓“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就是在枪杆子的弹压下，动员、唆使痞子、流氓无产者和芸芸勇敢者，逾越道德、法律和人权，采取非常手段，制造出一种在一定时段里的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氛围，形成对“阶级敌人”人人喊打的高压态势，恐吓、威迫全体老百姓，必须“自觉”地统一在党的意志下，从而达到预设的政治目的。因此，毛的“群众运动”实质上是中共和政府领导下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法西斯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记录了“群众运动”操作过程中所创造的“**毛氏规律**”：

开始——确定运动的革命目标（对象），调动所有媒体采编人员，组写文章，放送广播，以制造舆论；各级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作报告，以妖魔化敌人的手段，造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肃杀氛围和“你死我活”的恐怖情势。

继而——成立3或5人“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命令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鼓动大胆怀疑，大胆揭发，以排查、筛查的方式挖出“阶级敌人”。

接着——定任务，分指标，确定**运动重点对象**（一般占单位人数的3~5%）；成立“专案组”，对重点对象内查外调；训练积极分子（多数是勇敢分子和痞子、流氓无产者），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打、抄、杀等刑讯逼供；召开宽严大会，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后期——总结**运动“胜利成果”**，对新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批斗刑讯错了的重点对象，“落实政策”，宣布“解放”，以示党的“宽大”，舒缓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界线。在诸如镇反、土改、“横扫”、破“四旧”、夺权武斗等特殊时期，处决“阶级敌人”则授权基层党组织或“群众组织”，直接捕、审、决。

毛泽东的天才还在于，为了把“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烈度，控制在他认可的范围内，每次运动他都要向各级党组织下达完成任务的“**指标**”。

“**指标**”是统计学概念，属经济学范畴，毛泽东拿过来做政治化处理。把经济学上的概念发展成政治概念，不失为毛泽东的创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记录了毛的这些创造：

在镇反运动中，他下令给上海的领导人：“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在土改运动中，他对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赵紫阳等人“村村见血”和“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的红色恐怖，大加赞赏。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明确规定：“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

等等。

一反公投、二拒普选、三恶民调的毛泽东，这些政治“指标”是怎么被他“创造”出来的？说书人有一句套话，叫“一拍脑袋，计上心来”。显然，他的“指标”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但善于造神的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著文说，这是毛泽东倡导调查研究的结果。

不错，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这是一句真假掺和的谎言。因为，御用精英们未必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的调查研究服从于毛对政治形势的评估和决策。例如，当毛泽东决心要农业学走苏联集体农庄道路时，“绝大多数贫下中农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民情，便被各级党组织或御用精英们“调查”了出来；当毛泽东决

心开展“四清”运动以转移饿死人的仇恨时，农村 20%甚至 30%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敌情，便被各级党组织或御用精英们“调查”了出来，等等。到了六十年代，量化指标又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1961 年 1 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1964 年 5 月 16 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于是，以毛的两次讲话为蓝本，“群众运动”中的四个量化指标又被中共和御用精英们“拍”了出来：拥护他们的“人民”占 95%，反对他们的“敌人”占 5%，可以“团结的群众”占 95%，可以“团结的干部”也占 95%。由是，团结、教育 95%以上的“人民”和打击 5%以内的“敌人”，便成了历次“群众运动”硬性指标。

尽管毛泽东的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也制订了许多法律、法规，但他们更崇尚以丛林法则为思想基础的“群众运动”，并把“群众运动”作为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手段。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一书记载，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国家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长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毛所说的“靠我们那一套”，主要指他的“群众运动”。由此可见，1954 年毛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包括其中规定人民群众享有的各种自由、民主权利，都是哄骗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并不打算实行的官样文章。这种背信弃义的权力拜物教文化，是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夺取政权即所谓“建国”或“解放”后，毛泽东的中共，用蔑视自由、民主、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违宪犯法的“群众运动”，先后树立了成百万上千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内奸、走资派、黑帮、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等阶级敌人，并用专政工具对其进行无情镇压。

1950 年，中共在全国农村全面开展的暴力土改运动（图注 08：土地改革运动），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富农，实现了对老百姓主要是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掠夺颠覆了使我中华民族数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摧毁了农村数千年和谐依存的宗法关系，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和智慧，使农村中占多数的贫下中农，在对中共感恩戴德的同时，逐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裸裸的现代农奴，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从而使中共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1950年10月，在干涉他国内政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下，毛泽东和中共把党的利益、把“一边倒”的政策和“国际主义”义务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发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抗美援朝（图注 09：**抗美援朝战争**），自觉地中了斯大林消耗美国和控制中国的一箭双雕之计。他们以五六十万中华英雄儿女的生命和数十亿美元以及被孤立二十多年的巨大代价出兵朝鲜，愚蠢而不光彩地充当了导师的打手和炮灰，为霸主苏俄帝国主义立下了赫赫战功，保卫了金日成父子独裁的家天下。尽管抗美援朝战争使国家失去了美苏争霸中的渔人之利，但中共和毛泽东却借势强化了对异己势力的监控和镇压，巩固了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1951年的镇反运动（图注 10：**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的中共杀害了100多万包括起义、投诚和被俘人员在内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达到了镇压异己和强化共产党权威的目的，使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理念，化为烟云。

1955年，批斗文学家胡风运动（图注 11：**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泽东和中共把胡的文艺思想妖魔化为“凶恶残暴的敌人”，制造了又一起文字冤狱，第一次用“思想罪”来警告知识分子，不得与共产党思想相左。

接着，在7月，毛泽东和中共开始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个人历史和隐私进行了全面清剿（图注 12：**肃反运动**），使数以万计的人不堪凌辱而自杀。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图注 13：**反右运动**）中，毛泽东的中共把100多万知识分子（约占全国知识分子的六分之一）打成了右派、档案右派和阶级异己分子，酿造成万马齐喑、一党独断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和中共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化三改造”运动中（图注 14：**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数年间，先后又划出了数十万计的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中共诡称“土改漏划”），供人批斗；在批斗中，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强迫实行小手工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家化；在枪杀、自杀20~30万人的基础上，使中共垄断了全国大小一切资源，成为名符其实的唯一**雇主**，实现了对中国农民的第二次掠夺，从而实现了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全面掠夺。掠夺为**官僚特权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为权钱交易的腐败，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8年，毛泽东的“大救星”权力情结发飙，突发异想，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思想，在中共大员们的支持下，搞了个异想天开的、超英赶

美的、“流芳千古”的大跃进运动（图注 15：**大跃进运动**）。运动中，他们强迫农民用毛的“**革命加拼命**”思想，进行超强劳动，结果弄得整个中国大陆饿殍遍野，怨声载道！

以“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权力情结已经使他不满足于数十万个小兵团农业合作社的小打小闹，他要大兵团作战，用大兵团掀起农业大跃进的新高潮。于是，在他筹划下，第一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典型——嵯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被制造了出来。1958年8月26日，他在河南新乡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到10月底，全国74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2.6万个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图注 16：**人民公社运动**），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被誉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然而，在而后的三年中，这个通向共产主义天堂桥梁的人民公社，为“新中国”制造了3,000~4,500万个饿殍！

毛泽东和中共不作反省，更不道歉，为了重树被“三面红旗”败坏了的共产党权威，抓住专政体制造就了的农村**官僚特权阶级**即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四不清”等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并于1963年开始了整顿农村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图注 17：**四清运动**）。运动中，又使数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和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遭到批斗，数万人惨遭杀害或自戕。本来对大跃进颇有微词的刘少奇，为了“紧跟”，成了四清运动直接领导者。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和毛泽东所指的阶级敌人中，“地、富”是按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划分的，“反、坏、右”是按某个时期政治斗争需要按思想、行为划分的，文革中又增加了许多名目的阶级敌人，其中，“叛徒、内奸、走资派”是党内政治斗争需要按人际关系或政治态度划分的，“黑帮、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反动权威、反革命知识分子”是党外政治斗争需要按思想、政治态度划分的。他们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划分，是马列主义的异化：由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蜕变为所谓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异化，反映了**雇主独霸**的心态。更值得儆省的是，制造和树立阶级敌人后，要丑化和妖魔化阶级敌人，并在批斗的同时，警示批斗者和广大老百姓，要信奉共产主义，要效忠毛泽东和共产党，从而达到惩一儆百的目的。

按照马列主义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划分阶级**的理论，中国在1956年“一化三改造”完成后，阶级已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也因而不复存在。但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未被取消，反而越来越强化了呢？简单地说：他们反复向民众灌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说教，是既得利益个人和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官僚特权阶级既得权力——共产党绝对权威**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御人权术，是**雇主独霸**心态的表露，也是中

国阴谋厚黑文化的张扬。可叹的是，除少数先知先觉和为虎作伥者外，大多数人都在为专制摇旗呐喊而浑然不知其愚！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丛林法则理论。毛泽东说：“口之于味，有嗜则同。”他呼应了“食色，性也”的动物法则。于是，人类固有的恻隐、宽容、仁爱和理智等中华文明体现的天理之心，被妖魔化，成了必须痛加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禽兽固有的仇杀、嗜血、冷酷和淡漠等邪恶痼疾，被神圣化，成了无产阶级思想加以弘扬。这是中共赤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色！

在这个丛林赤文化条件下，信息被严密控制，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畸型的政治、道德氛围：

官本思想泛滥成灾，官僚特权阶级乔装打扮成人民的“勤务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歌声中，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由于官本思想的熏陶，多数人变得无条件地盲从“领导”，争相向“领导”显示自己的“积极”；

告密和出卖在“对党忠诚”的名义下横行，罗织罪名，打击同事，对朋友落井下石，出卖同事、朋友、同学乃至亲属，以换取“组织上”的信任；

政治高压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发表与官方声音相左的言论；

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下层民众变得蒙昧无知、逆来顺受甚至引颈就戮，等等。

显而易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培植打手，塑造奴隶，占有人类全部精神、财富资源，用乌托邦宗教理论和物资平均主义，去掩盖官僚特权阶级的占有、剥削和镇压。于是，在这种丛林赤文化的长期鼓噪和洗脑下，便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对独裁政权情有独钟的宠臣和御用精英，亦即**盲从拥戴者、争宠谄媚者、谎言制造者、告密出卖者、落井下石者和野蛮施暴者**，一大批在独裁者肆虐面前麻木不仁、愚昧而善良的民众，也应劫而生。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还制造了个人崇拜。

古今中外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大都出于缺乏权力背景的专家、学者、教授之中，国外如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等，中国如春秋时代的孔、孟、老、庄和二十世纪的胡适等，人们崇拜他们是**诚服于理**；唯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理论家、大思想家桂冠非握有生杀大权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莫属，人们崇拜他们是**慑服于权**。苏俄的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北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中国的毛泽东、

邓小平和“三个代表”的发明人江泽民等政治领袖们，都无例外地被誉为当代甚至空前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因此，全国人民崇拜他们、承认他们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服从他们的个人意志，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不容置疑的律令。于是，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诡计多端的毛泽东，凭着他那几本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封建君王御人权术相混合的著作（其中不乏有他人捉笔的），亦即毛泽东思想，便被奴才精英们拥上了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诗人、物理学家、甚至道德楷模的宝座，推上了个人崇拜的峰巅。

文革中惨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 1945 年的延安，他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在“七大”一次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名字达 105 次之多。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他力排众议，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而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铺平了道路。

文革中被毛泽东逼得仓皇促逃、几乎全家都摔死在异国他乡的中共党的唯一副主席、副统帅林彪，更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吹捧得天花乱坠，令人咋舌。一句“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他的千古绝唱。

文革中差一点被打倒后又被拖死的总理周恩来，不仅在毛泽东面前低三下四，在毛的老婆江青面前，也是卑躬屈膝，当着众多学生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全然不知中国国家总理的尊严。

文革中遭到毛泽东残酷批斗、被扭断胳膊后侥幸死里逃生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第一个在中国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甚至到了大祸临头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以“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理由与对手们争辩，力争做最后一次向毛泽东谄媚和求饶的努力。

文革中惨遭批斗病死于合肥的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文革初，曾荣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过党和国家第四把手。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曾被毛内定为取代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

其他那些权贵们，诸如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常委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元帅朱德、陈毅、贺龙，等等，都是鼓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能手，他们长期为争宠谄媚而不遗余力。无产阶级专政及其理论制造的崇拜和歌颂党的领袖，成了中共赤文化的又一重要特色。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制造的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权力不受监督；而不受监督权力，必然导致无法遏制的暴虐和腐败。

从确立毛泽东的权威到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有一个令人反思的历程。

1945 年，毛泽东借延安整风排斥和屠戮政敌的余威，运用权术，培植了诸如刘少奇、康生等一批争宠谄媚者，巩固了发号施令的权威地位。

为了控制中央，毛泽东利用矛盾，分而治之。五十年代初，他以“五马进京”的权谋，上调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和华东局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来京，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但当高、饶遭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联手强力反击时，他来了 180 度大转弯，将高、饶打倒（图注 18：**高饶事件**）。1954 年以“增强党的团结”名义，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将高、饶开除出党，迫使高自杀，饶监毙，从而达到了控制全局的目的。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图注 19：**庐山会议**），当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对他鼓吹的行将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政策提出批评时，一句“**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和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竟使毛泽东的尊严受到“羞辱”而勃然大怒。他明知彭德怀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他运用权术，利用彭德怀生性直率政敌较多的弱点，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给彭德怀扣上了“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当即罢了彭德怀的官，文革中又将其置于死地。

1960 年前后，他的大跃进政策导致 3,000~4,500 万人饿死（据称，官方承认“非正常死亡”3,767 万人），促成意见分歧，党内形成左、中、右派集团，处于分裂边缘。此时此地，毛泽东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的严重挑战，在 1961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图注 20：“七千人大会”），他被迫违心地做了“自我批评”。熟读经史、深谙厚黑权术的毛泽东，不甘心权威受挫，在利用掌管枪杆子的林彪大力培植对他个人崇拜的同时，大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和“**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舆论，开始了反击刘、邓的部署。接着，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对关键岗位上的人事做了调整。到 1966 年 5 月，他的绝对权威地位已经空前巩固，

向刘少奇、邓小平兴师问罪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翻开真实的历史看看，毛泽东不择手段地打击党内不同政见者，同打击党外不同政见者一样，都是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前赴后继地积极赞同、参与、吹捧下完成的。

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毫无阻拦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些在文革中先后死于非命的刘少奇、林彪们，那些被打倒的邓小平、彭真和“革命干部”们，那些“群众专政”中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和野蛮施暴者们，以及那些善良而愚昧的“革命群众”们，不是那场浩劫的帮凶，就是那场浩劫的推波助澜者。

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

无产阶级专政(后改称人民民主专政)制造了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培植了愚昧、奴性和野蛮，从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迷信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化，但又不可避免地日趋衰亡。

六十多年前，中国当代先知先觉的思想家胡适之（图注 21：**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以自由主义的人权价值观向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价值观挑战。他说：“你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又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又说：“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至今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在中国，这种伟大思想曾被御用精英们贬斥为“汉奸”、“反动”言论，胡适本人则被骂做“流氓”、“骗子兼恶棍”。

在毛泽东时代，自由在呻吟，民主在挣扎，人权在煎熬，“**窑中对**”成了毛泽东戏弄中国民众的权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化浩浩荡荡风靡全球时，中共雇主、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将普世价值视为洪水猛兽，称其为“**美丽的谎言**”，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还用“**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五不搞**”（3），将其拒于国门之外。现在，看起来他们十分强大，但他们的倒行逆施，终将被觉悟了的中国人扫进历史垃圾堆。

上述可见，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共的个人崇拜，又把毛泽东推上了独裁和谎言、野蛮、邪恶的峰巅。有朝一日，当历史挣脱权力打扮时，二十七年的历史记录，必将给毛泽东

以恰如其分的人生定位：

权谋盖世，罪恶滔天！

中国人应该甦醒了！

序幕附注 A：

附 1、“窑中对”

1945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的“周期律”，曾引起毛泽东忧虑和思考。进入北京后，毛泽东再邀黄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附 2、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压制个人主义、鼓吹集体、民族和国家至上的政治哲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现象。对内，它反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崇尚暴力和蔑视人权，主张建立中央集权主义的独裁统治，由政府统管全国经济，对人民生活实行全面监控，镇压一切形式的反对者；对外，它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奉行重分世界的战争政策。

附 3、“五不搞”

2011 年 3 月 1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附 B 图文(文革前简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注释：

图注 01：简评变法殉难者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近代思想家、政治家、诗人。湖南浏阳人。少年丧母，读书广博却屡试不第。为人生平好任侠，胸怀济世大志。甲午海战后转学“西学”，投身变法洪流，得到维新变法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的赏识。1897年，即光绪二十二年，又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倚重，开设时务学堂，次年成立南学会，又后创办《湘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不久入京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受光绪器重，参与变法。

由于袁世凯告密，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临朝“训政”，下令逮捕维新派。见大势已去，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谭嗣同执意不肯，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这是最后的机会。但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旋被捕，处极刑。

在刑部狱中，他在牢房墙壁上题诗曰：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时称“戊戌六君子”，同时就义于北京菜市口。临刑时，他在法场上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呼喊：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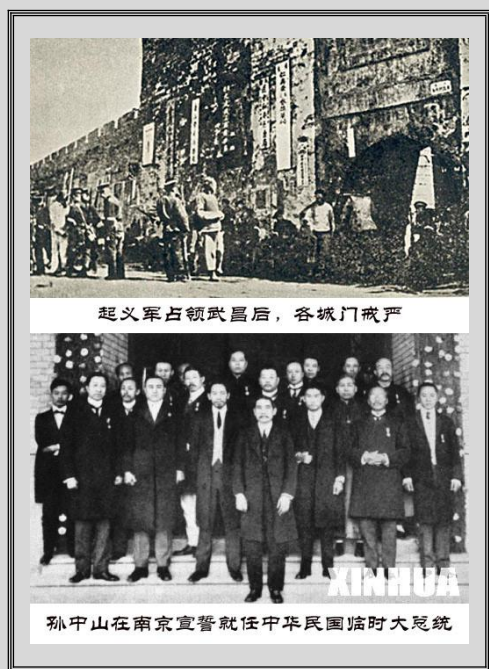
所幸，那时没有中共发明的手术刀割喉(如张志新)、竹签穿舌(如李九莲)和细尼龙线勒紧脖子等的野蛮刑律，否则，我们无法听到他最后的四句呼唤！

终年 33。一年后归葬于浏阳。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中多些谭嗣同，少些郭沫若，现代中国何愁没有真、善、美的华夏文明！何愁缺乏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

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他的思想集中体现于著作《仁学》中，要求冲破束缚，实行变革。现存诗词 200 余首。

图注 02： 简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
名文，字逸仙，号中山。1866
年 11 月 12 日，出生于广东
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
普通的农民家庭。1886 年至
1892 年，先后在广州、香港
学医，毕业后，在澳门、广
州行医。

1894 年上书李鸿章遭
拒，遂赴美国檀香山创立兴
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
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
主张。1905 年在日本东京成
立中国同盟会，提出了他的

“三民主义”思想。他曾多次向民众阐述他的三民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满清），恢复中华，实现大中华民族国家。

民权主义——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民众享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

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他的民治主张就是：国家机构**五权分立**，即立法、行政、考试、监察、司法五权分立、又互相制约的“**五权宪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获各省响应，清朝旋即灭亡，是谓“**辛亥革命**”。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乃于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反袁。1914年在日本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1917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1年，非常国会又于广州议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再举护法旗帜。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复任大元帅。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这种引狼入室的政策，几乎葬送了“三民主义”的一切理想。同年秋，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不治，逝世于北京。遗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死后，马列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1949年末，将三民主义赶到了台湾。

孙中山生前常说：“**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一个世纪过去了，民主、自由和三民主义，仍在中国呻吟！

图注 03：简评“五四”运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政府代表所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条件及

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被无理否决后，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愤怒的学生，痛打了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北洋军阀政府高官，又烧了他们的住宅。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5月19日，北平大、中学校两万五千多师生，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月3~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骇人听闻的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已呈星火燎原之势。6月5日，上海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很多地方的工人、商人都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推动了斗争的发展，给军阀当局以极大压力。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时间长而影响深远。

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兴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都积极参与到运动之中来，他们擎起“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广泛传播先进的西方民主和科学文化，冲击、批判封建正统思想，有力动摇了这种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新思想洗礼，成了后来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的榜样。“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并为其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五四”运动良莠不分，泥沙俱下，在传播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文明价值迎来“德赛先生”的同时，也引狼入室，引进了以苏俄为代表的**马列主义**。在二十世纪里，“马列先生”击败了“德赛先生”，使领袖崇拜主宰了中国，从而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愚昧和疯狂中，为现代专制独裁主义在中国泛滥，埋下了祸根。

值得庆幸的是，那样大规模学生、工人、商人参加的“五四”运动，“反动透顶”的北洋军阀政府，竟没敢下令开枪。在“五四”精神影响下，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在备受诟骂的政府执政**段祺瑞**官邸前，请愿示威，被军警开枪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造成举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花瓶”国会迅速通过决议，指责军警开枪“触犯刑律”，“反动政府”首脑**段祺瑞**，赶赴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答应惩治凶手，并从

此终身食素，以示忏悔（1）！对此，鲁迅愤怒地写下了带血文字：《纪念刘和珍君》。遗憾的是，“五四”运动七十年又一个月后，在同一个地方，代表人民的“人民政府”，竟下令开枪，使 300 多名（有传说千人以上）请愿的学生、市民惨死于长安街街头，血染天安门广场！无人长跪，无人食素，无人忏悔，而“人大”通过的决议是支持缉捕“闹事”的学生领袖，“人民作家”们，无人敢写《纪念 xxx 君》！

图注 03 附注：

附 1、“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曰：“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屠杀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1936 年，段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答之，食素如故，乃不治而死。

图注 04：简评瑞金苏维埃政府



瑞金位于江西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毗邻福建。公元 953 年建县，面积 2,448 平方公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人口 23 万。瑞金是中共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当时的中共武装，仅仅是苏俄“共产国际”领导下“国际纵队”的一个支队。

做为“国际纵队”的一个支队的中共，在日本突然出兵我国东三省制造“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即 1931 年 9 月 20 日，它的中央，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决议，宣称“‘918’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公然制定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命令江西苏区党和红军，“更深刻的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集中力量追击敌人”，积极发展红色割据战争，削弱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力量，为“武装保卫苏联”做贡献。显然，这是个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卖国决议。

1931年11月7日，在苏俄代表和大量卢布的支持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来自各地的610名代表，齐聚在谢氏祠堂，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20日，大会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名义，发行了列宁头像货币。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Cobet (soviet)的音译，意即“代表会议”。1917年11月7日，列宁的俄共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24年1月31日，苏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确认苏联为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国家。中共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承袭苏维埃名称，同承认它是苏共领导下的“国际纵队”的一个支队一样，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苏联的“弟”国或“子”国。

1934年1月，在这里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大纲》一规定（摘要，下同）：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他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大纲》七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镇压一切中外资本主义的怠工和破坏阴谋。

《大纲》十四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显然，这是人们能看到的中共第一个分裂中国的纲领。）

《大纲》十七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他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是他的巩固的联盟者。

1930年12月开始，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同中共红军进行了5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1934年10月10日，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8.5万红军主力，在周恩来等人的率领下，被迫从瑞金突围，开始了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逃到陕北，1936年10

月，红二、四方面军也逃到西北，都先后落脚以陕北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根据地。到此，中共从《大纲》第一条“统一中国”和第十四条“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矛盾中走了出来，变成了“逼蒋抗日”，不远万里“长征”到陕北的“抗日英雄”。

图注 05：简评抗日战争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在中国的驻屯军步兵第 1 联队，在北平芦沟桥附近，同中华民国政府军（下简称国军）驻守该地区的 29 军 37 师 219 团一部发生激战。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此后大战踵接不断。

淞沪战役

(1937. 8. 13~11. 12)，又

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历时 3 个月。日军投入 10 个师 28 万人的兵力；国军投入 70 余个师的兵力。战役结束。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 4 万。”

忻口战役（1937. 10），国军称歼敌 4 万人（包括中共八路军 115 师消灭日补给部队 547 人在内）。

台儿庄大战（1938. 3），是役国军称歼敌 3 万余。

武汉会战（1938. 5），日军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达 140 万。国军称歼敌 20 万。

四月攻势（1939. 4），包括晋南、豫北、鄂中、赣北等反攻中，国军称其消灭敌军 9 万人。

随枣会战（1939. 5），国军称消灭敌军 5 千多人。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 9），日军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攻取长沙遭失败，伤亡 3 万余人。

枣宜会战（1940. 5），日军以六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南阳和襄阳。国军称此役歼敌 4 万 5 千人。

百团大战（1940. 8~12），中共八路军称歼敌 2 万 5 千多。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 9），日军调集 13 万兵力，分三路进犯长沙，国军守军稳扎稳打，给予日军以极大消耗。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 12~1942. 1），日军纠结三个半师 7 万余人围攻长沙。是役，国军称毙伤日军 5 万 6 千 9 百多人。

远征军入缅作战（1942. 1），国军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解英军之危于同年四月。国军称歼敌 6 万多人。

鄂西战役(1943.5)，日军纠结 11 万兵力向长江三峡进犯。是役，国军称毙伤敌 3 万余人。

缅北反攻(1944.1)，国军称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

豫南鄂北(1945.3~5)，国军称毙敌 1 万 5 千 7 百多人。

此外，国军大的会战还有：太原会战（1937.10~11），南京战役（1937.12），徐州会战（1938.2~5），广州战役（1938.10），南昌会战（1939.3~4），桂南会战(1939.11~1940.1)，上高会战(1940.3)，晋南会战（1941.5~6），浙东反攻(1942.8)，常德会战（1943.11~44.1），湘西会战(1945.4)，滇缅路战役（1942.3~9）等，双方每次会战参战总兵力在 15~80 万之间。国军称毙伤日军 62 万。

抗战八年间，国军发动大型会战 22 次，重要战役 1,117 次。毙伤日军 145 万。国军陆军伤亡 3,211,419 人。空军阵亡 4,321 人，毁机 2,468 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军将领达 200 多人，1985 年中共承认有 85 位，被史学界倡扬者有 115 位。（以上版本较多，所列数字有出入，待考）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9 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代表何应钦上将呈递投降书。抗日战争以中华民国政府的惨胜而结束。

在八年抗战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开辟了敌后战场。除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外，还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等游击战术，也对抗战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军正面作战。笔者十三岁进入“新社会”，青少年所受的教育，都是“正面”教育，只知道抗日战争是八路军用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战打赢的，文革前，从没想过国民党军队还有那么多、那么大的会战！

不过，毛泽东对国军战绩不屑一顾，他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中写道：“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笔者：即约 30~40 万)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这就是说，伤亡 320 多万的国军，仅抗击了 44%的日军和 10%的伪军，亦即抗击约 20~30 万日军。他还多次谴责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但历史正在一步一步地揭示谎言：毛泽东的中共，不仅为中共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和“要避开与日军正面冲突”亦即“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总方针，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还秘密派遣潘汉年、袁殊等人，在上海、香港、南京等地与日、汪勾结，分享国民政府党、政、军的情报。

抗战胜利 60 年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些话是否言过其实？看看下一图注“百团大战”，你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图注 06：简评百团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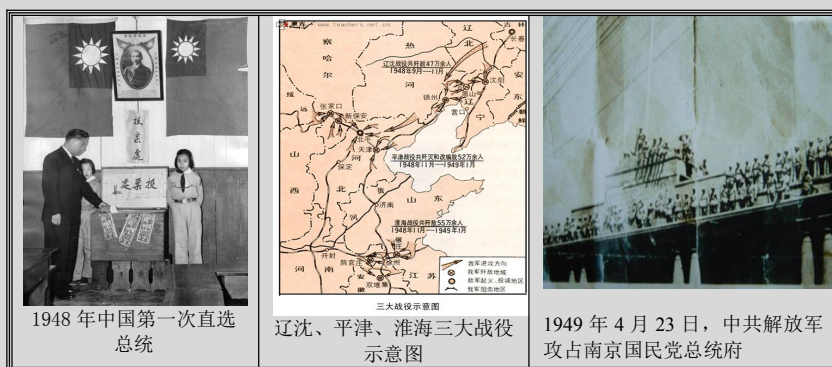
1940 年 8 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违背毛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抗日战略方针，调动 103 个团的兵力，在华北 249 公里长的正太线上，向日军发动进攻。到 12 月初，以伤亡 22,000 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日伪军 25,000 多人的胜利，使华北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军威。毛泽东于 9 月 30 日给彭发去一份电报称：“百团大战真叫人兴奋，这样的仗可否多搞一两次？”

然而，百团大战后的两年中，日军增调两个师团，约六到八万人，反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在“扫荡”中，八路军遇到了空前困难，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了三分之一，队伍也从四十万锐减到三十万。总结两年教训后，毛泽东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否定了 9 月 30 日的电报。据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披露，毛认为：抗战中，共产党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实力，抗日是次要的；日本人占领中国领土越多，国民党损失越大，对共产党越有利；百团大战是引火烧身，把日军从国民党那边引向华北根据地，使国民党得利。因此，毛批彭“帮了蒋介石的忙”，犯了战略和路线错误。在 1944 年中共整风运动、1945 年的中共“七大”和华北座谈会上，百团大战被毛作为一个极大的错误来批判，前后批彭批了四十天。这挨批斗的四十天，被彭德怀牢骚为“操娘四十天”。彭德怀虽然承认百团大战的指挥方面存有问题，却坚持认为总体上没错。

笔者在研究了一些资料后认为，到 1942 年初，经过三次长沙保卫战以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军已被打得精疲力尽，至少暂时无力反攻日军；由于美日矛盾加据，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也无力调遣更多兵力向国民党政府军发动新的攻势。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巩固已占领土，从而确保南进物资运输的畅通，自华中战区抽调两个师团到华北战区，对中共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便成了侵华日军的重要选择。因此，不论有没有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日本增调军队巩固华北防线为势所必然。

百团大战的是非曲直是很清楚的：百团大战是真正的抗日，没什么错。然而，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及其同伙，指责彭的百团大战是“帮蒋介石打日本”，文革中，彭又被批判为“搞独立王国”，“背着毛主席发动百团大战”，“使我军遭受到重大损失”，等等。上层精英们在声讨彭德怀的“滔天罪行”时著文说：“一九四〇年八月，彭德怀背着毛主席伙同朱德擅自搞了个‘百团大战’。战役进行了三个月二十五天，暴露了我军主力，使日寇攻打蒋介石的军队来进攻我军，保护了蒋介石，使我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这种无耻的消极抗日的自我保护主义，至今仍有很大市场。彭拒绝认罪，竟被打断肋骨，受重伤，后终被置于死地。

图注 07：简评国共内战



1946 年到 1949 年间，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了招致数百万老百姓丧生的内战。**四年内战**，不仅是两党在军事上的较量，也是两党在政治体制上的较量！

1948 年 4 月 20 日，中国大陆发生了迄今唯一一次全国性总统大选，也是发生在中国大陆迄今唯一的一次多位候选人竞争的民主选举。

1946 年年底，国民政府召开了中共拒绝参加的制定宪法的“制宪国民大会”。1946 年 12 月 25 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后，于 1947 年 1 月 1

日公布，同年 12 月 25 日正式实施。至此，根据孙中山的遗训，中华民国经过“军政”、“训政”后，正式进入行宪的“宪政”时代。

那次总统选举是间接选举，由国大代表投票选举。国大代表由各地基层选出。当年政府规定，全国选出 3,045 名国大代表。国大代表的选举某些程序，有别于今天中共人大代表的选举。

国大代表选举有四种方式：区域代表，依中国省市大小，每省份选出数名至数十名国大代表，总额共 1,810 名；职业团体，由各职业团体成员选出 380 名；商业，自治区等代表，155 名；党派及遴选，700 名。

1948 年 4 月 20 日，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在南京市国民大会堂开始。按选举法规定，选举为差额选举，首轮得票超过半数以上者才能当选。在首轮选举中，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蒋中正**，以 2,430 票对 269 票击败对手居正，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经过了四轮投票。在第四轮投票中，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以 1,295 票对 1,438 票，败给了桂系军人**李宗仁**。同年 5 月 20 日，当选的正、副总统，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职。然而，国共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使这次备受诟病又很不健全的自由选举，成了偏安于台湾的国民党民主云雨的初试，同时也促成大陆人民对初试民主云雨的恋念和渴盼。

中共抵制了那次选举。双方都要用枪杆子来做决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打得精疲力竭的国民政府军，已经丧失了对全国各地的控制。从 1945 年 9 月 5 日起，他们依靠美国空军运送国民政府军，相继收复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沈阳等大中城市，占据了比较有利的战略要地。作为中央政府，国民政府下令日军投降。国民政府的命令虽对中共无效，但侵华日军不敢不听。9 月 9 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代表何应钦上将呈递投降书，并下令侵华日军向各地国军缴械。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采取了保存实力、积极发展和坐山观虎斗的战略，使其武装，从战争开始的 3 万多人，到抗战末期，发展成为 120 余万正规军和 200 多万民兵一支可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强大武装力量。9 月 6 日，他们向日伪军实施大反攻，先后攻占了中小城市 250 余座，光复和占领了大片国土。此时，中共的另一大战略是抢占东北，那里驻着数十万支持并等待着他们接收的苏联红军。他们迅速抽调 10 万军队和 10 万党政干部，星夜兼程进入东北，抢在国民政府接收人员的前面，占领了长春、四平、哈尔滨等要地；同时，他们接收了苏联红军缴获后移交给他们的数十万件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武装了自己。

由于国共双方互不相容，相互指责，内战旋即爆发。1946年6月下旬，国、共两党的军队(以下简称为国军、共军)在中原地区(湖北、河南交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长达近四年的全国内战由此开始。

据报导，从1942年至1949年间，国军通过美国大规模军援、组建了45个步兵师；从1945年到1948年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亦组建了210个步兵师。毋庸置疑，苏援质次而量大，美援量少而质高。很快，兵力和装备稍占优势的国军，展开了向中共统治区(中共称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但在抗日战争中被打得焦头烂额、士气低落的国军，不到一年，进攻便被抗日中养精蓄锐、士气高昂的共军挫败。

到1947年3月，国共两军鏖战于陕北和山东。由于中共在白区工作和特工卧底的巨大成就，准确的情报使共军得以机动灵活地与国军周旋，常常能集中2~6倍的兵力展开包围攻击，取得了许多胜利。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军被歼约70多万人。在孟良崮战役中，共军消灭了号称“王牌部队”的国军整编74师后，迫使国军全线撤退。是时，共军军力上升至280万人，装备了重炮兵与工兵，各级指挥员的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他们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向国军全面进攻。

1948年9月底，共军发起了进攻战役：10月15日，克锦州，打响了辽沈战役(国军称辽西会战)，11月3日，共军进入沈阳，全面控制了中国东北，是役结束；11月中，发动淮海战役(国军称徐蚌会战)，1949年1月19日，下蚌埠，2月15日，克徐州，是役结束；1949年1月15日，陷天津，1月31日，共军和平进占北平，平津战役(国军称平津会战)结束。三大战役共军击溃、消灭、收编国军主力近150万人，有超过100万的部队与政府官员投降共产党。1949年4月21日，共军乘胜强渡长江，4月23日，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以其破竹之势，攻占杭州、南昌、上海等都市，席卷中国大陆。丧失主力的国军，兵败如山倒，在溃散中或就歼或投降。国民政府被迫迁广州、重庆、成都等地，同年12月10日，全面撤退到台湾。1949年10月1日，内战中获胜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宣布成立一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据中共报导，内战中，歼灭、改编国民政府军807万人。

在内战中，中共把八路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四年内战称之为“解放”战争。

历史不应被胜利者独霸！

六十年后，我们不禁要问：那场战争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哪些“解放”？

六十多年前，中国大陆曾进行过一次差额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民主初试，而“解放”却使刚刚起步的并不完美的民主，被指定接班人等马列主义世袭专权所取代。到四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中共才在农村村级基层单位，试行差额选举，并把这种选举宣扬成“民主的巨大进步”。这难道不是对“解放”两字的辛辣讽刺？

六十多年前，中国在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战死和饿死的人不到 2,500 万（基于政治考量，中共将此数上升为 3,500~4,000 万），而“解放”后的“一化三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却使生产力遭到比战争年代更为严重的破坏，仅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间，便造成饿殍 3,000~4,500 万。对此，到七十年代末，中共上层才有所省悟：决定“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引进内战中的手下败将——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台湾经济在内，基本上恢复了“解放”前的自由经济模式，才使经济搭上了繁荣快车。

六十多年前，中国产生了胡适、鲁迅、陈寅恪、钱钟书、沈从文等一代富有学养、秉性骨鲠的思想家、作家和学者；而“解放”后，在“舆论一律”的高压下，有的沉默无语，如钱钟书等，有的则蜕去硬骨，变成媚骨，如郭沫若等；到了文化大革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亦即个人尊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及其载体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等，遭到了空前的蹂躏和摧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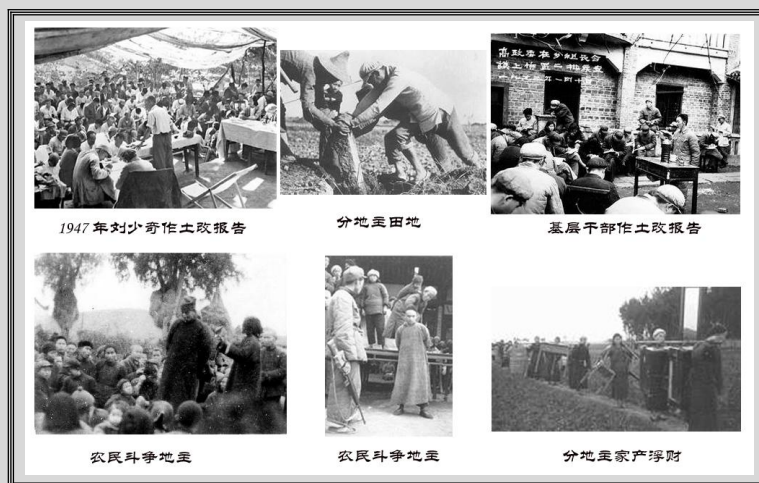
总之，那场所谓“解放”战争，不过是一场攫取权力战争，是一场改朝换代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比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更加独裁、更加残暴的禁锢！

在太平洋的彼岸，从 1861 年 4 月 15 日到 1865 年 4 月 9 日，美国也发生了一场长达四年的南北内战。取得了最后胜利的共和党总统林肯（1865 年 4 月 14 日遇刺身亡）和追随者，没有独霸和任意宰割战利品，战败的南方将士也没被打成反革命；他们采取了和谐、宽容、共治的方略，使胜利者在得到赞扬的同时，用宽容化解了失败者的反抗，并使失败者变成共治国家的合作者，从而使两党的民主政治得以发扬光大，殊途同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美、英、法等，由于采取了同林肯一样的和谐、宽容和共治政策，战败国德、意、日等，都能挺胸快速发展起来，成了战胜国的战略伙伴和密友。然而，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却以“救世主”和“大救星”自居，采取马列主义的仇恨哲学，用分而治之的阶级斗争策略治国，残酷镇压数千万计的失败者和少数民族，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又

发动和领导了残酷镇压不同政见者从而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倒行逆施，直到今天，“解放”了的中国人，还不得不为他们的“维稳”，付出代价，为他们的“反对分裂”，做出牺牲！

六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成亦非王，败亦非寇，看你夺权为了谁！为独裁，为专制，成功失败都是贼！

图注 08：简评土地改革运动



早在 1946 年 5 月，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首次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

这个政策，打着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旗号，开始了**暴力杀掠式**土地改革。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则是承认土地投资人合法权益下的和平均田。

毛式土改是划出 8%~10%的地主、富农，发动 50%~60%的贫雇农（主要是贫雇农中的痞子、二流子和见利妄为分子）对他们批斗、掠夺和打杀，从而使农村占多数的贫雇农，能跟着共产党走，为夺取政权聚集力量。据资料记载，搞的最凶、杀人最严重的有胶东、晋绥、河北等地。他们的残杀手段，惨绝人寰。具体有：砍头、活埋、剥皮、石头砸死、烧死、马后拖死、树上吊死等等，甚至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将婴儿取出活活摔死。有些地方，不仅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浮财，还要分他们的老婆、女儿。1947 年，国军开始九月攻势，地主、富农、中农组织的**还乡团**，开始报仇，贫雇农遭到了报复。还乡团报复手段之残忍，不下贫雇农。**挑起仇恨**，这是中共土改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屠杀与报复，是分而治之策略的体现。有时，为了弱化敌人的反抗，平服贫雇农中善良群体的不满情绪，中共也纠正过一些残酷做法，但都是权宜之计，服从于土改的主

要目的。对此，有共产党学者教导学生：“要从革命需要出发去理解这种杀戮的‘必然’性，而无庸道德价值判断。”

毛的这种出于政治动员的反人权、反人类的残忍谋略，果然奏效，贫雇农及其子女受到鼓励，纷纷参加解放军或地方武装和政府，同国民党军作战。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与台湾国民党的“和平土改”相反，于1950年在全国继续开展了暴力杀掠式土改运动。与过去政策稍有不同的是，强调“团结中农”，分老婆、分女儿的相对较少。

毛曾多次批评“和平土改”是右倾思想，要求全党继续推行“行之有效”的杀掠式土改。据文献记载：山西兴县土改时，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党组书记兼副主任的中共干部**牛荫冠**，在家乡召开“斗牛大会”。他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批斗跪在台下的曾被毛泽东誉为开明绅士的老父**牛友兰**。令与会的父老乡亲们震惊的是，他居然亲手用铁丝穿了自己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致其父三天后暴毙。由于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牛荫冠步步高升，官至正部级的全国供销总社主任；但他再也没敢回过兴县老家。坐镇广东的中共省委书记**陶铸**、**赵紫阳**等，大搞“村村见血”的红色恐怖，即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以立“政威”。原北大学生**乐黛云**，回忆1951年她在江西参加土改的情景：她所在的村子划出了八个地主，被副县长一声令下，全部就地处决；其中有一个老实八脚的老人，在上海干了一辈子裁缝，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土改前不久，回家买了些地，刚好划上了个地主，也被处决了；为此，她一直想不通。1951年在重庆郊区，笔者曾目睹过一个公审地主的场面：地主被押上台后，先后有两人上台，控诉地主欺压他们的罪行；台下打倒恶霸地主的口号，此起彼伏；控诉结束，主持人便代表人民政府，宣布判处地主死刑；当即地主被拉到台下，枪响应声倒毙，暴尸于台边；年约十二三岁的地主儿子，在他脑浆开花的父亲尸体前，冷笑了一声，转身扬长而去。——怨恨者控诉，代替了检方起诉；政府公审，取消了法院取证和庭审；官员口头宣判，抛开了判决书；立即执行，勾却了上诉；连封建王朝稍带人性的“秋后问斩”，都被中共废止了。一言蔽之：**野蛮取代了文明！**

土地改革被中共宣称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动员策略：挑起占农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毁灭他们之间存续数千年和谐依存的道德伦理价值，迫使他们尖锐对立起来，变成你死我活、鲜血淋漓的阶级仇恨关系，使农民多数人依附中共，从而达到树立共产党权威、巩固农村政权之目的。对那些不愿和不敢分地主、富农财产的多数贫苦农民，用少数痞子、流氓无产者的带头和软硬兼施、

“说服教育”的办法，让他们都能分到些田地或浮财，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据著名学者梁漱溟回忆写道：“1951年9月，我从四川土改工作后回京见到主席，谈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阶级的人。主席说：**台湾造谣说死了一千多万人；哪里有那许多？我估计全国合共大约六十几万人吧！**”又据有关文献记载，土改中“依法”处决的地主大约有60~80万，加上土改中被打死和自杀的地主、富农，大约死亡了100~150万人，其中20~30万人自杀。（由于档案死不解密，数字版本颇多，有待进一步考证。）毛泽东认为，通过这种策略——御人权术，就能使大多数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毛泽东的中共，以革命名义进行“村村见血”的暴力政治土改，是中共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掠夺颠覆了使我中华民族数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传统价值，摧毁了农村数千年和谐依存的宗法关系，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和智慧，迟滞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毛的暴力杀掠式土改，是击败国民党的政治策略，并非真心把土地均分给农民，使农民都变成土地的真正主人。历史业已证明，土改刚刚结束，毛泽东的中共便开始了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进程：他们运用专政权力，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打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旗号，摧毁了土地私有制，剥夺了农民们的私有产权，把农村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攫为党国所有，使他们“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全国唯一的雇主；同时，在第二次掠夺中，他们制造了一大批以痞子、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农村官僚特权阶级，并以这些人为代理，迫使农民变成了依附于他们的农奴。——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农奴与雇主及其代理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迟滞、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当代中国亿万农民，之所以在“瓜菜代”的贫困中煎熬了半个多世纪，落后的农业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观，其根源皆在于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的**5月4日**，即中共在1946年通过实行土地改革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土改大屠杀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土地改革中，当民主人士章乃器，向毛泽东反映“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毛共把这类御人权术合法化，就为尔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开了蔑视道德、侵犯自由、践踏人权的先河，也为尔后继续愚弄和全面掠夺农民打下了基础。

图注 09：简评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率领北朝鲜15万大军，突破三八线南韩军（总统李成晚）的防线，开始了统一朝鲜半岛的“解放”战争。

这场“解放”南韩的战争，是苏联首脑斯大林策划和批准执行的。

在欧洲，斯大林挑起了“柏林危机”，直接与美国对抗。在美国和欧洲强大军政压力下，苏联不得不于1949年5月12日，解除了历时近11个月的对柏林封锁。为了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力量，斯大林决定采纳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建议，在东方挑战美国。他设计了不直接与美国对抗的“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美国保卫南韩立场的动摇性，命令金日成军事占领南韩，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另一方面利用毛泽东急于武装军队和发展经济而有求于他心情，要求毛泽东军事支持金日成，挑起中美冲突，从而达到控制桀骜不驯又具较强独立意识的毛泽东的目的。

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毛泽东在“柏林危机”后不久，便把以鲜族人为主的三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移交给了金日成。这个由6.9万人组成的兵团，成了金日成进攻南韩的主力。同时，在北朝鲜发动对南韩进攻前的数月里，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奉调于东北，使东北军区部队达40万之众，其中有15万人陈兵于中朝边界，完成了为出兵朝鲜的军事部署。到此，中共“以血换援”的方针确定了下来。1950年8月13日，东北军区司令高岗，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北朝鲜军的进攻，势如破竹，仅三天就攻克南韩首府汉城（现名首尔），并以凌厉攻势，全面地迅猛地向韩国腹地推进。两个月内，席卷并占领了几乎整个韩国领土，把南韩军赶到北纬三十五度线上的洛东江、釜山角落里。胜利在望的金日成宣布：“八月将是解放祖国全部土地的月份。”

面对北朝鲜军的突然进攻，华盛顿一片混乱：一派坚持国务卿艾奇逊放弃韩国的战略，认为朝鲜非美国利益之所在；另一派则从“柏林危机”中吸取教训，主张根据保罗·尼兹兹等完成的代号为NSC-68研究报告的建

议，在全球各地迎击共产主义的任何挑战。很快，总统杜鲁门做出了迎击挑战的决定：他一面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命令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派兵迎击，一面向安理会提交动议，授权组成联合国军抵抗北朝鲜军的入侵。7月7日，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表决通过了第84号决议，组成以美为主由英、法、土、加等1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任命麦克阿瑟为总司令，援助韩国抗击北朝鲜的侵略。苏联代表的缺席，特意把中国推向与联合国和美国直接对抗的前沿。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以7.5万人的兵力，在朝鲜中部仁川港发动了“烙铁行动”。仁川登陆成功，使北朝鲜军像“一根绳索底端吊着的一块石头，从中间剪断绳索，石块就会跌落”那样，处于灭顶边缘。麦克阿瑟的预想实现了：联军登陆后，进攻到洛东江、釜山附近的北朝鲜15万大军，回头一看，惊恐万状，在仓皇撤退中溃不成军，几乎全军覆没。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出兵。紧接着，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中国出兵，或允许金日成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由于获取了斯大林军援和经援的许诺，为了证明他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铁托，10月8日，毛泽东开始实施“以血换援”的方针，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以成建制的兵团进兵朝鲜，继而以“唇亡齿寒”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口号惑众，动员数十万计的机械、修筑、运输等后勤工农援战。

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在错误情报蛊惑下，越过三八线，挥师北上，如入无人之境。10月19日，联合国军攻克北朝鲜首都平壤，麦克阿瑟发信敦促金日成投降，扬言11月23日感恩节前，消灭北朝鲜武装。

当联军先头部队行将“饮马鸭绿江”时，10月25日，秘密跨过鸭绿江潜入北朝鲜丛山峻岭中的21万中国志愿军，突然出现在联合国军面前，打响了第一次战役，接着以40万的兵力，打响第二、第三次战役。

在优势兵力和人海战术的突然攻击下，措手不及的联军节节败退，相继丢失平壤、汉城后，败退到三七线上防守。

由于兵败，麦克阿瑟力主增兵和轰炸东北，被杜鲁门否决。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马歇尔国防部长等人，主张在不扩大战争范围的前提下，依靠其强大的技术装备优势，稳步向朝鲜北部推进。麦克阿瑟对此不满，公开发表了与总统相左的言论，被杜鲁门撤职，总司令一职由战地司令李奇微中将接任。麦克阿瑟返美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先后有700万人上街示威，支持麦克阿瑟，指责总统滥用职权。

当中国志愿军攻到三七线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引起高层激烈争吵。金日成和苏驻朝大使兼北朝鲜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认为，志愿军应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联合国军赶下大海。他们毫不客气地批评彭德怀右倾，并把“状”告到斯大林和毛泽东处。

连续三次战役使彭德怀意识到，今天的对手不是当年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要消灭美军一个整师是不可能的，速战速决也不现实。据报导，在第四次战役反击时，中国以五个师的绝对优势，包围了美 2 师 23 团的阵地，力图歼灭一个整团。但攻击几天后，在阵地前除留下 2,000 多具尸体外，一无所获(另说志愿军阵亡 5,000 人)。又据知情人回忆：由于没有空军掩护，“1951 年春，一次四个军在大江南岸，接不到撤退命令，6 万多人挤在狭小地带，在敌军漫天炮火轰炸下，几乎全部死难。”彭德怀曾于 12 月 19 日报告毛说：“大衣和棉鞋多数未运到，棉衣、被毯，多被敌机燃烧弹烧掉，不少战士穿单鞋，甚至还有部分人打赤脚。……目前正值大雪，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度，战士在体力削弱、冻坏脚者无法走和沿途露营情况下，可能发生不可想象之损失。”1951 年 1 月 2 日，中共负责志愿军后勤供应的李富春告诉苏联人，有的整支部队死于严寒。因此。彭德怀认为，必须改变要求消灭整师和速战速决的方针，为此，他必须说服最高统帅。而此时的毛泽东，已被“胜利”冲昏头脑了。1951 年 1 月，他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美国人不过如此，不怎么样，还不如日本人，扬言“我一次消灭他一个军没问题”。

2 月 21 日，彭德怀夜飞北京，赶到毛住地新六所，排闼直入，唤醒酣睡中的毛泽东，力陈兵员不足、后勤保障困难等问题，并晓以速胜的危险性。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修改了他的战略，敕令彭德怀：“**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毛泽东的表态，支持了彭德怀，终止了彭、金分争。但彭德怀不得不按照毛的旨意，持百万之众，发动了损失惨重的被西方媒体称为“绞肉机”的第五次战役。

1951 年 6 月 10 日，第五次战役即被李奇微称作的“屠夫行动”结束后，中朝方宣布“胜利转移”即后撤到三八线以北与联军对峙。是役，中朝方宣布取得了胜利：经 50 天的奋战，毙伤俘敌 8.2 万余人，志愿军伤亡 7.5 万余人；联军则报告称，毙伤俘中朝军 14.5 万人。

1951 年 5 月 16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我认为美国的真正敌人是克里姆林宫，而且不会忘记，只要这个敌人在幕后操纵，就不能浪费美国的力量。”显然，他识破了斯大林一箭双雕计，明确表示主要敌人是苏联，不愿与中国纠缠而“浪费美国的力量”。他下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凯南与苏联代表马立克接触，商谈停战谈判事宜。6 月 13 日，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却浪费大量军事资源的斯大林，权衡之后，同意并下令和谈。

6月30日上午8时，李奇微奉命以电台广播方式向中朝军司令发出停战呼吁。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复电响应。于是，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听命于斯大林的毛泽东认为，在朝鲜打持久战对“中国”有利，中国有的是人，人多不怕死人的优势可以拖垮怕死人的美国，而换来的却是中国暂时无法拥有的军援和经援：苏联不仅答应并已经开始用苏式武器装备武装中国60~100个师（其中10个师装备已用于朝鲜战争），还答应给中国援建156个能制造汽车、飞机、大炮等工业项目。毛泽东是个善于“**假外患，平内忧**”的高手，在强权运作下，持久战的好处被发挥了出来：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掩饰真相的宣传教育，已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和对自由的遏抑，大大提高了他的个人威望。

停战谈判开始后不久，双方的分歧已明朗化。主要分歧是停战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和战俘遣返原则。联军方坚持，以双方实际控制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尊重战俘，志愿遣返；中朝方则要以战前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遣返全部战俘。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毛泽东和中共，不愿使战争停下来，于是，双方谈了又打，打了又谈，谈谈打打交替进行了两年多。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沉重的军费负担使苏联新领导人不能容忍了：中朝付出的主要是人，而他们付出的主要是钱。他们不能照顾毛泽东借外患平内忧的策略，要求中朝两国按**联合国军的条件**签署停战协议。发动南侵战争几乎使国家变成废墟的金日成和他的大臣们，对谈谈打打早已不耐烦，要求停战的呼声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不得不下令签署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停战协议签署后，以双方实际控制线为停战军事分界线。由是，北朝鲜比战前丧失了3,880平方公里国土；在21,374名中国志愿军战俘中，有14,715名选择去了台湾；在7,245名美国战俘中，也有23人选择去了中国。但到1955年7月，其中22人回到了美国。

据报导，朝鲜战争双方投入总兵力为300多万：联合国军120万，其中，美国48万；中朝国军188万，其中，中国130多万。据美方统计，联合国军伤亡113万，其中，美国伤亡14万多人；据中国军方报告，中朝军队伤亡近63万人，其中，中国伤亡36万人。如按此“统计”和“报告”，联军和中朝军伤亡是1.8/1，联军比中朝军多伤亡50万人。中朝两国在劣质武器的条件下，使“武装到牙齿”的联军付出了如此沉重代价，显然是个奇迹。但到九十年代，人们听到了一系列新数据：苏俄档案解密后，传

出中国伤亡 92~100 万；朝鲜停战五十年之际，有社科院学者在网上透露，中国伤亡 77 万；停战六十年后《炎黄春秋》披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中说，志愿军先后出动 135 万人，健全回国的有 37.2 万人，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 97.8 万人；又据报导，中国高级官员曾对友党说：中国军队阵亡 40 万；有学者则认为，中朝方伤亡约在 120~150 万之间。除成建制的志愿军外，那数十万计的机械、修筑、运输等后勤工农援战人员伤亡呢？没见有人披露。笔者认为，只要中朝两国**不敢解密档案**，中朝方伤亡就是个**待解的未知数**！

2011 年 9 月 4 日，在北京举行的《“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上，有与会者披露：1971 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成为热点。林彪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 20 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

正当御用精英们还在高唱抗美援朝是“**唇亡齿寒**”“**保家卫国**”时，《炎黄春秋》在“抗美援朝的得与失”一文中披露：1956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对来参加中共八大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第一副总理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1960 年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就朝战问题与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发生争吵。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尽管“保家卫国”的谎言已被披露，但在中宣部“主旋律”的监控下，这个谎言在中国大陆高喊了六十多个年头后的今天，人们还看不到**由谎还真的**迹象。

历史证明，中朝虽然没赢，并为这场不义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却成全了金日成和毛泽东两人。造成 300 多万朝鲜人伤亡的刽子手金日成，在强权运作下，摇身一变，成了北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善“假外患，平内忧”的高手毛泽东，通过“以血换援”的实施，不仅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还使他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从而为尔后的迫害和贫困、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创造了必要条件。历史也再次证明：在专制国家，战争强化专制，武力消泯自由。因此，许多独裁者都敢于冒外战的风险，借以达到转移国内矛盾、视线和强化独裁权力的目的！

毋庸置疑的是，朝鲜战争最大受害者是朝鲜人民，其次是“以血换援”

的中国人。停战五十周年，当美国老兵出现在首尔街头时，成千上万的南韩人向他们献花，感谢他们用鲜血给韩国带来了自由和繁荣。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一天，因愧疚而无颜以对，中国老兵没有出现在平壤街头：中国人和老兵们已知，他们的鲜血白流了，他们给北朝鲜人带去的不是自由，而是压迫，不是繁荣，而是贫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他们又看见，中国与美、韩经济上互补、政治上相依性很强，上层、民间交往频繁，早已忘记了毛泽东“唇亡齿寒”和“保家卫国”那套耸人听闻的**谎言**。

抗美援朝战争虽给中国一百多万个家庭带来了不幸，却给今天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有人论证说，抗美援朝的最大损失是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期”；但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失掉“解放”台湾的机会，却给中国留下了一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沃土，从而给中国大陆人民光复真、善、美传统价值和重修普世价值，带来了希望！

图注 10：简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由此开始。

所谓反革命，是指国民党的**党**(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区队长以上)、**政**(保长以上)、**军**(连长以上)、**警**(巡官以上)、**宪**(全部宪兵)和起义、投诚人员，以及“特务”、“土匪”、“恶霸”、“会道门头子”等。河南南阳县，仅在1950年就枪决了反革命分子1,100人。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要求各地像南阳县那样，坚决镇压各类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12日，毛泽东电示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人称：“上海是

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 1951 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 3,000 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 1,500 人左右。”到 1951 年底，上海全年基本完成了原定的“杀”、“关”、“管”的指标。自此，“指标”（1）成了各级镇压机关实施镇反所依恃的“准则”。

1951 年 2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3 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动员报告。使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

1951 年，笔者在重庆市两路口附近，眺望江中小岛，那里正在处决反革命分子。一排 48 名反革命，处决后被推入长江水中。

1952 年底，“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镇反”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中共中央和政府没有正式公布过确切数字。但在官方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讲话和著作里，人们找到了不同的版本：

1954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按此比例推算，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应不少于一百万。

1957 年 2 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称：“1950 年至 1952 年杀了七十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八万人。”

199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 157 万 6 千 1 百多人，其中 87 万 3 千 6 百余人被判死刑。

1959 年 8 月 11 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反革命杀了 100 多万。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 100 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此外，《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和伍洁芳写道：“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 1948 年到 1955 年，有 400 万人被处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的 7 月 23 日，即中共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镇反大屠杀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有没有杀错的？

1957 年 2 月，毛泽东说：“根本没有错。”他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城中获得了灵感：满人用数百万汉人的人头（2），确保了大清近

三百年的基业，现在他借数百万同胞的人头，定可确保中共江山千秋万代，有什么错？

错、对的标准是什么？《渴望》歌词曰：“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其实，不用问“客”，看看历史，便能分晓。早在中共夺得政权的八九十年前，当美国四年解放黑奴的内战结束后，以北方共和党人为主的胜利者，没有以解放者自居，没有利用权力搞什么“镇反”运动，去屠杀以民主党为主的南方失败者，更没有以“大救星”的身份，强制推行枪杀数十万人的“土改”（详见附图 08）、“三大改造”（详见附图 14）和饿死数千万人的人民公社等“解放生产力”的野蛮政策，去解放黑奴。他们把用战争解放黑奴的未竟事业，交给了全体选民——用宽容取代报复和镇压。时至今日，黑奴们不仅能当上总参谋长、国务卿等高官，还被包括白人在内的全体选民，用选票推上了美国总统宝座！

八十年代，中共因统战需要向台湾示好，定向对杀掉的国民党抗日将领、内战投诚军官，做了有限地甄别，撤销原判 4,985 人。同时，他们用“特色社会主义”六个字，推翻了他们强制推行了二三十年的“三大改造”、人民公社等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把经济体制拉回到“解放”前（土地党国所有权除外）。

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到“枪杆子巩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崇拜对抗自由、民主崇拜**的逻辑，也是中共马列毛主义专制文化对华夏文明和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赤化革命**。难怪人们说，中共党和国家旗帜都是血红血红的，因为，他们的革命是用鲜血浇铸的。

图注 10 附注：

附 1、杀人指标

1951 年 5 月，公安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处决指标的指示精神，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规定：“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 1%；在城市中以 0.5% 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实际杀人数已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指标”。

附 2、满人杀汉人

据史书记载，清兵入关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屠杀。可查到的记录有：

扬州十日屠 80 万，嘉定三屠 5 万，苏州屠 10 万，南昌屠 40 万，赣州屠 40 万，江阴屠 17 万，昆山屠 4 万，嘉兴屠 10 万，金华屠 5 万，潮州屠

10 万，沅江屠 10 万，舟山屠 2 万，湘潭屠 5 万，南雄屠 2 万，泾县屠 5 万，大同、汾州、太谷、沁州、泽州等地屠 40 万，计约屠杀汉人 285 万。

此外，在四川，清军于 1647 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留女。满清御用文人所写的《蜀碧》中，把屠城罪责全部推到也杀了一些人的张献忠身上，诬称他杀人上千万，编造了历史第一大谎言。据近年学者研究，四川被害者不下 300 万，而被张献忠杀害的约为 14 万人，连同张统治地区其它非正常死亡，最多只有 30~40 万人。

图注 11：简评镇压胡风集团运动



胡风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笔名谷非、谷莹、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1920 年，曾积极参加过日本共产党文艺运动。1933 年在上海参加左联，从事文学理论批判工作。他与鲁迅交好，于 1936 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相对立，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他的理论中心是“主观战斗精神”，要求作家“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现实”，“从改造现实的角度去把握现实”，去揭示民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使“对象在血肉的感性表现里面涌进作家的艺术世界”，使“作家的思想要求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等等。这种强调艺术特性的观点，与列宁“党的文学”旨意、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僵硬教义即与文艺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中共**权力文艺观**相左，遭到了御用精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批判。

1954 年 7 月，对中共民主作风深信不疑的胡风，针对批判，一厢情愿地写了 30 多万字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上报党中央，陈述并建议采纳自己的意见。可悲的是，像胡风这样一个大文学家，竟然不懂赤文化——“**权力，权理，有权才有理**”的常识！

1954 年 12 月 16 日，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发布了批判胡风的动员令。接着，紧跟中共的御用精英和争宠谄媚者们，便在毛泽东和他的前台周扬的指挥下，开始对胡风的围剿：把一个学术建议、争论，变成了政治批判。

1955年4~5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巴金**的文章《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文艺报》也在1955年5月号发表了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茅盾**的文章《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当时的著名作家、学者、教授和科学家,如**冰心**、**曹禺**、**钱伟长**、**冯友兰**、**王元化**、**秦兆阳**、**李希凡**等,以及文革中先后自杀的作家**老舍**、史学家**翦伯赞**和文革后异化为民主斗士的**王若望**等人,都纷纷落井下石,写了措词激烈的批判胡风的文章。

1955年6月初前后,政治批判胡风已经起了质的变化。毛泽东令《人民日报》分3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为《材料》写了序言和按语。在按语中,毛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至此,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已经从学术批判到政治批判,最后演变成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关押10年后,于1965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70年春,由四川省公安厅改判无期徒刑。其间,胡已出现了内因性精神病症状。

根据1980年7月21日中共《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披露:“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多人。”又据报导,其中隔离72人,逮捕92人,23名骨干分子获不同龄期的徒刑。

一封建议书,竟遭如此镇压,真乃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

1979年胡风获释出狱,冤狱24年。1985年6月8日因病逝世,终年83岁。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指控;1986年1月,中共中央公开撤销了强加给胡风政治历史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中共中央又为胡风的文艺问题与文艺活动问题平了反,撤销强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至此,毛泽东制造的共产党“新中国”第一个文字狱冤案,三十三年后,才最终划上了个句号。

不会反思的民族,就不可能去忏悔;不愿忏悔的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反思。

胡风出狱后，对胡风案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周扬，握着胡风的手说：“**责任由组织来负。**”这是一句官腔；但这句官腔却把个人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除巴金外，没有人再为曾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劣行去忏悔。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胡风理论著作：《文艺笔谈》、《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记》、《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诗集：《鲜花和箭》、《为祖国而歌》。

图注 12：简评肃反运动



1955 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没有结束，便直接进入肃反运动。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一场肃反运动，便在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事业（包括公私合营）的各个角落里展开。

各级政府、军队、学校、企业和街道，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肃反运动。运动重点是清查知识分子、留用人员和社会关系复杂人员的历史。数量“指标”，一般控制在 5%。运动开始第一阶段，每个人必须详尽地向党组织交得自己的历史（包括隐私），接受群众审查，第二阶段审查重点对象，第三阶段组织处理。对重点对象审查的方法是：1、培训积极分子，其中不乏痞子、流氓无产者，向他们灌输“大胆怀疑一切”的同时，极力丑化或妖魔化重点对象；2、命令重点对象用口头和书面，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3、组织积极分子“帮助”重点对象坦白交待，其“帮助”方法是诱供、逼供、批斗、人格侮辱、罚站、罚跪、吊打、背上压砖、“车轮战”（不准睡觉）和限制人身自由等。笔者七岁丧母，父亲在中国远征军服役，可能早已战死在缅甸抗日战场，十二岁流浪，十四岁半参加解放军，二十岁被确定为“重点对象”，第一次受到了上述各项“帮助”。原因之一是有人怀疑父曾在新一军服役，后去了台湾（现今证明此乃子虚乌有）；又有人举报，笔者曾说过，胡风集团分子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写得不错。

在运动的“帮助”中，约有 5 万人自杀。笔者当时所在的仅千余人的重庆炮兵学校，就有两人自杀。

《人民网》编的《中共大事纪》中写道：“这次内部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 1957 年底基本结束。通过运动，从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内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通过运动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这是今天中共对当年肃反第三阶段组织处理结果的表述。

但从当年文献中，我们看到了与中共上述表述不同的记录。

罗瑞卿在《学习》1958 年第 1 期撰文《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中提供了这样几个数字：“全国有专职肃反干部七十五万多人，还有上百万个肃反积极分子。全国参加外出调查研究的达三百二十八万多人次。”规模之大可想而知。肃反的成果有多大？

1956 年 12 月 8 日，毛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讲话中透露：全国共审查了四百多万人。

1957 年 7 月 18 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提出了以下数字：

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名，现行反革命三千一百余名；

第二，投案自首反革命分子十九万余名；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

第四，提高了群众的警惕性和识别力。

笔者根据上述数字推算，清查出的反革命子占被审查总数的 2%，清查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占 0.001%；投案自首占 4.8%，搞清问题的占 32.5%，还有 60.6% 即 242.6 万被审查对象，不存在问题。笔者很可能属于后者；但没有人承认说审你审错了，更没有人向你道歉，反要求你理解和“正确对待”这种“帮助”，即所谓的“放下包袱”。

对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如何处理？毛泽东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究竟杀了没有？抓了多少？笔者没有找到官方有关记录。据丁抒著作《阳谋》注释中的《上林县志》记载：广西上林县，抓出 150 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中、小学教师占了 60 名。在 150 名中，三分之

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劳动教养，三分之一被开除公职、管制劳动，四人未予处分。其他地方呢？只由等档案解密时才能揭开。

图注 13：简评反右运动



吸取东欧“兄弟国家”匈牙利动乱的教训，毛泽东为了强化党的领导，打算采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等改善党的领导措施。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为了给“整风运动”制造舆论，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里，除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外，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对于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他说：在政治上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等等。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知识分子问题和准备整风问题时，再次强调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毛的思想，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批评那些“不少同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一些御用精英们更把“发动党内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整风运动，颂扬为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看起来好像很文明，很民主，但仔细推敲便推出了问题。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孳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土壤，反对这些主义，势必导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共无法摆脱的悖论。

当人们想起毛泽东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时候，有人曾“为毛主席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而欢欣，为共产党的伟大、光荣而感动。”甚至说什么“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健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有些得意忘形了。他们忘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民主和自由，是**铁笼子里的民主和自由**：在铁笼子里，中共恩赐的“民主”，你可以纵情挥扬，中共赠予的“自由”，你可以任意驰骋；但如果你不小心冲撞了笼子铁壁，不是头破血流，便是粉身碎骨。健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忘记了延安整风和文豪王实味被斩首的教训，内心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渴望，又被共产党开门整风的“诚意”和毛泽东充满“礼贤下士”的讲话精神，激发了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想碰一碰笼子的铁壁，试一试毛泽东和中共的诚意。5月21日，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说：“**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上图：批斗章伯钧）6月1日，文汇报总编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发言中，上书毛泽东说：“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又说：“**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他们的意见，虽代表了人民的正义呼声，显然已冲撞了中共笼子的铁壁。

毛泽东突然变脸，他把冲撞笼子铁壁的人称为右派。5月15日，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在这篇文章中，毛写道：“**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6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毛泽东将此计管叫做“引蛇出洞”。

紧接着，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

反右中，有人指责毛借整风之名来反右是阴谋，毛泽东对答说：“这是阳谋。”有人指责毛是“秦始皇”，毛泽东对答说：“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年后的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有声有色地说：“蛇不让他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好一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痞子嘴脸！

在这场运动中，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一百多万人被内定为中右或异己分子等罪名，存入档案，监督、限制使用或将来算总帐；数十万有右派言论的工人、农民，被打成坏分子。反右中和反右后，有约5~10万人被打死、自杀，或在劳改中死亡，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千多万人受株连。其中，文汇报总编储安平，在文革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数字版本颇多，尚须进一步考证。）笔者时任教于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自杀两人，数十人被结论为中右、阶级异己分子，记录在档案中，“发配”到北大荒劳动，笔者为后者其中之一。

据钱理群在《**地狱里的歌声**》书中披露，在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是个右派劳动教养农场，“收容”有甘肃省各类右派二千四百余人，包括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三年后，被抢救出的奄奄待毙的“劳教人员”，仅1,100人，其余1,300多人已葬身于荒漠之中。据铁流的《**“南瓜山”数千饿殍的见证人 一位公安干警的自诉**》中记载：“南瓜山不是山，是个埋死人的地方。在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场部医院后面的一块荒坡上。当时沙坪劳改农场关押近一万多教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右派分子，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两年多的时间里竟饿死五千多老右，直到现在也鲜为人知。”原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他的一本《**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书中说：反右结束后，河南省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的谭家河，建了一个“万胜山林茶场”，共送去右派二百多人，逾半数去而不归，埋骨荒山；幸存下来的则多因伤残，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感到毛骨悚然。最令人无法释怀的是，这些残害右派分子的遗址，同“血肉横飞大辛庄”的受难者的归宿一模一样：埋葬右派分子的“万人坑”都被填平了，那些右派分子死后留下来的血渍，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已被“导向”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右派分子遗骸，在“主旋律”的催眠曲中，也已被“遗忘”分解得无影无踪！

运动结束，中国出现了空前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政治局面，为毛

泽东的一言堂，为毛泽东和中共制造饿殍遍野的“三面红旗”的胡做非为，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右派言论获罪的诗人杨一华，在监狱、劳改场里，度过了 19 个春秋。他把他的深切感受，写进他的一首诗里——《1957 年反右有感》：

百花齐放百家鸣，
纳善从流剧可亲。
谁识翻云覆雨手，
一时才俊尽沉沦。

1978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死后不到两年，在党内外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才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自此，一场悲惨的恶作剧，才在权力不请愿平反的“改正”花饰下，从形式上划上了个句号。在一党专政的铁拳弹压下，面对这个“句号”，抱打不平的旁观者，无可奈何，遭受残酷镇压的受难者，只好认命！

图注 14：简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



1953 年，毛泽东把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 年春，中国土地改革刚刚完成，相当一部分农民开始买牲畜、农具发展生产时，中共便大造舆论说，“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既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又有两极分化的危险”，并在当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

作社的决议》，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合作化遭到了农民的普遍反对，很多地区发生农民闹退社、砍伐树木、大量宰杀牲畜等情况。对此，毛泽东却一意孤行，他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高层，他大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有严重右倾思想，撤了邓的职；在下面，他派出农村工作队，用**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强制推行合作化，打击反对合作化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狠批农村干部的“**三十亩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忘本”思想，积极支持“**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的彻底掠夺。一时间，强迫命令风盛行起来，数十万农民因不愿将自己的农具、牲畜入社而被捕，或跳河、或上吊自杀。在毛和中共的软硬兼施下，仅用了三年，便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等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接着，到1957年，全国初级农业社先后跨进高级社。到1958年，农村全部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实现权变物资的转化。这种名义上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质上是毛党所有制经济，农民由此变成了中共党政权力的雇佣，从而使中共实现了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加快权变物资的进程，毛用惯用的动员和镇压相结合的手段，即树立5%“阶级敌人”当靶子，打成“反革命”，借以警告农民不准抗拒合作化。他明确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在“大捉特捉”中，约10~20万农民被打死或自杀身亡。

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通过工作队去组织实现，即抛弃了“自愿加入”原则，用动员+强迫命令方式，组成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供销合作社，任何单干，都被批斗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此，街上再也见不到修鞋的，剃头的，补锅的和修自行车的，因为他们都被集体化了，都成为合作社社员。到1956年底，手工业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

相比之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要比农业和手工业改造容易些。因为，中共明确规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渡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经过镇反和“三反”、“五反”的工商业界人士，没有人敢反对。因为，人们已经领教过“三反”、“五反”的血腥：曾被毛泽东表彰过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四个代表之一的**卢作孚**，跳楼自杀了；上海“冠生园”品牌创立者、一个勤俭起家的工商业者**冼冠生**，因不堪凌辱，也跳楼身亡了；据报导，在“五反”高潮的一两个月里，有一千多人跳楼。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合作化高潮中，识时务的资本家，便敲着锣、打着鼓，乖乖地将自己经营的全部产业交给了中共。到1956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全部实现了国有化，完成了一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成千上万个想不开的资本家、小业主，也纷纷跳楼自杀，被斥为“**罪有应得**”。

中共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道路，是一条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实行全面掠夺的道路。全面掠夺使毛泽东和中共变成了全国唯一**雇主**。在新雇主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官员（权贵）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官僚特权阶级**，而这个官僚特权阶级为九十年代演变成红色亿万富翁打下了基础，一如共产主义世界那样。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老百姓变成了被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任意驱使、宰割的奴仆。——这些都是权力拜物教的产物！

毛泽东死后的 1978 年，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为摆脱贫困，以不上吊、不跳河和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无畏精神，秘密用按手印、分田到户，即实行大包干的办法，率先反叛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砸开了套在他们身上长达 22 年的枷锁，受到全国农民的欢呼和响应。中共权力拜物教思想开始有所动摇，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民们很快把肆虐他们近三十年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农业社，送进坟墓。在八十年代，以红二代为代表的中国红色资本家们，无视五十年代前辈们的跳楼史，在权力保护下，跃跃欲试，九十年代开始发迹，“三个代表”到手后，他们便入党做官，在官商一体中大显身手。二十世纪末，在“三个代表”的官场里，权力崇拜有了恶性发展之势：“闷声发大财”、“有权就有钱”、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官员财产保密，等等权力腐败，为权力拜物教增添了一系列新内容。

中国有一条谚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看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先后不同遭遇，这条谚语可算灵验！

不过，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著书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总体上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实际需要”，是“**人民的选择**”；他们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全面总结了我国农村工作中的经济教训，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策，使农业和农村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繁荣的局面”，是“**历史的选择**”。对此，老百姓不能认同！在“舆论一律”、拒绝选举、人民无法用选票来表达好恶的一党专政下，当人民成了任由官员们驱使、宰割的奴隶时，所谓“人民的选择”，就是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对人民的奸污；在档案尘封，真相藏于密室，公正性被严重扭曲的禁律下，当历史成了任由官员们打扮的小姑娘时，所谓“历史的选择”，就是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对历史的猥亵。按照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的逻辑，就是说，过去搞合作化正确，现在解散也正确，总之，“一贯正确”；之于过去消灭私人资本经济，现在发展私人资本经济，当然也是“一贯正确”。——这就是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的谎言逻辑。

在“一贯正确”和一党专政的铁拳下，尽管政策翻了个个儿，中共一对翻个儿的折腾不作任何道歉，二对全面掠夺不作任何赔偿，因而，那些

在合作化中自杀或遭枪杀的农民们,那些在资本国有化中跳楼的死难者们,没人敢为他们鸣冤叫屈!

在天翻地覆的大折腾、大掠夺、大屠戮的“三大改造”中,六亿老百姓在当上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同时,却失去土地和工商业所有权,变成了雇佣和奴隶,而中共则在“为人民服务”的高歌声中,变成了腰缠全国所有生产、生活资源的唯一雇主。在雇主的“全面专政”下,中国老百姓的灵魂,没有得到过他们“罪己诏”的安抚,更没有得到过他们一句表示歉意的慰藉,得到却是“三个代表”所表达的“一贯正确”的谎言:“中国共产党始终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图注 15: 简评大跃进运动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着太阳吸袋烟。

毛泽东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958年，当农民们掌握了“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以后，便“焕发出无穷的物质力量。”这首诗就是证明。

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胸怀“大救星”权力情结的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指责他“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确认，“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宣布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红色狂潮。

1958年各项经济指标，按大跃进速度进行修订。那些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教授们，许多人在反右中已中箭落马，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些没有中箭落马者，大都心有余悸，“乖乖”得多了，一切听任政治家们安排，谁敢多说一句？

毛泽东规定：“每年增加一千万斤（粮食），搞到一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

由于怕反党当右派，怕犯右倾错误，各级干部们的高指标、浮夸风便泛滥起来。

6月22日，毛泽东批转的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中说：“明年（笔者：指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笔者：1957年才524万吨，年均翻2.86倍），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是1957年的16倍多）。”在逢迎献媚和异想天开的竞争中，谁是佼佼者？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非冶金部党组莫属！

8月北戴河会议上，考虑到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决定“土洋结合”。他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土炉子”炼钢，实行书记挂帅，并用“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铁纪律去完成任务。到1958年年底，投入的农村劳动力达9,000万人（另说6,000万人），“土炉子”全国遍地开花（见上图）。由是，1958年全年完成炼钢任务1,070万吨，虽比计划少230万吨，但比去年翻了一番多。（笔者：中间有多少不合格的钢材？）

9~10月，《人民日报》多次介绍推广商城经验：花100多元建一个炉子，只用250斤木柴和木炭，就可以炼出一吨钢，并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炒铁”、“板铁”，是名符其实的“钢”。对此，10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河南金榜第一名”。在毛下令“钢铁元帅升帐”

之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们，也在中南海里搞起了“土炉子”炼钢，并恭请“伟大领袖”莅临指导。毛应诺前往视察（见上图）。

40年后人们才得知，1961年实际钢产量仅为870万吨，四年间比1957年增加了66%。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农业也“捷报”频传。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3,821.9斤，放出了第一颗单产“卫星”（另说为2,105斤）。几天以后，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亩产4,353斤的水稻“卫星”也飞上了天。从此，一场放“卫星”的竞赛活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继四川卑县放出中稻亩产82,525斤的“卫星”后，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不甘落后，便放出一颗**中稻亩产130,434斤**的“超级卫星”，创下了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最高纪录！9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报导了这个令人鼓舞又令人困惑的消息。为了证明“高产卫星”的“真实”性，许多报纸都配发了“**嬉戏在卫星田里谷穗上的儿童**”的照片！（见上图）

乘着大放“卫星”的狂风，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巡游祖国大地。6月14日，他在河南封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8月4日，他在河北省徐水县回答粮食多了怎么办时说：“**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见上图）对“伟大领袖”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国亿万农民感激涕零。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对此，毛十分欣赏。

12月，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笔者：1957年为3,700亿斤；另说为3,9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笔者：1957年为3,280万担）。

历史跨进1959年，频传的“捷报”变成饿死人的“丧报”，雪花般地飞入中南海。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果然，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彭德怀“跳”了出来，竟敢“**我为人民鼓与呼**”。毛泽东率众反击，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中央，由此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新高潮。

那难忘的三年，笔者在北大荒农场劳动。1958年中期，当时的农垦部部长后来在八十年代荣升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上将说，下半年农场全部吃四菜一汤。秋，笔者在兄弟农场食堂，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吃得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1960年吃水煮玉米粒和玉米穗衣淀粉。1960年冬，农场做人造肉展览，宣传“玉米秸秆全身都是宝”，属“国家

机密”，参观回来后，笔者被指派用玉米穗衣做淀粉，人吃后拉屎干结，有时得用手抠。黑龙江历来都是“清明忙种麦”，王震“敢想”，下令种冬麦，结果数十万亩绝产。王震敢干，农场挣钱门路多。种大烟，花朵五颜六色，非常好看，花籽吃着比芝麻香。冬天进完达山原始森林里伐木，各总场、分场都建有伐木队，挣现钱，年年如此：靠山吃山嘛。伐木人零下40度取暖，把直径40~60cm的百年大树放倒，按50cm一节锯开，扳斧一劈四瓣，填进大油桶里烧……总之，笔者“得天独厚”，在大破环境中既没饿着，也没冻着，只是疚心难却。

到1961年，持续长达三年的大跃进，终以**饿死农民3,000万~4,500万**的代价，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官方承认：1958年到1961年，饿死即所谓“非正常死亡”3,767万人。那个发射“超级卫星”的广西环江，全县16万人饿死了5万，创死亡率达31.3%的世界纪录。据安徽省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叫“石求明”的，上书毛泽东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滩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1971年10月，笔者于林彪摔死后不久，曾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草黄林公社出差，同那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六〇年时，他们几乎毫无顾忌地、不加掩饰地说：那三年，他们公社饿死人在三成以上，有许多绝户。

对死亡，毛泽东早有“创见”。大跃进一开头，他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八届二次会议上，他讲大批死亡是“白喜事”。他说：“**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鼓盆而歌是正确的。”**（笔者：庄子亡妻后鼓盆而歌）**“人死应开庆祝会”**。如此说来，饿死几千万应开多大规模的庆祝会？草菅人命非其莫属也！

四十年后，官方资料显示当年粮食实际产量和征购情况：

1957年产粮3,900亿斤，征购961亿斤，占产量的24.6%（另说产粮3,700亿斤，征购960亿斤，占产量的26%）；

1958年产粮4,000亿斤，征购1,095亿斤，占产量的27.3%（另说征购1,175亿斤）；

1959年产粮3,400亿斤，征购1,348亿斤，占产量的39.6%；

1960年产粮2,870亿斤，征购1,024亿斤，占产量的35.7%；

1961年产粮2,960亿斤，征购809亿斤，占产量的27.3%。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毛泽东许多反高指标反浮夸的言论。但我们无法否认，他是高指标的始作俑者和恣意妄为者。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那政痞

式的“一分为二”：对同一件事，他既善于肯定，也善于否定，既善于褒扬，也善于贬斥，一切都要求他的下级领会其“精神实质”；他的“**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的痞子哲学，成了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理论”根据。当发现高指标祸国殃民时，他摇身一变，便从始作俑者变成了个反对者。这是中共的赤文化，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这种赤文化确保了毛泽东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如果发生错误，也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结果。

饿殍遍野的大跃进是“大救星”权力情结产物，亦即权力拜物教的滋生物，因而没有使毛泽东的中共翻然悔悟。但为了推卸责任，他们除大喊天灾外，却把罪责推到苏联乘人之危的“逼债讨帐”上。然而，历史记录却推翻了毛的谎言。据报导，在三年大饥荒中，苏联政府曾决定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都被毛“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事后，他还对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要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就这样，数千万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为毛泽东的“节操”和“志气”，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草菅人命之登峰造极者，非毛莫属也！

在这三年灾难中，有两件令人嗟叹欷歔的事，已分别载入史册。一件是，“伟大领袖”听到饿死几千万人后，心里很难受，表示三个月不吃肉，以此“悼念”饿死的阶级兄弟。御用精英们听了后，大为感动，纷纷著书立说，大讲毛主席与劳动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高尚情操”和不吃“嗟来之食”的“志气”。另一件是，河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因向上级要不到粮食，全县饿死十一万四千人。遭到上级批判后，怕当替罪羊被枪决，便领着老婆和三女一男全家六口人，夜半跳了井，14岁的儿子毕剑增，侥幸水里逃生。后人没人敢为他著书立传，却有不少人称，这位县委书记是“以死谢罪”，死而余情犹在！

图注 16：简评人民公社运动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自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合誉为“三面红旗”。借着大跃进的红色狂潮，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在全国农村正式地普遍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达到了高潮。据官方报导，到 10 月底，全国 74 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 2.6 万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制造典型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拿手好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们一手打造的王国藩、徐建春等一系列政治典型，让他们肩负着党的红托儿使命，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把六亿农民拖进了共同贫穷的深渊。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如法炮制，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典型——遂平县嵛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被他们制造了出来。其中，国务院副总理谭震霖、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和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等领导干部，为制造这个典型费尽了心机。

根据“一大二公”、“便于领导”、“全民皆兵”和“大兵团作战”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嵛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嵛岈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公社共建 27 个生产兵团，外加一个钢铁兵团。以生产队为一个团，团内设正副团长、政委。一个中队为一个营，任命了营长、教导员和参谋长；营长领导全盘生产，教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参谋长负责技术指导。营下边按村庄和作业小组，组成连、排、班。此外，各团还专门设立了水稻营、棉花营、红薯营。

由于军事化管理，嵛岈山人民公社的农民，都被约束在“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军事管制之中。为了达到“伟大领袖”提出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要求，许多村都把男女分开，编成连、排，分开居住，“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老年人带着孩子住留守营房。”夫妻也不例外。由于欲火难耐，有些小夫妻竟敢铤而走险，夜半跑到山里亲热。被哨兵逮住后，以严重违犯军纪论处。好事者记录了斗争辩论他们的场面：

审者：“你们为什么干这见不得人的事？”

违者：“想哩。”

审者：“想，想，谁不想？你们就不会忍一忍？”

违者：“忍不住呀。”

经过辩论批斗后，触犯“军纪”者提高了认识。

审者：“还想不想了？”

违者：“急死也不敢再想了；谁再想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这个记录已无法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公社男女分开的军事化管理，增加了年轻夫妇“野合”的可能性。

由于最低层的生产队长可以当团长、政委，共产党的官有低贱之嫌。于是，在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过程中，中共做出了严格规定：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分别编为团、营、连、排。刚刚当上团长、政委没多久还没过够大官官瘾的生产队长们，立刻变成了兵头将尾的小排长。共产党的官又主贵起来。

公社军事化管理，就要实行“**统一吃饭**”。于是，毛泽东倡导的公共食堂，便横空出世，大放异彩。由于毛将公社规定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政权体制，属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各级党和政府，在对农民实行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制的同时，有权无偿地调配各营、连、排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调配他们的粮、油、棉等生活资料，这种被时人称为即“合理”又“合法”的“一平二调”，使公共食堂有了“可靠”的供应保障。有资料显示：嵯峨山人民公社共建食堂 301 个，9,364 户全部参加了食堂；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全年每人 500 斤口粮标准，无价供应，社员凭粮证吃饭，可以吃个肚儿圆。在典型的带动下，遂平全县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建幼儿食堂 99 个、青壮年食堂 247 个、幸福食堂（老人）126 个、综合食堂 1,667 个。在初期的公共食堂里，人们初尝共产主义硕果，可以尽情地吃，忘情地喝（见上图）。张艺谋在他的《活着》影片里，就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公共食堂两次饭局的画面：一次是大吃捞面条，一次是大嚼肉水饺。笔者在北大荒的公共食堂里，曾有幸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吃的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1958 年 11 月 2 日，《河南日报》报导：“**公共食堂的建立，其优越性如旭日东升，放射出万丈光芒。**”

公社军事化管理，使毛泽东的大兵团作战思想大放光芒。毛泽东一声号令“**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九千多万男女齐上阵，以人民公社“钢铁兵团”为骨干的炼钢大军，使砖砌的小炼钢炉遍地开花，火光冲天。尽管小高炉炼出来的多是不合格的钢铁，却硬是把当年全国的钢产量翻了一番，达到了 1,070 万吨。

公社军事化管理，给农业大跃进安上了一双任意高飞的翅膀。在《人民日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的启示下（见上图），嵯峨山人民公社放出一颗亩产小麦 3,821.9 斤的“卫星”。但“卫星”上天不久，便被其他省市放出更大的“卫星”所取代。不服输的嵯峨山人，咬咬牙，又放出了一颗亩产水稻 31,403.33 斤的大“卫星”。好家伙，一亩竟产水稻 3 万多斤，这在遂平县放高产“卫星”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他们高兴没过多久，广西环江县亩产 13 万斤中稻的“超级卫星”，飞上天空，力压群芳，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产冠军！嵯峨山人蔫了，不敢再咬牙了。但省委书记吴芝圃死不服输，他硬把河南 1959 年只有 210 亿多斤的粮食产量，上报成 450 亿斤，达到和超过了毛泽东要粮食“**翻一番**”、全国每人每年“**平均有粮食 1,000 斤，猪肉 100 斤，油 20 斤，棉花 20 斤**”的目标。

嵯峨山人虽不敢再放“超级卫星”，但社办工业却捷报频传：几个铁匠集中在一起，一座炉，几把大锤，门口便挂起了“**嵯峨山人民公社修造厂**”的牌子；几个木匠集中在一起，各自带着他们的斧、刨、锛、凿，“**嵯峨山人民公社木工厂**”便宣告成立；油匠们支起了一口大锅，小毛驴拉着沉重的油磨，踩着没尽头的磨道，转了一圈又一圈，油匠们仰着一张张油光闪亮的脸，庆幸他们已从农民光荣地变成了“**嵯峨山人民公社榨油厂**”的工人……嵯峨山人大办工业捷报，引领了全国农村工业的大发展，为全国“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做出了贡献。尽管人民公社引领了工业大跃进，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竟敢说，1961 年，工业“**减产了 40%。**”

嵯峨山人在大办大学中，成效显著。在各级政要的帮助下，遂平县“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红专综合大学”正式成立，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号召，成了当年典型中的典型。全校共 10 个系，在校大学生 529 人。该校教授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识字不多，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洋教授由原来的小学教师担任。毕业生不仅能种地、开拖拉机、“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还能写快板书，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典型力量的推动下，全国工大、农大、夜大、红专班等高等院校，与“红专综合大学”争红斗艳，遍地开花，使毛泽东“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教育革命思想，大放异彩。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由 1957 年的 227 所，到 1960 年，增加到 1,289 所，猛增 5.6 倍。嵯峨山公社社员，几乎人人都变成了大学生。

然而，让嵯峨山人没有料到的是，进入 1959 年，日子越过越艰难了。首先是公共食堂告急，粮、油、菜的供应越来越少，有些食堂连喝稀都喝不上。在打倒了彭德怀之后，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必须坚守公共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指示，向全国发布命令：“**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由于中央的决定，嵯峨人、河南

人乃至全国各地的干部和群众，谁也不敢解散公共食堂。于是，在“**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里，红薯叶、马齿菜、菜梗和菜叶，都派上了用场，有些食堂，甚至派上了玉米心、花生皮、嫩草根和树皮。不过公正地说，这些“食品”，比笔者在北大荒用玉米穗衣作淀粉充饥，要好吃一些。

公共食堂喝稀断粮，都是高产“卫星”惹的祸。

在农业大跃进、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使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57年3,700亿斤，“激增”到1958年的7,500亿斤，猛增1.03倍。上行下效，在遂平县，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约为3.03亿斤，却“激增”为10.03亿斤，猛增2.31倍。大丰收了，国家征购粮油数量也“理应”增加。在遂平，1958年底，国家征购也从去年的800万斤，猛增到9,000万斤（县委书记认购数）；全国呢？国家征购数也“理应”自1957年的960亿斤，增加到1958年的1,500亿斤，但阻力太大，只征购到1,175亿斤。到了1959年，各地照例高奏大跃进、大丰收的凯歌。同年8月，在庐山，当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清除出中央后，毛泽东不顾各地已开始饿死人的严酷现实，率领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新高潮**”。是年，在粮食减产15%、年产不足3,400亿斤的严重人祸面前，在许多公共食堂无粮断炊的严酷形势下，毛泽东的中共，仍按他们心目中的产量，借着“反瞒产私分”运动的狂暴，强行从农民手里“征购”走了1,348亿斤粮食，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9.6%。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独树一帜，他一拍脑袋，把全省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硬从210亿斤“拍”成了450亿斤，猛增1.14倍。在吴书记的“坚强”领导下，嵯峨山所在的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学着顶头上司吴书记，一拍脑袋，把当年实际20多亿斤的产量，“拍”成了50多亿斤，国家以此强行从农民手里“征购”走了10亿多斤，约占当年产量的一半。

民以食为天！当农民们眼睁睁看见政府用枪杆子强行夺走他们40%到50%的口粮后，陷入啼饥号寒的危机之中。在“**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里，短短几个月，便从喝稀走到了揭不开锅的尽头。为了活命，农民们便以瞒产、私分、私藏粮油、做小锅饭来与官府抗争，使征购遇到了强大阻力。天才的毛泽东，立刻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反坏右”要翻天。1959年2月22日，他发出指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于是，他在全国发动了以反瞒产、反私分、反私藏为中心的“**民主革命补课**”的整社运动。1959年8月19日，他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要用“**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办法去“反瞒产私分”。

那些以痞子、流氓无产者为主要成员的“群众”和干部们，闻风行动了起来，他们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对农民、对私分的生产队干部，大打出手。他们扬言：“不打人就不是好干部！”甚至说“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就是“小彭德怀”！

有关资料显示：在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把反瞒产运动定义为“捉鬼拿粮运动”后，捉“鬼”变成了打“鬼”。据《炎黄春秋》报导：湄潭县在反瞒产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就有1,324人，打伤致残的有175人，关押致死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撤消一切职务的有1,680人。在广西，经过柳州地委同意后，1959年2月25日，石龙县集中全县各社队干部5,000多人，在二塘樟村召开反瞒产大会。县委书记**孟广平**说，1958年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右倾情绪作怪”，各社队干部故意瞒产私分，有粮不交国家，因此，要大打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据说，在“反瞒产的人民战争”中，有数百人被打死。在上林县，打和罚的手段有30多种，其中包括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罚挑水、扣工资、夺饭碗、背石头、罚苦工、晒太阳、带病上工等等。在河南，在嵯峨山的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献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掀起了反瞒产私分、挖私藏粮油狂潮，全区打人成风。在光山县，县委召开的一次反瞒产会议上，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把反瞒产不积极的县委书记**张洪福**，活活打死。上行下效，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致死40多个农民。据统计，在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手打过人的占93%。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挖藏粮中，由公安机关逮捕的1,774人中，有36人被打死在狱中，拘留的10,720人中，有667人被打死在拘留所里。全国呢？笔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粗略保守估算：按每县打死打伤30~40人计，全国死伤不会少于七万人，其中被打死的，应在三万人以上。

随着反瞒产、反私分和挖藏粮运动的深入和发展，饿死在“天堂”里的人越来越多。在贵州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的反瞒产运动中，全县共饿死124,51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绝户的达2,938户，遗下孤儿4,737人。在嵯峨山的信阳地区，据学者们估算，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的半年多里，“非正常死亡”约为60~100万人，三年里（1959~1961）“非正常死亡”约为110~130万人。其中，在人民公社的发源地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全社仅4万人，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的三个多月间，就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据潢川、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就达1.2万人之多！在全国，据专家测算，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人祸”中，有3,000~4,500万人倒毙在人民公社的“天堂”里；官方在《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中承认：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

亡” 3,767 万人。(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 每年的 8 月 29 日, 即中共在 1958 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那一天, 理应成为“**中国大饥荒纪念日**”, 年年铭记, 岁岁不忘!)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恶果, 迫使中共从 1961 年起, 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和有效的补救措施, 如政治上广开言路的“神仙会”和经济上的“三自一包”等亡羊补牢措施, 扭转了大规模饿死人的局面, 当时颇得人心。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性质基本没动, 数亿农民仍像现代农奴一样, 不得不在**雇主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的监控下, 长期在“瓜菜代”的贫困中煎熬。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恶果, 使中共陷入分裂。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逐渐得势, 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迫使他不得不退居二线。不甘心身居二线的毛泽东, 开始在暗箱里策划向刘、邓兴师问罪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死后, 右派发动宫廷政变, 击败了毛左集团核心“四人帮”, 宣布文化大革命为“浩劫”。1978 年, 在邓小平、中共的默许和支持下,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十八户农民签订“血”约, 揭“书”而起, 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 率先分田到户。1979 年 9 月, 中共在四中全会上, 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承认小岗农民分田到户的合法性。1980 年 9 月, 中共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2 年 12 月, 在全国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重新修改后的宪法规定: 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 重新设立乡政权。自此, 肆虐中国农民二十四年又三个多月的毛氏人民公社, 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接着, 到了 1983 年, 中共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推翻人民公社体制的同时, 砸开了中共套在农民身上长达三十年的农业合作化枷锁, 使亿万农民开始过上能吃饱饭的生活。至此, **毛氏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共氏农业合作社**, 都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成了千古诅咒的妖孽。

图注 17: 简评“四清”运动

饿殍遍野的大跃进, 使农民吃尽了苦头, 他们与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时那种关系已不复存在, 埋藏在心底的只有仇恨。不愿认错的毛泽东, 拒绝反思“三面红旗”的罪恶; 但他是以农民运动起家的革命家, 深知失去农民意味着什么, 这种后果的可怕性在困扰着他。为了解脱困局, 天才的谋略家又抬起了阶级斗争的武器, 并找到了替罪羊——曾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和冲锋陷阵过的社队基层干部。当听到毛泽东估计说有 **20% 生产队领导权在坏人手里**后, 周恩来便说“**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

握”，刘少奇则说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在这里，统计学再次变成了政治评估学。于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拿经济“四不清”的干部开刀，即清算他们的工分、账目、仓库和财物（简称“四清”），借以转移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对大跃进和对中共的仇恨，重树共产党的绝对权威。



为此，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他在文件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在这里，他把“三面红旗”制造的饿殍遍野的罪恶，统统算到“反革命”身上。他又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

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每个生产大队派工作队员30~60名不等。运动开始，首先大规模培训工作队队员。在培训中，把农村描绘成漆黑一团，许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已经烂掉，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夺权，原干部一律“靠边站”，等待审查。接着“访贫问苦”，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队员通过“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为重建农村政权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先“洗温水澡”，“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让他们“轻装上阵”，“共同对敌”。对重点审查人物，发动群众揭批。揭发内容包括：贪污、多吃多占、多计工分、欺压和打击报复贫下中农、混线即与四类分子（1）关系不清，等等。

1964~1965 年间，笔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参加过“社教工作队”，搞过两期“四清”，每期八个月。省里规定，有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社教”，以便接受改造，笔者便荣幸地当上了社教工作队一个工作组的材料员。在教育 and 接受改造中，曾目睹过许多场批斗会。其中有一次，批斗的是一个生产队队长。他的“罪行”很多，记得有这样几件“大事”：为了升官发财，他在 1958 年，“违犯毛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把亩产小麦 320 斤，虚夸上报成 1,020 斤，使生产队超交，短了半年粮，群众要他到“病死”的两个老人坟上**磕头**；在返销粮中（统购过头又返销给农民的陈年粮，1965 年仍在执行），他给四类分子多分，同贫下中农一样多，**混线**；他自己家也多分了 30 斤，**多占**。批斗中，他不服，说他开始报亩产 340 斤，公社批他右倾，第二次三级干部会议上，他报 520 斤，县里批他企图“瞒产私分”，他受不了，就索性跟着别人报了 1,020 斤。他还顶撞说：“那时，你当干部试试！”对多给四类分子返销粮，他顶撞说：“他们也是人。”他的顶撞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他虽然“硬”，但在反复批斗和打骂、捆绑下，他终于软了，承认他自私、混线、犯了罪，“辜负了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显然，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他是本队“**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代表。当清查到一个副队长的工分时，出了问题。他原是个“打头”的（领头干活），中农成份，活干得好，后来升副队长。他每年得的工分都是全队最高，1963 年高达 3,900 多分。每天记 12 分，群众评议，当“打头”时可以，当副队长每天应记 10 分。算来算去，扣掉了他 200 分。去年生产队收入较好，分值八分，须扣他 16 块。他一时想不通，竟上了吊。这个意外，把我搞懵了。当时工作队就宣布，他是“畏罪自杀”。一个“**反革命复辟**”分子死了，正如“伟大领袖”教导的那样，他的自杀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来到他家，见到了他的媳妇和三个小孩。小孩子泪汪汪的，媳妇似已没有眼泪，她连连对工作组组长说：“他有罪。”全家五口，只有三床棉被。看着他那个几乎一贫如洗的家，我那颗早已“冷酷”了的心，此刻竟被弄得酸酸地，眼也禁不住有点湿，赶紧转身躲开去。

到了 1965 年元月，风云突变，中共下达了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下达后，“四清”内容从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突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明确“清”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笔者春节留守，直接向社员照本宣读《二十三条》，规定不许讲解。党支部书记和委员们听了后，紧张得春节都没心喝酒。当时笔者有些糊涂，不知政策突变的原因。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因不满刘少奇、邓小平党内右派的不合作态度，特别是对“三面红旗”后果和“四清”性质认识等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怒出《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邓一伙。所以，学者大都认为，《二十三条》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四清”运动中有很多人自杀，笔者只见过两起。据报导，北京市郊区通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发生自杀 70 多起，死亡 50 多人。

全国有多少人死于“四清”？据报导，在城市有 4,128 人致死，在农村有 73,432 人被打死或自杀。

“四清”运动在面上只搞了三期，全国大约搞了三分之一的社队。第三期没搞完，便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四清”由是结束。

图注 17 附注：

附 1、四类分子

指“地富反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阶级敌人。文革中，又把右派分子包括在阶级敌人中，四类分子便发展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后，划分阶级敌人的范围不断扩大，便出现了“七类分子”、“十类分子”、“二十一种人”等等。

图注 18：简评高饶事件

“伴君如伴虎”这条远古封建的戒律，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继续发酵。历史这样记录了被毛整死的“大臣”名单：

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9 年被整，长期被囚，1973 年囚死；

中共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1966 年挨整，1969 年拖死于密室；

中共党章规定毛的接班人、副帅**林彪**，1971 年被整，同年 9 月摔死；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3 年起不断挨整，在反复折磨下，心力憔悴，拖死于 1976 年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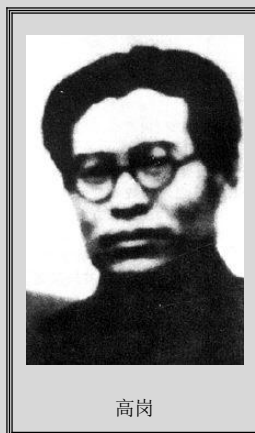
（以上各“大臣”的命运，可查看本书有关章节。）

但“解放”后第一个被毛整死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1954 年 2 月开枪自杀未遂，同年 8 月 17 日，又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 49 岁。

高岗被清洗的主要罪行是：与饶漱石结盟，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 年

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1932年1月，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11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红二十六军政委，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委。陕甘宁边区的创建和发展，使被打得焦头烂额的中央红军，有了喘息和立身之地。1935年9月，任15军团副政委；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1月，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1941年5月，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奉命赴东北，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49年后，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高岗

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钟岭乡环洲饶家人，生于1903年11月23日，曾赴英、法、苏留学。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历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1947年2月到7月，作为华东战区的最高统帅，领导和参与指挥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白塔埠战役、蒙泰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等，歼敌数十万。1948年10月后，与中原前线总前委邓小平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然后挥师南下，参与领导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先后歼灭国民政府军100多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1950年8月，第三野战军前委与华东军区合并后，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委。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饶漱石同志

高、饶厄运，始发于1952年的“五马进京”事件。“五马进京”指当时的五大中央局的“诸侯”即第一书记调进北京工作。那“五马”是：西南局的**邓小平**，西北局的**习仲勋**，中南局的**邓子恢**，华东局的**饶漱石**和

东北局的**高岗**。其中，高岗最为显赫，不仅担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之一，还兼任与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相平行的计划委员会主席，分管 8 个工业部，削减了周的权力，故有“一马当先”之誉。毛要重用高，周恩来看得十分清楚：做为大管家，他曾把党内传阅文件的顺序，由毛、刘、周、朱、高，改为毛、高、刘、周、朱，把高岗提到紧随毛后的第二位。原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进京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干部考核、任免大权，名正言顺地取代了刘的亲信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

1953 年“五马进京”后，据称，高岗与饶漱石结盟，反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反党阴谋”被中共中央“察觉”，在 1954 年 2 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饶受到“揭露和批判”。同年 8 月 17 日，这位曾在 1935 年 10 月拯救了中央红军的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高岗，终因不堪屈辱，饮恨自杀身亡；在华东战区做过重大贡献的饶漱石，被捕后病死于狱中。1955 年 3 月，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马进京”后，高岗怎样与饶漱石结盟？怎样反对刘、周、朱、陈（云）、邓（小平）等人呢？

毛泽东的天才在于足智多谋。在政权体制上，他反对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因为制衡妨碍专权；但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层面上，他要搞权力制衡，借分而治之之权术，达到唯我独尊的目的。“五马进京”是毛泽东**全面控制中央权力中枢的谋略之一**，即上调地方“诸侯”来“掺砂子”（1），借以监控经常参与决策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们的动向，节制、平衡他们的权力。他用“一马当先”的高岗，充当与政务院平起平坐的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削弱周恩来的权势，他用华东局的饶漱石，充当中组部部长，以压制、监控刘少奇的亲信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递夺刘少奇独断人事考核、任免的权力。

毛泽东的谋略，在历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1980 年 10 月，四千多老干部在评议毛泽东功过时，刘少奇遗孀王光美说：“高饶事件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恩来）。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由于刘不愿遵命，周得以保全，但刘也被毛记了一笔帐。又据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从 1952 年冬到 1953 年春，毛、高二人在接触时讲了很多私房话。高岗后来在检查中说：“我对刘少奇政治上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听别人讲的，是我捡的。”“别人”指谁？是毛。由于想清算刘的那笔帐，高岗进京前，“毛要他查东北的敌伪档案，看刘在东北被捕后的表现。”

高是否查了敌伪档案，无处可考，但紧跟毛泽东的高岗，已揣摩到毛反刘的意图，“五马进京”后，他决心紧紧跟上。“五马进京”的另一马饶漱石，看到高的权势日隆，便与高走在一起，紧跟毛泽东，向刘少奇发难。

饶漱石首先利用“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事件（2）向刘少奇发难。这个《名单》是安子文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搞的，因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为了紧跟，饶在中组部内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批斗安子文。饶的批安行动，被高层解读为“讨安伐刘”，或称“明批安子文、实反刘少奇”。几乎与此同时，高岗利用“新税制”事件（3）向刘少奇发难。这个“新税制”是刘少奇的亲信薄一波搞的，引起了物价波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批评，也受到了毛的训斥。为了紧跟，高岗在他主持的计划工作会议上批斗薄一波。高的批薄行动，被高层解读为“批薄射刘、周”，或称“明批薄一波、实反刘少奇、周恩来”。

高、饶的悲剧在于，初来乍到中央，未必了解中央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未必了解毛泽东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品行。在他们“批薄反刘”和“讨安伐刘”的高歌中，引发了红区党和白区党谁为领导之争，从而引发了党内白区干部与军队将领之间的矛盾。他们紧跟毛的行动，立即受到了刘、周、朱、陈、邓等人的联手反击，指责他们妄自尊大，挑起红、白区之争，企图分裂党。同时，高在陕北当土匪时抢女人、在东北称王时乱搞女人的腐败行径，也被揭露了出来。

毛泽东的天才还在于，他能审时度势，关键时出手，引领事态向有利于自己方面发展。当他发现用高、饶制衡刘、周计划失败后，遂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大骂高、饶是“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高、饶旋被打倒，从而使他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刘、周、朱等人的支持。

但打倒高岗并非毛心所愿。十年后的1964年6月16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高岗自杀时，说了句令人震惊的话：“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十年前，倒刘计划受挫，十年后，毛再度舞剑，指刺刘少奇的心窝，终致刘死于非命，其党羽薄一波、安子文等，也随之以“叛徒”罪名被打倒、系狱。

图注 18 附注：

附 1、“掺砂子”

毛泽东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详见第19章二、2。

附2、“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事件

1953年4、5月间，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毛泽东对这个名单很不满意。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批安说：“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并担任全部责任。事后得知，安的名单是按刘少奇的意图起草的。名单中有薄一波，没有林彪，即所谓“有薄无林”。

附3、“新税制”事件

1953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指责薄搞“分散主义”，也间接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

图19：简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



在1958年12月的大跃进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回到家乡湖南做调查研究。

那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高产“卫星”满天飞。湖南一些地

方，也出现了亩产稻谷6万多斤、红薯50多万斤的“高产典型”。他老家的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说：“今年粮食丰收，产量高的亩产有1,600多斤，平均亩产900斤的生产队有不少。”但是社员背后跟他讲真话：亩产稻谷600斤都不到。平江县委书记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说，部分高产田亩产才800来斤。为什么浮夸呢？平江县委书记向他反映：“虚报数字都是上边层层加码压出来的，不管你能不能办到。粮棉加翻，钢铁加翻，什么都要放‘卫星’，连吃饭都不要钱了。动不动就说你‘右倾’。”在乌石学校，他看到，八九岁、十几岁的小学生，也大搞集中居住，集体开餐，而大锅菜里清汤寡水，没有几点油星，学生仨儿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调查炼铁时，乌石公社干部告诉他，劳动力是公社统一调配，几乎所有男女劳力齐上阵，按军队建制把群众组织起来，搞大兵团作战。他问炼一吨铁要

花多少成本？干部们回答：“为了‘保钢铁元帅升帐’，我们是不惜代价的，没有算过账。”由于炼钢铁没有煤，全靠木炭，山上的树基本上都砍光了，农民面临生存危急。调查中，他同群众算了一笔帐：土法炼一吨铁，要比正规钢铁厂多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钱，而且炼出来的那些铁，根本不能用。

一位老红军战士，勇敢地递给他一张字条，上写着：“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1959年5、6月份，饿死人现象已在全国各地显露出来；但中共仍按虚假产量数征购粮食和安排人民生活，还大量增加粮食出口。1958年出口266万吨，已经超过了以“瓜菜代”为食的农民承受能力，1959年却调增到415万吨，激增56%。本来对毛泽东的霸道很不满意的彭德怀，已经按捺不住，要“我为人民鼓与呼”了。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在8月2日，又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私人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大跃进的不满。信中指责：“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毛泽东接信后，勃然大怒。他认为，他与彭共事的三十多年间，彭处处找茬：三十年代，彭差一点搞掉他的指挥权；华北会议上，他批评发动百团大战是“帮助了蒋介石”，彭不接受，先后斗了40天，彭发牢骚说，这是“操娘40天”；五十年代，他喜找军队文工团里的女孩子“跳舞”，有时还会拉她们到卧榻“促谈”，彭大发牢骚，甚至谩骂称其为“选妃子”，还为此撤消了一些文工团建制；现在又拿大跃进向他发难，挑战他的权威。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决定组织反击，把彭写给他个人的信向全会公布。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彭真等核心要员的支持下，毛泽东以信向彭德怀兴师问罪。

在会议上，毛先批彭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几天后，他见时机成熟，便怒斥彭“跟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向已经缚手待毙的彭发出威胁说：“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天，不然我们还欠20天的账，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见彭已无还手之力，便指彭说：“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在毛的无上权威下，一百多个中央委员和后补委员中，除朱德说了句“彭总有一股拗

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的开脱话外，其他委员不是落井下石，便是袖手旁观；尽管在事后，他们中也有许多人为彭鸣不平。

8月7日，在毛泽东的无上权威下，八届八中全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由于总参谋长黄克诚、原总书记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的前秘书）赞同彭的意见，在往来交换意见时，又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发现”，向毛告密，于是，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号召全党进一步开展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一封质疑“三面红旗”的私人书信，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由此可见，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多么可怕！也由此可以推见，胡风上呈的30万言建议书，判他25年徒刑，应算轻判；笔者在日记中记录了“三面红旗”的一些恶端，没有被枪决，应算党的“恩典”！

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和黄克诚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和罗瑞卿兼总参谋长。彭德怀这位中共大员中唯一比较廉洁、正直、敢言的骨鲠之士，就这样被赶出了中央。庐山会议后，借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中国各地抓出了大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小彭德怀”数十万个，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高潮**”，使刚开始不到半年的饥饿，迅速扩大，很快演变成饿殍遍野的惨局！

当毛泽东还在大讲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民主，提倡他的“不打棒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高唱他设计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时候，在批斗中，彭德怀被打断了两根肋骨，重病卧床，郁郁成癌，死于囚中。在监中疼痛难忍的彭德怀，曾哀求看管的战士说：“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临死前他曾大呼：“**这顶帽子**（指‘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摘，我是死不瞑目的！**”

图注 20：简评“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118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1961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通过协商，决

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3.4%。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粮食脱销的危险。城市粮食脱销的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心急如焚。

1961年，国家用了3.5亿美元（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偌大一个农业国，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用邓小平的话说，“永远也翻不了身”。

1961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问题。“各中央局书记面面相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问题严重在什么地方？他们心照不宣地指向县委书记一级：1958年批他们右倾保守，是“睁眼瞎子”，看不见农民的积极性，迫使他们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弄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到了1959年，又把1958年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全算到他们头上；庐山会议后，他们中许多人又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到1960年大量饿死人时，他们中许多人又变成了替罪羊，变成了阶级敌人，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枪毙，有的见大势不好跳了井；剩下的都是忍气吞声者，反正毛主席和党中央永远正确，谁也不敢说这都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惹的祸；因此，为了保全自己，县委书记们，不得不把“屁股坐到农民方面”上来，一听征购粮食，就“抵触”，便“反感”。——凡此种种，各中央局的“封疆大吏”们，虽心知肚明，却不好说。

熟读经史的毛泽东，精通“宽猛相济”权术。他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决定用软的“民主”力克硬的“抵触”。他决定召开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中央工作会议，用民主总结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下面各级干部“出气”，使各项工作（主要是征购）打开一个新局面。在这个会上，

他大讲民主的重要性，对过去几年的工作，也做了些自我批评。他说：“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也做了些自我批评。上行下效，一时间，各级干部都做起自我批评来。自我批评虽然空洞无物，形式主义，但比胡批乱斗心情舒畅得多。

然而，大会也有不谐音符。林彪说：“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情不自禁呼唤：“讲得好！”并带头为林鼓掌。对此，许多人感到惊讶。

来自刘、邓、彭的声音，与林彪截然不同。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苏共总书记）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邓小平强调要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加强民主集中制，影射党内缺乏民主。彭真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也应该作检讨，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在刘、邓、彭的鼓动下，有些地方干部便大胆而委婉地对中央提出了些批评，还提出了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要求。尽管对中央的批评大都是工作方法上的小事，有意避开了造成灾祸根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还是非常不满。由于会议开得比较民主，绝大多数与会者心情比较舒畅，大都能想方设法去完成征购任务，从而使会议取得了成功。为此，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献给大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笔者：与会者每天吃两顿干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会上，毛泽东饶有风趣地附和那个顺口溜；但在私下里，他极其不满对亲信们说：“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

“完全放屁”，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发起的“七千人大会”。

会议刚过去半年，农民们也刚从灾难中喘过一口气，刚刚从“三自一包”中填饱肚子时，毛泽东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评了“七千人大会”掀起的“单干风”（指“三自一包”）、“翻案风”（指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和“黑暗风”（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观点），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自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提法，被“三年自然灾害”谎言取代，刚过半年的“人祸”论，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全国农民不得不在“低标准”、“瓜菜代”中继续煎熬。

“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民主”之后就是镇压：四年后，第一个遭殃的是主张“毛主席也应该作检讨”的彭真，接着遭殃的是敢讲“七分人祸”真话的刘少奇。

图注 21：简评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



毛泽东的一篇《反对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立起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是党和国家团结的大敌。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中，自由主义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而使权力拜物教即崇拜权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横行于中国。

中国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先生，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说教。他说：“你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他认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来的。”他申明：“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他信奉新闻自由。三十年代，他在《独立评论》上写道：“……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而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他崇尚信仰自由。他说：“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

他推戴古代的自由主义精神。他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全世界最早的自由主义。

自由和民主不可分。胡适在谈自由主义时，必然论及民主。他认为：“我们古代也曾有‘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他认为，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

虽然台湾国民党人，批评他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他仍建议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将“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他还建议蒋介石：“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

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革。他说：“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澈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在哲学上，他是个实验主义者，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笔者反对崇拜权力魔力的权力拜物教，并认为：**自由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基础**；集体主义往往被独裁者独霸，成了御用的镇压异己者的理论根据。因此，美国开国元勋、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大思想家富兰克林警告说：“**哪里有自由，哪里才是我的祖国。**”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欧洲人，他们对自由也情有独钟。一个叫裴多菲的诗人大声唱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中国呢？就哲学而论：“人之初，性本善”吗？非也；“人之初，性本恶”吗？非也；“人之初，无善恶”吗？亦非也！何以为是？笔者借卢梭名言答曰：“**人生而自由！**”令人哀叹的是，饱受“集体主义”熏染的中国人，在信息封闭、个性压抑的环境里，大多数人很难接受这种被称为“异端邪说”的自由主义。

五十年代，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大陆掀起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并出版了近两百万字、共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专集。在集子里，御用文人们破口大骂胡适是“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是“‘一吓、二诈、三丢手’的流氓本事”，比比皆是。

胡适（1891～1962），名胡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等。1962年，在台北突发心脏病去世。

第 01 章 未加冕的帝王毛泽东

01 章目录

★一. 帝王意志：专断奢靡 二. 帝王意志：寡人好色 三. 帝王意志：权力放纵
★ 四. 帝王意志：伦理共识 第 01 章附注

一、帝王意志：专断奢靡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图 01-1）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毛泽东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毛泽东也彻底推翻了他几年前曾宣布过的“无记名的选举”、“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承诺。10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数年后，人民民主专政改称为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按毛泽东的说法，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具体地说，就是对四大朋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民主，对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行专政。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民民主专政便自动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胜利前夕，毛泽东曾信誓旦旦地说，他“决不当皇帝”。他真不想当皇帝吗？尽管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但做皇帝的美梦，在中国大有人在，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1914 年，袁世凯在北京称帝，1932 年，爱辛觉罗·溥仪在沈阳即位……前者遭到全国强烈反对，蔡谔将军在云南首举反袁义旗，全国响应，很快就将刚刚登基四十多天的袁氏复辟闹剧送了终；后者虽当了十多年皇帝，但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战战兢兢，二战胜利的欢呼声，又把他送进了囚笼。天才的毛泽东发现，在中国，冠冕堂皇地当帝王已经不可能，但当不加冕的帝王呢？“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干，在缺乏民主自由理念、信奉马列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社会环境里，也并非不可能。

在陕北，毛泽东在与著名女作家丁玲调情时说：“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丁玲回答说：“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泽东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丁玲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接着又要丁来册封东宫、西宫。丁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笔者：当时的毛妻）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接班人林彪是最了解毛泽东，他把毛泽东比喻为“马克思加秦始皇”。1957年反右中，毛泽东自比秦始皇说：“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1958年8月，毛泽东说他的统治“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沙菲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这就是毛泽东由来已久的未加冕的帝王欲念。

马列主义加封建专制主义，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给毛泽东实现帝王梦创造了必要条件。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里所指：“无产阶级”是中共和他本人，“资产阶级”是反对中共和他本人的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各个领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专政”就是镇压。在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毛的未加冕的帝王欲念就变成了现实。在“万岁”的呼喊和“东方红”的高歌中，这种未加冕的帝王欲念，挑起了埋在他心底的“大救星”欲火和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

毛泽东未加冕的帝王欲念，使他急于把全国所有资源，都集中到共产党手里，变成中共的一党私产，从而使他有权支配国家的一切财富。1953年，刚刚从战争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本应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但帝王欲念使他迫不及待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面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笔杆子的欺骗和枪杆子的镇压下，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仅仅三年，他便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农业资源，从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手中，夺走了包括矿山、工厂、交通、商业、城镇在内的全部工商资源，并把它“改造”成为名义上的国有或集体所有，实现了对全国一切资源的垄断，从而使他变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雇主。

由于帝王欲念的胜利，毛泽东的“大救星”欲火燃烧起来。他是个蔑视牺牲、草菅人命的“大兵团作战”主义者，亦即人海战术主义者。他号召中国老百姓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他的人海战术做出牺牲。因为，依靠这个主义，他战胜了国民党，依靠这个主义，他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依靠这个主义，他又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到了1958年，他又依靠这个主

义，掀起了一个“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显然，依靠这个主义，他的“大救星”欲火得到了满足，成就他名扬中外“千古一帝”的美梦。

“大救星”欲火又激发了他的**权力情结**，使他又发明了一个“**便于领导**”理论。1958年8月9日，他在山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于是，“便于领导”理论使“大兵团作战”思想大放光彩：在农村，农业合作社集体经济迅即变成了人民公社，变成了“一大二公”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城市，工、商、文、卫等所有行政、企事业单位，统统变成了党和政府所有。自此，在“**便于领导**”理论指导下，六亿中国人都被捆绑在“大兵团作战”的大兵营中。在这个大兵营里，**雇主和各级权贵们**，在“舆论一律”的专政下，能高调地、理直气壮地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去挟迫人心，要老百姓为他们大规模的人海战术做出牺牲，从而为他们肆意侵犯人权和财权、造就中国特有的**官僚特权阶级**，排除了障碍，扫清了道路。

这种“便于领导”的高度国有化、集体化的“大兵团作战”理论，同“群众运动”一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实质是权力拜物教的**雇主权权力情结**的张扬。这个理论使毛泽东和他的官员们，掌握了劳动者个人所得的分配权和国家、集体财产最终处分权，而这种没有制约的分配权和处分权，就是实质上的所有权。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政治局，名符其实地成了中国最大的“母”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或曰雇主，各级地方党委和党政一把手，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各个地方“子”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或曰雇主代理。巨大的财富和绝对的权力，使毛泽东同他的各级雇主代理、权贵们，成了中国最富有、最有权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大兵团作战”中，他和他们的富有和权力，在供给制、“一平二调”和支援世界革命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挥舞。历史反复证明，古往今来大奸大恶们，都善假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之名，弄权欺世，强奸民意，从而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诱迫黎元黔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在没有制约的分配权和处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中国广大工农群众沦为雇佣，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和奴隶，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得仰首乞求于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的“恩赐”，不得不颂扬雇主为“亲爱的妈妈”，还要感谢**官僚特权阶级**为“党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如果说中共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土改是第一次掠夺，掠夺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和智慧，那么，中共以共同富裕名义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第二次掠夺，掠夺造就了一批**官僚特权阶级**，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政府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则是中共以国家建设名义进行的第三次掠夺，掠夺使**官僚特权阶级**变成了亿万富翁。

封建帝王曾傲慢地宣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他们的傲慢并不证明他们的意志已全部实现：他们不得不允许人民拥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由。然而，毛泽东的帝王欲念，在“便于领导”的雇主权力拜物教理论指导下，却剥夺了人民拥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权利，全部实现了封建帝王们无法实现的理想：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毛臣。通俗地说，就是“毛党天下。”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他用枪杆子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之后，又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帝王欲念的宣言，是帝王权力情结的张狂。对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不忘拍马谄媚，他们无耻地“论证”说：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人民的选择！

历史是人类活动留下的足迹，怎能选择？一百六七十年前，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他们在战后用选票选择了自由和民主。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一场整整进行了八年的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后，领导这场抗击英军的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图 01-2），便辞去军职，告别了部队，谢绝了要他当国王的动议，将权力交还给了大陆议会。1783 年 4 月 19 日，在告别仪式上，华盛顿发表一篇简短的讲话：“使我辞职的伟大事业终于发生了，我现在有幸向大陆会议致以真诚的祝贺，并要求他们收回对我的信任，允许我不再为国家服务……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亲切告别之际，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结束公职生活中的一切工作。”面对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他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地径直离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上了平民的生活。他的离去，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了人类的无限权力欲和占有欲，为结束“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主义嫡传制和废除官员终身制树立了榜样。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诞生后，由于崇高威望和道德力量，平民生活六年之后的他，即 1789 年 4 月 30 日，被人民用选票推上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宝座。1797 年 3 月 3 日，当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后，他又回到他向往已久的家园弗吉尼亚山庄，再次过上了平民生活。他的隐退，又为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立下了先例，挫败了既得利益集团永占利益和专权分子独霸江山的谋图，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美国人民高呼的不是“华盛顿万岁！”而是“自由万岁！”“民主万岁！”“平等万岁！”至今美国人民还享受着自由宪法给他们带来的硕果。显然，这不是历史的选择，而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用选票做出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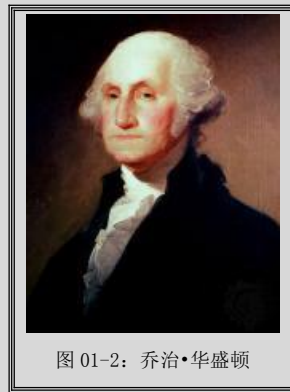


图 01-2：乔治·华盛顿

在中国，“人民的选择”的毛党天下，是怎样让人民做出选择的呢？

为了效忠苏俄首领斯大林，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局做主，先后派兵 130 多万，在“至理”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组成“志愿军”进入朝鲜，用 90~100 多万中华儿女的鲜血（其中 40~70 万遗骨他乡）和五十多亿美元，替苏俄打先锋，保卫和打造了北韩金家王朝。为了与苏俄新首领赫鲁晓夫争当世界导师和领袖，毛泽东的中共，还在“至理”的“**支援世界革命**”的光环下，无偿支援越南反美 200 多亿美元；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口号下，无偿支援人口仅 200 余万的反苏小国阿尔巴尼亚 90 多个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支援朝鲜 200 多个亿；在“反对越南修正主义”口号下，支援反越小国杀人魔王波尔布特的红色柬埔寨 20 多个亿；非洲有个小国，因喊毛主席万岁，便无偿“奖给”700 万美元；一个拉丁美洲无赖，领走 50 万美元经费后，便同“革命”一起遁名匿迹，等等。在国民经济建设上，毛泽东的中共决定大炼钢铁。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中，“9,000 万人上山炼钢”，直接损失浪费高达 200 亿元以上。据知情人 1986 年披露，国家补贴费达 40 多个亿，财政拨款弥补小钢铁企业亏损达 110 亿元。对此，毛泽东在 1959 年 7 月 10 日的庐山会议上，毫无悔罪地“至情”地撒谎道：“**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刘少奇在插话中，以谎传谎而“至诚”地说：“**大办钢铁花了 20 多亿，全民学了，值得。**”农业上，他们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搞“一平二调”的供给制、食堂制，大放高产“卫星”（其中广西环江县亩产 13 万多斤的中稻，最为“光彩夺目”），把五亿农民拖进了贫困、饥饿深渊，最终导致 1960 年前后三年间饿死了 3,000~4,500 万人。五十年代，每逢国庆，全国都要组织数百万人去游行示威或接受检阅，外宾来访，动辄组织数十万人去夹道欢迎，从不计停工停产的损失。一言蔽之：在**雇主**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局的眼里，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是他们任意支配和挥霍的对象，广大中国人民，都是他们任意驱使和蹂躏的奴隶，哪里有点滴“人民的选择”？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这是毛泽东的个人选择，这与美国人民的选择、华盛顿的个人选择，有天壤之别。（由于怕慌言败露，中共档案**死不解密**，有时因政治需要作有限地、有选择地部分解密，或因政治需要任意再加密，因而流传事件的**数据**版本颇多；准确数据有待有良心的史学家们作公正调查、考证。）

穷奢极欲是帝王的共性，毛泽东也不例外。

在中共对新闻媒体和创作出版的全面监控和专政下，毛泽东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艰苦朴素的领袖，道貌岸然的君子。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又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

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几篇说教文章，使他变成了高尚道德的化身。然而，当掀开神秘的宫帷幕墙，人们却发现了一个人格阴暗卑劣的毛泽东。

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包括诗）中，一部分是由他授意，秘书起草，然后冠上他的名字发表的；一部分文章虽然是他亲自起草，但经过中共集体讨论和修改，而后以官方名义发表的；配给他的秘书都是著名的理论家、作家和才子，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周小舟、李锐等，因此，他的文章很多是官方的行政行为。这里须要特别指出的是：建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中共为出版四卷《毛泽东选集》，组织了十数名专家、学者和数十名党的工作者，连续数年，对过去以毛的名义发表的声明、命令、决定、谈话和文章，进行筛选、订正、修改、整理和勘误；同时，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请求，苏俄党魁斯大林还指派理论家、科学院院士尤金为驻华大使，以马列主义高度来监视和审定四卷。因此，四卷的出版是名符其实的国家行政行为。然而，四卷稿费，毛泽东全部攫为己有。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透露，毛泽东稿费收入，文革前已达百万元之多，毛泽东死前，更高达 7,500 多万元。这对当年月平均生活费才 10 元的城市居民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是当年中国天下第一豪富。

为了效忠毛泽东，各地“诸侯”纷纷用公款为毛泽东兴建行宫，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据报导，这种行宫多达十多处。仅上海一地，为毛建的别墅就圈地一千多亩，园林和房屋修建，包括数十名年轻美貌的女服务员在内，一百多人长年为其服务。为毛泽东兴建的行宫中，特别耀眼的当属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图 01-3）。

1959 年 6 月 26 日毛泽东回乡时，对陪同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周小舟倒台后，继任人张化平心领神会，在中华大地饿殍遍野的 1960 年，拨款 1.4 个亿（另说一个亿），在毛泽东曾祖父母、祖父墓地，建成了驰名中外的园林式滴水洞行宫。1960 年下半年启动，建筑面积共 3638.62 平方米，到 1962 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滴水洞园林、通往韶山的公路，同时竣工。



图 01-3 滴水洞一号别墅近景

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房式样，吸取苏式建筑保暖防寒优点，设计出园林式滴水洞行宫中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一号为别墅式平房，供毛泽

东使用，双回廊，内设主房（卧室）、副房（江青卧室）、办公室、会议厅、餐厅、娱乐室等，朴素、大方而实用。二号为两层楼客房，共 24 间，是陪同的中央负责同志休息处。一、二号建筑中间有走廊相连。三号楼距一、二号建筑有百米远，是随行警卫（8341 部队）和省委接待同志住宿地方。出于战备考虑，1970 年，又建了一间整体浇筑的防震室和一个防空洞。

此外，不顾彭德怀等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用公款在中南海住所，修建了一个数百平方米的室内游泳池，供他个人专用。他还以视察工作的名义，配有数十人为他一人服务的专列，经常傲游中华大地。在物资极度匮乏时期，“特供”使毛泽东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例如，他爱吸上海“特供”的熊猫牌香烟和北京“特供”的大中华，从不缺货。六十年代，他开始热吸四川什邡烟厂手工卷制的大雪茄。于是，一个手工卷制大雪茄的特供生产小组为他而诞生了。不久，这个由五六个工人组成的生产小组，举家迁到了北京南长街 80 号，专门为“最高”手工精卷“132”大雪茄烟。然而，让人经常看到的却是，他身上穿的那件带补丁的旧睡衣，他那一副**廉洁奉公的形象！**

凡此种种，在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的眼里，这些挥霍和腐败，都可以戴上“人民的选择”的桂冠！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推翻了他的“无记名的选举”、“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承诺之后，戴着个人崇拜中制造出来的“大救星”光环，登上了未加冕帝王的宝座；而御用精英们所谓的“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都是向未加冕帝王献媚的赞歌，统统都是骗人的谎言！

二、帝王意志：寡人好色

最能体现毛泽东帝王意志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好色。**

未加冕帝王毛泽东，没法设“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进行淫乐，但共产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给他玩女人提供了可靠保障。据传，毛泽东玩过的女人不下百人，他特别喜欢玩弄年轻无知的女孩子。难怪，他的妻子杨开慧曾对人说过，毛泽东是“生活流氓”。

李志绥在他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

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五十年代，毛玩女人的事已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传开。为了确保毛泽东和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这些消息都被严密地封锁起来。从毛的秘书李锐所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我们看到了有些高干对毛帝王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不满。例如，在中共八中全会上，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揭批他的顶头上司彭德怀元帅时说：“他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员，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黄说的话中：“修房子”指给毛盖行宫；“调文工团员”指选女孩子供毛玩；“萧华”是总政主任、上将；“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大将。

给毛泽东“选妃子”玩的不光是萧华上将和罗瑞卿大将，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林彪夫人叶群等。其中，叶子龙是“出类拔萃”者。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写材料需人代笔，但在选女孩子供毛玩弄纵欲上，表现出别人少有的机警和敏锐，是“拉皮条”的高手，因而当年曾深得毛的信任。

在毛的内宫中，失宠前的叶子龙，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叶从各种渠道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和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介绍给毛做女友。许多女孩子以有与毛这种“特殊友谊”为荣。这些女孩子大多是贫农出身，或从小由政府养大，思想上非常崇拜毛，与毛的“特殊友谊”使她们感到莫大的荣光；宠幸后所得到的回报，也令她们欣慰。

当说到毛的女友时，不能不说说张玉凤、孟锦云、吴氏“姐妹花”和“秘密录音事件”。

张玉凤何许人也？官方记载，她是毛泽东最后一任机要“秘书”。在毛最后几年里，凡要求见毛的高级官员，甚至江青、李讷等至亲，都要经过她的首肯。据知情者披露，专横跋扈的江青，背后骂张“不过是一个陪睡的丫头”，当面却对她点头哈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向毛请示工作，因正值张“秘书”午觉未醒，竟在外边坐等了三个小时……有学者研究了张玉凤的权势后，竟得出了这样一条惊人的结论：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那么快垮台；有了张玉凤，中国避免了一次血腥内战。

张玉凤哪来的如此能量？她出生在东北牡丹江清贫之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1958年，年方十四岁的她，由于家中困难，无法供她上学，巧遇上铁路局招考列车员，便去试试看。她

那双姣美的大眼和白皙细嫩的皮肤，帮助她在面试中考中，成了一名客运列车上的列车员。1960年冬，铁道部要选调一批列车员到毛泽东专列上当服务员，十六岁的张玉凤被选中。这样，她被调进北京，并见到了“伟大领袖”。从小就崇拜毛泽东的她，能见到“伟大领袖”，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她的命运转机，发生在毛泽东的笔尖上。1962年的一天，“伟大领袖”在练笔时，竟在一张纸上写了许多“张玉凤”。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见后，心领神会，立即把年方十八岁的她，调到毛的车厢里，进行“零距离服务”。零距离接触使她感到，毛不仅是一个宽厚的长者、父亲，而且是一个能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情人。崇拜与感情，使她无法拒绝服务的极限。从此，她得宠于毛，成了毛最后14年中最亲近的随侍（有人曾诵《长恨歌》暗喻毛张关系，但毛不是玄宗李隆基，而张也不是贵妃杨玉环。）。与“伟大领袖”的“友谊”，使她权势日隆，文革后期，一个初中没读完的她，成了中国最有权势人之一。有一天，“伟大领袖”对她发脾气，叫她“滚！”她公然回敬对骂道：“我要不滚，你就是狗！”后来，“伟大领袖”对人评，说她是“一触即跳”。她与“伟大领袖”的“私交”，毛泽东的专职医生李志绥，在他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有详尽的记载。

孟锦云，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1968年被判13年徒刑（所幸没判处极刑），刑期到1981年。1973年冬天，刚坐了5年牢，25岁的她突然被释放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更让她迷惑不解的是，她是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却被安排到空军某医院当护士。1975年春天，她恍然大悟：一纸调令，就把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调入中南海心脏，成了“伟大领袖”一名“零距离护士”。原来，毛并没有忘记她。这“零距离护士”不过是当年“零距离服务”合乎逻辑的结果。在重重宫帷中，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她，甚至当人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给毛守灵人的名单上，赫然写着“孟锦云”名子时，人们还不知她是谁。

孟锦云是谁？她是个湖北姑娘，1948年出生，12岁就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了舞蹈演员。1963年4月，她还不到15岁，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苗条，皮肤白皙，特别是双眼明澈如水，成了到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领导们跳舞）最佳人选。在“出任务”中，当她见到了中央首长和“伟大领袖”时，备感无比光荣，当“伟大领袖”频频邀他伴舞时，又使她涌出了令队友们没法相比的自豪感。与“伟大领袖”交谈中，她心不由衷的发现，“伟大领袖”比父亲更加宽厚，更加善良；看见“伟大领袖”那伟岸的身驱、瞥见“伟大领袖”时不时投过来的那束多情的目光，她仿佛遇到了梦中的情人。“伟大领袖”的青睐和赏识，使她身不由衷地、轻快地同他携手步入舞池、书房；当“伟大领袖”拉她进入了卧室时，在她无

限崇拜的心目中，55岁的龄差已消失得无影无踪。1966年，也许是因文化大革命操心过度，“伟大领袖”竟把年方十八的她，遗忘到一边。这一遗忘，使她吃了不少苦头。她以为，“伟大领袖”早把她忘了。但时来运转，1973年，当“伟大领袖”从另一“零距离服务”的女友小丽口中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后，大发无产阶级震怒，对汪东兴说：“我就不信她是反革命！”“伟大领袖”的一句“不信”，就否定了空军将领们和军事法庭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反革命分子孟锦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动”。根据“最高指示”，汪东兴立即命令空军司令放人，于是，她“莫名其妙”地出狱了。见到“伟大领袖”，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你要给我平反。”不久，她的目的达到了。在“伟大领袖”最后的日子，她成了毛的贴身护士。

“姐妹花”是卢弘对吴姓二姐三妹的称谓。卢弘何人？他是前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1949年加入中共，曾任《解放军报》编辑，《炎黄春秋》主编。他在《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文中写道：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吴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余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是不太一般的关系。

卢曾不情愿地当过一任三妹的“候补情人”，那是因为二姐是军长夫人，军长是他的首长；但三妹没二姐长得漂亮，他又不爱她，也从未敢碰过这个“小姑奶奶”。卢在文中写道：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又一活生生的“霞姑”。

卢文还写道，三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是个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文中披露，三妹因“伟大领袖”的“需要”，被调出铁道兵，

安排到离中南海更近北京卫戍区任职，成了“伟大领袖”随叫随到身边不可或缺的人。到了文革，三妹从一个文工团演员跃升为“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她还经常随侍“伟大领袖”出巡，不仅自己享受“宠幸”的荣华富贵，还拉自己二姐共享，二姐也因此得幸。卢弘说：“当时，正随‘驾’伺候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指着三妹悄悄对李志绥医生说：‘她妈妈要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

1961年，由于毛的隐秘生活被秘书们疏忽大意而泄漏，发生了震惊高层的“秘密录音事件”。由于这个事件，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受到了相应处分。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中将等十四人。“拉皮条”高手叶子龙因而失宠，被逐出中南海，文革中又因此案被监护审查达七年之久。

“秘密录音事件”是个什么样的事件？从杨尚昆的日记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得出，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事后披露，最高权力层面也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认可了录音的做法。毛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但叶子龙为了“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在请示了中央有关领导后，便背着毛泽东，在毛的专列上安了窃听装置。这一安，便捅出了个大马蜂窝。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写道：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后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后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毛与幼儿教师在他车厢内厮混很久后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王是

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后，我、幼儿教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

刘对着幼儿教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么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么？”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教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教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后，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教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后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后，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这就是毛泽东同幼儿教师床上引发的“秘密录音事件”。如果在欧美国家，一定是个闹得满国风雨，甚至鸡飞狗跳墙；但在中国，老百姓有权知道的是“伟大、光荣、正确”，哪能允许你们知道这些不该你知道的“谣言”。

面对“谣言”，笔者曾察阅过一些批判李志绥的文章和回忆录。但在“主旋律”导向严格审查控制下因而诚信缺失的中国，这些批判文章和回忆录，究竟有多少是真实史料？究竟有多大“辟谣”价值？这里摘要介绍一篇《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文章，是九十年代，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采访戚本禹时的记录整理稿。戚本禹何许人也？他是文革初期趋附于毛泽东身边曾大红大紫过的秀才也。

采访中，戚本禹说：“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因此，戚得出结论说：“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惟其如此，戚对李的政治、思想也做了全面否定。他说，李志绥“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政治常识比较贫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文革，戚说：“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对李的人格，戚说：“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太。”

笔者无意评论李志绥和他写的书。看过上面这些文字后，笔者深深感到，由于怂恿红卫兵揪斗并打断彭德怀两根肋骨有功、成为毛和“四人帮”打手而坐狱十八年的戚本禹，还保持着四十年前那种“义正辞严”、“大义凛然”的品格。1967年4月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首次公开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从而轰动华夏，使他名扬天下。他在文章中这么说：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笔者：指刘少奇），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却大唱对台戏……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

无限崇拜毛泽东的戚本禹，在文章中所使用的这类“无产阶级”式高亢激烈、暴戾乖张的言辞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他四十年前的**文格**与九十年代的**说格**，有多少差别？一部揭露清宫权斗内幕的影片，竟被他斥为“卖国”，进而又把影片的称赞者断为“推翻江山”、“破坏专政”的罪犯。由此可见，他对“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是多么深刻！！须要声明的是，笔者引用上述文章，不是想证明戚拿了谁家的“三十块银币”，也懒得说他曾经为虎作伥。

毛泽东荒淫无度，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上床纵淫欲，立地呈君子。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说：“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为了维护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中共把这种毫无廉耻的糜烂生活，列为党和国家高度机密，任何人胆敢泄露，都将受到严惩。例如，“拉皮条”高手叶子龙，因“秘密录音事件”失宠而离开中南海后，怨言颇多，曾多次宣扬毛的桃色新闻，终于祸从口出。刘少奇闻听大怒，立即下令：“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抓起来枪毙！”要不是叶子龙曾有恩于周恩来、彭真等大人物，早没命了。在周、彭等人的斡旋下，叶算保全了性命。

还有一位空军女舞蹈演员，某部副参谋长的女儿，在毛死后，因生活

不太如意，声言要写一部“中南海宫廷秘事”，将交给台湾出版。为防“党和国家高度机密”被她泄露出去，立即被安全部门“圈”了起来。“圈”在那里？直到今天，她父母也不知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好听天由命。在同一世纪的两个不同国度里、又同与本国“最高”有染的两个不同女人，中国的她就没有莱温斯基小姐幸运。莱小姐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被曝光后，立刻成了全世界耀眼的明星，一连串的聘约使她应接不暇，而总统克林顿则被检查官、媒体、国会搞得焦头烂额，无以对应，差一点被弹劾下台。**中美差别：天上地下！**

值得一提的是，与党组织的“无情”处置相比，毛玩女人时颇有人情味。张、孟和“姐妹花”得到的丰厚“回报”，可以佐证。1961年夏天，毛发思旧情怀，叫他从未办过离婚手续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前来庐山会面。当见到年过半百、步履蹒跚、满头白发、面色苍黄、精神失常刚有好转的贺子珍，他情意深深地迎上去，握住贺的双手，拉她到旁边的扶手椅上坐定。他想拥一下曾为他生过六个儿女夭折到跟前只剩一个女儿李敏的妻子，抚平一下她心中的创痛，但遭到了拒绝。在贺子珍的眼里，权力使她不得不到这里来，来会见她不愿再见的那个使她伤心痛苦了大半生的冷酷之心的丈夫。贺临别时，毛情意切切地说：“我们见面，你的话不多。你回去後，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我们还要见面。”第三天下山后，贺子珍精神再次失常，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连女儿也认不出来。据记者报导：“在南昌，她不时蓬头垢面，神情凄惶地冲到省委的大门口，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是谁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的再次会面。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她浑然不觉地立在雨中，对著省委的大门。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她病成那样，忍不住心酸落泪。”

1962年在上海，毛又发思旧温情，他把五十多年前在韶山老家时，曾同他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女人找来见他。见到当年如花似玉的湘妹子变成满头白发的老妪时，他情至意尽感慨不已地说：“怎麼变化这么大！”遂给她2,000元，叮嘱她回家好好颐养天年。表情木然的老妪，不知谢恩，踉踉而去。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据说，由于玩女人的领导干部较多，为了约束他们，中共内部便出了一个不成文的伦理约定：五级（相当部级、省级、将军）以上保密，六到十三级酌处，十四级（正县、团级）以下严惩。在档案死不解密的今天，这种“据说”的真实性，谁能说得清？

被整肃后自杀身亡的“东北王”高岗，就是个玩女人的能手，据说一生玩了一、两百人，其中不乏被强奸者。毛泽东十分羡慕高岗，他对他的专职医生李志绥说：“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以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刘志丹名字命名的小说《刘志丹》被批判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揭露说，刘志丹带部队到处“抢东西，抢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

2006年8月8日，中共严控的新华网发表了一篇《罗瑞卿女儿回忆：中南海的权力游戏》文章，作者引用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的回忆写道：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注：陈xx上将）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作者继续写道：

点点不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49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作者引用罗点点的话说：“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像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笔者：江腾蛟同叶子龙一路货色）

笔者认为，在毛泽东的“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指导下，中共高干

中有几多干净者？

据说：副总理李先念曾在南京**强奸过一名宾馆服务员**，被陈云压下不报；“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花帅”叶剑英，晚年要**年轻美貌的护士“陪侍”**、按摩、擦澡，被斥为“造谣”；朱德、贺龙等人青壮时，朱是**玩妞的能手**，贺每到一处都要有几个姘头，**没有姘头就无法生活**；刘少奇见到王光美后，以精神病为由，甩掉了年轻妻子王健，创造条件与王完婚，被誉为“美满婚姻”，……但他们都被党史、回忆录塑造成高风亮节的正人君子。（在假话横行的时代，这些“据说”的真实性有多高？盼望后来人作客观调查，还李、叶、朱、贺、刘等人一个清白。）

在中国，“据说”或曰“小道消息”，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由于档案尘封，新闻被控，检查受制，回忆录回避、掩饰真相，揭露者又多以“造谣”罪繫狱，“据说”便有了广阔市场，在人群中不胫而走，尽管真真假假叫你难以搞清。但五十多年的历史不断证明，许多“小道消息”“据说”，当时被斥为“谣言”的，若干月、若干年之后，许多都能返本还元，变成真实。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揭露毛玩女人，描述这类道德丑陋伟人的文字，均被贬为“低级”和“下流”。如上文中毛的打手戚本禹就责骂李志绥，说他揭露毛玩女人的书是“黄色的、下流的东西”。由于戚是崇毛主义者，人们对他的责骂并不意外。意外的是，有些批毛(不一定反毛)者也对揭露毛玩女人的“隐私”不满。如研究毛史的学者**武xx**，呼应戚本禹著文说：

“李揭毛泽东生活上的黑，把一个生前的大圣人描绘成为一个见女人就闹的性病患者，给圣人的脸上摸上了一层狗屎。当然这样的文章就不会不在西方社会吃香，不但书的销路可观，李志绥这个名字也因和毛泽东连在一起而扬名四海了。”**武xx指斥揭露者是些“小人物”说**：“……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风气中，那些严肃的研究毛泽东的作品无人问津，而那些投合时代之癖好的人，以揭毛的隐私为快乐的书却一直‘热销’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说实在的，在人性的深处，小人物们把那些在生前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的死后的影子当成了屠场上的活猪一样地来‘宰杀’之，也有着—个心理学上的意义哩。”为此，**武xx引用哲学家黑格尔的话说**：“仆人眼中无英雄……歌德也重复说过……历史人物倘遇由这样一个懂得心理学的仆役伺候着，以后在历史文学上记载着，自然就会显得平凡不足道了；他们被这位仆役拉下来，拉到和这精通心性的伺从婢仆的同一道德水准上，甚或在那种水准下几度。”

笔者不想追根黑格尔说这段话的历史背景，笔者只想请教**武学者**：当权力只准人们知道御用学者们颂扬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所谓“正

史”和他“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情操”的一面时，为什么在档案尘封、新闻被控、检查受制、揭露者繫狱、回忆录回避、掩饰真相的条件下，不让人们去了解毛泽东“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噬权如命、表里不一、不择手段和道德低下的人格呢？为什么不让人们知道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毛泽东？例如，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的女友多患有“阴道滴虫病”，而毛也是“滴虫病携带者”。对此，武学者大骂李是“宰杀”“圣人”的“小人物”。其实，武学者不必大动肝火，只要把毛生前的医疗档案拿出晒一晒，便一目了然了。但那是国家机密，谅武也拿不出来；于是，破口大骂便“理直气壮”了。由此可见，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酱缸”里，连学者也难逃被腌渍的命运。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1)被迫下台、克林顿总统因“拉链门事件”(2)被整肃等事件证明，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洞悉历史真实，在“横看成岭侧成峰”中，才能显现历史人物完整的“真面目”。

当然，在中共高干中也有例外者，譬若彭德怀元帅。然而……

三. 帝王意志：权力放纵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是文革前毛泽东帝王权力的一次大发威。

1958年，中国大地上涌现一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浪。这是信奉权力拜物教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实践。

反右派斗争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不懂经济的毛泽东，帝王和“大救星”的权力情结极度膨胀起来：他幻想通过以钢铁为龙头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大跃进，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和美国；通过组织城乡人民公社，来实现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和生产过程全面权力化，使他能以拥有巨大财富的**雇主**身份，毫无顾忌地调动全中国一切人力和物力资源，使中国“跑步”进入他想像中的**共产主义天堂**。毛泽东想以此证明，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由于他所领导下的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中心，因而他还是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的这一“共产主义天堂”图画，实际上是蒙昧民族的冥冥神话，而“世界共产主义中心”和“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说，则是中华大帝**权力情结**的恶性膨胀。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反右后全民一片噤声中，这种乌托邦式的乖戾狂想，却能大行其事。

在毛泽东以及被其驯服了的党中央领导们的高压下，中央各级干部，大都成了强迫命令的乖张疯子：“钢铁元帅”升帐，全国发动9,000万人大炼钢铁；74万个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几乎在一夜之间合并成2.6万多个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数以万计的农民砸锅毁灶，在公共食堂“敞开肚

皮吃饭”；高压下的党员干部们，丧失了理智，大放“卫星”，制造一个又一个粮食高产神话，其中，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放出的一颗中稻亩产130,434斤的“重磅卫星”，成了《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的头版头条新闻；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遍及城镇和乡村；供粮计划被破坏，整个经济生活失去了平衡。与毛泽东的狂想相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急剧下降，形成大范围饥荒，开始大量饿死人……当时被赞颂为“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的人民公社，面临全面崩溃，“共产主义天堂社会”发生了最严重的危机。

一向比较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图 01-4），本来与毛泽东有许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建国后，又反对喊“万岁”，反对唱《东方红》，厌恶毛泽东玩女人，看不惯毛泽东的生活作风和民主作风，已经与毛积怨很深，这次更看不惯毛泽东异想天开又不许别人置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1958年12月大跃进期间，他曾回到家乡湖南做过调查研究。那时，在《人民日报》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鼓动下，“卫星”满天飞，湖南一些地方出现了亩产稻谷6万多斤、红薯50多万斤的“高产典型”。他家乡的乌石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说：“今年粮食丰收，产量高的亩产有1,600多斤，平均亩产900斤的生产队有不少。”但是社员背后跟他讲真话：亩产稻谷600斤都不到。他看到为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煮饭的锅都砸了。在乌石学校，他看到八九岁、十几岁的小学生也**大搞集中居住，集体开餐**，而大锅菜里清汤寡水，没有几点油星，学生仨儿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在“幸福院”里，老人们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在平江调查时，县委书记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部分高产田亩产才800来斤。为什么浮夸呢？平江县委书记向他反映：“**虚报数字都是上边层层加码压出来的，不管你能不能办到。粮棉加番，钢铁加番，什么都要放‘卫星’，连吃饭都不要钱了。动不动就说你‘右倾’。**”调查炼铁时，乌石公社干部告诉他，劳动力是公社统一调配，几乎所有男女劳力齐上阵，按军队建制把群众组织起来，搞大兵团作战。他问炼一吨铁要花多少成本？干部们回答：“为了‘**保钢铁元帅升帐**’，我们是不惜代价的，没有算过账。”由于炼钢铁没得煤，全靠木炭，山上的树基本上都砍光了，农民面临生存危急。调查中，他同群众算了一笔帐：土法炼一吨铁要比正规钢铁厂多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而且炼出来的那些铁根本不能用。1959年7月，他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在大放“卫星”河南境内，看到**窗外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的逃难者**，食之无味。服务员项文芳问他何以不吃饭？彭德怀指着站台上的逃荒的人群说：“你看看他们！能吃得下去吗？”他想起了湖南那位老红军递给他的那首诗歌：“**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多么沉痛的呼号！他愤然提笔将“请”



图 01-4：彭德怀元帅

字改成“我”，他要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向毛泽东犯颜直谏。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各大区负责人和各业务主管们，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等政策的后果，议论纷纷，持批评意见的人很多。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认为，向毛泽东直谏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他并非没有顾忌：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就是维护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给毛泽东提意见，有反对毛主席的嫌疑。但强烈的“我为人民鼓咙呼”的欲望，这种道德理性使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多数中央委员都有能如实陈词，毛会接受批评，改弦更张，大跃进灾难性的后果将可以避免。但这位英勇善战的元帅，想得太天真了。

首先，他在西北组的小组会上，多次发言，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他还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全民炼铁，国家与地方补贴共50多亿，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大，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这么高呀。”当时毛泽东插话说：“不会有庐山这样高。”彭德怀说：“那就矮一点吧。”他意犹未尽，于是，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数千言的意见信，被毛泽东批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史界称之为《万言书》。

《意见信》在首先称赞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和“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之后，他批评道：（摘要）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

“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

“（农村公社化）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

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他写道：（摘要）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等关系混淆起来。”

“在这些同志看来，（隐指毛泽东）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

一切，……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这封《意见信》，无论从现在或当时的角度来看，都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当时的部分实情，批评的语气相当舒缓，有些地方还着意淡化而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回避已经出现的大范围饥荒和开始饿死人的现实。这种淡化了的对国家最高领袖的批评，不要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司空见惯，非常正常，就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帝王，面对这种客观批评，也不得不下个《罪己诏》，以谢天下。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这种轻描淡写式的批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

对彭德怀素有成见的毛泽东，见信后非常懊恼：关键时候，彭又跳出来反对他了。尽管他已看出，彭信中说得都是实情，而从他亲自派员到下面做调查研究所得到的实际情况，并不比彭信批评的实情好，甚至严重得多。他很清楚，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推行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有强大的阻力，如果不排除这些阻力，他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就会被质疑，帝王地位就会动摇，后果是可怕的。此刻的毛泽东，想到的已不是理想“天堂”的危机，而是个人权力和“伟光正”形象的危机。因此，“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抛开了他常对全国老百姓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谆谆教导”，直面彭德怀的“挑战”。

毛泽东在 1959 年 4 月的上海会议上，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信》，就是对他帝王权力的挑战，他必须应战，而且必须战而胜之。毛泽东有信心、有把握战胜彭德怀，他的杀手锏就是“中共伦理共识”。

7 月 16 日，在常委扩大会上，毛拿出了他的杀手锏，放出流氓痞话，威胁常委们：“如果党搞分裂，那我就走。组织人民，另外立党。如果军队另搞一套，我就另组红军。”又急电北戴河疗养的夫人江青，乘飞机上山，帮他斡旋串连。毛终于得到了参加会议的中共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朱德和书记彭真等要员的支持，并在中共伦理共识的基础上达到统一：保卫总路线，反对分裂。到此，彭德怀的一纸批评政策的信件，变成了分裂党的破坏活动。

四．中共伦理共识，是帝王意志实现的保证

长期以来，在刘少奇的倡议下，在毛泽东的长期培植下，在陈伯达、胡乔木等高级权贵和御用精英才子们的长期鼓噪下，简而言之，在党的伦理哲学上，已经形成一个顽强共识：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全党无条件服从中央，中央无条件服从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就是维护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党、分裂党；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揭发、批判一切反对毛泽东的人和事；不允许对党有半点怀疑，等等。这种强调无条件服从的中共伦理共识，是封建“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翻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形成的封建独裁的赤文化。这种赤文化的特点是：为了目的，可以使不择手段的行为“高尚”化、“道德”化；而这种“高尚”化、“道德”化了的手段，可以随意颠覆仁义理智信的传统道德，任意践踏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

为了迫使彭德怀就范，毛指派同其关系不错的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去说服彭德怀低头认错。聂、叶见彭后，晓之以党要团结的大“理”：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即使有些批评完全合乎事实，也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上想；动之以数十年友谊至“情”：要用任劳任怨委曲求全的精神，从全局利益出发来检讨自己。聂、叶不辱使命，在他俩的“帮助”下，彭终于承认他写的信是“反党”，并做了检讨。这里，中共常说的实事求是的道德观，已被中共伦理共识所颠覆。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彭德怀，终于上了毛泽东的圈套；聂、叶虽没有落井下石，却为虎作伥，当了一次助纣为虐的不光彩信使。

见到彭德怀的检讨后，毛泽东便多次严辞批判起彭来：

“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

“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

“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现在庐山会议，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

“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

毛泽东在一封《给张闻天的信》中，正式提出“军事俱乐部”这个名称。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会上，在毛的指挥下，“大臣”和各地“诸侯”们，使用党内惯用的毛式批斗法(3)纷纷落井下石，信口雌黄地对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展开全面围剿。下面根据《庐山会议实录》，摘录他们的部分批判彭德怀时的发言（多次会上发言，时间不分先后），供读者赏鉴：

刘少奇（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二，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文革中遭批斗，囚中断药，不治而亡）：

“（你）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到“人民的大救星”，马克思主义这种自相矛盾的发展，就是中国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刘的“积极搞个人崇拜”，是为埋葬自己在“积极”挖掘坟墓！这就是代价。

“你拉李井泉（笔者：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四川没放卫星好。”——一句“说四川没放卫星好”，便成了结党营私的罪证，可见刘少奇的逻辑已荒唐得即可笑又可悲！

“对我们的搞法，（你）总是不满意。”

“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朋友不成就打倒，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同意主席讲的（你）有野心，（你）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根本问题在此。”——一封《意见信》就被斥为“有野心”，这对于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中共来说，不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这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的逻辑，是中共伦理共识的逻辑，当然根子是无产阶级专政。

周恩来（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三，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文革中是毛泽东的助手和总管，遭几次批判，险些被打倒，最后被内定的医疗制度拖死）：

“（你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没有自我；周的后半生，是一个在毛泽东面前战兢兢的驯服工具。

“华北（你）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在中共党内，独立人格是大敌！

“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你）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朱 德（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四，副主席，元帅，文革中遭到冲击和批判）：

“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

“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

“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这是少有的不同声音。在尊贵的高级官员们看来，朱有点“不识时务”！

“开始只当做一般文件看待，并未引起重视，听到主席讲话后，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信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开初只觉得有些提法、词句不当，但精神是好的，没有意识到这是根本方向问题。”——朱德的发言，被毛泽东当面斥为“隔靴搔痒”。

林 彪（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六，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元帅，文革中仓皇促逃，同老婆儿子摔死在蒙古国）：

“动机是（你）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

“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冯是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军阀。

“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马屁拍得理直气壮，无耻之尤！

“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自负太大，刚愎自用。”——但在背地里却说毛批彭是“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

彭 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市长，文革中遭批斗，扭断右臂）：

“你在西北小组讲：（错误）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在他看来，毛泽东不会犯错误。当他被红卫兵扭断右臂时，是否还坚持他的看法？

“（你）说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

“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党性就是绝对服从中央和毛泽东，这种奴性就是中共伦理共识。

“（你）反对个人崇拜。”

“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在总路线制造的饥荒中，开始饿死人的消息已传入了中南海；但为了紧跟，他竟瞪着眼说瞎话。

贺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元帅，文革中遭批斗，囚室里药死）：

“（你）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

“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信》就是“反党纲领”，贺老总也落井下石；最终也要为落井下石付出代价。

罗瑞卿（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大将，文革前遭批斗，跳楼自杀断腿致残）：

“（彭德怀）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不要说他的生活、为人很多都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又有什么用处？”

“遵义会议以后，一有机会，你还是反（毛主席），直到现在你还要反，这是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这是中共论理共识。可悲的共识！

陶铸（中央委员、中南局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初曾为中共中央常委，不久被打倒，囚死于合肥）：

“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牢骚话不少，情绪不正常。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同志咬牙切齿。《意见书》不过是公开发放的箭，在背后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知道放了多少更毒的冷箭。”——这是感觉推理。七年后，凭着这种推理，把他自己推到合肥囚毙。

“彭德怀同志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的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当他在合肥囚毙前，还这么认为吗？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

黄永胜（中央委员、广州军区司令，上将，文革时任总参谋长，林彪集团要员，十五年徒刑中监毙）：

“（彭德怀）军阀主义、目中无人、个人主义。从历史上看，我对他能够彻底改正错误是没有信心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

当年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五、第七的**陈云和邓小平**，他俩对批彭的态度？因无资料，无法书录于此。

在彭德怀孤立无援的时候，陶铸 8 月 5 日写信给黄克诚大将，“大义凛然”又十分“精彩”地劝说他“落井下石”。信中写道：“**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毅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最终被毛囚斃于合肥的陶铸，他所说的“君子爱人以德”、“操守”和“贞节”，就是不顾“君王”独裁权力造成饿殍遍野的苦难，也要维护这个“君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陶的信和他结局，不发人深省吗？

从以上摘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尊贵的大员们是怎样批判彭德怀的。在这种充满无产阶级“凛然正气”的批判中，他们说的是真话？良心话？还是假话？昧心话？那些是与人为善话？落井下石话？在一贯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伟大领袖”面前，他们中那些是秉公者？正义者？那些是盲从拥戴者、争宠谄媚者和谎言制造者？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有句名言是：“**搞政治一定会把手弄脏。通过原始而残酷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体系，不可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他们的道德水平究竟有多高？是否已经把手弄脏？请读者自己判断。

此时的彭德怀元帅，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他多次做过这样无用的招架：

“我是直接写信对你（笔者：指毛泽东）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在没有民主的党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有罪推定，是“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逻辑！

“现在还难接受。”——在毛的中国，你只有接受批斗的自由！

“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像法庭审判。”——在中国，毛一言九鼎，谁敢替你辩护？这种“审判”司空见惯，历来如此，彭焉能例外？

“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站出来报名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有绝望的自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在8月2~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进一步开展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最后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两个决议（图 01-5）。

如果说在决议前，“保卫党的总路线”是为了保卫“崇高”的乌托邦理想，而在决议后，这种“保卫”已经变成捍卫独裁权力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自投罗网。他上庐山时，毛清除彭德怀的决心已定，且已明朗化。出人意料的是，这位黄大将军在读过彭德怀的“意见书”之后，当着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巨头的面，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同意这封信里的意见。”接着便与刘、周二人辩论。辩论话题无意间涉及到四平战役时的一件事，毛泽东插话说：“那是我决定的。”黄竟敢顶撞说：“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在中共伦理共识下，黄成了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对此，有人投书赞曰：“**壮哉！黄大将军！全党全军仅此一人！**”笔者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黄大将这种言行属实话实说的常行，但在中国特色的环境里，的确值得赞美。然而不久，还是在那座山上，还是这位黄大将，竟跟着别人落井下石揭发起他的上司“骂毛泽东同志”来。是划清界线抑或效忠、谄媚？在没有或缺乏自由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权贵们的人格已经扭曲得令人看不清、摸不透！

8月16日，毛泽东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种无限上纲式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免去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和黄克诚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和罗瑞卿兼总参谋长。

随着彭德怀倒台，不少军事将领跟着遭殃。

1959年8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激烈批斗彭德怀的会议上，总参谋装备部部长万毅将军公然号召说：“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全然不顾底下的老百姓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面对对彭的“揭发”，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突然在台



下大声喊道：“胡说！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并大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他们两个的下场自然是被手铐铐出会场。看来，中共高级干部中，并非都是落井下石的无耻之徒。

接着，遭到清洗的还有：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沈阳军区政委**周桓**，铁道兵司令**滕代远**，国防部副部长**萧克**，原志愿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邓华**等上将。最为惨烈的是：江苏常州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红军，大校军衔，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旋即揪出，1970年3月11日被处决。

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先后揪斗出高达200万（另说：高达1000万）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数千人自杀。借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高潮，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荒谬政策恶性发展，使刚开始不到半年的饥饿，迅速扩大，很快演变成饿殍遍野的惨局。到了1961年中期，工农业全面跃退，**导致3,000-4,500万人饿死**。官方承认“非正常死亡”有3,767万人(4)。这就是毛泽东帝王权力一次大发威的惨烈后果。（由于中共档案死不解密，上述数据版本很多，尚须人们仔细考证。）

1959年的庐山会议表明，中共伦理共识——这种已“高尚”化、“道德”化了的“理性”，使国家利益屈从于党的利益，党的利益屈从于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而人类自由理性和道德价值已荡然无存。

如果说“一化三改造”和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把中国人变成了**物质权力的雇佣**，而反自由、反人权等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即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则把中国人变成了**精神权力的奴仆**。

庐山会的重要性在于，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陶铸和贺龙等在内的尊贵大员的支持、纵容和争宠谄媚下，毛泽东帝王权力进一步加强，为数年后打倒、斗死他们自己（刘、周、林、陶、贺）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埋下了祸根。

第01章附注：

附1、“水门事件”

指美国共和党在1972年总统竞选运动中，在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装置进行非法活动的政治丑闻。1974年8月，美国第47届总统共和党人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因有掩盖真相、阻挠调查等罪名，被迫

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由于辞职而离任的美国总统。

附 2、“拉链门事件”

指美国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小姐的“性丑闻”事件，后被戏称为“拉链门事件”。弹劾调查的理由是：帮助、唆使、建议和促使莱温斯基阻挠司法，并同另外一些人策划阻挠司法和阻挠适当执法。1999 年 2 月 12 日，在参议院弹劾案表决中，因没有达到宪法规定票数，被整得焦头烂额的克林顿，最终保住了总统宝座。

附 3、毛式批斗法

首先由党组织以“**有罪推定**”确定被斗对象；其次做好批斗准备，即用“**怀疑一切**”的观念去武装、培训包括痞子、流氓无产者在内的积极分子，要他们大胆揭发；准备就绪后，组织“短兵接触”，召开批斗会。

在批斗中，严令被斗人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不要“**蒙混过关**”；动员、鼓励积极分子和与会者，以“**大胆怀疑、无限上纲**”的精神去批判、揭发，用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的方法去栽赃；还要高呼“打倒”口号，造成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氛围。对“**顽固不化**”的“恶劣”者，可“灵活”采取以下批斗法：“**精神折磨法**”，即臭骂、侮辱、禁食、断饮；“**意志摧毁法**”，也叫“车轮战”，即积极分子三班轮替，精力充沛，被斗人昼夜不息，欲睡不能；“**灵肉触及法**”，如罚跪、罚站、脖子吊砖、吊打、刺伤，等等。这种肉体折磨加精神虐杀的批斗，虽比希特勒大规模肉体消灭法要“文明”些，却无法掩饰那猫玩老鼠般的快意、邪恶和残忍！

有时，党组织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里，对不同的批斗对象，在批斗的程度、轻重和方式上，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附 4、“非正常死亡” 3,767 万

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一·四五，百分之四·三四，百分之二·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乘那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千七百六十七万。

本书带引号的“非正常死亡”一词，主要指饿死。

第 02 章 “七千人大会”受挫

02 章目录

一. 庐山会议后的形势 ★二. 骇人的“信阳事件”和饿殍 三. 召开大会的目的
四. 为什么会犯错误? ★五. 毛、刘、邓的不同反思 六. 林彪讲话和“出气会” 本章附注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计 7,118 人，史称，这次大会为“七千人大会”（图 02-1）。

一、庐山会议后的形势

毛泽东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呢？



图 02-1：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

1981 年《党史研究》第四期披露：邓小平透露了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被证明整错了的和已获平反的人数。1962 年 5 月上旬，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四十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

据占有档案资料的体制内作家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一书中披露：“1962 年 4 月 27 日，邓小平专门主持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指示在县以下的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的，要‘一律平反’，即使有轻微错误的，‘也不留尾巴’，事实上是一风吹。邓小平这一指示下发之后，各地加快了平反的步伐，截止 1962 年 8 月，总共甄别平反党员、干部和群众 600 多万人。”在“甄别”中，因三篇日记获“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罪”的笔者，也在“一风吹”中得到解脱。

庐山会议后，究竟抓了多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了多少“小彭德怀”？上面的“披露”也没有说清。不过，中共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在河北，曾这样形象地批评河北的“反右倾”运动：“有辫子抓辫子，没有辫子抓头发，没有头发抓头皮。”这些话，也可做一千万数字的旁证。

在激烈地反“小彭德怀”、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官僚主义又横行起来，基层干部中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

中，打人、骂人、欺压群众特别是被骂为“比黄世仁还黄世仁”（电影《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的恶霸，也借势横行霸道起来，接踵而来的是大量饥饿和死亡。

1960年春，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相继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和浮肿蔓延等严重形势，出现了与饥饿相关的饿死、自杀、打死、枪杀等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尽管各省都在封锁浮肿、“非正常死亡”等信息，但有的还是传入了中南海。例如：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传出饿死数万人的消息；1960年3月，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其中，黄冈传出浮肿人数5万、襄阳传出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等消息。

面对这严峻形势，毛泽东却得出相反结论。他说：“**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御用精英们紧紧跟上，在报上发文说：“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的号召，继续鼓吹大跃进，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饿殍遍野频传的3月，他又在杭州会议上发出了“**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的号召，继续为人民公社鼓噪。全国各大城市的党组织，不敢怠慢，不管老百姓死活，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来。

毛泽东的“乐观”，助长了省一级干部的新一轮浮夸风。在大规模饿死人的1960年3月，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向毛和中央报告说，全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着浮肿、饿死人现象，但却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向毛报喜：河南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使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对此，毛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说“**这些办法极好**”。在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向毛报告：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对此，毛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的大办食堂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四言诗：“**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的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

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庐山会议后，“非正常死亡”来势凶猛，各

省饿死人数迅速增加。到1960年2、3月间，饿死人的消息满天飞，间也有飞入中南海的。此刻，毛泽东才发觉势头不好。1960年2月23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道：“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他还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秆、根、叶大制淀粉”作代食品，来补充口粮不足。在北大荒，笔者曾奉命用玉米穗衣做淀粉，人吃了大便干结，得用手指抠。但毛泽东拒绝承认：由于他的中共垄断一切物资资源和一切政治权力，强迫各地执行他的“反右倾、鼓干劲”方针和通向天堂的“三面红旗”政策，已经把全国拖入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中！

二、骇人的“信阳事件”和饿殍

正当毛泽东用湖南、山东、河南、贵州、黑龙江等几个大跃进红旗省的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三面红旗”无比正确时，随着满天飞舞的死人消息，大规模饿死人的河南“信阳事件”，倔强不屈地闯入了中共权力中枢中南海。

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一书中写道：

“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任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笔者：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1998年邓力群（笔者：曾任中共宣传部部长）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笔者：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笔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笔者：家里死了长辈和丈夫的妇女，要穿白鞋守孝）”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乔培华，在《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一文中写道：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省委的精神到了信阳地委那里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充分。1959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而信阳地委浮报为50多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分配给信阳地区征购任务9亿多斤，加上下面的层层加派，达到10亿斤以上（笔者：数据与张树藩《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文中有出入），从而造成征了过头粮，而且把群众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等都搞光了，造成了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在当时的信阳地区及所辖的十几个县市都可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有的

户死绝了人。有很多小村灭绝了人迹，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广大农民连吃的口粮都没有，许多人都饿死了，哪里还有余粮上缴呢？在征收不出粮食的情况下，就大量地反瞒产，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隐瞒不报，因而采取逼、打的手段，出现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严重情况。如光山县委一位书记处书记对反瞒产有看法，县委会上，在第一书记（笔者：马龙山）的指挥下，就被当场打死。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对反瞒产不满而被扣上右倾帽子，被活活打死的人也有很多。（笔者：多少呢？由于地方政府严密封锁，不许外人调查，档案又死不解密，人们难以知道较准确数字。）

干部打人，并非河南一家。据报导，广西上林县县志记载了大跃进中干部打人现象：云黄大队队长扬言：“**不打人不是好干部**”，八个队干部全部打过人；大丰公社书记打过 12 个农民，公社副主任打过 36 个人；在上林，打和罚的手段有 30 种之多：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上吊、扛水、挑水、罚跑步、拔胡须、打口粮、扣工资、夺饭碗、看饭盅、游全村、游田梗、背石头、封门口、插白旗、假枪毙、带高帽、用火烧、罚苦工、顶北风、放蚂蟥咬、晒太阳、放牛进屋、丢石入房、带病上工、打鼓喊冲锋，等等。乔文继续说：

事件发生以后，信阳地区的各县、公社、大队分别采取了各种方式封锁消息，民兵日夜站岗值班，不允许农民外出要饭，说外出要饭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不准农民向上级反映情况，说那是告黑状，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因此就是反党；不准私自在家做饭，说私自做饭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人民公社；特别是扣押许多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如光山县委书记指示县邮电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进行严格检查，谁写信给外地的亲戚朋友、上级机关、省市领导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就扣下来，对署名的人进行开会批斗，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匿名信就让邮电局的同志回忆是谁送的信，设法查出来。有一封反映光山饿死人的信，邮电局的同志说好像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光山县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检查，搞的人心惶惶。（笔者：显然，这种恶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产生！）

尽管对于信阳地区的问题，河南省委缄口不提，信阳地委严密封锁。但消息还是或多或少地传出一些。

据学者们估算，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的半年多里，信阳地区饿死即“非正常死亡”约 60~100 万人，1959~1961 年的三年里，“非正常死亡”约 110~130 万人。

《百年潮》1999 年第 12 期，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系当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所写。

张树藩在文中写道：（摘录其中四段）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和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第二天，吴芝圃（笔者：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

张树藩“想不通”可能有些道理，因为他是**体制内**人，对有些党员干部因执行上级政策被批、被斗、被镇压他想不通；但对体制外的人特别是农民群众来说，批斗那些大刮共产风、强迫命令的党员干部，镇压那些狗仗人势、“比黄世仁还黄世仁”的恶霸党员干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1971年10月，笔者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草黄林公社公出，曾同那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六〇年时，他们几乎毫无顾忌不加掩饰地说：那三年，我们公社饿死三成以上，有许多绝户；中央派人来这里搞“民主革命补课”，干部都“靠了边”，许多干部（包括生产队干部）被撤职、法办或自杀。

与农民群众遭受连续三年的大饥荒的同时，河南许多无辜的基层干部历经了三劫魔难：1959年河南在全省按照中央精神“反瞒产”时，就有大

批基层干部被关押、被拷打致死或自杀，是**第一劫**；在“大饥荒”的饿殍中，不乏基层干部遗骸，是**第二劫**；根据毛泽东批示进行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是**第三劫**。据披露，在毛泽东制造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全国成百上千的地、县级党员干部被判刑；湖南全省 80 来个县，有 30 来个县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河南处分了 23 万人，其中，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被判死缓；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因怕当替罪羊遭枪决，携妻子和三女一男投井自杀。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中有不少蒙冤者，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罪有应得，如陆宪文、马龙山等痞子。大跃进政策和庐山会议后鼓吹“持续大跃进”并在全中国大抓“小彭德怀”的始作俑者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永远还是那样“伟大、光荣、正确”。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闯入中南海的“信阳事件”，并没有使毛泽东和他的幕僚们幡然悔悟。1987 年赵紫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几天内，对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中有无数的农民饿死。他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

“信阳事件”不过是大跃进和“持续大跃进”运动恶果的冰山一角。据报导：到了 1961 年中期，全国工农业全面“跃退”，导致 3,000~4,500 万人饿死。据官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显示，1958~1961 年间，全国“非正常死亡”有 3,767 万人（详见第 01 章附 4）。

一个叫李为的安徽人，在《几个老人记忆中的那场饥荒》一文中写道：

一段历史如果经历太久，历史的细节和真实就会被忽略，人们的疼痛和灾难就会被删除。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秉持良心，尽自己所能揭示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有人会质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甚至认为你图谋不轨。上世纪六零年前后那场饥荒就是如此。不知道我这段记述，你是否认为它是真实的？

笔者通过自己村庄的故事，几个依然健在的老人的回忆与叙述，记录一下当时的情形。

58 年，当春天小麦开始抽穗的时候，下了一场苦霜，导致了麦穗全部干枯，人们陷入了绝望，当时最有经验的老农都认为灾年将至，但是没过多久，小麦重新抽穗，而且那年的收成比往年还略微有增长，每亩地的收成都在一口袋以上（布制长口袋，在一百斤以上，当时还没有化肥，这个产量已经是不错的产量），但被征收后所剩无几，59 和 60 年庄稼还是收成了，但是总是收的不够被征收的，导致了在老人记忆中最为严重的饥荒。59 年陆续开始饿死人，首先饿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越是大地主成分，活下来的可能性越小。

姓许的解放前是大地主家庭，弟兄9人加父母共11人，饥荒过后仅存一人，人们叫他二瘪子，现在已经儿孙满堂。

笔者的一个堂姐，一个堂哥被饿死，一个堂哥被爷爷用一斗玉米的代价卖给了陕西人，一斗玉米放了我堂哥一条生路，也救活了我的爷爷。堂哥现在还活着，现在56岁，已搬家到安徽宿州，有了自己的家庭。

姓徐的家庭，因饥饿中母亲没有奶水，最小的婴儿被饿死后，饥饿导致母亲把自己死去的婴儿煮吃了。被丈夫和大儿子发现后，此母亲被活活打死。此大儿子依然健在，现年68岁。笔者不敢跟他提起那件寒心的往事，不过他还是说：“那都是饿的，没有办法，哪个娘愿意吃自己的孩子啊！”

姓许的家庭一个儿子金锯，几乎被饿死，躺在地里时，被我的父亲背回了家，喂了他半碗粥，得以活命。现在每逢过年过节，依然到我家来看望我的父亲，他说父亲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经在我哥哥小时候打过我淘气的哥哥一巴掌，其母亲知道后带着他跪在我们家门前，说：“人不能没有良心啊，不是人家救你，给你半碗粥，你哪能活着啊”，父亲把他们扶起，说淘气的孩子该打，其母亲仍然说：“人不能没有良心！”。可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图，是千真万确的。

但那时候掌握粮食的人员饿死的很少，几乎没有饿着。一个老人说：“现在官员腐败，我们的生活依然逐渐好转，但是那时候的腐败是要命的，他们多吃一个馒头，就是吃了几条人命！”可见不要神化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纯洁度。

一个姓孙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吃野菜和草，后来草和野菜都吃光了，就吃玉米杆和麦糠做的馍馍了。那种馍馍不能见风，风一刮就飞了。”

一个姓王的老人说：“那时候人饿的，头发一摸全都掉光了。”

另据报道：

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和全国各地逃到深圳的饥民，成功地逃出中国(图02-2)，逃到当时被称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等待祖国去解放”的殖民地香港，成了“令人唾弃的叛国分子”。三年间，云南边民十三万多逃出国境，当了被人诅咒的“卖国贼”！



图 02-2：叛国饥民逃香港

1962年4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当时说这是民族分裂分子同苏联修正主义者共同策划的一次大叛逃。

一九六〇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一大二公”当年被赞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人民公社的军事化密不可分。

据报道：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许多农村实行“**聚家并屯**”，进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改造。“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

“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为了逼着人人进食堂吃饭，“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不许吃饭。”

1960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因而要“**鼓足干劲**”拼命干活有密切关联。

有人曾目睹过这样的场面：

……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

村干部根据“伟大领袖”“**拔白旗**”的教导，对胆敢抗拒命令者，以“白旗”论处：“村干部一声令下，把‘白旗’围起来进行**拳打脚踢棍子夯**。”

1960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为保卫“社会主义阵地”因而强制农民进公社食堂密不可分。

根据毛泽东“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有制规定，土地全部国有化，粮食也随之国有化（后来部分退给集体）。农民吃饭问题，由各级政府根据各公社、大队人口，核定口粮标准，分发给各级公社大食堂。因此，农民要吃粮，必需进食堂。

据报道：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曾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6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走，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图 02-3）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1959年7月初，他回到老家看食堂，发现老家已有不少人饿死。借着毛泽东“食堂不好可以散嘛”的指示，他责骂县委书记说：“你把人还给我！”应农民要求，他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几千个食堂。结果，风云突变，张凯帆被毛泽东指责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说张“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等等，并将张投入监狱。

紧跟毛泽东弹跳的《人民日报》，把公共食堂描画成仙境：“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可是，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

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说：“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年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他：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

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能说这是“歪嘴和尚念错经”吗？这位有时敢说实话的“封疆大吏”阎书记，文革开始不久便被迫自杀。

然而，在这种人为造成饥饿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的指示，还在向全国发命令：“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

一九六〇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盲目大搞水利建设密不可分。

例如，对于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毛泽东说：“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工程，规模很大，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1958年一直干到1961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成百上千（另说上万）民工，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另有报导说，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

一九六〇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超低标准口粮分配密不可分。

有人曾这样描写死亡：

在一九六〇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笔者：一斤等于16两，每两31.25克），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

.....

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挪到一九六〇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1961年1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在文革中，王家来因“媚日”罪，被批斗后上吊自杀。

《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〇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一九六〇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毛泽东的“志气”和“骨气”密切相关。

据报导：赫鲁晓夫听说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马上召开苏共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 50 万吨食糖，300 万吨粮食。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决定。毛泽东闻讯后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又说：“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周由此回绝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援助，展示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志气”！又据报导：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转达了肯尼迪总统援助中国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 500 万吨小麦；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如果中方表示认可，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中国穷人送救济包。对此，王炳南大使转达了毛泽东的革命立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方代表还以幽默的口吻传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幽默后，“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大使的转达和中方代表的哈哈大笑，再一次展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骨气”！——在“大救星”的“志气”、“骨气”下，数千万农民被他“救出苦海”，饿毙后，升入到“共产主义天堂”里!!!

.....

（上面多处“据报导”没有注明出处，这是因为：一是这类的文字很多，网上、地摊、书店里很容易找到；二是当“**揭示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有人会质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甚至认为你图谋不轨。**”因此，如果你不信，即是注明出处你也不信，勿如干脆省点文字，信不信由你。）

1961年初春，**笔者**探亲路过开封。不大的火车站的广场上，有数百人在等待，在徘徊。他们中许多人好像不是在候车，像在寻找什么。在初春的寒风里，他们抄着手，三五成群地集在一起。他们的脸好像都是土黄色，眼窝深深的，颧骨高高的；他们所穿的褪色棉衣，似乎沾满了尘土，好像也是土黄色的；也许是豫东地区的黄沙土地，使车站广场的砖墙砖地上，都留下了薄薄的一层黄色尘土。寒风吹过来，卷起阵阵黄尘，与土黄色的衣，土黄色的脸，构成了一个土黄色的混沌世界。一个妇女坐在地上，双手捂着一块烤红薯吃，土黄色的人们，便不约而同地用眼光把她包围了起来，贼眼溜溜地盯住那块被双手紧紧捂着的红薯。广场的一角，一个老人睡着了。当人们翻动他时，僵硬的身躯证明他已永远“**睡着**”了。一个青年，突然倒在地上，几经挣扎，**爬不起来**，人们把他抬进了候车室，后果未知。笔者到车站附近一家饭店里凭票证就餐，买了一碗干饭，一碟咸菜，一碗菜汤。刚吃了几口，在“出去！出去！”的驱赶声中，一个土黄色的中年人拉着一个土黄色的十岁上下的瘦弱小姐儿，双双跪到我的跟前：“**救救她吧！**”那土黄色的小姐儿眨巴着一双大眼看着我，分明也在哀求我。笔者童年丧母，父在缅甸中国抗日远征军中服役，杳无音信，迄今不知所终，凭亲友接济熬过童年，十二岁流落街头，饥肠辘辘之声早已根录于脑海之中。当见到土黄色的瘦弱小姐儿，仿佛听见了她腹中的辘辘肠鸣。我答应了。小姑娘站起来，端住饭碗便往嘴里扒米饭，大口大口地伸着脖子吞咽。还剩下两口留给她父亲；父亲没吃，让她吃完，父亲只喝了几口汤。当时的我，尽管也有些饿，显然比他们父女俩“阔气”得多。我无法知道他们的未来，只好暗暗祝福他们，这是我当时的唯一能力；而那土黄色的小姐儿和她吞咽的模样，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全国各地大都一样。1961年5月，笔者在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当农工劳动期间，因**三篇日记**，获“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罪，被打成“极右”。遭残酷批斗后，身陷管押中，几遭灭顶之难！所幸，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那股短暂春风，“一风吹”把我吹出了囚笼。

在这里，笔者摘录当年获罪日记主要一篇里的几个片断：

59年9月12日

“大兵团作战”这个名词今天才搞清楚。但搞清楚之后，使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舒适。

曲阜县的支边青年们，向我讲述去年他们县“大兵团作战”。他们的一致结论是一团糟！

“第一个回合”是秋收战役。

金色的谷浪，黄澄澄的大豆，——一片丰产景象，要人们赶快收割。但“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员们，执行的是“集中兵力突出一点”的作战方针，结果大片大豆爆皮了，地瓜烂掉了，——结果58年丰产没丰收。

“第二个回合”是大炼钢铁战役。（图 02-4）

“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员们，开始调动大批“兵力”到炼钢战线上去。但小炼铁炉像草爬子一样，只吃不拉。【草爬子，昆虫，东北方言，未知学名，头钻进人皮下吸血到死。由于是东北土名，支边青年未必知道，便以此推定我“造谣污蔑”】而且煤炭渐渐不够用了，指挥员们便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风格，创造了一套大破坏的方法——住房被拆了，门窗被劈了，这一切都拿去当煤用。家里的大锅没用了（因整个县已经成立了大食堂），就被指定砸碎去炼铁。即使想了这么多办法，也未能完成上级给予的指标。



图 02-4：广大农村大炼钢铁中炼钢炉林立

第二次战役失败了，人民公社威信扫地。（这种说法值得考虑）【这句被推定为“恶毒攻击”】

这二次战役实际上是一场紧张的、带有强制性的劳动。

人们每日劳动平均达 14 小时以上。由于不劳动不得食，人们只得披星戴月地干，干的正吃着饭就呼呼睡着了。可是饭罢，哨子一响，人们又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工。

参加劳动的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有抱着小孩子的母亲，有提着药罐子的病人（！），——真是劳动大解放！【这句被推定为“恶毒攻击”】

除以上以外，还有一些新措施：如夫妻二人只能星期六相处在一起，其他时间归集体；私人财产，如房屋、生产工具，都归属集体。

我听了以后，不禁一声长叹！

据上海《社会》杂志 1993 年第四、五合期刊载，《三年大饥荒资料死亡人数推测》的作者，用四种方法进行推测计算：1959 年到 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2,791 万到 4,522 万人之间。其中，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1,126 万人，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634 万人，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557 万人，山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528 万人，湖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378 万人，广西自治区“非正常死亡”人数

约 226 万人。由于档案死不解密，又不允许体制外的人或团体组织调查，信阳事件和上面推测计算出来的数据是否准确，只有等到五十多年前的那些中共机密档案解密时，才能得到较准确的结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再次紧急呼吁：每年的 8 月 29 日，即中共在 1958 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大饥荒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这里，笔者之所以多次不厌其烦地斥责“档案死不解密”，是想引起读者注意：当今之所以对历史事件众说纷云，数据差别很大，盖因当局怕败露谎言拒绝解密档案之故。笔者希望以此能与读者共同呼吁当局：不要用政治玩弄历史，把历史当成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要效法民主国家三十年解密的做法，让阳光代替暗箱，让人民知真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召开大会的目的

1961 年 9 月，在中共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 32 亿斤。可是到了 11 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 23.4%**。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粮食脱销的危险。据说，北京市库存粮食**只够七天用**，城市粮食脱销的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心情不会轻松。

1961 年，国家用了 3.5 亿美金（合人民币 14 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按这种情况下去，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偌大一个农业国家，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用邓小平的话说，“**永远也翻不了身**”。

1961 年 11 月 11 日，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问题。各中央局书记面面相觑，感到问题的严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问题严重在什么地方？他们心照不宣地指向地、县委书记一级。1958 年，批他们右倾保守，是“睁眼瞎子”，看不见农民的积极性，迫使他们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弄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到了 1959 年，又把 1958 年的共产风、浮夸风，全推到他们身上；庐山会议后，他们中许多人因同情彭德怀，质疑“三面红旗”，行动不力，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 1960 年大量饿死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又在“民主补课”中，变成了阶级敌人，被撤职、判刑，有些还被判死刑、死缓，有的见大势不好跳了井，剩下来的只有忍气吞声，听天有命。本来是毛泽东制定和推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惹的祸，但在高压下，谁敢说“三面红旗”个“不”？因为党的伦理哲学已经确定：毛主席永远“伟大、

光荣、正确”。为了保全自己，地、县委书记们，不得不暗地里把“屁股坐在农民方面来”，一听征购粮食，感情上就“抵触”，便大声“困难”。因此，落实粮食征购问题，就得克服地、县委书记们的**抵触情绪**。

深谙权术又熟知中共各级干部情绪起伏脉络的毛泽东，对如何克服地、县级干部抵触情绪早已成竹在胸：**稍施民主**。于是，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

会前，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并不了解毛的谋图，他们按往常惯例去筹划大会。他们设想：大会以作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的工作报告开始，用讨论报告来统一大家的思想，预计10天会议，就可达到开会的目的。为此，他们组织写作班子，起草了《刘少奇工作报告》（下称报告稿）。毛泽东看过报告稿后，做出了出乎刘、邓意料的反惯例行动：报告稿先交大会分组讨论，然后再做修改、定稿。

对于毛的反常举动，有人一厢情愿说是“充分发扬民主”，有人基于反右的前车，认为是“钓鱼”，也有认为是“不赞成”报告的某些内容，等等，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熟读经史的毛泽东，精通“宽猛相济”权术。“**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三年多以来，批斗刑罚，猛多而民怨而官慢（抵触），应以宽济之。当他了解到干部们特别是地、县级干部们的抵触情绪后，决定打民主牌，即用“民主总结经验”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方针，让下面各级干部各抒己见。毛相信，以今天民主包容舒畅之宽，济以昨日专政批斗刑罚之猛，就能克服抵触情绪，从而“**统一思想和鼓足干劲**”，使各项工作包括征购在内，达到打开一个新局面的目的。显然，这种封建帝王将相的“人治”权术，既非“充分发扬民主”，也有别于“引蛇出洞”式的“钓鱼”。

然而，即使这种“民主”也与无产阶级专政格格不入，稍有不慎，门缝过大，“阶级敌人”就会乘虚而入，招来麻烦，反右就是例证。不过，毛泽东成竹在胸的是，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和改造”，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已经知道什么叫**驯服**，也知道拒绝驯服的后果，这三年大饥荒里没有出现大乱子，就足以证明。因此，他稍施“民主”，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令人感恩戴德的效果。

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会进程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预想发展。

张素花在《变局：七千人大会》一书中披露，**中央在报告稿中说**：“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1959年、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为什么会犯错误**？张在书中披露，**中央在报告稿中认为**：“这几年有一部分的建设工作的缺点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或者有些政策规定得不完全恰当的原故。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实行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中央在这几年来还规定过一些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不恰当地提倡过一些引起不良后果的事情，例如几个‘大办’，在调整国家体制方面，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中央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工作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从张文披露的报告稿中看得出，中共中央承认在三年中犯了“三高”、“一刮”、几个“大办”、瞎指挥、平均主义等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一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二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等等。也许报告稿在刻意回避这个基本事实：**恶果源于专制、独裁和体制腐败**。

当报告稿下发后，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官员，对报告稿进行了热烈讨论。由于反右派和反右倾的前车之鉴，他们大都知道发表意见的分寸，但也有人在“发扬民主”的承诺前，跃跃欲试。

大会讨论时，对于大跃进期间表现出来的错误，诸如“三高”、“一刮”、几个“大办”，还有瞎指挥、平均主义等等，是明摆着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家的分歧不大，但这些错误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当追究这些深层次问题时，便纷纷议论起来。

四、为什么会犯错误？

许多官员认为，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主要**不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有官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发生在1958年9月。当时刘少奇到江苏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出身农家的刘少奇，难道连农业生产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举例人说“难以理解”。笔者认为：**刘不**

是“不懂”；用谎言开道，是毛共发动群众的高招；“一万斤”是发动大跃进、放“卫星”最好、最难得的谎言。另一个例子发生在 1958 年广西大放钢铁“卫星”的时候。当时省委书记亲自去现场考察，发现高炉用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没有炼铁的煤，人们把树砍了做燃料，认为只要把矿石烧黑，就是铁了。省委书记指着烧黑的矿石，问身边的技术人员是不是铁，技术人员点头称是。省委书记和技术员竟分不清石块和铁？举例人说“更加难以理解”。笔者认为：**省委书记是明知故问，以假求假；技术员投其所好，以假报假。**在没有民主不敢说真话的时代，这是不正常的“正常”。所以有人说：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不能说服人。官员们不敢深究“不敢说真话”的原因。

有人说，**为什么会产生高指标**？大家当时为什么相信它、接受它呢？其中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心里认为完不成，但是不敢说；一种是为了迎合领导，投其所好，明知不行，硬说能行。这两种不是缺乏经验的问题，而是属于思想问题。笔者认为：**这是绝对服从的恶果，明显是个民主问题，只是太敏感了，与会官员们不敢说，只好归为“思想问题”。**

还有不少官员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党内斗争过火。他们说，几年来光是从反右上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笔者认为：“**言者有罪**”跟有无经验风牛马不相及。

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亦即撤职查办，致使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

这句“强调”的话是那位高官说的？是毛？是刘？笔者从资料中查出，1958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为了强竖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毛泽东把一切质疑、抵触和反对者当成“白旗”拔掉。

甘肃、青海两省有些官员们，针对 1960 年冬的**整风整社**工作提出意见。他们问：信阳经验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在甘肃推广是否适当？在追查信阳问题时，中央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坏人掌权，因此在全国

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此湖南官员质疑：“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作人做个报告。”

笔者认为：“请省委加以说明”，把省委权力估计过高了；“请创作人作个报告”，可说是**胆大包天的英雄也**！之所以称之为英雄，因为这个湖南官员敢于挑战毛泽东。为了收拾替罪羊，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顿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又说：“**三类社、队要成立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现在中央下放了一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显然，挑战者知道“创作人”是谁。

天灾和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安徽、西藏、山西等很多省有不少基层官员认为：**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说，“农村工作中，人灾是第一位的。”

湖南有人更大胆地直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好一个“人祸第一”的“三权”论者，他把“主”和“奴”的关系，摆上大会，**真乃又一英雄也**！

有官员甚至对错误的性质提出质疑。华北地区有人提出：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地方官员把矛头含蓄地指向了毛泽东，**虽当不上英雄，也应算作好汉**！遗憾的是，笔者没能找到这些英雄好汉的名子！

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1961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

对1958年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有的官员私下讲，焦点在毛主席身上，但很少有人敢公开这么说。若干年后**何金铭**曾回忆：“**我就说过：‘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反右倾的时候，成了很严重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事后诸葛亮，或是门里**耍棍棒**。

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呢？（图 02-5）

在专制、独裁条件下，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敏感的话题。1959 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就是倒在批评“三面红旗”上的。倒彭后，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说：“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三箭齐发是毛泽东的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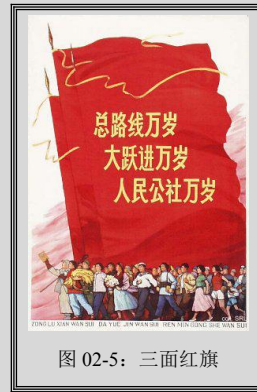


图 02-5：三面红旗

但有不少官员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自信”，他们大胆地就“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他们说：“三面红旗”是否正确，原则好讲，具体难说；丰收地区好讲，灾区不好讲；工业好讲，农业不好讲；总路线、大跃进好讲，人民公社不好讲。还有人说，大跃进这面红旗要不要都可以。

惧于毛泽东的权势，很多官员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改变过急**，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在商业、手工业中，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农业方面的“三高”不是实质问题，**而是所有制、分配制度、生活集体化的问题**；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强调不断革命的时候，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等等。

有个官员更直截了当地说：这次会议，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

显然，曾为毛泽东的乌托邦疯狂过的官员们，在饿殍遍野面前已经有所清醒；但在中共伦理共识的氛围里，他们没有勇气理直气壮地质疑 1959 年庐山会议做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右倾危险是主要的”结论，更不敢理直气壮地批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独裁体制。

这些声音，对听惯了歌功颂德、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和“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来说，**相当刺耳**，也出乎他的意料。他察觉，同 1959 年庐山会议一样，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遇到了“**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不同的也最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中央，在他的身边，也出现了“反对派和怀疑派”，就是他钦点的接班人刘少奇和邓小平。

五、毛、刘、邓的不同反思

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恶果，都有所反思，但反思的广度和深度相当不同。

毛泽东为他制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辩护，说“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有错，也是执行中的问题。之于饿死了几千万人，他告诫大员们不要看得过重。他曾对他的“御医”李志绥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会前他很乐观，他认为，国内困难形势已进入谷底，召开“七千人大会”，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各级领导干部承担一下责任，批一下分散主义，告诫大家要听中央指挥，就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他的乐观还表现在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他热情地向与会者介绍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显然，他告诫与会者：在困难中要看到光明，对“三面红旗”不能动摇。不过，也有人这么解读他的诗词：“待到饿殍遍地时，他在丛中笑。”——显有解读过头之谬。

其实他的这首词，是为**安慰女友**所作。在这里，他拿了过来作政治拔高处理。对此，他的专职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有所描绘。

无独有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也认为此词与女人有关。2005年9月21日，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调弄“伟大领袖”说：

看看主席的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花都开了以后，我在花里面笑。可是我告诉你，毛主席的真相，他的第一次原稿不是这样的，……他的原稿是**他在旁边笑**。他是个旁观者变成在中间，大家知道什么境界呢？……以前女孩子穿的是玻璃丝袜，在大腿中间吊着，……她把袜子穿上去以后，所以她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袜子没有穿上以前，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你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腿，就是**他在旁边笑**，丝袜套上大腿，就是**他在丛中笑**。

笔者在其演讲稿的旁批中，戏而和之曰：

哈哈！开涮“伟大领袖”。按照李敖大师的“诠释”，毛泽东那首词的

下阕四句应改为：“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袜套大腿上，X 着美腿笑。”这是笑话，读者自不必当真。

毛泽东向与会者还介绍了另外两首诗，其意图更加鲜明。那是钱昌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两首小诗。钱诗对当时饿殍遍野的农村形势进行赞美：

《芦台农场》

麦苗肥壮谷登场，
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
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

薯曝墙头菜挂檐，
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
绿女红男夕照前。

钱昌照何许人也？他是“民革”中央常委。在饿殍遍野的年代里，他所看到的竟是五谷丰登和莺歌燕舞，不承认“当年一片荒”。毛泽东需要这些“民主党派”的谄媚来点缀中共的民主，用谎言来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毛以安慰女友的诗词告诫大会主持者，以钱昌照的精神起草大会报告。

然而，与会者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在起草大会报告里，多了些错误和缺点的描述。毛虽不满意，但大会的列车已经启动，他也只好随车相机行事。

在报告稿的推动下，大会偏离了毛泽东预定的方向，几乎成了控诉“三面红旗”大会；大会的主导权，正在向刘、邓手里转移。这一切好像是专跟毛作对，使他“憋了一肚子恶气”。

为了掌握大会的主导权，在党内的压力下，毛泽东被迫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这种空洞无物的“自我批评”，毫无诚意，但已伤及“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还为他的罪责辩解道：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图 02-6）

毛泽东的“缺乏经验论”，论理深奥，调门高超，充满训诂，毫无悔意。人们不会忘记：他的总路线政策实行伊始，苏共中央曾劝告他吸取 1932～1933 年代苏联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教训（1），被他嗤之以鼻；彭德怀在《万言书》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大跃进政策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使“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忠告他“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被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陕西户县大队干部杨伟名等农民，上书《当前形势感怀》，向他发出正义呼声，指出他的人民公社政策已使“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遂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杨也被迫服毒自杀。然而，无上权力，却能使他把他的独断专行美化成“缺乏经验”和“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是可笑？还是可憎？



图 02-6：毛论“自由王国”

不过，“充满训诂”的调子已经没有两年前的自信了。那时，1959 年 7 月 23 日，面对已经开始大范围的饥荒和饿殍，他轻松地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他的“没有什么可紧张的”轻松，却使中国数千万农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刘少奇的反思与毛大不相同：相对诚实得多。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显然，这是难得一见的实事求是！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找死咧！”在毛泽东面前，他说这种真话太大胆了。果然，几年后，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听到刘少奇讲“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时，会上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经久不息的掌声，使坐在正位上的毛泽东十分尴尬。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掌声使刘忘乎所以，忘记了“指头论”的发明人毛泽东，就坐在他的身边。

“……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因三篇日记获“恶攻罪”的笔者，才得以解脱。

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刘少奇也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似乎是违心的。他在一些小型会议上曾坦露心扉说：“‘三面红旗’比较难说。”他甚至还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其实，在无产阶级

专政下，省志上不写也很有可能。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在中共党内并不少见。也许三年的饿殍枕藉，使疯狂追求毛式乌托邦的刘少奇，良心受到了强烈的谴责。他说这些话时，竟激动得忘乎所以，忘记了他所倡导的“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的哲学，忽视了毛泽东的尴尬，为文革中被打倒、被迫害致死，埋下了祸根。

邓小平反思与刘相近，远不同于毛。他了解毛的品性，他自始至终没有涉及“三面红旗”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也没有讲天灾、人祸的关系，有意回避了毛的“1：9”的“指头论”，更没有像刘少奇那样慷慨激昂。他说：

“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

“党的实事求是、说老实话，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这三个方面的优良传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

“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

“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

“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

也曾为毛式乌托邦疯狂过而今有所自省的邓小平，显得比刘少奇老练些，城府更深些。但他打着毛的旗号影射毛的作法是自作聪明，是逃脱不了毛泽东犀利目光的。

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反思的调子，放在表面的纠偏上，没敢涉及“三面红旗”本身，更不愿追本溯源到马列专政理论和体制上，因而纠偏调子没有毛泽东那么“高超”。但刘、邓在会上的有限反思，已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已“杀”入最高核心，令他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就睡在他的身旁。决不允许大权旁落的毛泽东，正在等待时机，扭转并主导大会方向。

六、林彪讲话和毛的“出气”权术

机会终于到来。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

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空前绝后的学费啊！拿饿死 3,000~4,500 万个农民当学费，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的领导人敢于这么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可悲啊，就是这位为毛泽东开脱罪责的林彪，在发言九年八个月另十四天后，竟被毛逼走，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2 时 27 分，同老婆、儿子一起，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汉！

曾以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的杨国殿说：“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这是他后来说的；当时他敢说吗？

毛泽东非常满意林彪的讲话。在这次大会上，其他人的讲话，毛没有给予评论，唯对林彪的讲话当场带头鼓掌，并称赞其讲得“很好”。大会原定 1 月 30 日结束，林彪讲话后，天才的毛泽东发现扭转并主导大会方向的时机已经到来，迅速作出了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决定：会议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

召开“出气会”是打民主牌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毛泽东看来，让下级官员出气，就能沟通上下关系，克服抵触情绪，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和鼓

足干劲”使各项工作（包括征购）打开一个新局面的目的。他有意把下级官员出气的矛头引向省部一级。

为了让下级官员出气，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对各省省委领导大加鞭挞。他说：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偏要摸老虎屁股”的号召，立即引起了热烈响应。这步“棋”，聪明而圆滑。

当时有不少地、县级头头已经摸清了毛、林的意图，所谓“老虎屁股”，就是一些省、市、部级领导，所谓“出气”，就是要把矛头对准他们“出气”。于是，他们中便有人在会上献谄说：“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歪嘴和尚”就是指一些省、市、部级领导。他们在会上纷纷向省、市、部级头头们开火。

湖南有官员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给省委提意见说：“没有抓住‘五风’这个关键问题，把文章做到纯洁组织的问题上去了，全省一下子就发现了32个三类县，可见省委心中无底。”——“五风”，是从毛的“一大二公”那里刮起来的，这才是“关键问题”。湖南省领导敢抓吗？

吉林有人提意见：“1958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了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

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听听这口气，就知道他的权力有多大，无须再去证明这话是谁说的！

河北有官员说：“1960年整社出的问题比前几年还要大，主要是把干部的积极性打掉了。”“三类队划分的标准是谁规定的，究竟全省有多少被敌人掌握的大队，为什么出入这么大？整风整社，整下边干部，真是整伤了心。”——整风整社是毛决定的，信阳经验是毛肯定的，省委敢不执行吗？

有官员给省委提意见说：“这几年搞运动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从食堂里找坏人，从各级干部里挖死官僚，真叫下边害怕。”——毛多次指出：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为了保卫这个“阵地”，保护好这个“心脏”，省委敢不从中抓坏人？

还有官员针对反倾向斗争提出意见说：“近几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省委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在毛的压力下，各省、市、部级头头们，也纷纷在会上作检讨，让下级在他们面前出气。

下级在上级面前出气，大多数可能属真；而省、市、部级头头们的检讨，大多数真中带假，其诚实度需大打折扣。这是因为，就在毛“痛斥”省、市、部级头头、表示要坚决摸“老虎屁股”的当天晚上，毛曾安抚过他们。

那天晚上，毛泽东通过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向省、市、部级头头们传话说：

“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讲的东西，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即使人家讲的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如果你只有十条错误，人家讲你二十条，你实际上还是只有十条嘛。”“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对敌人不要承认，对同志也不要承认，也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带帽子。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当民主人士，只要你对，你就

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

毛的安抚使省、市、部级头头们，心中都有了底。

对此，有精英著文说：“什么叫领导艺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叫人不能不服。”——这是中国人的不幸：如果把这种真真假假玩弄权术的游戏当成“艺术”加以赞美的话，就要颠覆中国词典中关于“诚”字的全部释义！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在2月6日检讨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认为农村需要反右，把解散食堂也看成是右，实际是农村“左”的情况未彻底解决，反而掀起了反右浪潮。加之在这种情况下，搞了几个大办，搞过渡试点，结果伤害了一部分干部，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1960年的减产。再一段是1960年冬，就减产和生活上发生问题的原因，对天灾估计的高，对坏人当道、基层组织不纯、五类分子掌权、民主革命不彻底，估计得过分；而对“五风”错误的严重危害性估计不足。——这不都是毛倡导的吗？刘的聪明在于代毛受过。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说：“1958年冬我曾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少种高产，全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其实是170斤。”（笔者：“伟大领袖”那么容易骗？陶在投其所好。）陶后来回忆说：总的看，毛主席“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笔者：揣摩毛的心理。）陶还检讨了反倾向斗争中的“机械过火”错误：第一次1957年反右，第二次1958年的拔白旗，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批彭，第四次1960年冬到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

广东省委检讨说，这几年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党的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党内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出现了过火斗争；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检讨中说：省委1958年11月召开过一次思想混乱的会，会上提出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二、三年吃的方面实现按需分配，强调拔“白旗”等等，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因为反右倾的斗争，搞到基层扩大化了，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又伤害不少人。

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检讨中说：“每当主席、中央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总怕退得太多，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比较高的增产计划”。——紧跟毛的柯庆施，

一席真假搀和的话，同陶鲁笏揣摸毛的心理，以便投其所好，有什么差别？

粮食部在检讨中说：1959 年全国全年粮食产量是 3,400 亿斤，征购就拿走了 1,200 亿斤(另一说为 1,348 亿斤)，占三分之一强。全国出现大饥荒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粮食征购过头是其重要原因。1960 年本来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已极为严重，但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

冶金部在检讨中说：大跃进期间，冶金部看到毛主席和中央很重视钢铁的产量，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当毛主席在成都会议谈到用“10 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20 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的想法后，冶金部立刻写报告给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国钢铁工业“10 年赶上英国，20 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图 02-7)(笔者：又一个投其所好者)对此，毛泽东十分高兴，称冶金部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1958 年 5 月，冶金部又“论证”表示，只要 5 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 年可以赶上美国，对毛泽东和中央一再抬高钢铁指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是冶金部带起来的。对此，冶金部检讨说：计委、经委的毛病，我们也有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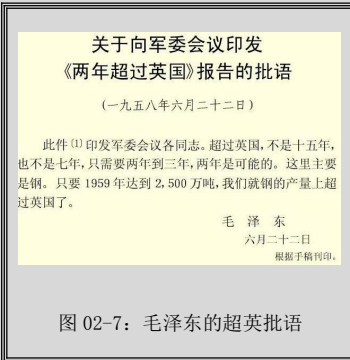


图 02-7：毛泽东的超英批语

外贸部在检讨中说：1959~1960 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而且在一个时期要求大家不吃猪肉，支持出口。这几年外贸部提出：“挤、超、顶”和“五先”、“出口第一”、“保一头”等口号，起了不好的作用。1959 年出口粮食从 1958 年的 266 万吨提高到 415 万吨，出口量猛增 56%，即猛增 29.8 亿斤，等于夺走了约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

《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检讨中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吴还说：“宣传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主席讲了敢说、敢想、敢干，要以马列主义为



图 02-8-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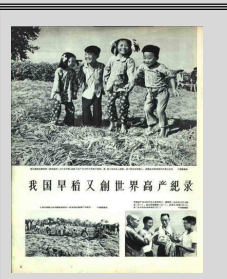


图 02-8-2：“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基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图 02-8-1)

人们不会忘记，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四个小孩站在生长着的茂密稻穗上嬉戏。图片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实实，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图 02-8-2）并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从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了鼓动大跃进的家喻户晓的著名口号。吴冷西的“**新闻为（毛的）政治服务**”，深受毛泽东的赞许和信任。

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袖的关照下，有些下级干部大胆出气，省级官员也纷纷过关，个别省级大员如大跃进中饿死了630多万人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泉**，因作风霸道被调离外，其他各就原位。毛泽东主导的“出气会”，也算达到了他的目的。

下级敢于在领袖面前批评上级，上级能够在下级面前做检讨，这是中共党内民主的萌动，理应看做是“七千人大会”的重要收获。因此，许多与会官员认为，这次会议是“**最民主**”的会议。于是，有人得意忘形地打油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笔者：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个“七千人大会”是个失败的大会。

首先，大会起草的报告他不满意，成绩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缺点和错误说得太多，描得太黑。其次，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令他震惊：刘竟敢把形势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完全否定了他常说的“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关系”的“**指头论**”，还怀疑“三面红旗”完全正确，甚至有“秋后算账”的嫌疑。邓小平有意回避“三面红旗”，躲开天灾和人祸的评介，却大谈民主问题，大批党内缺乏民主，蓄意影射他。在开得比较成功的“出气”会上，下级官员们在“出气”时，尽管他们避免涉及党中央，那是投鼠忌器，但具体的“气”还是“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和整社等一系列他所制定的大政方针政策上。受“气”的省、市、部级头头们，虽在压力下做了检查，但那“代人受过”的委曲和“替人背黑锅”的怨气，无论如何伪装，也逃不出毛泽东的锐利目光。

毛泽东虽在口头上也肯定了这次会议，但心里却“**憋了一肚子恶气**”。“憋了一肚子恶气”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心态，那是江青在文革中得意忘形时信口披露出来的。

“憋了一肚子恶气”的毛泽东，散会后对他的左右侍卫们说：

“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讲什么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又说：“什么‘**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马列主义**’，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完全放屁”，是毛泽东对他批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成果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七千人大会”是宣布“三面红旗”失败的大会，这对于好斗而不愿认错的毛泽东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人在权在，人们竟敢在他面前“放屁”，那么百年后呢？斯大林被赫鲁晓夫鞭尸的阴影笼罩了他，“警惕赫鲁晓夫情结”由是产生。刚过半年，他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便彻底推翻了“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和决议。几年后，他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并把“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锁定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身上。

第 02 章附注：

附 1、苏联大饥荒

由于斯大林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农庄和公社化，枪杀了 100 多万个反对集体化的“富农”，使苏联农业大幅度减产，从而引发 1932~1933 年的全国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由于俄罗斯不肯解密档案，史家众说纷纭，有饿死几百万、数千万和六千多万人之不同说法）。其中，有苏联“粮仓”美誉的乌克兰，就饿死了 700~1,000 万人（另说饿死 750 万）。对此，六十五年后的 1998 年，乌克兰总统下令把每年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设定为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八十二年后的 2015 年 4 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关于谴责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集权主义影响和清除其标志的法案”，宣布宣传共产主义为非法！

第 03 章 反击谋略之一：以阶级斗争为纲

03 章目录

一. 静观	★二.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三. “四清”

一、以退为进——静观事态的发展

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取得了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态度比较实事求是，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毛的独断独行作风也有所收敛，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对毛泽东的霸道作风，应该说是清楚的；他们对毛的“自由王国”论和毛对林彪发言的赞美，也理应意识到他们与毛在对“七千人大会”作用评估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利用大会的形势，将毛泽东免职或靠边；但在党的伦理哲学前面，他们犹豫了，错过大好时机。也许他们不完全清楚毛泽东对大会所持的否定态度，以为毛是不得不给他们以信任，放手他们在第一线工作。于是，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他们便开始积极贯彻大会精神，而对毛泽东在暗箱内策划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了警觉。

1962年2月27日，针对不顾国内存在大量饥荒的严重现实而无偿外援朝、越、阿等国与美苏争霸的错误作法，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建议：“党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在困难形势下，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即对苏联共产党、东欧国家共产党等“修正主义”的斗争，要和缓一些，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的援助，要少一点。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周、陈、邓等中央的首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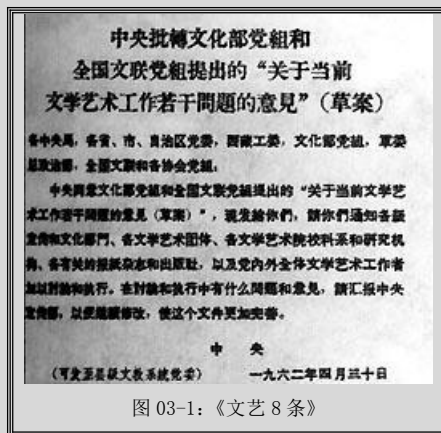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3月27日至4月16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到8月，包括笔者在内，全国甄别、平

反了 600 多万人。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 8 条》)(图 03-1)，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八条的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据林默涵回忆，《文艺 8 条》强调“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八条》的下达，使文学艺术界不少人士认为，他们翘首盼望的春天即将到来。



6 月 16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即 8 万言书)，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彭的长信，受到了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官员们的普遍同情。

7 月 9 日和 11 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主张，得到了刘、邓的积极支持，1961 年 3 月在安徽省就开始试行了。那时，在饥饿和不断增加死亡的威胁下，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有效地缓解了饥荒的发展，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由于安徽的作法曾报告过毛泽东，并得到其首肯，于是全国许多地方纷纷效法。

应当肯定，刘、周、陈、邓的这些有限作法，是对毛泽东僵硬乌托邦主义的有限人性化修正。这些修正使经济、政治关系等方面有了一些发展：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有所回升，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群众，得到了甄别和平反，与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紧张关系也有所和缓，政治环境比以前稍有宽松。他们这种人性化修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共党、政府与民众的紧张关系。

“七千人大会”后，迷恋权力的毛泽东，丧失对中共党和国家的控制权力极为恐惧。曾几何时，苏共赫鲁晓夫的出现，令他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弄不好的话，在自己身后，中共党内也有人会效仿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落得个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在他的眼里，只有工农业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换句话说，只有当他成了全国唯一雇主时，才能使他的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确保他打下的江山，千秋万世永传不衰。然而，保证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的“三面红旗”，却在“七千人大会”上遭到了“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的质疑、批判、甚至诋毁。“三面红旗”中的**大跃进**，已以失败而告终，**人民公社**已从“一大二公”撤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如果“队为基础”这块最后的根据地也守不住，他所创造和亲自督导的“三面红旗”就会全面彻底崩溃，建立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天堂”的美梦，就会化成泡影，中国的赫鲁晓夫们，就会以此为借口，把他赶下台，甚至搞得他遗臭万年。使他无法容忍的是，他钦点的接班人，竟也与“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同流合污。偏执狂使他把“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定性为“**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他在1964年12月12日提出的新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显然，他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由各级雇主代理和权贵们组成的**官僚特权阶级**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中共一党专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能看到他的党的一些掌权者“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毛在暴虐中闪现的一丝人性。然而，这仅仅是他挫败党内敌人的手段。他没有也不愿意承认，他所指责的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同他和他领导的左派“官僚主义者阶级”，都是高度国有化和集体所有化的产物，都是中共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力量基础。因此，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势必导致反对和危及中共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事实证明，毛泽东死后不久，党内右派集团迅速击败党内左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使邓小平等党内大批右派**官僚特权阶级**重新上台执政，从而挽救了行将分崩离析的中国共产党和威信扫地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已经察觉到这个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存在，正在挑战他的权威和领袖地位。他的偏执狂使他每每想起“七千人大会”，就像看见八公山一样，草木皆兵了。他在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中说，反对他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因此，他变得极端多疑、猜忌，甚至感到大权旁落，在党内日益孤立，发现人们对他已经敬而远之，出现了“**我孤独一人**”的恐惧。以“**与人斗其乐无穷**”狂躁的毛泽东，是不会认输，更不会服输。“领导中国舍我其谁”的毛泽东，自“七千人大会”

会”后，按捺住恶气，调整了一下心情，便面对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开始了巩固绝对权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新长征。

二、主动出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首先，毛泽东要观察一下刘、周、陈、邓，看看他们能走多远；让他们继续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他可以在一边静观事态的发展。经在半年多的观察，他发现，刘、周、陈、邓等人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他已无法容忍，决心重返一线，利用党主席的权力，进行干预。于是，他向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陈、邓等中央大员，挥舞起可以置他们于死地的大棒——**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他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简单而武断地归结为物资财产占有形式不同的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尽管他用财产占有形式来划分阶级，但他并不否认精神层面的矛盾和斗争，如宗教、信仰和政见分歧等等。他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对此，恩格斯呼应道：“**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这样，马、恩两人在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划了个等号。等号证明，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进而他们“证明”，一切宗教、信仰、政见、权力分配等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都是两大阶级斗争的反映。——这就是他们的丛林法则逻辑。对于政治斗争，马克思认为可以不择手段。他宣布：“**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历史记录证明，列宁是第一个“同魔鬼结盟”的实践者。普列汉诺夫曾批评他的学生列宁说：为了胜利，他“**甚至可以和魔鬼结盟。**”这样，马列主义的所谓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实际上已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大都是聪明的怪物——天才。当他们打天下时，便同土匪、痞子、流氓等魔鬼结盟，打着“解放”人民的旗号进行革命，美其名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他们夺得政权、正襟危坐于高堂之上时，他们便说“**这是人民的选择**”，美其名曰：“**人民当家做主**”；当他们宣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而对人民实行残酷迫害、屠杀时，却不忘往脸上贴金，自称是“**为革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等等。他们的天才还在于，通过“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洗脑术，用血腥的阶级斗争，洗掉恻隐、宽容、仁爱、理智的华夏文明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使芸芸众生变成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羔羊和奴隶。

没有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是**官僚特权阶级**的权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监

督制、随时罢免制和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制。遗憾的是，所有掌权的共产党人，都拒绝实行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监督制和随时罢免制，而对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制，却情有独钟。因此，当共产党人通过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夺得统治权力后，就做起官、当起老爷来，变成了剥削人民大众、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官僚特权阶级——一百多年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就是一部把“人民公仆”变成“人民老爷”的历史。

毛泽东不愧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纯正”表现在：念念不忘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棒。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权力，敢同魔鬼结盟。

在井冈山，毛泽东与土匪**王佐**、**袁文才**结盟，拜把兄弟，落草为寇，并纳袁部“女战士”贺子珍为妾；后因共产国际不容，王、袁反叛，遭处决。毛闻后，疾首顿足，发誓报仇。不久，击毙袁文才者朱昌偕，被毛打成“AB团”成员，遂遭“错”杀；二十多年后，毛又将杀王者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囚毙在监所。毛利用权力，先后翦除了朱、彭，总算告慰了土匪王、袁的魔灵！

“七千人大会”后，“憋了一肚子恶气”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要出一出心头的恶气了。此刻，“七千人大会”后不到半年，威胁他的权力的主要敌人，已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昔日与他南征北战中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倍受折磨的老百姓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此刻，他在将自己封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同时，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定性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和**牛鬼蛇神**，他们之间的权力、权利斗争，也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为了与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他在十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会议上，为阶级斗争大造舆论。在那次会议上，他大反周恩来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批判周关于“**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估判，将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子弟摆在同等地位上。他说：“还没有及时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魂不散，动摇不定。”他斥责**王稼祥**“三和一少”的建议是修正主义。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曾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就没有搞好的。”又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对不对？如果对话，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闻言后，他怒斥廖的讲话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典型言论**”。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葛曼**和甘肃第一书记**汪锋**，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起色，但毛认为葛和汪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

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毛的批判，导致文革中汪被批斗，葛自杀身亡。他还怒骂主张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其间，彭德怀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全面审查他的历史。对此，毛信口雌黄地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反动势力”。他下令中止全国的甄别平反工作。

接着，在紧握军权的林彪支持下，在1962年9月的中共十中全会上，他挥舞起阶级斗争的大棒，打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狠批他们的“单干风”（笔者：指农业包产到户）、“翻案风”（笔者：指刘、邓布置的甄别平反工作）和“黑暗风”（笔者：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形势估判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告诫全党、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规定各项工作要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此时的毛泽东，已成了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他的讲话，一锤定音，使“七千人大会”刚刚形成的有限民主的活跃气氛，迅速消失殆尽。

但他的倒行逆施还是受到了抵制。于是，他要破釜沉舟。1964年12月27日，在林彪等大员参加他的生日宴会上，他借酒发飙、发出颠覆中共的狂言：“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纯正”的阶级斗争观！

三. 明修栈道——“四清”

历史已经表明，刘少奇等人的“三自一包”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缓解了“三面红旗”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恢复了部分粮食生产的活力，至少挽救了一千万农民的生命。因此，在纠正“三面红旗”的巨大破坏问题上，刘少奇等人的功不可没。

资料表明，在北戴河会议上，刘、周、陈、邓并不同意毛的讲话。但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出于自我保护，他们都放弃了与毛争锋，而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

在建立绝对权力的道路上，毛泽东高高举起的阶级斗争大棒，首先打向官僚特权阶级中最弱的农村基层干部(图 03-2)，然后自下而上，最后棒打高层。



图 03-2：“四清”中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的批斗会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1963年5月，走火入魔的毛泽东，在杭州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他在文件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他又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甚至妄言：“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于是，以农村基层干部为批斗对象的“四清”运动，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农村搞“四清”呢？不少学者认为是为了防修反修。他们的证据之一是，毛曾说过：“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但农村干部何须“收买”？当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从一个贫穷的贫雇农变成雇主代理掌管了全村的土地、农具等全部生产资料并握有行政、人事大权时，在没有有效监督的体制下，必然会产生“地主”的占有渴望，无须收买，便会产生对账目、仓库、财物和工分的占有行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制造的“一大二公”高度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考察一下毛泽东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毛泽东说的同他心里想的、说的同做的并不一致：有时看起是目的的，实际是手段，而有时看起来是手段的，恰恰是他的真正目的。“三面红旗”的失败和大量饿死人，毛都十分清楚。但他的性格是不承认失败，否则，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英明形象就会受到质疑，他的领袖地位就会因而发生动摇。这就是他的大跃进情结，或称“三面红旗”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必须坚守住“三面红旗”的底线，并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统统算到阶级敌人破坏和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上来。显而易见，他反复高唱的防修反修的目的，实际上是保卫他个人权力的手段。这与大恶大奸没有什么二样。毛泽东这种随条件置换目的与手段的哲学，注定他是个毫无诚信的痞棍。

毛泽东拿农村基层干部开刀，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首先是转移怨恨。大跃进，使农民吃尽了苦头，埋藏在心底的只有对毛对党的怨恨。为了化解怨恨，四不清的干部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其次，警告他的宿敌地、富、反、坏、右，要他们老老实实，不得轻举妄动；第三，警告各级干部，特别是警告党内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右派集团干部，

要他们维护“三面红旗”，特别要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看一看本书“序幕”附“图注 16. 简评四清运动”，毛的一石三鸟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四清”是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四清”。对于毛泽东来说，“四清”是保卫权力的一个战略部署，对于刘少奇、邓小平来说，是自我保护和扩张权力的好机会。

对于“四清”，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邓小平肯定也有说法，遗憾的是，笔者缺少这方面资料。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邓小平也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时间仅仅过去一年，他们已“忘记”了他们曾说过的话，大讲起阶级斗争来。

毫不奇怪，刘、周、陈、邓都是大搞阶级斗争的能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镇反、暴力土改、反高饶、反胡风、肃反、反右、拔白旗、反彭德怀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中，他们都紧跟毛泽东，是毛的亲密助手，同毛一道，在中国制造了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庐山会议后，他们觉得毛越来越独断专行，觉得他们自己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怕当彭德怀第二、第三，更怕他们的党被毛一意孤行毁于一旦。因此，他们力图利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机会，逐渐架空毛泽东，使他成为一个名誉主席。但他们也知道，嗜权如命又聪明透顶的毛泽东，不会轻易陷入他们设计的圈套，于是，他们便“顺水推舟”来制造“紧跟”假象，借以麻痹对方。果然，他们在 9 月北京举行中共工作会议上，“顺”《前十条》的“水”，“推”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的“舟”。《后十条》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第一次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比《前十条》更左。《后十条》的出笼，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在刘少奇挂帅和亲自指挥下，“四清”运动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展开。全国各地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的办法。县以下由工作队统一领导，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赴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

开展“四清”运动。据报导，江苏省组织了一支8万人左右的“四清”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达5.4万人，浙江全省共抽调干部3.14万人搞“四清”，江西省则抽调干部2.92万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按后来的正统说法是“左”倾思潮的产物。由于自上而下不断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热衷夺权，使运动充满火药味，血腥局面不断涌现。例如，陕西省长安县是全国典型。那里搞“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对其中所谓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贵州，连邓小平的亲兄弟县委书记**邓蜀平**，也没躲过劫难，被迫自杀身亡。

1964~1965年，笔者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莲花一队搞过“四清”，担任工作组的材料员。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每个生产大队派工作队员30~60名不等。运动开始，首先大规模培训工作队队员。培训中，组织者把农村描绘成漆黑一团，许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已经烂掉，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夺权，原干部一律靠边，等待审查。接着访贫问苦，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通过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为重建农村政权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先“洗温水澡”，“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让他们“轻装上阵”，“共同对敌”。对重点审查人物，发动群众揭批和斗争。在莲花一队，斗争会上也发生打人、捆人，一人自杀。

与此同时，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蹲点，搞了个著名的《桃园经验》。她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血腥的对敌斗争；对待忠于中共和毛泽东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多数都成了重点揭发和批斗对象；她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她还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等等。

应该说，刘少奇的做法和他的《桃园经验》，既符合毛“**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形势评估，也符合毛关于防止基层“官僚主义者阶级”夺取政权的论断。然而，敏锐的毛泽东察觉：《桃园经验》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大相径庭，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一股对他不满的潜流正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工作，背离了他的方针，但其威望却与日俱增，已形成一山二虎之势。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刘谋图：驾空不成，以极左面孔出现，力图把水搅混。

“四清”运动在刘少奇的直接指挥下，全国有532.7万多人接受审查

和批判，在城市有 4,128 人致死，在农村有 73,432 人被打死或自杀，基层党员干部怨言很多。毛泽东趁机发泄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其为“形左实右”。

有人论证说，毛、刘的分歧在于对“四清”的矛盾性质看法不同。刘少奇认为“四清”矛盾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人还论证毛、刘分歧说，毛泽东的打击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当作敌人来打；刘少奇的打击面大，贪污百八十块钱的，占集体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较温和，整掉了毛病还是自己人。这都是表面看问题。事实上到 1964 年年底，在中共党内，“四清”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察觉，刘甚至包括周、陈、邓等人，对他的权力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他对刘主持的“四清”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竟达到了出尔反尔的地步。

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要“洗刷几百万”，刘少奇“顺”其思路，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方法去分清政权的敌我性质，此法被毛批准全国执行；但不久，毛批其为“神秘主义”，指责其为“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大兵团作战是毛的“杰作”，刘“顺”其思路，将大批干部集中到少数几个点上搞“四清”，此法被毛批准全国实施；但不久，又被毛斥责为“不相信群众”。风光一时的《桃园经验》，是毛批准向全国推广的；但不久，毛又反悔，竟批其为“大毒草”。一山岂容二虎？不论你怎样挖空心思顺水推舟，都是想占山为王，我岂能让你得逞！

1964 年 12 月 20 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刘在讨论“四清”性质问题时，发生冲突。刘少奇说：“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不屑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到了 26 日，毛泽东又当众指责刘少奇“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发泄了对《桃园经验》的不满。在扩大会上，毛对刘发泄的结果是怒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结果，实际上剥夺了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帅印。

此刻，聪明的刘少奇可能看出，毛发动“四清”的目的已不是整基层党员干部。因为，毛说要“洗刷几百万”，而他才整了几十万，怎么能说“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呢？显然，毛是在借“四清”制造阶级斗争的舆论。当紧张氛围形成以后，毛就要用阶级斗争的大棒打他了。可惜，他觉悟得晚了。

据近来披露的《林彪日记》中记载：“1964 年 12 月 27 日。好不寻常！

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笔者：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笔者：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著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今天，毛来电吩咐说：‘**今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感到毛要整人了。”

《二十三条》制定和下达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从经济走上政治，突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为此，各地纠正了刘少奇一些更左的做法，解放了很多基层干部，受到基层干部的欢迎，上下关系、干群关系和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也有所缓和。但是，《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公开指向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六年后，即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毫不忌讳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二十三条》就是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这表明，“七千人大会”后，毛、刘的第一个回合较量，以毛泽东胜利而告终。

毛泽东为什么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取代“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可能毛泽东发现，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推演下去，势必危及到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因此，使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比较准确、安全。

但是，不管毛泽东把文字游戏玩得如何眼花缭乱，无法回避的是，不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并不证明“官僚主义者阶级”不存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当垄断了全国一切资源的“三大改造”使毛泽东和中共变成全国唯一雇主后，便产生了一大批现代中国的**官僚特权阶级**。到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占有全国权力和资源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官商一体中，又大显身手，逐渐演变为官僚特权阶级与官僚垄断资本家相结合的**红色资产阶级**。如果说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富有，同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相对贫困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那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孳生的官僚特权阶级，则是这个“主要成果”的执笔者。

第04章 反击谋略之二：棒打文艺界

04 章目录

一. 两个批示	二. 批“有鬼无害论”	三. 八个样板	★四. 批《海瑞罢官》
★五. 文艺座谈会和《二月提纲》			第04章附注

一. 两个批示——先拿弱敌问罪

人们都说，文痞姚文元是根棍子，军师张春桥是把刀子，戴着“约法三章”金箍咒的毛夫人江青（1）是个白骨精。棍子和刀子人们争议不大，唯白骨精尚须推敲。因白骨精有三变，而江青以不变应万变：咬人不变。她自己说，她是毛的“一条狗”，毛“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所以她是条狗子。棍子、刀子、狗子之所以厉害，完全是因为他的后台老板厉害。他们的后台老板就是毛泽东。为了整倒刘少奇、邓小平和以他俩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毛在拿忠于他的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开刀同时，没有忘记拿他的宿敌知识分子开刀；而知识分子中，他最讨厌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不持枪拿刀，但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等自由主义思想还未改造好，时不时用影射、旁敲侧击、借古讽今等笔法，攻击他的政策、路线和他本人，是刘、邓右派中的软实力。因此，对付他们，**棍子、刀子、狗子**都要派上用场。

1962年9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制造舆论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解放”后，他对制造舆论极为重视。他接二连三地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就是制造社会主义革命舆论，或曰赤化革命舆论。为了推翻以刘、邓为代的党内外右派官僚特权阶级，他必须做好舆论准备：在大搞“四清”制造阶级斗争紧张氛围的基础上，拿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开刀，杀鸡给猴看。这是他做舆论准备的又一步阴棋。对此，有人称其为“阳谋”，是“不断革命”；但有人则管叫他为阴谋，是“层层剥笋”，先“剥”掉刘、邓右派的软实力。

此时的毛泽东，在刘、邓权势日隆的情况下，已倍感孤立。因无亲信可依，不得已，他派夫人江青打先锋。据原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回忆：“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不要用地。**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被禁止干预朝政的紧箍咒箍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江青，受命后如释重负，决心不辱使命，她要大显身手了。

江青一出山，便拿着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刘、周、邓刚刚制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开火。自称给毛当“文艺哨兵”的江青，曾“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进行调查研究。她“发现”文学艺术界“一塌糊涂”，就利用枕头风把这些情况吹给了毛，于是，按她的说法，“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但明眼一看便知，这是毛在后台、江在前台表演的“双簧”。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刘仁的一个文件上发出了第一个批示：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全国文学艺术界开始整风。此前的11月，毛泽东曾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上发出了第二个批示：

（文艺界）“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偏执狂，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1964年7月，他发出“关于取消盆花和庭院革命化的指示”：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还有点好处，晚上还要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人管理庭院。今后庭院还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

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香山要多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花鸟也在制造阶级敌人，真真一个草木皆兵！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如果说江青抛出的《“有鬼无害”论》是文化革命的第一炮(见下)，“五人领导小组”的成立，则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组织保障。虽然那时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但按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天才谋略家毛泽东，用“欲擒故纵”的策略，任命彭真为“五人领导小组”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并以组员康生为耳目。

毛的两个批示，推翻了1962年4月30日他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文艺八条》要求文学艺术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吸收外国文化和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推翻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呢？

作家涂光群在他的《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一文中说，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听了批示后，在极度的惊诧中脱口而出：“**这些话不是毛主席说的，我还真以为是右派言论呢！**”笔者认为，冯牧的惊诧，代表了文学艺术界权贵和御用文艺精英们的困惑。

长期以来，文学艺术界御用权贵和文艺精英们，在政治伦理上已经认同并紧跟了毛在政策上的出尔反尔：“**为政治服务**”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马基雅维里式(2)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和“为了统治不计道德”的君主政治信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为了加速赤化革命进程，毛泽东推翻了他的“**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民主承诺，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整肃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而在批判和整肃中，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都是毛的鼓手、棍子或抢手，是毛泽东的依靠力量。在反右中，毛推翻了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便紧紧跟上，跟着毛的指挥棒大打出手，使一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沦为右派分子。如今，毛又推翻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保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又抡起了棍子。然而，令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这次抡起的棍子，不仅要打一般文学艺术工作者，更要打他们，怎不叫他们惊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诸如**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等，大都是中共党和毛泽东的功臣。他们在他们领导下的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各个领域里，按照毛泽东的规定，制作和出版了大量歌颂党、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讴歌工农兵形象的作品。他们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打成反革命思想，**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也纷纷落井下石，最终把胡风送进监狱，判无期徒刑。可以这么说，他们为推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明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批判一切与此相左的文艺思想，立下了汗马大功。（图 04-1）



图 04-1：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大跃进失败后，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也进行了反思。反思中，他们渐渐与毛的党内左派奴性教条疏远，向刘、邓的党内右派靠近，于是，产生了《文艺八条》。

《文艺八条》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僵硬教条的缓释。

善于权谋的毛泽东并不认同《文艺八条》，他批准下发《文艺八条》只是缓兵之计；在《文艺八条》下达后不久，他已经察觉，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已经背离了他，成了刘、邓手下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因此，江青一出山，便踢开《文艺八条》，打着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旌麾，向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党内右派集团兴师问罪。

二．批《有鬼无害论》

江青出山后的第一炮，就轰向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有鬼无害论》是《北京晚报》编辑在得知廖看了昆剧《李慧娘》后电话约他写的一篇剧评（图 04-2）。1961 年 8 月 31 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名“繁星”。



图 04-2：京剧《李慧娘》剧照

1961年夏天，由江青同乡好友孟起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在北京上演。戏中描写李慧娘死后报仇并援救裴舜卿的故事：李与太学生裴舜卿的相爱为贾似道所忌，终为贾杀害。《李慧娘》揭露了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的荒淫残暴，歌颂了被贾杀死的李慧娘化成厉鬼也要与仇人拼到底的死而不已的斗争精神，是一出富有人民性的好戏，因而受到了好评。廖在《有鬼无害论》一文中写道：“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这与毛泽东对他侄孙女王海容说的“《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有什么区别？

区别有。区别的关键是：昆剧《李慧娘》是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力荐的大作，《有鬼无害论》作者则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手下的一员大将，他们都是毛泽东正在设法清除的人。矛头所向，显然是毛、江床上早已议定了的。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要批鬼戏，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他，旋即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迫使文化部党组向中共宣传部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并点了《有鬼无害论》的名。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自此，全国各地，不论城乡，“鬼戏”一律禁止演出。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不太满意，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人们已从江青“不满意”和“不解气”中，看到了她背后的身影及其清除异己的政治计谋。于是，一篇点名批判孟超剧本《李慧娘》和廖沫沙剧评《有鬼无害论》署名梁壁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便在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梁壁辉”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原来，江青没有批“有鬼无害”的文才，她便跑到上海求助于提倡“大演十三年”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此时正欲更上一层楼的柯庆施，欣然领命，便找来了由“苏中才子”之称的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据柯庆施死后的继任者陈丕显回忆：“对俞铭璜同志，我在战争年代就和他很熟悉。他长期在我任区党委书记的苏中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是江苏有名的‘秀才’。据我所知，他对批‘有鬼无害’是有顾忌的。毛主席曾提倡过写些‘不怕鬼’的故事，而《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又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写的，

所以这篇批判文章很难写。无奈，这是柯庆施直接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俞铭璜只好关起门来搜肠刮肚。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令柯庆施满意，于是柯又让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当年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唐振常，得知这篇稿子“来头不小”，便“奉命照登”。这就是数年后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的内幕。

《“有鬼无害”论》炮制出笼，预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有鬼无害”论》像颗重磅炸弹，把文化部炸得晕头转向，并使刘、邓得力干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倍感紧张。廖沫沙的文章连同剧本《李慧娘》一起受到了围剿和批判。据说，有人作过统计，在半年的时间里，在中央和省市主要报刊上，批判孟起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不下 500 篇。

在康生和江青的压力下，中宣部主管文艺界的领导周扬、林默涵等人，采用“舍车保帅”的策略，先抛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学家邵荃麟当活靶，批判他的“中间人物论”。但江青和康生不买他们的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康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对文学艺术界的全面清剿。

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桃花扇》、《阿诗玛》、《逆风千里》等，以及田汉的京剧《谢瑶环》受到了批判；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赖大嫂》，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和《对手》，刘澍德的《老牛筋》，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舒群的《在厂史以外》，菡子的《父子》，陈翔鹤的《广陵散》等短篇小说，也先后受到了批判；刘澍德的《归家》，汉水的《勇往直前》，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羽山和徐昌霖的《东风化雨》等中、长篇小说，以及黄秋耘的杂文《破水瓢的启示》和《人尽其才》，孟超的《剧苑管窥录》，等等，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其中，有的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

到了 1965 年，中国的报纸刊物，更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濯的短篇小说《代理人》和长篇小说《水滴石穿》。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的文章。此时的《李慧娘》被定性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张春桥更

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被批判为“大毒草”和“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到了文革,已攀升到四百部(3)以上。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砍掉了周扬的左右手。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又对文艺工作者作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在“便于领导”的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了的中国,“吃饭权”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已牢牢地掌握在雇主毛泽东和他的党臣手中。“吃饭权”原则也从“**不劳动不得食**”发展为“**不服从不得食**”——这个在任何社会里,他们的帝王或总统都无法办到的事,在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掠夺而垄断了全国全部资源成了唯一雇主毛泽东,他办到了!

其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七年前的毛泽东。七年前,1957年3月8日,他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说:“**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

此时的文学艺术部门,已经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文化部大改组后,一位新上任文化部主持工作的“新文化部”第一副部长**肖望东**,在起草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说,要对文化部门“**犁庭扫院**”、“**彻底清洗**”。如果这个文件起草在1957年6月,他铁定是一个极右的右派分子,然而,紧跟毛泽东的“**为政治服务**”,却使他飞黄腾达,成了革命左派。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然而,“新文化部”的命运并不比“老文化部”好。1967年1月19日,随同全国夺权的浪潮,造反派宣布夺取了“新文化部”的领导权,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3月,**戚本禹**到文化部当众宣布,由**金敬迈**(笔者: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负责文化部的工作。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新文化部”,就在这种不明不白中宣告结束,它的主人代理部长肖望东将军,也被打倒,关押北京西郊监狱达9年,故人称其为“短命部长”。

三. 八个样板

毛泽东曾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彻底清洗”了“一塌糊涂”的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各个领域后，文学艺术界变成了一张“白纸”，导演毛泽东便指导着夫人江青，在这张“白纸”上，开始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和她的“最新最美的文字”和“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八个样板”。

江青在上海休养期间，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要阿甲（符律衡）改编成京剧。这就是她要“大破大立”后“立”的第一个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一九六三年秋，她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要北京京剧一团将其改编成京剧。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剧名改成《沙家浜》。当她看上了淮剧《海港的



图 04-3：《智取威虎山》剧照

早晨》后，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组成领导班子抓改编。中共上海市委不敢怠慢，便组织作家郭炎生、何慢、杨村彬等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海港》，成了江青又一个“样板戏”。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图 04-3）、《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京剧团的节目《奇袭白虎团》。“高参”张春桥不懂京剧，为了巴结第一夫人，走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自称“我原来从不看戏，只喜欢看书写文章，只进行逻辑思维”的他，开始学习京剧，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躲在家中“速成”。张终于抓出了成效，受到江青的称赞，遂有“四出戏书记”之浑号。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江青亲自抓北京芭蕾舞剧团排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又经常到上海抓上海芭蕾舞剧团排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赞扬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又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浜》。

到文革前夕，江青树起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等，共八个所谓“样板”，时称“八个样板戏”。

体制内传记作家叶永烈，在《江青传》里写道：“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七月十三日（这天两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没有水平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作家以《红灯记》为例，列举了江青对剧组的指示：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

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这段文字有丑化之嫌。当江青变成敌人后，作家们自觉遵照“主旋律”曲谱弹跳，丑化她是很自然的。

在毛泽东的导演下，康生、柯庆施、张春桥等要员的全力促请下，江青终于如愿以偿地戴上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的“桂冠”。

1964年7月，江青以“旗手”的口吻《谈京剧革命》。

她说：“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他质问道：“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她还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是“坏戏”。

这里，江青明白无误地教训文艺界精英们，除了她的八个“样板”是为“六亿几千万”工农兵服务外，其余所有剧目，都是为“一小撮人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的，或为“一小撮人”服务的嫌

疑。江对文艺精英们的“教训”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毛泽东两个批示的再版。

到了1966年，除江记“样板”、“地道战”、“地雷战”和“兄弟国家”的几部故事片还在上演和放映外，其他电影、戏剧、话剧等剧目，全部销声匿迹。于是，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一家独放，万马嘶声的奇特局面。当年广为流传的电影顺口溜可以作证：

越南是飞机大炮，朝鲜是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是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是莫名其妙，中国只有新闻简报！

四. 批《海瑞罢官》

就在“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江青在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向刘、邓右派集团投出了第二颗重磅炸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图04-4）。署名作者是浑号叫“棍子”的姚文元。



图04-4：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据江青说，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她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

为什么“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对她的话“充耳不闻”呢？其一是，她当时仅仅是中宣部下属一个文艺处的副处长；其二，四位都知道，毛泽东对她的评价：“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任用她”；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海瑞罢官》持肯定态度。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海瑞罢官》这出戏成于北京，却是源于上海。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我们自然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

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毛主席是湖南人，爱看湖南戏。一天，他看了湘剧《生死牌》，戏中海瑞这个人物引起了他的兴趣。第二天，他专门打电话要我们为他找来《明史》，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海瑞传》。

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问题，为了纠正“高指标”等“左”倾问题，毛主席有感而发，在工作会上盛赞海瑞，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毛主席说：明朝皇帝对下臣严酷，不少大臣被廷杖致死，但还是堵塞不了言路。对嘉靖皇帝忠心耿耿的海瑞，为了大明江山，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上疏批评皇帝。海瑞对嘉靖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嘉’谐音）皆净（‘靖’谐音）”。他要大家习海瑞刚正不阿、敢于批评的品格，并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毛主席指示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毛主席的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讲话精神一传出，各地争先恐后演出海瑞戏。光上海，周信芳就上演了《海瑞上疏》、《海瑞背纤》。胡乔木约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文章，吴晗欣然同意，他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陈丕显继续写道：

1961年剧本发表并正式上演时，定名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正式演出后，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了饭，对他的演出大加赞扬（图04-5），毛主席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十分感动，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说明这出戏是成功的，吴晗也感到无比欣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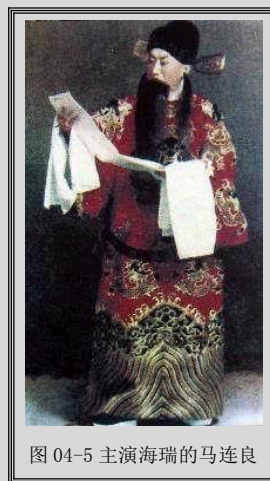


图 04-5 主演海瑞的马连良

如此说来，江青忤逆毛泽东了吗？否！恰恰相反，忤逆毛泽东的却是吴晗、周信芳、马连良等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这些尊贵令人向往的高级学者和艺术家们，竟然都是健忘的蠢人：刚刚过去四年，他们竟然忘记了1957年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引蛇出洞”的“阳谋”，忘记了毛泽东在历史上曾多表演过的“理无常是”的“一分为二”哲学。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是个政治意志坚定的人；但为了实现他的某个政治目的，又是一个不择手段出尔反尔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例如：

1945年9月，毛泽东在书面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提问的“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解说为何”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又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还是国家民主化。”但到1949年10月夺得权力后，他彻底推翻了“无记名的选举”、“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承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到1957年7月7日，他在回答罗稷南向他提的“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时，他不加思索地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经常告诫党员干部说：“要团结，不要分裂。”但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因两人发生争论，毛泽东怒骂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两年后，果真把刘打倒了。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说过：“要讲真话。”“要实事求是。”但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写道：“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但在1957年的莫斯科演讲中，毛泽东说：“（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

毛泽东在1963年3月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但到1964年12月，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人们都知道：

毛泽东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民主作风倡导者；

毛泽东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方针的提出者；

毛泽东是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政策多次抨击者；

毛泽东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即“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发明者；

毛泽东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民主政治论述者。

.....

话说得多么动听、多么感人啊！

但做的呢？远的延安“抢救”不说，翻开“建国”后的历史看看，在他当权的二十七年中，从镇反开始，到土改、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反高饶、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拔白旗、反彭、民主补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多少人被整、被斗？多少人自杀、被杀？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保守估计，被枪杀、自杀、饿死者，不下五千万！

例子太多，不胜枚举。总之，毛泽东诡谲狡诈，言而无信。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毛泽东真乃一国妖也。

当时文化部负责人林默涵写道：“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她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

“主席改变看法了”是因为毛泽东的政治任务变了：现在要倒刘整邓，就要首先清除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清除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就要先拿彭真手下的大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开刀。于是，他改变了称赞《海瑞罢官》的态度。

为了完成毛泽东交给的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江青到上海得到了柯庆施的支持。柯将任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张找来了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的“棍子”姚文元。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姚文元为“笔杆子”的三人组合，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秘密炮制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经过八个多月的十多次修改，署名姚文元（实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陡然在全国卷起一阵狂澜，开始了围歼北京市委的外围战。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阴暗内幕。她说：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这显然是非组织的阴谋活动。在“中共伦理共识”的词典里，凡毛泽东暗中搞的活动，都叫光明正大，别人这么搞就是阴谋。例如，在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仅仅看法相近，分别交换过意见，便被视作阴谋分裂活动，终被打成反党集团。

1965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改变了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表态，使批判更加火爆，吴晗和北京市委成了众矢之的。到了文革，主演海瑞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终遭迫害致死；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捕入狱后，头发被拔光，不堪凌辱而自杀殒命(图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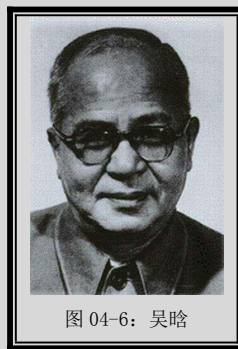


图 04-6：吴晗

五. 文艺座谈会和《二月提纲》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给已经开始了的文化大革命火上浇油，但却受到了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等党内右派集团的抵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江青又于1966年1月21日，跑到苏州去找林彪。她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江青请这“尊神”，目的在于震慑党内右派！

林彪的态度呢？他在《林彪日记》中写道：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婆娘(笔者：指江青)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笔者：萧华为此付出了代价）

但江青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要求，还是得到了林彪的首肯。

根据林彪的安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江青的座谈会，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作为随员一同前往。

2月2日上午，刘志坚等一行6人乘机飞到上海。下午5点钟，江青召集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也在座。座谈会尚未正式开场，江青就宣布约法三章：“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座谈会一开始，江青便向与会者做了自我介绍。她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文艺哨兵”。接着，她“介绍”说，她常“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作调查研究，“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她说，她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她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她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江青的“介绍”，实际上是为座谈会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晚上同与会者一起观看电影《逆风千里》。

据悉，在18天所谓座谈中，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她看电影的时候，看一部就否定一部。她指责这些电影：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宣扬和平主义；有的专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又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结局；有的则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等等。看

了几十部电影，她“没有一部满意”。这样，原本由部队几个人参加的座谈会，实际上变成了看电影和聆听江青训话的“一人论坛”。(图 04-7)

2月19日座谈会结束，刘志坚等追忆江青多次谈话内容，理出了个头绪，写成了向总政党委汇报的文件：《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认为：“**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图 04-7：江青

不料，江青看到这个《纪要》后，很不满意。她的秘书电话通知已回京的刘志坚说，《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要总政“不要传达，不要下发”。电话里还说，江青“**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参加修改。

总政派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乘机飞上海参加修改。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笔者：十七年指 1949～1966 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笔者：中共党史中结论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此处却把他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很多座谈会根本没有提及到甚至没有想到的内容，其主要是：

“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 30 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要破除对所谓 30 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 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斗争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 30 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显然，这是陈伯达把对“文艺黑线专政”的批判，上升到理论高度。

同时，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多字。

此时的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已经由江青的“一人论坛”，变成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三人论坛”。

毛泽东对《纪要》极为重视，在江、陈、张的修改过程中，他在审阅中曾先后作过三次修改。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他不但肯定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还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时，他还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

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毛泽东在这里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很快“文化大革命”就演变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到此，“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江、陈、张“三人论坛”，已经变成毛、江、陈、张“四人论坛”。

最后，未经林彪同意，毛泽东就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从而使江青的名字，名正言顺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央文件上。

这是典型的毛式政治造假：在少量真货中，掺入大量假冒产品，用以达到以假乱真兜售其奸的目的！

这是典型的毛式领导“艺术”：以诡秘取代阳光，以武断统一思想，以权力强奸民意，从而体现领袖的天才、英明、和正大！

这种政治造假和领导“艺术”，其典型示范作用之大之强，远非《纪要》本身所能比！

既然“伟大领袖”已经御批“林彪同志委托”六字，林彪无话可说，只有认可。《纪要》很快履行完批准程序，以中共中央中发(66)211号的红头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通告全国。

“偶而露峥嵘”的江青，正式甩掉“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的金箍咒，昂首阔步跨进中共中央决策高层。

也许是巧合，1966年2月3日，即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第二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议针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引起文化思想界的混乱，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成立的，是毛泽东为了加强文化思想工作的领导而提议专门成立的。因为《汇报提纲》是在二月起草的，又被称之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明确提出：

“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很明显，这些话是针对姚文元在批《海瑞罢官》时专横武断、以势压人的恶劣作法而发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引向他们认为的正常学术讨论轨道。显然，在一党专政下，《二月提纲》比《座谈会纪要》较有人性。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2月8日，刘少奇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

此时的毛泽东已派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借助军队的力量，进一步推动批判文艺黑线运动。由于《纪要》尚未出炉，便对《二月提纲》采取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态度。他只向彭、陆问了一些问题，并没表示不同意见。对此，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追述道：“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在反复无常的领袖面前，聪明一世的彭真和陆定一，竟认为毛泽东同意了。于是，彭真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将《二月提纲》批转全党。

前面说的“巧合”，是一“阴”一“阳”的“巧合”。这种“巧合”，是中共党内左右两派斗争的展现，反映了中共党内阳谋与阴谋之间的角力，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必然性。

当3月17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定稿后，3月28~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分别作了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正、副组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批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批“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批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批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批吴晗、翦伯赞（笔者：史学家）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笔者：指彭真）；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

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是时，邓、吴、廖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等等。

随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公布，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也传开来。刹间，文艺界、学术界阴云密布，恶浪滚滚，在指名道姓地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同时，全国各地也像当年抓“小彭德怀”那样，纷纷抓起本省、本市、甚至本县的“三家村黑店”、“燕山黑话”和“反动学术权威”来！

例如，黑龙江省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抓出了个“三家村黑店”：他们是哈尔滨话剧院院长刘相和，副院长李默林和王志超三人，批判他们是哈尔滨话剧院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根子，并撤了他们的职。由于嫌他们职位较低，又抓出了个市级“三家村黑店”：他们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郑依平，哈尔滨市文联主任牛乃文和文化局长章子岗，也是三个人，批判他们是哈尔滨市文化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根子，也撤了他们的职。黑龙江省一些县里，也抓出了“三家村黑店”。当年，笔者在黑龙江省密山县边境上的一个农村公社里，曾参加过一次“愤怒声讨‘三家村黑店’大会”。会后，我问当地一位颇有文化的农民知不知道《三家村》时，他说：“我没去过！”

在当时的党政领导看来，只有同时批判和打倒三个人，才能叫“三家村黑店”，才算与中央保持一致！毛泽东式批判在夺权前，已经荒谬到了可笑、可怖、可悲又可咒的地步！

1965年3月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党内右派领袖总书记邓小平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要求“赶快刹车”。但一个摇摇欲坠自身难保的总书记，谁听他的？

从1963年5月6日江青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起，到1965年11月10日姚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再到1966年3月30日毛点名批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止，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丧钟已被敲响，从文化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亦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左派集团向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夺权的舆论准备已经完成。于是，毛泽东便吹响了向党内右派集团全面夺权的进军号！

第04章附注：

附1、“约法三章”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要同江青结婚的意愿；但同时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以后又出现了“约法三章”的多个版本。但史学家们认为，在多个版本中比较可信的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版本。王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对江的“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附 2、马基雅维里主义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鼓吹君主制，他教导君主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得权力，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只要目的实现，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保证事业成功才是君主头等大事。他认为“一个君主如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的事情”。告诫君主们应具有像狮子般的勇猛和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不必重视遵守诺言，而且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那些盲目守信的。他推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总是找到了上当受骗的货色。”

由于马基雅维里鼓吹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观点，亦即手段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约束或叫做“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被后人称之为“政治恶魔”、“罪恶的导师”、“邪恶的教唆犯”、“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他的《君主论》亦被称为“邪恶的圣经”、“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和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也成了阴险狡诈、厚颜无耻的同义语。

附 3、《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此系文革工作者“彩色小吉普”根据当年“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和“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等三个造反组织于1968年1月发布的资料编纂而成）

（1）、故事片 200 部

其中有：《清宫秘史》、《武训传》、《烈火中永生》、《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铁道游击队》、《雷锋》、《狼牙山五壮士》、《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鸡毛飞上天》、《周信芳舞台艺术》、《洪湖赤卫队》、《鲁迅传》、《李双双》、《红楼梦》、《逆

风千里》等。

(2)、新闻记录片 30 部

其中有：《万象更新》、《珠穆朗玛之歌》、《安源煤矿》、《北京紫禁城》、《刘少奇访问印尼》、《春节大联欢》、《美丽的西双版纳》等。

(3)、科教片 30 部

其中有：《桂林山水》、《杂技里的秘密》、《飞向宇宙》、《泥石流》、《揭开棉蚜生活的秘密》、《菊花》、《龙门石窟》等。

(4)、美术片 20 部

其中有：《神笔》、《大闹天宫》、《孔雀公主》、《牧童与公主》、《黄金梦》等。

(5)、三十年代与香港影片 20 部

其中有：《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啼笑因缘》、《孽海花》、《渔光恋》、《野玫瑰》等。

(6)、外国翻译故事片 100 部

其中有：苏联 40 部，匈牙利 4 部，捷克 7 部，波兰 5 部，东德 5 部，保加利亚 4 部，意大利 5 部，法国 7 部，法、日合作 1 部，墨西哥 14 部，日本 2 部，印度 2 部，印尼 1 部，阿根廷 2 部，希腊 1 部。

第 05 章 反击谋略之三：丑化知识分子

05 章目录

一、憎恶知识分子言与行 ★二、“书读得越多越蠢”论 三、问鼎诺贝尔奖金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知识分子有偏见。其实，何止文化艺术界？翻开他的历史看看，可以这么说，他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着很大的偏见，甚至敌视，存在着挥之不去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

一、憎恶知识分子言与行

当提出毛泽东有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就会加以反驳。例如：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当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还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奠基者和倡导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感召和激励广大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之中，充分发挥聪明和才智，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每个重大关头，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论证说：“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两弹一星”的辉煌成果，证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从理论到实践均获得巨大成功。”

不过，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也承认：“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其中，包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对造成““左”的错误”的原因，他们往往归结为毛的错误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着意回避体制和毛个人品质上的原因。

在中共党内，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本身大都是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也存在轻视和偏见。例如，毛泽东的秘书被称为党内理论家的胡乔木也说：

“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当周恩来等人提出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时，时任中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能摘。”他们甚至还把中共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失利，都归罪到知识分子身上。

中国有句谚语叫“听其言，观其行。”人们从毛泽东五十多年革命史中，又悟出了一条经验：要搞清毛私下说的、具体做的，不可轻信毛书里写的、公开讲的。

人们在聆听毛泽东“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教诲时会发现，毛泽东做的与他说得的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来棣研究员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书中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半反革命”和“极端的反革命派”，统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但为了掩人耳目，“1951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时，却把将近原文一半的篇幅尽数删去，他所删去的是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

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世界”说。从广义上来说，包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劳动创造世界”说，没有什么错；但当马列毛主义者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割裂并对立起来时，以知识分子为主构成的白领管理层、决策层和文、教、卫阶层，都成了与工农兵劳动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或曰准剥削阶级），因而成了工农兵阶级的敌人和革命对象（或曰准敌人和革命对象）。于是，只承认体力劳动是“劳动创造世界”主体的马列毛主义劳动说，便成了改造、镇压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农兵要领导学校”和“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等系列“最高指示”，便应劫而生，“理直气壮”地风行全国一二十年。

1942年，中共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初到延安不知就里，天真地响应中共“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的号召，写了几篇《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了中共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在延安整风中，王的批评被毛发现，旋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遭批斗、逮捕。1947年7月1日凌晨，王终被砍头残杀于枯井中，造成了中共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文字狱：“王实味冤案”。然而，在平反“王实味冤案”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却把制造这起冤案的罪责扣

到执行者康生的头上，有意放过主谋毛泽东和刽子手贺龙。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除“王实味冤案”外，整风、“抢救”运动中，“**延安 80% 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毛泽东“延安抢救”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批斗，是继“打土豪，分田地”后，又一次对真、善、美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敌对势力，不能改造，就应打倒。1951年5月，他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拉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是部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办学校的故事影片。作者有意告诫主政者，富民强国当以教育为先。这对急于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来说，不啻是个“严重的挑战”。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号召“**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他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接着，他用他的权力和他惯用的无限上纲式的批判手段，把评价电影《武训传》的所谓“讨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在以枪杆子为后盾的“讨论”运动中，电影《武训传》的编导、主要演员和48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作者，都遭到了无情批判。毛泽东批《武训传》的胜利，实质上开始了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代表的西式**马列独裁文化的赤化革命**。这个赤化革命，是以批判、丑化、最后颠覆以真、善、美为代表的儒释道文化和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代表的普世文化为目的的。

批判《武训传》的硝烟未散，毛泽东又发动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10月23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方面他公开说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发出内部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要他们“**忠诚老实交清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这种外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思想改造**”而内行“**清理反革命**”两面作法，被毛泽东称为“**内外有别**”。这是中共以谎言为主旨的**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于是，全国各地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反革命为目的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脱胎换骨”中，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高压下，都纷纷批判、丑化自己，一个接一个地“脱”掉了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净“胎”**，“换”成了阿谀争宠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例如，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著名桥梁专家、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茅以升**，往自己脸上泼粪说：“我于 1920 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根据马列毛“劳动创造世界”说，给自己戴上了个“剥削者”的帽子。他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在“脱胎换骨”时咒骂自己说，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发表文章斥责自己说：“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发文质问自己：“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发文坦白：“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黄河大合唱》歌词作者、中央戏剧学院教育长**光未然**，发文则要求自己，要“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

1955 年，毛泽东一手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曾被中共认作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外进步作家”胡风，自作多情地向中共提出了洋洋 30 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阐明自己的文艺观点，希望中共能采纳他的意见。由于《报告》里有些观点如“主观战斗精神”等，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点相左，毛泽东看后勃然大怒，遂脱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伪装，罗织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用他惯用的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抨击手段，在《人民日报》上杀气腾腾地写道：“**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夫妇于 1955 年 5 月 17 日被捕，其他“胡风分子”也陆续锒铛入狱，冤案涉及作家等知识分子 2,100 多人。当年年轻幼稚的笔者，不经意说路翎(胡风集团成员)的小说《洼地下的战役》写得不错而惨遭批斗。胡风被判无期徒刑，毛死后才被彻底平反。(参看“序幕”中的图注 11：反胡风集团运动)

为了驯服知识分子，使他们俯首帖耳，彻底趴下，1957 年，毛泽东运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为了“引蛇出洞”，他设计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圈套，并在圈套上镶嵌了金色的光环。他像骗子那样，信誓旦旦地保证共产党要实行“**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4月30日，他甚至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大鸣大放”，向共产党进言。《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指出“党天下”的弊端，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图 05-1) 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构想……5月15日，毛泽东突然变脸，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



图 05-1：批斗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把“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统称为“右派”。6月8日，他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在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有 55 万在“大鸣大放”中直言敢谏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近百万人被内定为中右和异己分子，数十万有不满言论的工人、农民被打成坏分子，数万人在运动中被打死、自杀，或在劳改中死亡，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千多万人受株连。笔者时任教于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两人自杀，数十人被结论为“中右”、“阶级异己分子”，记录在档案中，“发配”到北大荒劳动。笔者为后者其中之一。

反右中，有人指责毛借整风之名来反右是阴谋，毛泽东对答说：“这是阳谋。”有人指责毛是“秦始皇”，毛泽东对答说：“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年后的 4 月 6 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有声有色地说：“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前者是否画出了一个帝王独裁者嘴脸？后者是否又画出了个无赖痞子的丑态？请读者自断。（参看“序幕”中的图 13：反右运动）

更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曾热情颂扬过的鲁迅。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得那些无法超高的赞美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然而，到了他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便不需鲁迅的硬骨和傲骨，更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需要是

俯首帖耳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著名作家、演员黄宗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写道：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如果不是三十年代曾有恩于毛泽东，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敢这么问吗？**值得庆幸的是鲁迅**，他只活了55岁。如果能活到76岁以上，他可能是大右派“章伯均”，抑或是大媚骨“郭沫若”；假如再“聪明”些抑或幸运些，也许能关住门窗，与钱钟书一起，在故纸堆里游弋！

蔑视知识分子莫过于他对外国人说的那句话了。1967年5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此时，他已经推翻了他先前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

二、“书读得越多越蠢”论及其他

毛泽东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也殃及教育界、卫生界和学术界。

毛泽东憎恶知识分子的“名言”是：“**书读得越多越蠢。**”

也许是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和五十年代的教训，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人、农民，容易蒙哄，因而“**便于领导**”，而知识分子往往有自己的想法，不愿盲目跟随，有些甚至向毛挑战，分庭抗礼，不“**便于领导**”。因此，他毫无遮掩地提出了“**书读得越多越蠢**”论，借以弹压知识分子；而这句“名言”也成了文革中驱赶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伏笔。在此期间，二战后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用比中国多十数倍（GDP比例）的教育投入，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为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从1941年到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始终同时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的胡乔木著书说，毛泽东“他确实说过：**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不用胡乔木证明，翻翻文献，就能找出许多毛泽东说过的这类话：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三点，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

厅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1964年3月28日，他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说：“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

1965年1月3日，他在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懂。”

1965年1月5日下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娃娃在那里搞四清，讲教授比助教差一点，助教比学生差一点。读书越多越蠢。”

.....

为了给“书读得越多越蠢”立论，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找出了许多“证据”。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时说：“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当日毛泽东又说：“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XXX(笔者：转引的原文如此——下同)，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

XXX 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XX 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XXX、XXX、……，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1965 年 6 月 26 日，他在关于卫生工作的谈话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

这是毛泽东“解剖麻雀”哲学：以少代多，以偏概全，以个别概括全局。

这是毛泽东偷换概念式造假：以“自学”“自修”等同于老粗，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立论。

由于憎恶知识分子情结作祟，毛对各界知名人士横加指责，对学校教学秩序横加干涉，并鼓动学生造反。

1964 年 2 月 13 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说：“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

——这同“自学”“自修”一样，等于说学校可以停办。今日中国教育落后，投资奇少，居世界倒数前列，国民整体素质低下，不能不说这与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无视教育的思想有密切关联。

1964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周信芳（笔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钱在香港。有的青年演员就作‘十年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从“赎买”到“收买”，露出了毛泽东思想“诚实”的一面。但也有不够诚实的另一面。《党史博采》第 9 期《毛泽东私人财产》一文，披露了毛的存款和开销：毛曾用他自己的存款“犒赏”过一些知己。读后，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给 1920 年曾资助过他 2 万银元的章士钊 10 万元，叫“借钱还债”；他给韩旋十年、最终促成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反蒋归顺的无党派人士程思远 10 万元，叫“犒劳功勋”；他前后给贴身“秘书”张玉凤 15 万元，叫“结情联谊”；他给“大总管”汪东兴 4 万元，叫“修膳房屋”；他先后给夫人江青 38 万元和 2 万美金，叫“亲情使然”；而他那笔相当于周信芳 49 年工资总和的百万元存款（文革中存款高达 7,582 万元），当然叫“正常收入”了。这对当时人均年收入不足 150 元的中国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笔者算了笔小帐：中国普通工农家庭，按一家四口平均年总收入

600 元计，挣汪东兴的 4 万元须 67 年，挣章士钊和程思远的 10 万须 167 年，挣张玉凤的 15 万元须 250 年，挣江青的 38 万元须 633 年，挣他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存款须 1,667 年，挣他在文革中的存款（那是个天文数字）须 12.64 万年，而挣周信芳的年工资 2.04 万元，只须 34 年。青年演员想“要赶上周信芳”，何腐之有？

1964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这是毛泽东的权力哲学：学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复辟问题，甚至是人头落地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1961 年前为校长），不知天高地厚，竟敢以“伟大领袖”的“一分为二”观点进行逆向逻辑思惟，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被发现后，遂被毛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受到了围攻和批判。1965 年 9 月，杨被罢掉中央党校一切职务，逐出校门，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差点毙命，真是“罪”有应得。其实，“一分为二”即不神奇，也不新鲜，它源于春秋时代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据此，隋代杨上善在注《黄帝内经·太素·知针石》中，首次明确用了“一分为二”这个词，说“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南宋朱熹又认为“一分为二，节节如此”。所不同的是，毛在“一分为二”中加进了“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即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并利用权力，把它打扮成唯一的绝对真理。其实，“合二而一”并不是“一分为二”的反叛，而是“一分为二”的补充和完善，也符合列宁的说教。“一分为二”突出对立面的“分”，强调其斗争性；“合二而一”突出对立面的“合”，强调其统一性。“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也可看作是事物分析与综合发展的表现形式。例如，化学中的分解与化合就是这种表现形式。在宏观宇宙中，一定区域内黑洞大爆炸是一种分裂，一定区域内收缩为黑洞则是一种组合，这是一生万物与万物归一现象的最典型的表现，也是分析与综合规律存在于自然历史中的根据。因此，作为认识事物方法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有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尽管“一分为二”在表达辩证法上不够准确。为什么这个明显的学术问题变成尖锐的政治问题呢？盖因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也。毛泽东的理论是“顶峰”，凡人不可并列，岂可超越？

1964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行了。”又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

——为了权力斗争，毛泽东竟发明了“下乡出哲学”和“阶级斗争出哲学”的荒谬理论。诚然，毛在农村搞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有丰富的

权力斗争经验，在哲学上也有些许著作，如此而已。毛死后传出，毛的那两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著作，出自于他的理论家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之手。如果这个“传说”不足为信的话，我们还可用历史观点来反诘：古今中外的大哲人、大思想家，如中国孔、孟、老、庄等，外国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康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有几人产生于农业劳动？有几个是权力中心的帝王？历史毫不夸张地证明，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绝大多数出自于学识渊博、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之中；毛的“下乡出哲学”和“阶级斗争出哲学”论，是权力哲学的演绎，是**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派生出来的谬种：既是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手段，也是动员和“收买”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工农兵的政治招数。

1964年8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下令：“文学大学生今冬明春都下去。理工科不动，动一些也可以。其他统统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都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

——这是毛泽东**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派生出来的又一个谬论。这无疑是要让学欧洲史的学生，从“马、牛、羊”身上找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特征；让学文学的学生，从鸡鸣、狗叫和豕睡中去发掘真善美；让学语言学的学生，从“稻、粱、菽”的生长中去厘清“主谓宾定状补”；让学法学的学生，从“麦、黍、稷”的结实中学会逻辑与断案，……政治手段之可笑、可鄙、可恶，可谓世界之最！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首都红代会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又说：“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作过工人、农民就学哲学，那么哲学叫作‘窄学’。学问不是学校里学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仇恨学校，仇恨教师，这话似有偏激，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例如，毛曾大骂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为了他的“教育革命”，使中学停课三年，大学关闭七年，迫使适龄青、少年辍学上山下乡当农民。他的“教育革命”的目的是抑制多元、镇压自由、革掉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于是，他利用红卫兵在“横扫”中，把数十万教师打成牛鬼蛇神，其中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64～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表侄孙女王海容（文革后期曾任外交部

副部长)做了四次谈话,鼓励学生造学校的反。他说: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要害死人。”

毛泽东棒打知识界,与把矛头指向在一线工作的刘、邓是一致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是刘、邓党内右派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了向刘、邓夺权,先要打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尊严。

三. 问鼎诺贝尔奖金

当毛泽东大力宣扬“书读得越多越蠢”,极力贬低专家、教授等知识分子时,千万不要以为他憎恶所有知识:他在贬低别人知识的同时,意在抬高自己的知识身价。培植知识上的个人崇拜,也是他棒打知识界和倒刘、整邓的重要谋略。他的言行都力图证明,他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而且自然科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为了树立他的“一分为二”哲学思想为中外绝对权威思想,他利用权力,雄心勃勃地率领中国一些科学家问鼎诺贝尔奖金。

物理学家王德奎在《中国层子模型四十年历程》中写道:“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我国1955年开始酝酿生产核武技术。这年1月15日,在毛主席亲自召开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会议上,毛主席问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钱三强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毛主席却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对此,钱三强等我国科学家还说,毛主席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受到当年中国一流科学家们“还行”的赞誉后,毛泽东在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刚刚恢复,便拨巨款邀请各国科学家来北京聚会,讨论他的“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充满信心地向世界自然科学高端进军。

1964年8月21日至31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名科学家云集中国首都，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图05-2)。开会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团长坂田昌一，当面称赞说“你的文章写得好”，使坂田一下子成为中国科学家们心目中的耀眼明星。



图 05-2：1964 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会场

坂田写了什么文章，令毛泽东称赞呢？

原来，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研读过列宁和恩格斯著作、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构成物质终极单元的“基本粒子”理念提出了挑战，构建了基本粒子不是物质微观结构最后一个层次的坂田模型。这个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毛泽东“物资无限可分”和“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受到毛的注意。1961年4月，坂田昌一又发表了《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再次极大地支持了毛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本来对自然科学陌生又缺乏热情的毛泽东，因坂田昌一文章而倍受鼓舞，突发异想，决定拨重金在北京召开国际科学讨论会，使“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享誉世界，并创造条件问鼎诺奖。

“一分为二”已经成为今日中国人的口头禅。作为方法论，研究物质内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科学性毋庸置疑。把“对立统一规律”归结为“一分为二”是借代，即不准确，也不严谨，易引歧义。例如，五彩缤纷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多元的。拿“一分为二”来说，难道不能“一分为三”、“一分为四”即“一分为多”了吗？研究人们的思想，为什么不能分成左、中、右？研究数学，为什么不可以分成正数、负数和零数？如是，核子物理学中的电子、质子和中子，电子学中的正电、负电和绝缘体，等等。这些都是“一分为二”定义不准确、不严谨所引发出来的“一分为多”的歧义。任何思想，如果把他描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就会陷入“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的困境。“一分为二”不能例外。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实际上是他把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与《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即物质无限可分思想进行无理组合。之所以叫无理组合，是因为，如果承认“物质无限可分”是真理，那么，就会产生二律悖反：与“物质无限可分”真理存在的同时，也应存在着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物质不能无限可分”的真理。这种对物质可分性理论的“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自我否定。在中国，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已经把五彩缤纷的世界庸俗化简单化了，庸俗简单到就像小孩子看电影能分清好人、坏人就算绝顶聪明那样缺乏理性的“小儿科”。

8月24日，毛泽东召见参加科学讨论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物理学家周

培源和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就坂田文章约谈。他说：

“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们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这是“立场决定论”！接着，毛泽东在科学家面前畅谈起自然科学来。

他从陨石说到阳光，说到人造卫星，说到冰川时期。他指出：“氢和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人胎有一个发展阶段就象鱼”，“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他还指出：“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在铜线沿线发出电来”。他论证说：“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他还论及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等。他的结论是：“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基本粒子也可以分。”

在毛泽东面前毕恭毕敬的科学家们，对“伟大领袖”这种科普性的说教和感觉哲学，竟谄为“科学知识渊博”，“见解精辟”，并佩服得五体投地。

尽管“伟大领袖”“科学知识渊博”，“见解精辟”，但科学讨论会并没有达到会议主人期望的目的。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都能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我们呢？”1965年，中国社会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海瑞罢官》被批判，罗总长被罢黜，文化部被改组，科学家们安敢忘记“伟大领袖”的这条伟大批评中蕴涵的“殷切期望”？

于是，在这一年，在国家财政巨额拨款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组成了由朱洪元、何祚庥等39名学者参加的合作组进行攻关。合作组不辱使命，他们很快用毛泽东“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创立了与美国科学家盖尔曼“夸克模型”相对抗的“层子模型”，向世界最高物理奖——诺贝尔奖金发起冲刺。据“层子模型”参与者回忆，当时的学术带头人认为，“最重要的事乃是确定基本粒子内部是否有结构，是否符合‘一分为二’的思想，因而把主要精力用来求强子的波函数。”（笔者：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出带头人是哪位科学家）在短短九个月里，层子学者们以“大跃进”的速度发表了四五十篇论证层子存在的论文。有些论文还指出，“‘夸克模型’有数学唯心主义错误，而层子是真实存在的亚强子粒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另据传说，“层子模型”不仅证明了层子存在，“层子

也是无限可分的”，而且也证明了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所谓“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毛泽东子。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应当说，每个“子”都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毛泽东和层子学者们，满怀信心地认为，“层子模型”比“夸克模型”更有条件、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金。

令人遗憾的是，“层子模型”在国外受到冷遇，甚至被称为伪科学，连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华裔科学家丁肇中、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人，都有意回避推荐“层子模型”问诺。“层子模型”虽在国际上冲刺诺奖失利，但在国内，却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层子模型”的积极创建者朱洪元、何祚庥等多人，都获得了巨额奖金。这有力证明了毛泽东“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伟大、光荣、正确！”

在“层子模型”耀眼光环笼罩下，中国科技大学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刘耀阳，与诺贝尔奖金擦肩而过。

物理学家刘耀阳，以坚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观点被选入39人合作组，如同持不同政见的王明被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会那样，成了合作组里的唯一异议派。据《科技日报》报导，年轻教师刘耀阳，在1964年，在研究物质“不是无限可分”上，创立了带“色”夸克模型，取得了与美国科学家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的成果，发表了他的《一个可能的基本粒子模型》论文。由于他的观点与“层子模型”相左，他的论文只能象征性地作为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内一份刊物的末尾。对此，刘耀阳教授回忆说：1966年暑期，“当年有一个重要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笔者：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人参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有的人一心要在这次会上利用层子模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被拒之门外，会议上当然也不会提到我的工作。这事充分反映出（我的）文章的遭遇。”

毛泽东死后，有人发现，1969年获诺贝尔奖金的盖尔曼，他的夸克模型有“抄袭”、“仿造”刘耀阳科研成果之嫌，因刘耀阳的科研成果比盖尔曼得奖的成果要早。但也有人认为：如果说盖尔曼“抄袭”、“仿造”了刘耀阳的科研成果，那是天大的冤枉，因为，当时的盖尔曼只知中国有一个令他不屑一顾的层子论，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个研究带“色”夸克的刘耀阳，更没有听说过刘耀阳的那篇被“摘要”发表过的论文。

总之，在毛泽东督导监制的“层子模型”向诺奖冲刺中，刘耀阳与诺贝尔奖金擦肩而过的可能性很大。这或许是刘教授的终生遗憾，因而也或许是中国永远的遗憾！

这是谁人之过？

笔者只好借用“层子模型”的得奖人、当代中国大出风头的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北大教授何祚庥(图05-3)的“旷世名言”来回答：

“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第 06 章 反击谋略之四：大搞造神运动

06 章目录

一. 学雷锋运动	二. 工业学大庆运动	★三. 农业学大寨运动
四. 全国学解放军运动	★五. 学《毛主席语录》运动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声望与日俱增，大有架空毛泽东或取而代之之势。迷恋权力的毛泽东，对大权旁落极为敏感，3,000~4,500 万的饿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鞭尸的阴影，还紧紧困扰着他，又使他处于极度恐惧和痛苦之中。

对此，他发过牢骚。在 1964 年 11 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范围的会议上发火说：“还是少奇挂帅，……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为此，他还骂过娘。在 1964 年 12 月 26 日他 71 岁生日那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他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果然在宴会上，他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让与会者个个如坐针毡。1964 年末，他又当着其它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对于毛“骂娘”，林彪在日记这样记载：“毛喝了一瓶白沙液，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毛泽东不愧是天才的权谋家，牢骚、骂娘不过是巧妙示弱，是麻痹对手的手段；为了把权力从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手中夺回来，他必须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使他本能地意识到，利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去培植对他的个人崇拜（或称个人迷信），是树立绝对权力的最佳途径。为了自我塑造绝对权威“人皇大帝”形象，在“骂娘”前，他一口气捏出了五个大金刚，亦即**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和学《毛主席语录》**。五大金刚的出现，凸现他做为绝对权威“人皇大帝”的伟大、光荣、正确。由此，他开始了颠覆“民为贵，君为轻”和“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的革命进程。1970 年 12 月 18 日，他对美国记者斯诺承认，五大金刚是造神，目的是夺权。他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

搞点个人崇拜……”

一. 学雷锋运动

“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于是，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起和推动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

对于雷锋，中国人大都不陌生。他小学毕业后便参加工作。工作期间，曾1次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1959年12月被破例批准入伍。雷锋入伍后，被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在部队的32个月里，他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被评为节约标兵，荣获“模范共青团员”，出席了沈阳部队共青团代表会议。1962年8月15日，他因事故不幸殉职。

在部队里，由于他表现突出，沈阳军区《前线报》开辟了“向雷锋学习”的专栏。据报导，1960年，他曾给辽阳灾区捐款100元救灾，给驻地附近的和平人民公社捐款100元……1960年6月×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公外出，我在沈阳车站，看见了一个老太太，在汽车旁焦急地徘徊着，像是有什么困难。我上前询问，一看证明，原来这位老太太是从山东来部队找她儿子，路费用光了。我了解清楚后，立即请她老人家吃了饭，并给她买好到她儿子驻地的车票。本月8日，这位老太太的儿子，给我们部队首长写来了一封感谢信。”又据“雷锋帮老大娘找儿子”照片的拍摄者，在40年后所写的《我给雷锋拍照片的故事》一文中回忆：

“1961年2月初的一天，我陪同雷锋到丹东工程兵某部作忆苦报告，回来在沈阳换车时，见一位老大娘拿着许多东西，走路很吃力，便跑上去帮助拿，扶她上了火车，找到座位。老人担心找不到在抚顺的儿子家，雷锋一听是同路，便安慰说：‘您放心，到抚顺后我帮您去找。’到了部队驻地瓢儿屯站，我们没下车，而是去了抚顺南站，把背包寄存之后，陪老大娘去找儿子。老大娘初来抚顺，不知儿子在哪儿。我们只好按照信上的地址，四处询问，终于在近郊找到了大娘的儿子家。当孙女跑出来拉住奶奶的衣服时，我抓拍了这个镜头。”（图06-1）



那个年代的人们，还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报导：“**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等等。

雷锋走到那里，便把好事做到那里，而且做好事不留名。他是模范，是标兵，是先进工作者，因而被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称为“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说他“**有着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和情操；他的价值，在于他把自己火热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这一切，在那个年代，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共识！

随着那个年代逐渐远去、陌生，人们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雷锋精神”，已经发生了分歧：有人说“雷锋精神”永存；有人则认为雷锋是“人造英雄”；还有人甚至大胆地预言：如果雷锋活着，一定是“四人帮”的重要成员；但也有人认为，雷锋是个爱拍照、有丰富生活情趣、一度被神化从而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的平常人。笔者倾向于后者。

近几年来，有不少雷锋朋友或与雷锋共过事的人，在回忆中较详细地介绍了雷锋的个人生活。介绍使人们了解到，雷锋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丰富生活情调的普通人：他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写诗歌、散文和小说，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喜爱照像，短短的一生照了六七百张像；在他遗物中，不仅有他缝补过三层的袜子，也有很时髦的毛衣、皮夹克和手表（笔者在五十年代末，才攒够 120 元，买了一块半钢手表）；他同包括笔者在内的普通青年人一样，都有远大理想；在那个特殊时代，他把学习毛著、助人为乐作为追求理想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才是生活中的真实雷锋。笔者这么说，丝毫没有贬损雷锋的意思。

贬损雷锋的却大有人在，就是那些为政治而神化雷锋的人。例如：有人不顾雷锋每月仅 6 元收入和有限的支付能力，宣扬他两次捐款 200 元和多次送路费的“先进事迹”，有损雷锋精神的真实性；那张“雷锋帮老大娘找儿子”照片拍摄者的回忆，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回忆，当时拍摄的那张照片，应属表演，即雷锋与拍摄者合作导拍，使人质疑雷锋动机的纯洁性；雷锋做好事照片和日记的存在，又是对“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讽刺，等等。之所以有人认为雷锋是“人造英雄”，就是由这种神化而异化为贬损的结果。

雷锋最大的贬损者是毛泽东。为了政治需要，他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大力支持新的**毛泽东式政治造假**：在平凡而真实的雷锋身上，注入了许多编导事迹，并对平凡事例进行政治神化性包装。以假乱真后的雷锋，便被捆绑在他个人崇拜的政治战车上！

毛泽东看上雷锋，并不仅仅是因为雷是模范、标兵、助人为乐、“做好

事不留名”，因为，在中国，像雷锋这样做好事的人很多。为了博爱和赎罪，基督徒们一心做好事，不计个人得失；为了聚积功德，佛教徒们长年行善，终生以此为乐；伊斯兰教徒信先知，行课功，施舍资财给穷人，义无反顾。可是，毛泽东不喜欢他们，讨厌他们，甚至还要罗织罪名去惩罚他们。毛泽东之所以能看上雷锋，主要是雷锋向毛、向党表忠心的那些话，正中他搞个人崇拜的政治下怀。雷锋在日记里写道：

“我要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清除思想上的毛病，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懂得了不少道理，心里感到特别亮堂，工作越干越有劲，只觉得有股劲永远也使不完。”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聪明敏锐、洞悉君意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部长林彪，就在毛泽东迫切需要这份政治资源时，他大笔一挥，向毛泽东敬献了一幅极为关键的厚礼——学雷锋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命令全军学习雷锋，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崇拜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所以，有人一针见血地说，“雷锋是毛泽东与林彪绝妙合作的政治产品。”

出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政治需要，那个时代学雷锋青、少年比较积极，特别是中、小学生。他们的思想比较纯真，在舆论一律的社会里，在反复洗脑中，他们会被洗脑工具报纸、广播牵着鼻子走：1966年疯狂的“横扫”和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运动，就是这种反复洗脑的结果。相比之下，成年人上当受骗较少；上了年纪的对学雷锋还有反感，他们中不少人认为，在教信佛，行善积德，远比学雷锋作好事纯洁、真诚得多。

今天，当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时不时还在为毛、林合作的政治产品——雷锋传扬鼓噪的时候，伊拉克战争传奇人物、美国女兵杰西卡·林奇的新传记《我也是一名士兵》出版了。这位在伊拉克战争中遭到伊军伏击身负重伤被俘的美军女兵，九天后被美特种部队从伊军医院中成功救出。这宗戏剧性事件哄动了美国，19岁的女兵林奇，被美国传媒描绘成身负重伤弹尽援绝后被俘的英雄，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但她没有把自己看成英雄。她在她的传记中这么说：

“我不想将不属于我的荣耀揽到自己的身上。事实上我没有开枪，一枪也没有，我没有杀死任何人。我只记得自己摔倒在地，那是我最后记起的事。”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英雄，或者做出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不会试图利用这种优势。”

“我眼中的英雄是我的朋友洛丽·皮斯特瓦（笔者：同遭伏击阵亡的黑人女兵）和其他身亡的战友。”

这位不苟名利、实话实说的美国女兵杰西卡·林奇，同“做好事不留名”而留名的雷锋，其对比之鲜明，令人深思！

在利用雷锋搞个人崇拜的同时，1963年毛泽东又多次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进一步强化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二．工业学大庆运动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告》中，介绍了石油工业部开发大庆油田的情况：从1960年5月开始，国家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它的一些经验在各部门和党、政、军、群众团体中也都适用。”

从中共中央发出的通告中人们可以看出，作为个人崇拜政治谋略的一部分，毛泽东要用“两论起家”的大庆油田大会战的“成功”，为失败了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翻案，从而证明他的伟大、光荣、正确。

笔者根据“纪念建党80周年专题网站”所发表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一组文章，从中摘录了一些当年的报导：

1960年5月，在余秋里、康世恩（笔者：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副部长）等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在松辽平原上的大庆地区，组织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图06-2）



图 06-2：会战指挥部召开油田技术座谈会

当时的艰苦状况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几万人包括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大学教授、博士，在一无房屋，二无床铺，甚至连锅灶等生活用具也很不够的情况下，参加了石油会战。人们在茫茫大草原上，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在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有的人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夜晚干脆往野外一躺，几十个人扯一张篷布盖在身上。雨季，在帐篷、活动板房或牛棚马厩里，外面天下，里面小下，外面雨住了，里面还在滴答。夜里，有些人索性挤成一堆，合顶一块雨布，坐着挨过一宿。

大庆位于高寒地区，人烟稀少。10月初，往往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多度。到了冬天，没有房子，露营呆不下去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搞勘探、搞建设、搞生产的同时，发动群众挤时间，自己动手修土房子。大家不分地位高低、职务大小，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挖土打夯，没有工具的用脚踩，建成3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土房子。有些来不急“干打垒”的，就挤在自己挖的地窝子里，度过了严寒的冬天。

会战职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时每人每月口粮定量只15公斤，已远远不够，而且还一降再降，最低时每天只能“五两保三餐”。蔬菜供应不上，就打草籽、挖野菜。后来又发动职工、家属集体开荒种地、养猪等，去解决生活困难。

不但生活方面艰苦，生产方面同样困难重重。几十台大钻机在草原上一下子摆开，设备不齐全、不配套，汽车、吊车数量不足，没有公路，道路泥泞，供水供电设备缺乏，工作条件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大庆人团结一致，鼓足干劲，知难而上，苦干硬干，千方百计打上去、啃下来。他们采用人拉肩扛加滚杠的办法，把几万吨的设备器材从火车上卸下来，连五六十吨重的大钻机也是用这种方法，拖到几公里之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钻机安装好以后，水供不上来，大家就排成长队，用水桶、脸盆从几百米以外的水池打水传递过来，一打就是几十吨，保证了钻井需要。

面对重重困难，会战指挥部以石油部机关党委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以“两论”为武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职工学习，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大会战的全部工作”，形成了“三老四严”作风，即“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就是名扬全国的“两论起家”。在“两论”指导下，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会战职工说：“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喊出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和“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

在2月5日的《通知》中说，到1963年，大庆油田油产量达到600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

从摘录的当年报导来看，“文章”记录的“艰苦状况”基本属实，“大会战”是毛泽东蔑视生命号召老百姓为他的社会主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亦即“革命加拼命”的实践，与笔者当年在北大荒开荒队、伐木队劳动中的生活雷同。

大庆石油会战，实际上是1958年毛式大跃进的翻版。“大会战”与“大跃进”异曲同工：

“大跃进”是“大兵团作战”，如大炼钢铁，全国动员九千万人上阵，历时数月；“大会战”也是“大兵团作战”，在大庆这块5,479平方公里的地方，集中四万多人马，会战了三年。

——邓小平在视察大庆后说：“这哪里像搞工业的样子？什么大会战？是大混战！”

“大跃进”时“钢铁元帅升帐”，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大会战”中调集了7万多吨器材设备，偌大的“一笔糊涂账”。

——当年曾在石油部底层工作多年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1992年在新疆油田批评石油部官员说：“石油系统在经济上向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大跃进”中《人民日报》说：“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大会战”中英雄们放出话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八十年代，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报刊上批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是唯心主义口号，遭到围攻。

“大跃进”人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大会战”人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笔者经历了那个时代：那是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但却是个盛产“浪漫诗人”的时代！

“大跃进”好汉唱道：“老汉今年七十九，钢打的膀子铁打的手。”“大会战”的英雄王进喜喊道：“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笔者在黑龙江密山县农村，遇到了一个曾参加“大庆石油会战”返家的年轻“逃兵”，他说：“那里太苦，我想家。”但“铁人”王进喜——

“大庆人的杰出代表”，积劳成疾，终于 1970 年 11 月 15 日，因病不治而逝，年仅 47 岁。

对此，毛泽东说：“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毛泽东说的“革命加拼命”，就是批判、斗争、镇压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干劲，这些都来源于他那劳民伤财、漠视生命和人权的“大兵团作战情结”。

毛泽东的“大兵团作战情结”由来已久。毛泽东的哲学认为，“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矛盾迎刃而解。”“大兵团作战”原则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和不惜一切代价，“不要怕砸烂罐罐罐”。胜利了，即“主要矛盾解决了”，失掉的物资可以重新得到，死去的人可以用生育补充，亦即“其他矛盾迎刃而解”。内战中，他在辽沈、平津、淮海地区组织了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每次战役都是集中数倍于敌的数十万兵力进行“大兵团作战”，还“组织动员”了数十万民众，用肩扛、手推、车拉运送军需，支援“大兵团作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代价究竟有多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如法炮制。从第一到第五次战役，每次战役都集中数倍于敌人的上百万兵力和数十万搬运军需的中国民工，进行“群羊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到 38 线以南纵深地区。只是第三次战役后，美军增加了兵力，改变了战术，“群羊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因而受阻，从而使我军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蒙受重大损失，在 38 线以南地区留下了十多万具遗骸，被美军司令官李奇微称为“屠夫行动”。不过，据当年国内报刊报导，同第四次战役一样，第五次战役我军也取得了巨大胜利：为了大量杀伤敌军，我军“大踏步后退”，“胜利转移”到 38 线以北，在坚固的防线上与敌战斗，“为最终战胜敌人打下了基础”。战争中的大量伤亡，在从不怜惜生命的毛泽东看来，“无非是死几个人”而已，属次要矛盾：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伤残者可赞为“光荣负伤”，对遗骨他乡者，可誉为“死得其所”，“死得重如泰山”。（图 06-3）



图 06-3：大兵团作战“死得重如泰山”！

军事上的胜利，使毛泽东对“大兵团作战”情有独钟。他把“大兵团作战”原则运用到国内政治建设上来，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在镇反、肃反、反右、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等政治和体制建设上，每次都搞“大兵团作战”运动，每次都派出上百万人的工作队，对运动实行统一领导、组织、动员和“说服教育”，每次都派大量笔杆子和枪杆子，对反对者进行批判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毛泽东大脑膨胀起来，他决定把“大兵团作战”

引入经济建设上来，于是产生了九千万人上阵的大炼钢铁运动。出乎他意料的是，九千万人上阵的“大兵团作战”，在科技和经济规律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终以惨败而告结，他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也因而受到了严重质疑和挑战。但他并不认输，他说：“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笔者：实际 200 亿以上)，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了学费。”他知道，他这么说很下流，属痞语，虽没人敢说不，但也不敢见诸于报纸。为了挽回面子，他又决定在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大庆地区，组织了一次不计成本的大会战，并取得了“成功”。

尽管毛泽东说“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甚至说：“石油工人们一起奋斗出来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这些文字显然是为失败了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翻案，但字行间还是流露出他的底气不足，也不理直气壮。事实上，在大庆会战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没有那一个企业真正学习过大庆，而毛泽东再也没有组织过一次像大庆会战那样大规模的劳民伤财的“大兵团作战”。

1963 年 12 月 3 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大庆油田的发现，中国人民 100 多年来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他在 1964 年 12 月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到大庆，充分肯定了大庆经验。他说：“这个油田的建设，是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请注意：周恩来在二届四次会议上宣布的是“油田的发现”，在三届一次会议上肯定的是“油田的建设”，但在两次代表大会上，只见油田建设者的功臣，却不见油田发现者的踪影。在两次代表大会上，万众瞩目的功臣大庆 1205 钻井队队长王进喜，不仅是油田建设中的功臣，在中国老百姓眼里，他还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我们无权责怪中国老百姓。在“舆论一律”的环境里，大庆油田被发现时，王进喜还在几千公里外的玉门；大庆出油半年后的 1960 年 3 月 19 日，他才从玉门出发，来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官方不让你知道，你老百姓那能知晓？笔者这么说，丝毫没有贬损“铁人”王进喜和油田建设者的意思；“铁人”们的功劳不应抹煞；笔者仅仅想正名历史而已。

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会不知道，如果没有人发现油田，甭说“两论起家”，就是用毛的二十论起家、两百论起家，石油工人们也奋斗不出一个大庆油田来。然而，大庆油田发现过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字典里却完全消失。不仅如此，据海洋石油专家郭永峰说，他“拜访过原地质部系统那些发现

油田的技术人员，他们晚年凄惨，他们经历不能上报纸、电视，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话。据这些老人估计，‘文革’中至少有数十人因谈了真实经历而致死、致残。”这正是毛泽东“过人”之处：为了让全国人都知道，大庆油田是石油工人们用他的“两论起家”奋斗出来的，任何了解真相和正直的科技人员都必须闭嘴，否则必遭镇压。这是毛泽东**憎恶知识分子情结**孳生出来的专政措施。

毛泽东说大庆油田是“**石油工人们一起奋斗出来**”的，是典型的毛式撒谎：**以假混真，真中售假**。

但历史不会为独裁服务，也不可能为专制独裁者长期霸占。2001年10月27日，《家庭》突破新闻封锁，发表了蒋振华的《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文章。文章在介绍黄汲清和他的家庭时说，日本人在东北松辽平原上找石油，找了整整30年没有找到。蒋写道：

小日本为什么没有找着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在大庆油田被发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地质学家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可能生油。但咱们中国搞地质的人不信那一套，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提出陆相生油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果然没用多少年就找到了大庆油田！

蒋文提到的四十年代提出**陆相生油理论**的是谁？他就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地质学学部委员、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著名地质学家、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博士（图0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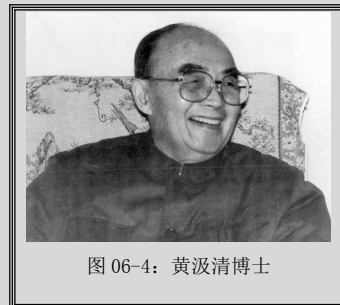


图 06-4：黄汲清博士

根据陆相沉积可以生成石油的理论和对中国地质构造的深入研究，黄汲清博士和另一位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共同建议，先在准噶尔、柴达木、四川、松辽、华北等大型陆相沉积盆地进行石油普查。蒋文介绍了发现大庆油田过程：

1955年6月11日，普查委员会下达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

1955年8月，地质部东北地质局派出的5人小分队，在松辽踏勘中，采集到的泥页岩中有荧光反应和浓重的油味；

1958年4月17日，在吉林前郭尔罗斯旗达里巴屯施工中，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号钻机打出油砂；

1959年4月11日，在松嫩平原上的小镇大同附近，“松基三井”正式开钻，到9月26日，黑色原油如巨龙从千米地下喷涌而出，直冲蓝天……

自此，一个中国第一大油田、世界第五大油田的大庆油田，便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

毛泽东死后，比较重视科学技术的党内右派掌权，在 1982 年 10 月，国家科委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授予黄汲清主持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项目一等奖，承认了黄汲清对发现大庆油田的巨大贡献。1995 年，由香港富商斥巨资设立的“何梁何利奖”，以百万元重奖，奖给当代中国杰出科学家、为中国石油工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博士。然而，在今日中国，“革命加拼命”的莽撞的“铁人”精神，依然盖过黄汲清的勤奋和杰出。

三．农业学大寨运动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农村，曾悄悄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

1958 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公社问题，即“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 月 1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演时，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的总体方案。到 8 月初，毛泽东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七十四万多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先后合并成两万六千多个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到 10 月底，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

1958 年 8 月 29 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在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 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 3 年，再搞 12 年，15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说，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公社是 1958 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 1958 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毛泽东断言：“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11 月 21 日，在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得意忘形地说：“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 41 年，再搞 12 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我们要逼他先过

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然而，苏联没被他逼上“过渡”路，中国却在他的率领下去“过渡”，结果，3,000~4,500万农民在“过渡”中变成饿殍，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也被迫“渡”回到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给历史留下了可悲、可耻又可咒的一页。

为了活命，在党内右派“修正”力量的支持下，农民们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等初级市场模式，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相对抗，结果遭到了毛泽东的无理批判和残酷镇压。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时代，亿万农民在贫病交迫中，煎熬了一年又一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忍无可忍，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勇敢行动，得到了全国农民的热烈响应，也受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支持。很快，中国农民们，把罪恶的、横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农业合作社送了终。

在中国横行的20多年里，人民公社产下了一个怪胎——大寨。

“寨”，往往使人联想到“兵”，事实也确如此。所谓大寨，原是屯兵的营寨，住的是“平定”周围的官兵及眷属。然而，大寨这个怪胎，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命令下，却在中国红红火火地辉煌了十五六个年头，**使六亿多农民吃尽了苦头**。

请看，当年的大寨何等辉煌！

自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学大寨精神**”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起，到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止，到大寨参观学习的人数高达700多万人次。在国外，世界134个国家的25,470多名外宾，也到大寨参观。在国内，除毛泽东外，从国务院总理到省、市、地、县直到公社生产队长各级干部，大多数都来大寨“学习”过。来大寨考察、“学习”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教授等学者络绎不绝，文学家、诗人、记者连篇累牍地发文、咏诗、题辞，赞颂之词充斥全国大小报章，歌唱家们吼声高放，把“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唱遍全国大街小巷和穷乡僻壤……期间，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从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一路飚升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跃升为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成了中外千古难得一见的农民宰相。

大寨，一个六七十户农家、不足300口人的小山村，何以能如此辉煌？

要解读大寨，就要读懂他的领头人陈永贵，因为，陈永贵是解读大寨历史的钥匙。九十年代，史学家吴思写了一部书，书名是“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吴思的书名准确地道出了大寨辉煌的原因：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

毛泽东看上陈永贵决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个人崇拜政治谋略之一。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为捍卫“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的人民公社正确性，狠批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单干风”。尽管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对抗他，但他十分清楚，反对人民公社的，无论党内党外都大有人在。因此，在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单干风”的同时，他必须树立典型人物来“说服教育”反对者。这个典型终于找到了，就是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

陈永贵虽是个文盲，却是个能吃苦耐劳又聪明狡黠而长于计谋的农民。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什么呢？（图06-5）



图 06-5：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感谢共产党是真心的，不计较他曾经是“陈二鬼子”。

191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六岁那年，由于生活所迫，父亲陈志如先后卖掉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后，带着他来到大寨。一年后，父亲不堪生活的窘迫，活不下去了，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一根绳子吊死在祖坟前的老松树上。饥饿夺走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饥饿又夺走了他的父亲，使他成为孤儿。他在贾氏宗族孟老人和她的儿媳妇稳周老人的收养下，长大成人，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棒小伙子。二十七岁结了婚，生了长子陈明珠。

乱世出英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据昔阳县县志记载，在扫荡和反扫荡中，有四五百人被日军刺死、烧死、活埋和机枪射杀，遇害事件比比皆是。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的大寨当权人，就想请一个人出来维持维持。他们看中了长工出身的陈永贵，看中了他胆大心细、能言善辩，又能随机应变。于是，陈永贵当上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伪村长、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的情报员，常出入于日本

人的炮楼和村落之间，时称“陈二鬼子”。其时，他也给大寨人办了一些好事。

日本投降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枪杀或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他被拘留起来，五花大绑在村里挨斗、挨了不少拳头。他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就向他的好友共产党第一任大寨村村长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和有些村民，替陈永贵说了不少好话。他们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吧？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又没作什么坏事。话说得很有道理，被共产党采纳。共产党的谅解不仅使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在被史称“中共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的土改运动中，还分给他一处窑洞、十几亩地和几件家具。为感激共产党不杀之恩，感谢共产党分田之德，一句话便挂到他的嘴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陈永贵！”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共产党，把大寨的农民一步一步硬拉进了人民公社。

1946年，陈永贵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号召，参加了共产党员贾进才组织的好汉互助组。不久他发现，村子里还有一些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没有组织起来，其中有的是曾养育过他的，有的是在反奸中替他说过好话的。陈永贵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离开了“好汉组”，成立了一个“老少组”，把困难户都吸收到他的组里来。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和不怕吃亏的报恩心，当年秋季单产就超过了“好汉组”。到1949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1948年，经贾进才等人介绍，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陈永贵被评为山西省农业劳模，成了昔阳县内颇有名气的人物。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

1952年，由贾进才推荐，陈永贵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大寨用**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成立了“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代领农民们开始走他们不愿走的路。这一年统购任务四万二，他咬牙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扬。

1955 年，毛泽东说：“1955 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2 月，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自任社长。同全国各地一样，用“说服教育”、行政命令加批判“小农经济思想”亦即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将农民们的农具、牲畜“作价”收为高级农业社所有，从此，农民们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

1958 年是“辉煌”的一年。那年，为响应毛主席“超英赶美”的“伟大号召”，各地丰产“卫星”纷纷上天，重磅“卫星”亩产竟高达十三多万斤。一流大科学家钱学森，也著文凑热闹说，根据他的“科学”计算，亩产可达五、六万斤。紧跟形势的陈永贵已按捺不住。据《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陈永贵伙同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在后底沟培养了 3 亩玉米丰产田，亩产达到 14,436 斤；在神土角，干圪梁上种植了二亩谷子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 14,124 斤，超过 1956 年最高年产量 230 斤的 60 多倍；他们培育的 1.2 亩高粱，共产高粱 7,650 斤，平均亩产 6,375 斤。笔者认为，陈永贵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放十多万斤的大“卫星”，只放了五万斤以下三颗中不溜“卫星”，符合钱学森“科学”。据报导，他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搞丰产，干部带头跑在前，队队保证放卫星，争取秋天上北京。

1958 年毛泽东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8 月，陈永贵又从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就对社员“耐心说服教育”说：“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事情既然迟早总得办，倒不如把挨批评变成受表扬。”社员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没有阻挠他。24 日，他倡议创办的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被史称为“中共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在“第二次掠夺”中，陈永贵提刀纵马，成了先锋官之一。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还多次警告：“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陈永贵响应号召，牢记警告，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还一度实行过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大寨办的公共食堂，尽管一年多才吃了 19 顿细粮，日常仍以窝头稀饭为主，但陈永贵还是高度赞美了他的公共食堂：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一年多后，大寨的公共食堂同全国各地一样，也在一片愤怒地反抗声中垮了台。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的“大批促大干”，符合他的“革命加拼命”思想。

1953年，初级社刚成立，陈永贵就制订了治山治水十年规划。当年**首战白驼沟**，一个月中，他们投工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据说，首战当年大功告成，陈永贵豪气冲天地将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1955年冬，陈永贵开始了劳民伤财、破坏环境的**三战狼窝掌沟**。狼窝掌沟长约三里，宽约四丈，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石头。一战狼窝掌沟时，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1956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38条石坝连同20多亩庄稼一扫而光。当年再战，1957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精光。他没有灰心，当年排除异议，进行三战：70多个劳力苦干了27天，搬运数万土石方，用石灰30吨，筑大坝32条。据说，“终于驯服了狼窝掌沟。”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救济物资和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为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号召，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据说，农民们眼巴巴地望着到手的救济粮和物资又被拉走了，敢怒不敢言。

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革命加拼命”，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说，1963年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据说“比原来的更好，创造了一个奇迹。”据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1980年11月，这些战天斗地的先进事迹，很多都变成了真假搀合的谎言。

毛泽东最看重陈永贵轻视生命、漠视人权、压制自由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路线觉悟和管理才干。

1957年，在帮助党“整风”的一个不平凡的夏季里，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装起下台架式。一次大会，群众问永贵怎么没来呀，县派驻队干部郝兑元依陈永贵之计说：“他还能参加会呀？”暗示陈已下台。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是计，七嘴八舌地出起气来。

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带头指责陈永贵向国家卖粮太多，农民吃亏太多，指责办高级社“一切财务都归公，甚也得听他陈永贵的！”接着，胆大的农民们便骂将起来：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

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馍馍哩！

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甚也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

干活没轻没重、没黑没白，还不如去当长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

不久，毛泽东说“**事情正在起变化**”，风向变了，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据报导，“支部及时组织社员，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升。”陈永贵学着毛泽东，对他的农民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1958年大跃进期间，有位社员对办食堂不满，说了句怪话，激怒了陈永贵。他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这种**无限上纲的毛式批判**，吓得那个社员再也不敢“乱”说了。

1963年秋，面对大灾，陈永贵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还有个口号叫“白天治坡，晚上治窝”。那时大寨人根据毛主席“**革命加拼命**”的思想，干起活来就得不要命：人们白天干在地里，晚上干在村里，早晨披星星，晚上戴月亮；对这种超时超强度的劳动，大家都咬牙坚持着，没有谁敢说一句“草包”话。超时超强度的劳动使社员赵小和赶着车困得睡着了，颠簸的大车把他从车上摔了下来，轧死在自己马车的车轮下。村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陈永贵说，赵小和是为保护集体财产不幸牺牲的，是个好社员，“死得重如泰山！”

1966年，以郭风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提出了嫁出大寨的要求，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大寨，大寨的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证明“**大寨有新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爱情必须服从政治，没有恋爱自由可言。他决定首先解决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风莲。于是，大队支委会共同来讨论郭风莲的婚姻问题，“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年仅19岁的郭风莲泪下如雨，拒绝党支部干涉她的个人生活。陈永贵抛出杀手锏：“**如不答应，开除党籍**。”少女终于屈服。其余的少女们也只好斩断前情，被迫发誓“死了也不

出大寨”。一场爱情的政治危机，就这样以陈永贵的全胜而告终。

此外，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是个全国惟一什么经验都能出的地方。除“三战狼窝掌”外，诸如什么“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大批了还要大批”，“割资本主义尾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等等，都是大寨总结出来的推向全国的“**革命加拼命**”经验。可以说，陈永贵为树立毛泽东在农民中的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大功。

对毛泽东树立的陈永贵和大寨这个典型，各级干部谁敢怠慢？为了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表忠，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奉周总理之命，派出一支400余人的队伍，帮助大寨修建了一个蓄水池，命名为“友谊水池”；听说大寨要搞“人造小平原”，有关单位马上派出了推土机；握有实权的一些领导干部，来参观学习时，还带来了化肥、良种、机械等生产物资，做为赠品、试用品，赠予或廉价售于大寨；农忙时，一些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自愿”来大寨帮忙播种、收获……后来，由于“帮忙”人太多应接不暇了，才被陈永贵谢绝。

1964年12月21日，紧跟毛泽东的周恩来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原则、精神和风格的概括，把大寨典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死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大寨这个被大树特树的典型，在多方指责下，也悄然倒下，随毛泽东而去。

1979年春，农业科学家杨显东博士，在全国政协常委小组会上发言，第一个揭开了大寨“盖子”：大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其他经济都砍光了；毁林造田，大造山间小平原，结果是破坏生态平衡；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都成了穷光蛋；实行穷过渡，吃“大锅饭”，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大寨的自力更生是假的。杨显东博士还对陈永贵提出尖锐批评说：“**我认为陈永贵欺骗了全国人民，欺骗了党中央……**”

1979年9月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40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等等。

据昔阳县志记载，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在农田水利建设施工中，农民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据高级记者杨继绳披露，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湖南、湖北的一些农村，出现了几起十八九岁的少女因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而集体自杀的恶性事件。例如，在湖北省红安县，由于不堪贫困的煎熬，1975年的几个月中，就发生过52名女青年先后集体自杀的事件。又据1979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陈永贵在昔阳县领导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有2,061人，造成冤假错案3,028件，导致非正常**死亡141人**。据作家凌志军记载，非正常死亡的141人中，多是上吊、投水或跳崖自杀，有两人死于乱棒之下。

那么，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呢？由于档案尘封，无可查。笔者估算：全国2,000多个县，如平均按昔阳县的25%计，则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的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可能高达一百五十万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施工在内的**死亡人数至少在二十万以上！“农业学大寨”运动，被人们称作二十世纪最愚昧、最卑劣、最野蛮的运动之一。**

在各方压力下，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加了批语。《批语》承认，“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批语》还第一次承认，对大寨这个“先进典型”，有些领导和部门“……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批语》回避了“农业学大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和积极推行者周恩来的责任，以及由此带来的冤假错案和伤亡。但这个《批语》，还是把造成二十多万农民死亡的可悲、可耻又可咒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送了终。

在“农业学大寨”的冤假错案中，人们看到的多是一些抽象的数字，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所写的随感《西风残照大寨行》，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写道：

中国真正的英雄是谁？绝不是追随毛泽东搞“穷过渡”，与天斗、地斗、人斗的陈永贵，而是李云河、戴浩天、徐适存、冯志来、陈新宁、杨伟名这些坚持独立思考、见识卓异、舍身为民请命的人！

可是他们在当时皆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李云河**24岁时即任浙江省永嘉县委书记，31岁的**戴浩天**是县委农村工作队长，二人在1956年不赞成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在永嘉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最后**李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劳动改造**，戴成了“右派”加反革命，**举家遣送农村管制**。而支持李、戴，在会上喊过“包产到户就是好”的农民**徐适存**，

不“适”不“存”，**瘦死狱中**。1962年，浙江青年**冯志来、陈新宁**等人投稿人民日报，讨伐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斥为“**单干理论家**”，二人历经劫难，九死一生。陕西户县的大队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文化程度虽不高，却能清醒把握中国的脉搏。他们三人联名、杨伟名主笔的《当前形势感怀》，写于1962年5月，却不止于批评人民公社制度，而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初稿：他们对“社会主义初期”的判断，对尊重“价值法则”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唤，多么具有远见！可是，在权力即真理的中国，导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他们的“回答”可想而知，**三人的下场不说也罢**。

这些人才是中国的真正的精英呀——良知良能聚于一身。陈永贵在她们面前，借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是一抔黄土！

在鄢烈山的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三句这样的话：农民徐适存“**瘦死狱中**”，浙江青年冯、陈“**九死一生**”，陕西队干部杨、贾、赵“**三人的下场不说也罢**”。鄢被国内誉为“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但话到嘴边却留了半句，令人遗憾。仔细想想，也不能太责怪他。在国内，除颂扬唱诗派外，体制内作家们都知道，**文字与饭碗、牢狱的关系**。他们写作中创造了诸多隐喻暗语、旁敲侧击、闪烁其辞、拐弯抹角和打擦边球等笔法，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笔法”去描述当局认为的敏感话题。我们并不期望像鄢这样所谓“敢说真话”的作家，也用《红岩》中描绘渣子洞里受刑共产党员那样夸张、渲染的手法去描述上面六个人的下场，我们只期望他们实话实说，把实话说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吝嗷地把“敢说真话”桂冠戴在遇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鄢烈山头上。由此推见，那些尚不“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学者、记者、编辑以及当事人们，**他们在报导、史著、传记、回忆录等等里面，究竟肯定了些什么？渲染了些什么？回避了些什么？曲解了些什么？甚至篡改了些什么？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

笔者不得不搜肠刮肚，终于从纪念《当前形势感怀》发表四十周年一组文章中，了解到了杨伟名的下场。

农民**杨伟名**执笔起草的《当前形势感怀》，又名“**一叶知秋**”，当时曾引起轰动。他们在文章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行分析了。”文中还说，这篇感怀“**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毛泽东看信后勃然变色，遂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怒斥道：“**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

已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杨伟名惨遭批斗迫害，终因不堪凌辱，**服毒自杀**，卒年 46 岁。毛死后的 1979 年 6 月 29 日，杨伟名始得平反昭雪。

“农业学大寨”的主要承担者陈永贵呢？

杨显东博士批评陈永贵“**欺骗了党中央**”，笔者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在当“陈二鬼子”、搞互助组时，没见他欺骗过谁（不排除曾骗过鬼子）；他带领大寨走所谓“共同富裕”的合作化和公社化道路时，也谈不上他欺骗，他仅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制订这种祸国殃民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放卫星时有点欺骗，但那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跟上，跟不上就挨批；三战狼窝掌和大战天灾，更谈不上欺骗，而且还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哩。当树成典型后，他变啦，变得欺下骗全国了，但既谈不上瞒上，更谈不上“欺骗了党中央”。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毛泽东、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之下。党中央**纵容或默认他骗**，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或旁观他骗**，从没有去过大寨的毛泽东，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需要他骗**。他可能是进了官府，身不由己，在充满“假大空”即“假”获重用、“大”能升迁、“空”受表彰的官场里，**不骗人则被人骗**，他便顺着大流渐渐看惯了骗，习惯了骗，又渐渐学会并熟练了这种政治骗术。这不是为陈永贵开脱，仅仅说杨批他“欺骗了党中央”的话，不够恰切。

陈永贵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理应为此付出代价。1979 年 12 月 17 日，他被免去兼任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1980 年 8 月 30 日，他被迫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 年 9 月 1 日的中共十二大上，他失去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成了一名退休干部。1986 年 3 月 26 日，71 岁的“农民宰相”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结束他由长工到“陈二鬼子”，又从大寨党支部书记跃升到国务院副总理既辉煌又可悲、可咒的一生。

四．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

1964 年 1 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示《人民日报》等报纸：“**加上一版，专门报导学习解放军。**”于是，1964 年 2 月 1 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掀起了新一轮的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

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又说：“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

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学到手，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

人们从这篇社论中可以看出，学习解放军最根本的是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如果说**学雷锋**是毛泽东要求他的人民读他的书，“净化”人们的思想，**学大寨**是毛泽东要求他的农民们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和干劲来承认他的人民公社的正确性，**学大庆**是毛泽东要求搞工业的干部和工人们，学会用他的所谓“两论”和“大兵团作战”思想搞工业，从而为他的臭名昭著的大跃进正名，那么，这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批发的《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则要求他的人民必须用他的思想指导一切。在**造神运动**的设计上，毛泽东把学习解放军当成“纲”，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当成“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纲举目张**”。这种“**纲举目张**”，完美地体现了他的“大救星”情结和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

毛泽东是个枪杆子崇拜者，“**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的名言。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枪杆子既然能出政权，就能保政权。夺得政权以后，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紧紧握住枪杆子不放。令他不放心的是，朝鲜战争后，他不得不任命对他怀有“**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的彭德怀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了牵掣彭德怀，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出人意料的提议增补林彪元帅为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凌驾于彭德怀之上，获得批准。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他又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罢免了彭的一切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扶林彪为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

1906年12月17日，农历丙午年十一月初二，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林家大湾一个富足的农民家庭。1926年初夏，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了第四期学员。同年12月，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1927年8月1日，已升任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的林彪，参加了周恩来等人发动的南昌起义。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毛泽东的领导风采曾使林彪由衷佩服。他见到毛时脱口而出：“南昌起义的军队要是由你来指挥，肯定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毛泽东打量着这个瘦弱

的二十二岁的年轻的连长，问道：“为什么？”林彪说：“除了敌强我弱和客观上的因素外，起义军的高级领导人不会打仗，只是从书本上或条例里死搬硬套地指挥战争，也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林彪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毛泽东，并被毛视为知己。很快，林彪便被晋升为一营长，1929年春，又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又跃升为红军第四军军长，1932年3月，未满二十六周岁的林彪，又被毛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长。长征时，他紧跟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奇袭泸定桥，智取腊子口等等，战绩卓著，受到毛的赞扬，尽管其间，他俩曾发生过严重分歧。到延安后，他曾被毛削去军权调任为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但他毕竟是一员难得的虎将，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毛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内战时期，他又被毛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统帅百万大军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内战中，他组织和指挥了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辽沈、平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一百多万。在战争年代，林彪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路顺风，也为毛泽东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大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彪对职位上的安排不太满意，便“称病”不朝。但壮心不已的林彪，不忘窥伺政权，时刻注视着政局的变化；因无机会，便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机会终于到了：1959年9月，彭德怀倒台后，林彪取而代之，成了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毛曾说过：“**林彪是忠于我的一员战将，我信任他。**”林彪心领神会，他对夫人叶群说：“毛泽东深谋远虑，一看就不是那种咋咋唬唬，轻浮得像张纸的人。我就感觉到，跟上这个人，绝对吃不了亏。跟对人，就是吃不完的资本呀。这是在任何书上都找不到的经验之谈，你要好好地读透这本**无字书**。”他对叶还说“**恩（格斯）之於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宁），蒋（介石）之於孙（中山）**”，为此，他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一步一步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大统帅，其他的人都不行都不够格。我们的眼里就是要只有一个统帅，一个领袖，一个天才。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此时的林彪已是毛泽东肩上猛鹫，毛泽东指向哪里，他将扑向哪里。

庐山会议上揪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为了效忠，刚刚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打破了寂静，心中捧着“无字书”，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毛泽东想听到的声音：“**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9月30日，他又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文章。文中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他警告说：“……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

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的延安对抗大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

同年，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他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他的鼓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根据毛泽东“**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思想，又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突出政治”，实际上是突出崇拜毛泽东的政治。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对此，毛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于是，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毛主席语录。接着，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到1964年5月1日，部队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已下发到部队战士手中。

196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报导说，林彪同志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顶峰论**”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贡献之一。但物极必反，顶峰之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颓萎、堕落和衰亡，不论林彪主观上是否意识到。

军内造神运动，用真假搀和的办法制造了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

子，诸如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都成全军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偶像。

毛泽东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喜在心中。特别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使他心潮澎湃，无法忘怀。林彪在那次讲话中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的这篇“救驾”式的讲话，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迅速走出困境，反守为攻。

借助林彪在军队中推行**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把军队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毛泽东向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夺权的主要权谋之一。于是，他反复号召：“**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心怀“无字书”的林彪，已洞悉毛泽东的谋图。他在日记中写道：“**要整刘少奇。**”便积极配合起毛泽东来。

有人说，为了权力，毛、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话虽然刺耳难听，但不是无中生有：林使劲吹拍，毛开心笑纳；他俩一唱一和，先后表演了十多年，直到林彪出逃摔死到温都尔汗为止！

林彪在军内大搞造神运动中，有多少军人伤亡？一将落难，又有多部属、亲朋跟着遭殃？在新闻封锁、舆论一律的环境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一度被报导过的文革事件后又重新被控制、封锁和加密的条件下，笔者很难从解放军出版物中找到多少有关资料。但人们还是能从军外的一些书中，找到伤亡事例。例如，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披露：

小王在军队时亲眼看见过一次死刑判决和执行。被处死者不是监狱的犯人，而是一位解放军士兵。那时部队里正是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非常时髦的时候。有位连长选了他的一位喜欢顶撞干部的调皮战士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经常点名批判他。他对连长积下了仇恨。一天夜里，他取出他的枪，冲进连长的房里，打死了连长，后来又打死二十个来追捕的军人。

他最后被打伤逮捕，不久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的伤完全治好后才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前全军开了宣判大会，开会时，坦克排在会场外，杀气腾腾，好像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师的敌人。这个士兵是被用步枪从他背后击中脑部而死的，死后有人用手枪补火，查实他确已死亡。

人们还可以从广为流传的两个事件上，窥见到军内造神运动的惨烈。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跳楼自杀。

1966年3月18日深夜，处于委屈、痛苦、悲愤和绝望中的罗瑞卿，从他住房的三楼楼顶纵身跳下去……他没有死，多处骨折、受重伤。

跳楼前，他给妻子郝治平留下了既可怜又可悲的绝命书：

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刘伯承元帅曾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这可以说是包括罗瑞卿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伦理共识使他们认为：革命永远神圣，党永远正确，毛泽东永远伟大；对他们来说，极左路线、个人崇拜等等都不是问题；他们甚至认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无论个人遭到多大的不幸、委屈，包括个人和家庭的毁灭，都无损革命的合理、党的正确和领袖的伟大。这种与现代文明价值格格不入的封建忠君意识，是大跃进、文革中混乱局面得以控制、一党专政得以继续的重要原因。

一个忠于毛泽东、忠于共产党、事业日逼中天的总参谋长怎么会如此短见？

“绝命书”中说的“会议的事没告诉你”指的是什么？原来，自三月以来，毛泽东和林彪决定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叶剑英主持会议。罗在会上作检查；如果罗不承认给他罗列的一系列罪行，检查就不能通过。会议没有确定日期，停停开开，每当罗瑞卿要陈述真相为自己申辩时，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或宣布休会。显然，这是从“延安整风”继承下来的整人法：只能坦白、挨整，不许沉默、抗辩——**毛泽东式的逼供信**。风光时，罗瑞卿常用这种办法收拾别人，没有想到今天，会让叶剑英用这种办法来整自己！无可名状的痛苦，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整个精神崩溃了，他决心以死来抗争。

罗瑞卿怎么会得罪毛泽东呢？

罗瑞卿与毛泽东 1929 年相识，1930 年初罗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就在毛泽东手下工作。抗战初期在延安，罗被任命为抗大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执行者。1949 年到 1959 年，罗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决策，先后镇压反革命高达 200~300 万，为稳定政局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虽被国外称作“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却被毛泽东称为“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他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笔者：毛泽东给罗的绰号）顶着。**”1959 年庐山会议上，罗瑞卿发现周小舟、周惠、李锐到彭德怀、黄克诚住处交谈，向毛泽东告了密，使毛泽东下决心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毛兴奋地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1960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他还颇为得意地说：“**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可以说，罗对毛忠心，毛用罗放心，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如此忠于毛泽东的大将怎会遭到整肃呢？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得罪了林彪。

其实，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也很好。

林彪同罗瑞卿从 1930 年 2 月开始相识共事。罗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的下级。红军时期，林当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是教育长。抗战时期，两人分开。内战打太原后，罗要求调到四野，林彪、罗荣桓同意，但由于中央决定调罗当公安部长，才未去成。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这名中共中央委员，已经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十分耀眼的红人。林彪建议任命忠于毛的罗当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很快被毛批准。可见他们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据说，不到两年，林、罗的关系就出了“裂痕”，而这种“裂痕”与叶剑英元帅和杨成武上将的“小报告”相关。1965 年秋天，林彪曾经对陶铸这么说：“**1960 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 1961 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 1965 年便正式反对我了。**”这话也许是实话。陶铸将林的话传给了罗瑞卿。笔者认为，林的意图不仅要陶铸把这句话传给罗，更要传给毛泽东。陶铸是否把林的话传给了毛，笔者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

料；但笔者深信，陶一定会把林的话传给毛。因为，当年身为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是毛泽东向刘、邓夺权所信赖的重要人物之一；由于他是毛的亲信，在来京后的第二年，便被毛任命为文革小组的顾问，接着提拔为中共中央常委，迅速成了地位仅次于周恩来的党和国家第四把手。如此显赫的毛的红人，当时的他，怎会忘记把发生在林、罗之间的重大信息传给毛泽东？做为毛泽东猎鹰，林彪已经察觉到毛要整罗瑞卿了。平时对罗颇有意见的林，在借机向罗发出了严重警告的同时，便不失时机地向毛表示忠诚，并开始了倒罗的部署。可惜罗没有“吃透”警告，还以为他是毛的红人，林整不了他哩！

林彪是如何察觉到毛要整罗瑞卿呢？据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回忆：

罗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笔者：毛的痴呆儿子）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笔者：毛岸青夫人，江泽民时期授少将军衔）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必也会知道（笔者：常委林彪当然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罗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罗点点在回忆中还记载了另一件事：

1965年5月，江青找到爸爸，说她对军队和军装都很有感情，希望有一套新的军装和帽徽领章。罗为了照顾江青同志的感情和维护现役军人的尊严，只发给江青一套军装，没有发领章和帽徽。这种不肯通融的做法，引起江青极大不满。

点点说的对广大老百姓来说不可思议：**伟大领袖胸怀若谷，怎会如此小肚鸡肠**？但对熟悉毛泽东品格的林彪来说，这些信息对他非常重要。

猎鹰的双眼，决不会放过更为重要的信息：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训斥刘少奇；19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又首次公开冲突；此时的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原先被毛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倒在刘少

奇一边；党内外特别是在众多中、高级干部看来，毛最多是作为一个偶像而存在；自 1963 年以来，毛已发觉他在党政中被逐渐架空；到了 1965 年，毛已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而此时，毛所倚重依靠的军队，实权已逐渐转移到贺龙和罗瑞卿手中；生性多疑的毛，并不信任贺龙，一旦毛、刘摊牌，贺龙的态度是个未知数，等等。——党内这种复杂而尖锐的权力斗争形势，怎能逃出林彪的鹰眼？

毛泽东所信任的罗瑞卿呢？自 1959 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 1962 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自认为在军中有毛、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彭真撑腰，在党内有邓应援，大有取代林彪之势，因此，作风强悍，飞扬跋扈，除贺龙外，其他老帅大将都不在他的眼里，甚至许多事情也常绕过林彪直接向毛请示回报。而林彪呢？为怕与毛的红人罗瑞卿争锋，被毛怀疑夺权，自 1962 年夏天后，在罗咄咄逼人面前，无可奈何地“托病”逐渐放权，再次“卧薪尝胆”，等待时机。看出军内形势的刘少奇，为了架空毛泽东，也对罗采取亲近拉拢的态势。1965 年 5 月他曾公开说：“**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罗也经常向刘、邓请示工作。党内右派势力也乘机散布说：“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权大盖世，上必除之，何况罗有依附于刘、邓的嫌疑？毛泽东听到传闻后，发觉大势不好，便开始了“倒罗弃贺”的新部署：他一方面严厉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另一方面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毛的“好学生”总政主任萧华和忠臣副总长杨成武，令他们注意贺、罗动向，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同时晋升杨成武为第一副总长和军委副秘书长，做好了随时接班的准备。

遭到申斥的林彪终于等到了机会，便当着陶铸对罗发出了警告，并在备忘录中恶狠狠地说：“**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权力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不过是权力的转移。**权力的转移或再分配，就需要不断的斗争去实现**，这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

有人认为，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为换取林彪支持的一笔政治交易；但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一箭三雕的权术：**严惩不忠、警告观望和安抚林彪**。

了解中共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要打倒谁，上面所说的理由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为了使广大干部和百姓们信服，他们必须在**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上大做文章。

打倒罗瑞卿的第一个“至理”的罪状是：“大比武冲击政治”。

六十年代初，南京军区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少将在某部二连蹲点时，发现二连副连长郭兴福训练有方。在李德生的重视下，迅速出现了一个训练典型：**郭兴福教学法**。本来对林彪大搞“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和“突出政治”颇有微词的罗瑞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使郭兴福的教学方法迅速在全军走红。对此，罗点点回忆道：

时光很快就流转到了1964年。回想起来，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事情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周围的许多事开始变得别扭起来。那年1月里，叶剑英同志在南京军区视察时，发现了郭兴福同志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叶剑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毛主席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大加赞许。林彪看了报告也表示赞许。毛主席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军委还在1月3日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父亲向林彪报告后于1月下旬到南京军区召开了现场会，对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进行具体的组织和研究，并通知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派人参加……

父亲的本意是十分明显的，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军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自然是他这个总参谋长的主要任务。……父亲总认为，突出政治不能光是一句话。政治也从来不是空头的。……军队当然应该拿出点像样的训练成绩来向党汇报。这不仅是部队建设的需要，而且实际上搞好了也是给突出政治从另一角度做个补充，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

父亲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比武”。

毛主席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

面对这些可喜的成绩，军委各位领导同志以及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以密切的关注。父亲多次陪同周总理、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观看军事表演。这一年的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都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

毛主席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在看完擒拿格斗表演后，毛主席还对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毛主席还在观看表演的时候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夜战，近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从当年新闻报导上来看，罗点点的回忆基本属实。但在当时“养病”中的林彪，已经窥测到毛怀疑罗的态度，便于1964年12月就当时部队工作中的问题发出指示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

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针对全军大比武说：“要把这个风煞下去，很快来个转弯，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

罗瑞卿的把柄终于被抓住了。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会议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由元帅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但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把叶帅凉在了一边，从而引起了元帅叶剑英、聂荣臻和上将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的不满，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向毛告御状。此时，在其打倒刘、邓的战略部署中已经对罗的立场产生了怀疑的毛泽东，借机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借机对罗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不久，毛泽东为确保在对刘、邓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就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兵权的部署，任命杨成武、李天佑分别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发现并积极推动全军大比武的叶剑英，摇身一变，成了批评大比武冲击政治的元帅，开始按毛、林安排收集起罗瑞卿冲击政治的材料来。洞悉毛心迹的林彪，便向夫人叶群面授机宜，叶群迅即以电话告知海军副司令李作鹏中将。1965年11月27日，李便同海军副司令王宏坤上将、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少将三人写信状告罗瑞卿，称其阴谋篡权海军，并罗列了他十条罪状。同落井下石一样，相互揭发，也是毛泽东用分而治之之策控制高级将领的重要手段。

在完成上述部署后，1965年12月2日，曾热情支持过大比武的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还骂“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发出了整罗的信号。兰州军区的报告是杨成武首先“发现”的。早想扳倒罗的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发现”报告后，便飞报给林彪。林看到这份报告如获至宝，很快上呈毛泽东。这样，杨成武取代罗瑞卿只剩时间了。

在批示前的11月29日，毛的秘书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为了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至情至理”的理由，同时缩小打击面，不惊动刘、彭、邓、贺龙等人，毛故意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师（笔者：指叶剑英）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师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

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骂声传达了明确支持林彪的信息。本来对罗不满的叶群，同毛一唱一和地骂起罗瑞卿来。

于是，便产生了倒罗第二条“至理”的罪状：“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

洞悉毛泽东思想的林彪，即命叶群同他的爱将空军政委吴法宪中将，编织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罪名：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临终遗言。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这个被史称为的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林彪、叶群、杨成武和少数几个人外，连中共第二把手刘少奇也不知道会议内容。叶群在会议上作了3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她说，刘亚楼临终前，她去看他时，他对她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这四条意见是：1、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2、要保护林彪的身体；3、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4、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罗瑞卿负责。叶群还历数了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等个人野心的罪行。面对叶群这个“死无对证”式的揭发，毛泽东“深信不疑”，迅速做出了“罗是野心家”的结论，使多数与会者茫然不解。10日，被通知从昆明来上海参加会议的罗瑞卿，一下飞机便失去了自由。在毛泽东时代，这种颠覆法制文明的逮捕，早已司空见惯：对权贵如此，对下层百姓更甚！

人们不禁要问：英名盖世、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怎么会相信叶群那种“死无对证”的胡言乱语？当想起当年庐山会议期间，由于罗瑞卿告密，就导致“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那件事，人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结局是“理所当然”的：在向刘、邓党内右派集团夺权决战前夕，毛以毛、林联盟和以莫须有的罪名拿罗瑞卿祭旗，并警告所有观望者和潜在的叛逆者。在“死无对证”的置疑眼神中，会议根据叶群的揭发，做出了撤销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

1966年1月初，毛泽东晋升在“倒罗(瑞卿)弃贺(龙)”的部署中的有功之臣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原来罗瑞卿所兼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另一有功之臣杨成武上将，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

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发誓“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鬼”的罗长子，在上海会议上还是个“反对林副主席”分子，但在三月叶剑英主持的会议上，一下子就变成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暗藏在军队中的赫鲁晓夫！这对于一贯忠于毛泽东的罗瑞卿来说，

那委屈、那痛苦、那悲愤已经使他精神崩溃了，于是他绝望地一跳……

这一跳使既得利益者、因好色被人称为花帅的叶剑英元帅，诗情大发，改写辛弃疾《贺新郎》词中一段，讽喻背叛：

将军一跳身名裂，（笔者：辛词原句为“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
回头万里，
故人长绝。

许多人对叶剑英的幸灾乐祸颇有微辞。另一既得利益者杨成武上将，马上为叶帅圆场说：“这是惋惜。”杨成武全然不顾事实，又欺万里中华无词人。

更为惨烈的是：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教员郭兴福全家自杀！

在毛的中国，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必然祸及下层。罗瑞卿倒台后，郭兴福遭了殃。

郭兴福，山东邹平县人，1930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起义参军，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一次。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第十四步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12军34师教导营，后调到**100团**二连任副连长。在任副连长期间，他从实战需要出发，研究摸索出一套教学训练的好方法。军长李德生发现了他，并在12军内推广他的教学训练法。被誉为“郭兴福教学法”迅速走出12军，走向南京军区，走向全军。郭兴福因而被调到南京军区高级步校当教员。

1963年4月至10月，郭兴福应邀到了广州、武汉、沈阳军区，做了数十场表演，参观见习人员数以万计。

负责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给军委的报告中写道：

“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笔者：1963年）到南京，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总参军训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总共有十九个课目）。看了以后，大开脑筋，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报告中还说：“总之，郭兴福教学方法已为广大群众所公认，自动要求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已自下而上的酝酿了很久，有几个军区已经正式作

出了决定，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军委发一个指示，在全军中加以推广，号召各军区，各军种、兵种、部队和学校及至民兵，结合本身的特点，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发扬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培养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借以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进一步使军委有关训练方针、原则落到实处，大大提高训练的质量。”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收到叶帅的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笔者：向毛泽东报告过程，与罗点点的回忆稍有不同）。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对此表示赞赏，并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

为了检阅由“郭兴福教学法”引发的全军大练兵的成果，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运动。1964年5月15日，总参、总政发出了《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拉开了全军大比武帷幕。

从6月到7月上旬，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比武基本结束。从7月到8月，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组织下，全军分18个比武区展开了全军大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的共有3,318个单位，33,000多人，在3,766个项目的角逐中，共评出694个尖子单位，3,070个尖子个人。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大比武，都倍加赞誉。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都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从6月到9月的全军大比武，被军史称为“百日辉煌”。

然而，到1965年秋，当毛泽东发现罗有投靠刘、邓嫌疑后，曾被他赞誉过的“全军大比武”，成了“冲击突出政治”、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罪状，他的忠臣罗瑞卿则被他臭骂为“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野心家”，迫其跳楼自杀，但积极推举“大比武”而与刘、邓保持一定距离的叶剑英，却安然无事，还获得晋升。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颠倒过来呢？在毛泽东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一人落难，亲朋遭殃。遗憾的是不少人认为，这种潜规则理所当然！

生活在这种充满封建株连规则的氛围里，被李德生将军发现、被叶剑英元帅推举、最后被罗瑞卿总长看重的“郭兴福教学法”的创建者郭兴福，便随着罗总长的倒台而惨遭大难。

因被罗瑞卿看重而获“罪”的**郭兴福**，被戴着高帽子、坐在笼子里游街。有一次，他在气温高达 40 度的南京大街上，在水泥道路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下头，膝盖上的鲜血把裤腿浸得点点黑红，豆大的汗珠在水泥路留下斑斑汗渍；有时还要手拿稻草大声说“我是罗瑞卿的孝子贤孙”，“我有罪”，“我罪该万死”……一个刚烈汉子，遭到如此蹂躏，他的身心受到了多么大的摧残啊！他绝望了；丈夫落难倍受歧视凌辱的妻子**李淑贞**，也绝望了。他们商量，**用全家自杀来抗议迫害**。与妻子抱头痛哭后，他要先“送走”他所疼爱的三个儿女——6 岁的儿子**钢钢**、4 岁的女儿**炼炼**和 2 岁的儿子**久久**，因为，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横行的中国，他怎能忍受留在世间的三个儿女被当成反革命“狗崽子”任人欺凌？当看见他的三个儿女惊恐地望着他在抽泣、在啼哭的时候，他的心跳动着几乎要破胸而出。他无法抑制住双手的颤抖，但决心已定：神志上的歇斯底里，使他咬紧牙根，野兽般地扑向他的儿女，用颤抖着双手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活活掐死，然后与妻子一起通电自杀。然而，电把他俩打懵却没有打死。妻子李淑贞醒后，见丈夫、孩子已死，砸开窗户，跳楼负伤。被剧烈撞门声震醒过来的郭兴福，跑到厨房，拎起菜刀猛砍了自己十多刀，绝望地倒在自残的血泊中。撞开房门闯进来的邻居们，目睹了那血淋淋的令人毛发悚然又令人心碎的惨烈场面！三个小孩死了，郭兴福和妻子李淑贞被抢救了过来。郭兴福以**反革命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李淑贞被判处两年徒刑，监外执行。

呜乎！年幼无辜的**钢钢**、**炼炼**、**久久**，你们来到人世间的社会主义中国，难道命中注定要你们为**大比武**殉葬？命中注定要你们当**造神**运动的祭品？命中注定要你们用短暂的一生为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付出生命代价？

谁是杀害他们的真犯！谁是杀害他们的元凶！公理何在！

死刑消息传出，正直的人都噙着眼泪愤愤不平。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原 12 军军长李德生，先后出面多方工作，才将郭兴福改判为 20 年徒刑，多少擦掉了一些挂在人们脸上的泪珠。

李淑贞已经没有眼泪，她常常坐在儿女的坟前发呆，久久不甘离去。好心人们常开导她，她也常不无懊悔地对人说：“当时我晕了，咋没有去挡他！”

毛泽东死后，度过十余年监狱生活的郭兴福被释放了出来，恢复了军职和官衔；但巨大的悲痛已经使他变得冷漠、苍老、珠黄。八十年代初，当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采访他时，见他“原先那么虎虎有生气的人仿佛死过一回，动作迟缓，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彩，思想和语言都带有那种心灵破

碎所固有的冷漠和偏执。他没有丝毫失去那可怕的记忆，一举一动在都告诉你，他对那些恐怖场面记忆犹新，或许他只生活在那些可怕的记忆里。”

1985年，在儿女忌日那天，他曾想剥去双手，妻恸曰：“我们做过一次傻事，不能再做了！”他有所回心。然而一天，目光突然冷峻的他，骑着自行车，鬼使神差地与汽车相撞，结束了他五十五年辉煌、惨烈、悲凄的一生。

据说不久后，李淑贞在郁郁中死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给这个家庭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都是后话。

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向更高层次上发展，“最高”、“顶峰”、“最最最”、“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教和口号，相继扶摇直上。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们看来，致伤、致残、家破人亡，给胜利者带来的不是困顿，不是郁闷，也不是怜悯，更不是悔恨，而是愉悦、舒畅、欣慰和颠狂。

五. 学《毛主席语录》运动

林彪、罗瑞卿对推动毛泽东个人崇拜运动的最重要贡献是编发《毛主席语录》。（图 06-6）



图 06-6：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给林彪名字上打 X，发生在林从副统帅摔死成反革命之后。

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并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该报便从5月1日起，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毛泽东语录。1962年2月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于是，到1964年1月5日，由《解放军报》编辑田晓光负责编辑的《毛主席语录 200 条》征求意见本出版了。

1965年5月，在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参加的集体讨论会上，讨论和审定了再版的《毛主席语录》。会议一致通过了再版《毛主席语录》的《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427条语录。由于林彪曾明确指示过：“**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因此，总政为了达到军内每个战士人手一册，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但由于地方各级领导都来部队要《语录》，实际发行量大大超过计划，增到**1,213万册**。

凡是经历过“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由于林彪和罗瑞卿的鼓吹和推行，**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权贵们强有力的支持**，这本小小册子，很快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这本有“东方《圣经》”之称的《语录》，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时止，在短短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数，就有10.5亿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以及各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在内，其数量之大，更为惊人。又据报导：仅文革几年内，国内外出版的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语录》，就有500多种版本，总印数高达**50多亿册**。其中，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毛主席语录》，高达数千万册。还有报导说，法国、德国、瑞典、印度、马来西亚、刚果（布）、朝鲜等21个国家，用英、法、僧伽罗、泰米尔、印地文、旁遮普、朝鲜、孟加拉等24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也有数百万册。其中，日本翻译出版了近30万册。据当年政府统计，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男女老幼人均持有《毛主席语录》1.5册以上。因此，《毛主席语录》被国际上公认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自此，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中国也因而成了世界革命中心，成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响往的胜地！**”

在中国，人手数册的《毛主席语录》，把中国变成了红色海洋。（图06-7）

对于“红色海洋”，有人曾这样描述：

曾记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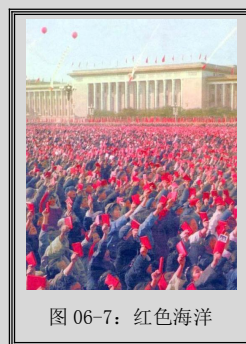


图06-7：红色海洋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都要进行朗读或背诵，时称“天天读”。

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要举行敬祝仪式，即站在毛主席像前，行三鞠躬礼，手擎《毛主席语录》，口中念念有词：“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结束仪式，时称“早请示”。晚上上床睡觉前，如法炮制，时称“晚汇报”。除了这种标准的宗教式的敬祝仪式外，还有唱歌、跳舞等敬祝形式。

也许有些读者发问：信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怎会举行这种荒诞不经的宗教仪式？甚至有人可能认为，笔者有意用这种虚假、荒唐的无稽之谈来蛊惑人心。笔者是否在弄虚作假？否！读者请看敬祝仪式种种（图 06-8）：

图 06-8：敬祝仪式种种



除“早请示”、“晚汇报”外，在上下班前后，在会前会后，在饭前饭后，在火车、轮船上，都要按时举行敬祝仪式。时称“时时祝”。

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

这种敬祝仪式，以它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能逐渐消蚀人们的活动力、识别力、判断力和批判力，攫走人的情感和责任感，并使崇拜和臣服内化定型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了的精神族群。这都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除“天天读”、“时时祝”外，还要处处学习《毛主席语录》。请看下面一组“处处学”（图 06-9）：

图 06-9：“处处学”《毛主席语录》



总之，田间地头，工地车间，校内课堂上，军队演练中，都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学《毛主席语录》，不学便视为对毛主席不忠！

待人接物时，更要颂扬《毛主席语录》，时称“**事事颂**”。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呼应。有人在文章中这么写道：

老太太上街买菜，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称两斤菠菜？”
买卖成交后，售货员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两毛钱。”

尽管这有戏谑之嫌，笔者并没有遇到过，但相信有存在的可能。

笔者打电话曾遇到过尴尬。那时电话不是自动接线，而是由总机人工连接。通常打电话者摇通总机，总机小姐便问：“喂，要哪里？”打电话者回个地址后，电话就会很快接通。但在《语录》盛行特殊年代里，通话“规则”大变。有一次我摇通了总机，传来了总机小姐的声音：“‘**反对自由主义**’，要哪里？”由于我没有先背段语录就说了要通话的地址，接线小姐当即拔线挂机，无论我再怎样摇机，对方也不搭理。无奈下，只好到别处找电话再打。

除“天天读”、“时时祝”、“处处学”和“事事颂”外，《毛主席语录》还是攻防利器。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既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巴金在劫后的一篇《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文章里，有过一段形象描述：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

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

在派性斗争中，由于造神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毛泽东言论成了“最高指示”、绝对真理。因此，在两派大字报的你来我往、面对面的唇枪舌剑、对峙广播站的互相攻讦驳辩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从《毛主席语录》里引出对自己有利的条条，借以攻击和诘难对方，于是，便出现了滑稽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毛式奇特的“语录战”！如一方振振有辞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对方便还以颜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派性斗争中，这种以“文斗”方式进行的“语录战”，到头来，多数都演变成了“武斗”，最后决定胜负的，仍然是拳头、棍棒和冷、热兵器。

中共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交接中，最高领导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居然也发生了“语录战”：一方说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方说是“按过去方针办”。孰是孰非？这种在暗箱中操作的权力斗争游戏，只有天知、地知、当事人知，人民群众不得知。最后，老百姓知道的仅仅是：“四人帮”被“粉碎”。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必然要用他的《语录》作武器，推向国际社会，直接用于“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战场。例如，1968年4月16日，他曾以“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身份，发表了干涉美国内政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于是，豪情四射的毛的“群众”们，频频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干涉他国内政，制造了多起外交事件：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笔者：“X”，引录的资料原文如此，下同。）

去X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驻非洲X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引起所在国群众愤怒。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台

下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黄镇和宋之光为了维护中法友谊，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到1967年，回国后的宋之光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挨批斗，“坐”了“喷气式”。

1967年，我国69名留英、法等国的学生，回国时途经苏联，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挨了打，30多名学生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莫斯科的百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被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制止，差一点在莫斯科酿成大血案。

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并被法方用囚车押送飞机场，逐出法国。

在一系列丑陋表演碰壁后，到了1970年，自以为是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才不情愿地下令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这与两年前他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豪情，大相径庭。由是，毛泽东的“群众”们，在国外的荒诞行径才告结束。

《毛主席语录》在国外受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法发威；但在国内，不要说非议，任何对《毛主席语录》的不尊重，都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惩！

主编《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报》编辑田晓光说：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笔者：看来田晓光不愿反思)，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她还披露：

北京x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

解放军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进了翘起的“二郎腿”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他惊恐万分跳楼自杀。

编辑《毛主席语录》时，她的唯一助手张凯夫往毛主席头像上打×，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她也因此被株连，审查后打入“牛棚”。

她还抱怨，到 1971 年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她又被隔离审查，审她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她说：“真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田晓光有所不知，在河南省许昌市，笔者亲眼目睹一个名叫**王华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枪杀于许昌东关汉朝晁错墓碑前。他的罪名是把《毛主席语录》垫在桌腿下。如果田编辑知道这件《语录》血案，是否能有所愧疚？这里，笔者没有要她承担什么责任的意思。

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 年，随着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国温都尔汉，被个人崇拜搞得晕头转向的中国人，似乎有所醒悟，红色海洋的狂热也因之退烧。接踵而至的是，《毛主席语录》这个“红宝书”，也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悄然落下，到毛死后，完成造神运动历史使命的“红宝书”，最终被扫进垃圾堆里，并从曾为此发烧过的人们生活里淡忘、遗弃、消失。但许多在忠君封建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对“红宝书”的风行，不愿反思，也不忏悔，甚至愚顽得附和御用学者们的刻意说教：“**这是历史的必然**”！

第 07 章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07 章目录

一、《五一六通知》	二、批斗开国元帅朱德	★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横扫知识界	2、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3、学校大乱	4、刘、邓中计	四、《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	
★五、第一波自杀风潮			第 07 章附注	

一、《五一六通知》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用“层层剥笋”的谋略，一步接一步地完成了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全面夺权的战略部署。

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5 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了撤销有投靠刘、邓嫌疑的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强化了林彪元帅的权力。1966 年 1 月初，毛泽东又任命忠于自己的叶剑英元帅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命杨成武上将为代总参谋长，与林彪形成掎角之势。2 月 22 日，又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建制，防止罗瑞卿旧部滋事。之后，又增调两个师加强北京卫戍，任命心腹傅崇碧为北京卫戍区司令。随着批斗罗瑞卿的深入，贺龙元帅在军中的影响力减弱，其权力也逐渐被毛边缘化。在这之前，毛怀疑彭德怀在军中势力没有肃清，便用调虎离山之计以“加强三线工作”为名，任命彭德怀为三线副总指挥，把他送到西南的大山沟里监管起来，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文武合璧。彭德怀的副将黄克诚，也被逐出北京，出任山西省有名无实的副省长。

1965 年 11 月 10 日，因“秘密录音事件”受到毛泽东怀疑的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下放到广东省委书记处任书记。为考验杨的忠诚，在罢黜后，毛泽东命他去“看望”王稼祥和陈云两位资深大员，观察他们的动静。在杨“看望”后，陈云心领神会，立即以书面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近况，意让毛泽东放心。在 11 月 19 日，杨还就这两次“看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意在证明自己不辱使命，对毛不贰。1966 年 5 月，杨的忠诚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反被一贬再贬，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后又放逐到山西临汾，不久被隔离审查。

杨尚昆被罢黜后，毛任命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为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警备局局长，负责指挥毛的嫡系中央警卫团 8341 部队。

当采取了政治、军事等一系列反政变措施后，毛泽东认为万事俱备，

时机已到，便开始借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名，向刘、邓的左右手——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兴师问罪。

1966年3月8日到29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多次6~7级的强烈地震。以22日发生于宁晋县东南的7.2级地震强度最高。其中6.8级地震波及142个县市，7.2级地震破坏范围包括136个县市；有感范围北到内蒙多伦，东到烟台，南到南京，西到铜川等广大地区。地震造成巨大破坏，共造成8,182人死亡，51,395人受伤，破坏房屋400余万间，损坏桥梁86座。有人说，这是大难当头的先兆。由于笔者对“天人感应”说持保留态度，因而对地震与社会动荡的因果关系持怀疑立场。但日渐绷紧的阶级斗争的钢弦，却预示着烈度更高、伤亡空前的“人震”即将来临。

当邢台人民在强烈地震摧残下作痛苦挣扎的时候，面对巨大破坏和重大伤亡，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依计开始了他超越地震烈度百倍以上的“人震”——文化大革命的部署：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不顾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猛烈抨击党内右派的社会基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又说：“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为了夺权，全国学校都成了刘、邓帮凶，被他描成一团黑；知识分子中除郭沫若、范文澜外，其余都成了革命对象。可悲啊，上层权斗，学者遭殃。“他们先挑起斗争。”这种倒打一耙，无异于狼吃羊的逻辑（1）。

3月28~30日，毛泽东无视地震带来的重大伤亡，把抨击的矛头直指刘、邓的左右手，数次对心腹康生说：“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不经政治局讨论，毛本人就可以宣布打倒这个，解散那个，完全推翻了他自己多年高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然而他又贼喊捉贼地反问：“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毛泽东不去体察灾情，却玩起了知识定义游戏。4月14日，他在《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写道：“但从实质上看，

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

——为了权力，毛把知识定义为打仗、革命、做工和耕田。这是什么主义？当狼想要吃羊的时候，无论羊怎么做，狼总有吃的借口，甚至会振振有辞地、“至情至理”地胡说八道。

毛泽东对救灾无动于衷，却对权力情有独钟。4月29日，他在同党内谈关于彭真问题时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在权力斗争上，毛是铁面无情的：面对一个多年追随他、吹捧他的人，只要认定他当前威胁到他的权力，他会毫不犹豫地“捅倒他”。

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经过造神运动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说一不二、句句是真理的独裁者——绝代君王。

5月4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一个由17名政治局委员和6名后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扩大到76人。其中，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党内左派，当时连中央后补委员都不是，不但列席了会议，还成了会议耀眼的明星。

为了彻底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林彪向陆定一投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把一纸“证明”，摆放在政治局委员面前。重重心事的高官们看到：

我证明：

- 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後一贯正派；
- 二、叶群与王实味（2）陆定一根本没有恋爱过；
-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这张“证明”是林彪的一箭双雕：即为自己老婆叶群正名，也“痛斥”陆定一和他的老婆严慰冰造谣惑众。面对这张大员之间勾心斗角的“证明”，

高官们在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之后，很快还过神来，便狠批起陆定一来！

到此，人们终于看到了中共最高层领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看到了他们高喊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看到了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迫切性**；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老百姓为中共最高层领袖们的原则性、迫切性和不可调和性付出 200～300 万个生命的**必要性**！！

天才的毛泽东，利用这次会议玩起了猫耍老鼠游戏，他要借刘少奇、邓小平的双手，导演一出自相残毁的绝代悲喜剧。

此时的党内右派首领刘少奇，极力掩盖自己的空虚和失落，不得不在三倍于政治局委员的左派面前，违心地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来主持会议。此时的党内左派首领毛泽东，则远在杭州遥控会议，观察着刘、邓的一举一动，业已露出胜利者的喜悦。这是“民主集中制”赋予他的特权：党的主席可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而通过遥控以观察政治局委员们的动静。

绝代悲喜剧之一是，在刘、邓主持下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斗，把早已打倒了的罗和“发配”到外地的杨硬拼合在一起，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撤消了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隔离审查。5 月 23 日，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任命李雪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这等于刘、邓举刀砍掉了自己的左右手。

这是自残，也许是不得已的自残。在中共权贵们的道德观念里，出卖好朋密友并对其落井下石，是“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现，因而是一种保全自己最有价值的选择。更可笑的是，彭真在表决时，不仅举手赞成罢黜自己，在表态时还用“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反诘，来证明自己是全党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

对于自残，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以为耻地自欺欺人。6 月 27 日，他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分别对他们的左膀右臂，痛加鞭挞。

刘少奇说：

“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理直气壮地落井下石！

“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

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插话：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是讽刺？抑或幸灾乐祸？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这位坚决不给知识分子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中宣部陆部长，可怜得很！

“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据信，安窃听器是经他批准的，杨尚昆是替罪羊而已。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先治罪，后侦讯，这是毛式独裁的惯例，是现代文明无罪推定的倒行逆施。

“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他没有想到，仅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便断然把炮口对准了他，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处”。

邓小平说：

“两件大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更大。”——善于看风使舵；与文革后他为“彭罗陆杨”平反的鲜明对比，成了中共赤文化的一大特色。

绝代悲喜剧之二是，5月16日，在刘、邓主持下毫无阻挡地通过了打倒自己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图07-1）。江青说，从“七千人大会”憋到现在，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五一六通知》是在3月底，毛泽东背着政治局常委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成立的一个起草小组秘密起草的。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组员由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等。秘密起草的《五一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还撤销了《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4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先一步通过了这个《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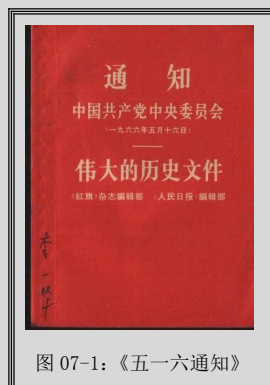


图07-1：《五一六通知》

这种非组织活动非但没受到谴责，反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人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手段之高超，也不能不承认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造就了绝代独裁。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他对那些过去曾效忠过他但现在效忠不够的知识界文化人和官员们大加鞭挞：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狼要吃羊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但为了证明狼的“伟大、光荣、正确”即“伟光正”，找个“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由”，展示一下“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吃羊时就能“理直气壮”，被吃者也能“逆来顺受”，旁观者就会“心悦诚服”，全国上下都会振臂高呼“万寿无疆”！

《五一六通知》恶狠狠的批判《二月提纲》中提出的“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是“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是把“反对的锋芒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是虚伪“资产阶级的博爱观”，其目的是“开辟一条……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等等。

此时的刘、邓已知自己在毛的心目中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处于非常不利的弱势地位。但他们不愿沦入“羊”群，还要千方百计地向毛表忠谄媚，力求毛的宽恕，力争保住自己“狼”的尊严。于是，他们都毫无保留地表态支持了这个《通知》。

5月18日，林彪按照预先与毛达成的默契，在会议上作一个和当年“七

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他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大讲特讲“防止政变”问题，有意制造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紧张气氛。然后他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紧握枪杆子的林彪声色俱厉的讲话，使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满了恐怖气氛，形成了人人过关的局面。与会者人人自危，为了自保，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总理周恩来也亦步亦趋地大讲“防止政变”，并不遗余力地领导落实防政变的各种政治、军事和组织措施。领导七亿中国人的最高集团的权贵们，竟是这样一批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又落井下石的无耻之徒！

绝代悲喜剧之三是，在刘、邓主持下批判开国元勋朱德元帅。

二、批斗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图 07-2）

过来者都知道朱德何许人。在少年时期的“旧”社会里，笔者在“杀朱拔毛肃清共匪”的墙标上，就认识了中共数一数二的大人物朱德。“解放”后，笔者在跟着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同时，也跟着高喊过“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

谁知这位中共二号人物不识时务，总爱与一号人物闹点小别扭，于是地位江河日下，中共八大时变成了四号人物，1959 年军委副主席也丢了，只弄了个常委。也许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文革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头衔并没有被革掉。



图 07-2：“建国”初领袖标准像朱、毛并列

据体制内学者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朱德在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厉的批判。该书有如下的记载：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 32 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泽东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

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

在**档案资料死不解密**的情况下，人们也只能从有条件接近机密档案资料的体制内学者、作家们著作的字缝里，去发现“谣传”朱德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受到严厉批判这个事实；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许农合写到此处又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这是体制内作家、回忆录撰写者和出版家们的通例：遇到与“主旋律”相左的敏感话题，就闪烁其辞或话到嘴边留半句。但还有“胆大妄为”者，他们向外界披露了朱德挨斗的记录。

据被披露的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文件上，记录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元帅受到严厉批判的情况。现摘要抄录如下：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朱德被责令作检讨。

朱德：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

方彭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没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

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看一看以上中共大员的批朱言论，再想一想庐山会议上中共大员们在批斗彭德怀时的发言，他们之间在人性邪恶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为了保全自己而效忠而对过去的战友落井下石；如果有什么不同，就是对于一个年逾八十的老同事、老战友和老上级，更要给他加上一个“搞政变”、“黄袍加身”和“定时炸弹”的罪名，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从以上摘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许农合主编的那本《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书里，编者有意回避了周恩来、陈毅，薄一波和乌兰夫在对朱德恶意攻击中所暴露出来的卑劣人格。

体制内学者许农合为什么要回避周、陈、薄、乌等人对朱德恶意攻击呢？在大陆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旦某某领导人被中共定为坏蛋，铺天盖地的批判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极力丑化他的隐私也合理合法，林彪、康生被定为奸党，所以，揭露他们对朱老总的恶意攻击便顺理成章；反之，某某领导人如周、陈、薄、乌等被中共定为功臣，就要树立他们的高大形象，他们的错误、罪行和丑陋人格，都要“保护”起来，任何人揭露他们的负面，都可视为“造谣”、“污蔑”，轻者封杀，重者查处。在这种“主旋律”的“导向”下，真相被掩盖，人物或被拔高或被丑化，历史真实就这样被扭曲和篡改。

在摘录中我们没有看到刘少奇的言论是个遗憾。在毛泽东时代，在会上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与会者没有沉默的自由，沉默等于反对，会议主持人没有不作为的权力，不作为就是破坏。因此，可以推定，惧于毛的威严和毒辣，会议主持人刘少奇一定会有所作为，只是在文档解密前，人们暂时无法看到而已。

会议结束后的5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自此，这个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线指挥机构，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最终让刘、邓靠了边。8月

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从此，**江青**这个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第一夫人，便成了权倾中国令人生畏的风云人物。

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5月31日，手持“尚方宝剑”的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没有登报，没有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到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手中。被夺权的《人民日报》社总编**吴冷西**这样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一小小的政变”。

1、横扫知识界

在大跃进中**吹破时空**的总编**吴冷西**，在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不得不谨慎小心地摇摆于毛、刘两派之间，最终，还是灰溜溜地被“横扫”出人民日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缺点是没有“**指名道姓**”因而“**没有击中要害**”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图07-3）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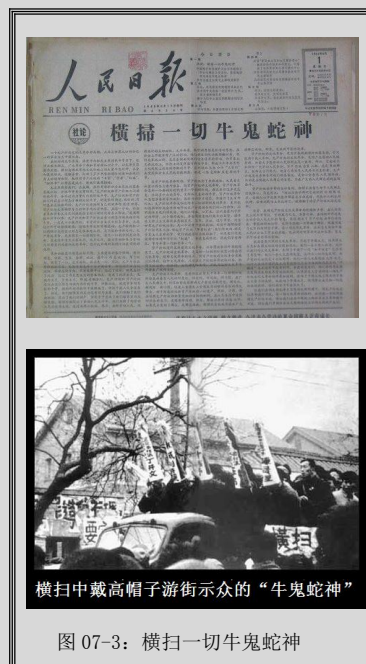


图 07-3：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

“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牛鬼蛇神”原是指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形象，后喻形形色色的丑恶或坏人。中共使用“牛鬼蛇神”词语，早见于《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批言中，那是毛泽东在1963年5月9日为这个文件写的。《人民日报》作为中共党的喉舌，它的社论就是中共党的方针政策。因此，自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一词便成了家喻户晓的政治概念。有人说，这种政治概念没有严格定义，模糊不清，易生歧意，很难准确掌握。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可以任意伸缩的模糊概念，正是毛泽东和中共权贵们所冀求的：伸，可置敌于死地，缩，可施人以恩惠——这是树立“绝对权威”不可或缺的手段。尽管如是，当时“牛鬼蛇神”的指向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泛指教育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和文艺界中一切不愿学习毛泽东著作因而被视为没有改造好的学者、专家、教授、作家甚至学生，泛指支持和领导“牛鬼蛇神”的校长、院长和政府官员，泛指早已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反动”子女，泛指被左派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党内右派成员，等等。那么，谁是“牛鬼蛇神”呢？用不着法律条条界定，也用不着监察官起诉和法官断案，只用来自“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句话：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大多数老百姓呢？他们必须跟着起哄，否则，就有“牛鬼蛇神”的嫌疑。

陈伯达不过一个文弱书生，毛的一介秘书，刚刚上任文革小组组长，便立马横刀，怒吼天下，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社论》得到最高的谕示或授权，因而据有非凡的权威。

2、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是借一张大字报的“东风”写成的。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矛头直指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

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图 07-4）大字报点名的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在揭露批判北京和北大领导的同时，十分尖锐地、杀气腾腾地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张由毛授意、康生导演的大字报一贴出，立刻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下令中央广播电台在 6 月 1 日以全文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应命在全文发表大字报的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7 月，毛泽东又对聂的大字报做了极高的评价：“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图 07-4：“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7 月，毛泽东又对聂的大字报做了极高的评价：“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显然，不仅要消灭他们的精神，还要消灭他们的肉体。这是恐怖的先声！这是“红色恐怖”的号角！毛泽东赞扬这种恐怖，《人民日报》欢呼这种恐怖，党内左派集团竭力鼓噪这种恐怖，充满血腥的红色恐怖终于被煽动了起来：几年间，红色恐怖肆意暴虐大陆中国，虐杀了数百万个无辜生灵。

对于聂元梓的大字报，官方主流媒体说是在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直接策划下写成的；但聂本人并不认同。聂在《聂元梓口述自传》一书中透露，由于她在四清运动中给陆平提了许多意见，陆平曾借机整她，结果与陆结怨很深。这次她想借《五一六通知》的“官理”来“摆平”她与陆平的私怨。为此，她请示曹轶欧：“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因为陆平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行，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于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贴到了北大校院内墙上。

“请示”得那样恳切，答复得那样随意，而大字报要“消灭一切”的火药味那样浓烈，人们不能不否定聂的“回忆”：她想与死后横遭“鞭尸”的康生划清界限，因而否认康的策划。不管她是否想“划清界限”，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她要借助《通知》官报私仇，亦即借助钟馗打鬼。然而，

她的公报私仇，使毛泽东有了严惩异己的借口。这里，人们再次看到毛泽东发动“群众”的高招：**示意或授意忠实执行者，有目的的选择、鼓动和培训“群众”，使“群众”能够在实现其主要谋图上，表现出绝对忠诚和魔鬼般的虐杀勇气来！**

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横扫”社论见报、广播后，到6月5日，《人民日报》一口气连续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四篇社论。在《人民日报》煽动下，北京各大、中学校风起云涌，硝烟弥漫，红色恐怖氛围逐渐形成！

经毛泽东批准，6月3日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便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3、学校大乱

当《五一六通知》、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横扫》社论先后见报后，整个北京都被煽动起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生性酷爱自由的学生们，被长期**封建党阀式奴化教育**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昔日平静的大、中学校的校园里，浮现着不安与骚动。在父辈的调教下，了解中共权力斗争、洞悉毛泽东动向的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们，凭借多年阶级斗争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一场生死搏斗已经来临，便率先成立他们的组织——红卫兵，把宣泄的矛头对准了《五一六通知》中界定的“阶级敌人”，而不是党阀式奴化教育的始作俑者。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他们给老师提意见，继而对老师进行大批判，接着便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由是，学校的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瘫。进入六月，几篇“横扫”社论见报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跟着大乱，全国各地学校也开始大乱起来。

6月16日，《人民日报》就南京大学发生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发表社论，支持南大大乱，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上海同济、交大、复大、科大等高校，激进学生贴出大字报，揭露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出现了赶走工作组的呼声；西安交大激进学生贴出了省委有黑帮的大字报，扬言要驱逐省委派的工作组……

进驻学校的工作组，是刘、邓的右派中央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作出的决定，意在“横扫”中，把“乱”控制在他们许可的范围内。但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得到的“最高指示”却与此相反：“**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学生被他们煽动了起来，冲突事件、打人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6月18日，在聂元梓等毛左派人士的煽动下，北京大学东语、西语、化学、无线电等系，揪斗了50多位教师，为全国学校树立了榜样。史称“六一八事件”。

对“六一八事件”，作家林正德在《非常十年》里这样描写：

六月十七日，从早晨到次日凌晨二点钟，在北大校园里，愤怒的学生群众到处围住“黑帮”分子，高呼口号，揭露、控诉陆平“黑帮”的罪恶，而这时工作组仍采取不过问的态度。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北大学生一片欢腾起来，热烈欢迎支持。

十八日清晨五点，北大学生又继续斗争“黑帮”分子。一阵阵无节奏的铜锣声在古老的北大红墙校园里刺耳地回响着，一队所谓“黑帮”、“牛鬼蛇神”的队伍正在校园里被游街，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两尺见方的黑牌，头上戴着高帽，第一顶帽子写的是“牛”字，第二顶是“鬼”字，第三顶是“蛇”字，第四顶是“神”字，合起来便是“牛鬼蛇神”。

这一天校园里到处都是人山人海，青年大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白炽化的程度。哲学楼、大饭厅、三十二斋、三十五斋、三十八斋（笔者：北大把楼叫成斋）、校医院、二院、南阁的前面，凡是有一块空场地的地方就设立“斗鬼台”，拉来“黑帮”分子就斗。这一天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各单位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统统被揪出来斗（陆平、彭佩云除外），人数多达五十余人，有的人一上午被揪斗了几次，他们有的挨打、有的罚跪、有的“乘喷气式飞机”。

那些“黑帮”、“牛鬼蛇神”们有的木然地任人摆布，有的挣扎反抗着，有的大声抗议，然而，当时的青年学生们都发了狂，反抗只能带来更可怕的报复，有的被吐了一脸的口水，有的挨了响亮的耳光，有的衣服被浇了墨汁，白衬变成黑衬衫，有的女教师衣服被拉脱了扣子，露出了雪白的胸脯……

六月二十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的一个常委和一些干部，提出“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口号，支持的学生马上举行了示威游行；支持院党委和工作组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两军对峙。

六月二十日早晨，北京师大学生**谭厚兰**等 17 人贴出“**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第一次把矛头直指工作组。孙友余时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北师大工作组组长。

六月二十日，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学生贴出了“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矛头也指向工作组。

在清华，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的大字报《“怀疑一切”万岁》受批后，六月二十一日，他用大字报号召向院党委、工作组夺权，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同激进学生尖锐对立，虽有数百学生被打成反革命，但在毛左派势力的支持下，各派势力紧紧跟上，造反、揪斗、打骂、辩论愈演愈烈，局面已失去控制。

为了“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没收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在横扫中，擅长乱中取胜的毛泽东，打开了放出罪恶的“潘多拉魔盒”⁽³⁾，把左派学生中的贪婪、杀戮、暴虐分子，一一释放了出来，于是，**批、斗、扭、打、吊、辱骂、罚跪、戴高帽、躬腰、颈上吊砖、抄家、“坐喷气式”**等触及灵魂法被炮制了出来（图 07-5），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式批斗法（见第 01 章附注 3）。在毛泽东的左派暴虐学生面前，学者、专家、教授、作家、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书记、校长等“牛鬼蛇神”们，以及早已被毛打翻在地沦为弱势人群的



“地富反坏右”们，他们的人格、尊严、信仰和毛在亲自制定的《宪法》里“恩施”于他们的“民主”、“自由”权利，等等，统统丧失殆尽，被批斗得“威风扫地”，从而被推到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的境地！在毛泽东和《人民日报》的鼓动下，**红色法西斯恐怖局面**，终于形成！

4、刘、邓中计

此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

平，虽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也明白已被毛定为赫鲁晓夫式人物，但为了争取毛的宽容和谅解，便积极投入到领导这场被迫接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为此，他们一方面对迅猛而来的运动做出八条限制性规定，即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防止局势进一步失控，另一方面，他们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由于得不到毛的明确答复，刘少奇在六月上旬同其它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谈笑风生，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而对他所提的问题含糊其辞，不明确表态。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是：伟人之所以伟大，在于**在政治斗争中，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可悲的是，紧跟毛泽东三十多年的刘少奇，竟不知是计，还以为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返京后，刘便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取代已经瘫痪了的校党组织，对运动实行直接领导，力图扭转日趋恶化的局势。

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这是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曾用过的“阳谋”诡计的翻版。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刘少奇的悲剧在于他利令智昏，不知道为了打倒以他为首的党内右派，今天在他眼里的“牛鬼蛇神”，恰恰是毛泽东要依靠的左派力量。

在刘、邓工作组当权其间，被打成反革命的激进学生，纷纷变成了反工作组的急先锋。其中，北航学院的**韩爱晶**、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人，最为活跃；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却也是反工作组的干将。在这种控制、反控制的红色恐怖中，名扬全国的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应劫破壳而出。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在想什么呢？此时的毛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学生，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级**深为不满，从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已看出来了。这种怨气在被反右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而这些年来积怨更深。这种积怨与高干子弟们“革命血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颠覆力量。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党内右派集团的反叛“憋了一肚子恶气”的毛泽东，决计对党内右派集团施展与反右运动“阳谋”相反的阴谋诡计：一方面刻意容忍刘、邓派工作组控制运动，另一方面幕后唆使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人民日报》，煽动颠覆力量造反，进行反对工作组控制的斗争；他蓄意把水搅浑，制造对立，

把老百姓对中共怨恨情绪引向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及其社会基础，为全面夺权做准备。

在控制和反控制的激烈较量中，聪明一世的刘少奇，完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毛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去。仓促上阵的工作组，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把数百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样一来，与造反的学生形成严重对立，导致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发生。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海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了。

为了打击刘、邓和他们派出的工作组，毛泽东完全抛弃了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始了分裂中共中央的“阳谋”：在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闹革命之后，发表了著名的“支持闹事”讲话。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为了促使革命走向激化，挫败工作组的求稳谋图，他又运用阴阳两面手法，在高唱“讲道理”的同时，使拳脚相加的打人合理化。1966年6月，面对工作组疲于控制的打人高潮，他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即所谓“不主张打人”的“最高指示”：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这是支持打人？抑或反对打人？请读者自己做判断。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他作了个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长江。在特意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7月18日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

“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不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江青、陈伯达等人到北大、清华等院校去，明里调查研究，实则煽风点火，搜集刘、邓材料。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

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进行揭发批判。

江青登上讲台，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用颤抖着的尖细的声音狠批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了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江青的情绪随着欢呼声、口号声激动起来。忽然思想“走火”，竟大骂起毛岸青之妻北大学生张少华来：“他妈的是个政治骗子。韶华（张少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时骗他和她结婚的。”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江青这一番话，使热血沸腾的学生们明白，江青婆媳之争也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江青的讲话，逼得张少华仓皇出逃，在外地藏匿数月之久；后因生活无着，才不得不向周恩来求助。时任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聂元梓等当事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有类似记载。

站在江青两边的康生、陈伯达显得十分尴尬。

江青讲话后，康生在台上大声宣布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一句话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对康生的谎言，那个被毛泽东任命为工作组组长、并以工作组组长身份在《人民日报》社里搞了个“小小政变”的陈伯达，理直气壮地点头称是。

最后陈伯达讲话。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陈的“建议”就是命令。

在撤消了工作组同时，也推翻了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台下那些曾受工作组打压过的学生，瞬间从“反革命”变成了革命者。学生们的反抗精神获得了褒扬，于是，解放了，翻身了，当场有不少激进学生激动地哭了，反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的表态和江、康、陈等人的煽风点火，使刘、邓主持的党中央乱了方寸，陷入尴尬、沮丧，被迫下令撤出全部工作组。

1966年7月29日，已经在毛泽东布下的火海中被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出无奈，露出苦衷。他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

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特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显然，刘少奇缺乏周恩来逆来顺受的“精明”和随机应变的“干练”。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直接向他兴师问罪。

四、《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图 07-6）



图 07-6：1. 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2. 《人民日报》刊登《十六条》 3. 《学习十六条手册》

此时的毛泽东决心借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逐步罢黜刘少奇，教训邓小平。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141 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 47 人，列席了会议。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他们的检讨大都很勉强，多是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直接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这种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为此，毛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复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下去，想在全会上点一把火。他原本期望他在中央全会上登高一呼，与会者就会像青、少年学生中的红卫兵那样，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然而，应者寥寥，多数人同情

和支持刘、邓，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甚至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会议开得十分沉闷。毛泽东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会议证实了他的预见：反对他的人不是几个，而是一大批。他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压，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以期达到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目的。8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使用惹恼激怒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甚至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但毛不依不饶，继续指责刘少奇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终于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便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毛泽东：“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五不怕”即毛泽东常说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样一来，不啻火上浇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部署。

到此，毛泽东剥掉了他创立的“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装璜，暴露出“集中”独裁的本相，使与会中委大员们望而生畏，自顾不暇。这就是领导七亿中国人民的中共中央委员会。

惹恼激怒法取得成功后，8月5日，毛泽东用异常激烈的语言写了一篇痛斥刘少奇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把这些“帽子”扣到刘、邓头上并不为过，因为他们历来都是这么干的；但如果说毛是其反对者，则大谬矣！中共历史，就是一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红色恐怖的历史。从井冈山肃反到延安整风，

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整肃彭德怀、批《海瑞罢官》，那一件“压制”不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那一桩“恐怖”不是“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中共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合力下成就的？毛泽东把自己打扮成倡导民主、自由的君王，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伎俩是对民主、自由的玷污！因此，这“五十多天”的历史，不过是毛泽东玩弄权术、设置陷阱、打击对手的内讧历史而已。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全会后，面对中央委员会内强大的右派势力，8月6日，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当时“卧病”在床的陈云，这位在毛死后大反文革的政治局常委，立刻致信向毛泽东效忠，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8月8日，全会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由毛泽东修改并亲定题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8月9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全文发表了《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声称“**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乡头村里，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各种场合的会议，人们也高呼这样的口号。

《十六条》是毛泽东整肃党内外刘、邓右派集团的檄文，是他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的。据陈伯达回忆，着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文革小组成员“笔杆子”王力也参加起草工作。《十六条》前后改过多次。陶铸、王任重、张春桥也参加过一些修改工作。尽管当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会议的公报的初稿已在陈伯达的主持之下写好。据王力回忆，当时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

第一，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

第二，送审传阅的名单上，主席后边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给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公报的初稿曾引用了刘少奇声明中的几句话。

这三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挨批判连公报初稿都不再送他审阅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将取代刘少奇，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一贯倡导“民主”的毛泽东，独断专行，背着中共中央七个常委中的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多数，搞阴谋、施诡计，党的中央委员和高层权贵们，却熟视无睹，坦然接受。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格**，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体格**，这就是领导七亿人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格**！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全会不过是实现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工具而已。

8月9日，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志，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由于十一中全会上遇到了党内右派集团的巨大阻力，毛泽东决定走出全会，到数年造神运动中培植出来的“群众”中去号召造反。8月10日下午7时，他突然出现在中南海西门的接待站，会见由文革小组为他挑选好的“首都革命群众”，并在“首都革命群众”的簇拥下，走上讲台，用洪亮的声音鼓动造反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中央委员的有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有人说，在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没有达到罢黜刘、邓的目的。这是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的战术和耐力：**层层剥荀，步步昭示宽容，避免一蹴而就失人心。**

刚来中央的陶铸为什么一跃成了第四号人物？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

最初的名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邓小平怎么会名列第四呢？因为他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四。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这样排不行！”江青向林彪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江青的话，正中林彪的下怀。于是，把邓小平排列到陈伯达之后，名单顺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江青看了名单，仍不满意。江青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根据江青的意见，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四位，最后敲定了中共中央常委的排列顺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能敲定中共头头坐位排次，可见她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万人之上，毛、林两人之下。在毛的威慑下，中共中央委员会形同虚设：举举手，盖盖章，如此而已。**中共党员们能期望什么？中国人还能期盼什么？**

在《十六条》的鼓动下，充当枪使的红卫兵，“杀”出校园，“杀”向社会。城市沸腾起来，农村也即将沸腾起来，一场新的、规模更大、来势凶猛的风暴，已经形成。

五、第一波自杀风潮

主人权斗，奴仆遭殃。《五一六通知》通过后，引发了从1966年5月到7月的第一波自杀风潮。这个“第一波”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波，也是中共“解放”中国人民、成立“新中国”十七年后的继土改、肃反、反右、“一化三改造”、大跃进和“四清”运动后的第七波自杀风潮。“新中国”成立后那六次风潮中，至少有**100万人**自杀。不同的是，文革第一波自杀风潮来势汹涌、迅猛，此时的**红色恐怖**已经充满血腥！

在毛泽东时代，自杀被界定为“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罪行，按毛泽东说法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要“**遗臭万年**”的。但许多无法忍受毛式批斗的人，却宁冒“遗臭万年”之“大不韪”而选择了自杀。据专家、学者推算，在第一波自杀风潮里，全国约有**3~5万人**，在“横扫”中自我了断！

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高级干部，可能是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他是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5月18日自杀的。

邓拓是1930年就参加中共的老党员，五十年代，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多年。1956年，由于持刘、周在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政策，使毛泽东的“反反冒进”思想在《人民日报》宣传力度不够，被毛斥为“书生办报”；1957年反右时，又由于缺乏“引蛇出洞”的积极性，使《人民日报》内部反右成果不大，又被毛斥为“死人办报”。很快，总编辑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吴冷西取代。带着“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两顶帽子的邓拓，被迫降级到北京市委任副书记。对毛颇有微词的邓拓，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政见相同，一拍即合，在北京各报刊上开辟了一个叫《三家村札记》栏目，邓拓独办了个《燕山夜话》。他们在知识性、趣味性掩护下，以隐晦、曲折、暗喻、影射等社会主义笔法，抨击毛泽东“三面红旗”等政策，含蓄地指责其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赢得了许多读者。批评时政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但在毛泽东时代都是犯罪行为。随着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发展，彭真为了保护自己，他抛弃了邓拓，向毛泽东打了批邓拓的报告。于是，北京传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的顺口溜。彭的利令智昏，为毛泽东所利用。毛倒刘、邓右派集团的部属是：批斗邓、吴、廖“三家村”，继而揪出彭真，最后打倒刘、邓。到5月8日，北京各大报刊出了毛泽东怒斥“三家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的讲话：“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毛的怒斥，推动了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运动；毛左派集团的精英们也大喊大叫，要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5月16日，杀手戚本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给邓拓致命一击，宣布他是叛徒；并且警告说，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这种显然来自“最高”的声音，把邓拓逼上了绝路。熟悉党内斗争的邓拓，深知任何自由主义和独立人格都是毛泽东的大敌，一旦《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所蕴涵的独立、自由主义精神被“最高”识破，便“罪责”难逃；他也深知，他不可能得到党内其他实力人物的理解和支持，得到的唯有落井下石。与其让“最高”折磨和“朋友”出卖，何如自我了断？于是，5月18日凌晨，他服毒自杀。

第二个殉难者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5月23日上午，年仅44岁的田自杀于中共政治中心中南海里，而另一说法是被汪东兴枪杀。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14岁时，他在报上与一个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被川中许多人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海燕社”。1937年，15岁奔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后于1938年加入了共产党。1948年8月到1966年5月，他在毛泽东身边当秘书长达18年。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还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

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参与毛泽东、中共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平日毛泽东作诗词和写文章，常要引经据典，一般都由田家英查找和核对，成了毛泽东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被毛誉为不可多得的忠良才子。但大跃进以后，田的自由、独立思想与毛的专制、独裁品格，发生冲突，逐渐拉开了距离。《五一六通知》公布六天后，即1966年5月22日，他被以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和“最高最活论”、反对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篡改毛主席著作等罪名，被毛批为“右派秘书”，勒令“停职反省”，逐出中南海。

对于田家英的死，体制内作家们都把他说成是自杀，但在描述自杀时间、地点和自杀方式等细节上出入较大，有的闪烁其辞，也无尸检文件证明。更为甚者，他的女儿曾自，在回答香港著名记者陈鲁豫采访时，在首肯父亲死于自杀的同时，却又语焉不详地暗示：“然后，这时候我母亲在机关呢，中组部的安子文给她打电话。哎哟，我母亲说她当时头懵了，早晨走的时候，好好的，没想到他会有这种。然后旁边这些负责的人就揪着她的胳膊，她说把我揪得都生疼，都揪出手印来了，一定要你过去看。她看了。后来她认为，看，就是让你证明认可他是自己去世的。”

然而，一种不同的说法却广为流传，还有泄密的中央文件佐证：**田家英被汪东兴枪杀。**

在档案无限期尘封的今天，这种传说和文件是真是假？人们难以搞清。笔者权将知情者的描述摘录于后，供读者圣鉴。

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一〇〇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

“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〇—四—〇〇九〇—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行，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笔者：刘少奇）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不久，内卫朱国华自杀身亡。

斯人已去四十年，疑云重重消释难。人们期待档案解密。

当人们为名人之死鸣不平时，却忘记了对小人物“自杀”的关注，尽管朱国华可能曾是汪东兴的“帮凶”。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像关注大人物那样去平等地对待小人物的命运呢？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兰州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的自杀。

江隆基，1905年生，陕西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初，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校党委工作。1957年反右中，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紧跟中央的党性

原则和毫不手软的对敌斗争作风，为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立下了汗马大功：在八千多人的北京大学，成功地抓出了 716（另说 699）个右派分子，并用毛式批斗法对右派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据说，其中有十多个死于非命。1959 年 1 月，江隆基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反右 9 年后，1966 年 6 月 17 日，得到省委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用毛式揪毆法（4）进行斗争。他们强迫江隆基跪在桌子上，扣上重十多斤的铁笼子。6 月 23 日，兰州大学再次召开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等进行批斗。6 月 25 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这个得不到中共党组织谅解的功臣，终因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奋然自杀。他**先是施刑者，后为受刑者**，这就是他的历史。笔者这么说，不是说江隆基得到了什么“报应”，事实上许多曾助毛作祟的中共功臣，大都能安度晚年。这里仅仅说从反右到文革的发展逻辑：**反右是文革的必要准备，文革是反右的必然趋势**。

6 月 1 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胡揪乱斗之风甚嚣尘上。特别是当毛泽东那条“**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的“最高指示”传到社会上以后，那些学者、专家、教授和作家们，便首当其冲。由于忍受不了“**触及灵魂**”和“**没收反动思想**”等毛式批斗法的痛苦，“畏罪”自杀便成了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笔者搜集到的一些资料，从《五一六通知》公布到 7 月底的“横扫”中，自杀的知名学者、专家、教授、作家有：

傅洛焕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吴恕求	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
光开敏	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
李平心	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汪 钱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毛启爽	上海科技大学教授 教务长
朱代杰	北京铁道学院教授，自杀后妻子自杀。
徐 韬	上影制片厂海燕厂导演
姚 溱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高芸生	北京钢铁学院院长
李国全	中央歌舞剧院副院长
李铁民	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
许世华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易光轸	北京市 52 中学副校长

“横扫”中专家、学者遭殃，也祸及学生、职员和家属。如，西安交大学生**沈丙辰**、**王永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沈新儿**，诗人闻捷的妻子**杜芳梅**，江苏省沙洲县凤王公社医生**缪志纯**和妻子**孙惠莲**，等等，都在“横扫”中纷纷自杀（5）。

遗憾的是，笔者搜集到的自杀资料不足全国自杀人数的千分之一，且未能搜集到“地富反坏右”等弱势人群的自杀资料。

第 07 章附注：

附 1、狼与小羊（伊索寓言）

一只小羊在河边喝水，狼见到后，便想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吃掉他。于是他跑到上游，恶狠狠地说小羊把河水搅浑浊了，使他喝不到清水。小羊回答说，他仅仅站在河边喝水，并且又在下游，根本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见此计不成，又说道：“我父亲去年被你骂过。”小羊说，那时他还没有出生。狼对他说：“不管你怎样辩解，反正我不会放过你。”

这说明，对恶人做任何正当的辩解也是无效的。

附 2、王实味

王实味（1906~1947）河南省潢川人。1923 年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5 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1930 年在上海跟刘莹结婚。因不满国民党当局，忧虑时事，1937 年 10 月，只身奔赴当时青年人向往的“灯塔与明灯”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对王实味极为反感。他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又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于是，1942 年 6 月，延安掀起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周扬发文指责他文艺思想是托洛茨基文艺思想。1943 年 4 月 1 日，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审查结论不断升级，最后于 1947 年 7 月 1 日夜，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等罪名，将王实味砍杀于一眼枯井中，时年四十一岁。

三十多年后，年迈的刘莹从广播中得知王实味于 1947 年已被处决，断然认定这是政治诬陷，便开始申诉。到了 1990 年 12 月，中共中央终于宣

布了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时，其子已经五十五岁，面对平反决定，泪流满面。

附 3、潘多拉魔盒

潘多拉 (Pandora, 希腊语: Πανδώρα), 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用粘土做成的人类的第一个女人。众神都努力打扮她, 使她拥有更诱人的魅力。作为对盗取天火给人类带去光明的惩罚, 宙斯把她送给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根据神话, 潘多拉出于好奇, 她打开了宙斯给她的一个装有祸害、灾难和瘟疫的魔盒, 释放出人世间的所有的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等; 当她再盖上魔盒时, 里面只剩下了希望。

附 4、毛式揪毆法

毛式揪毆法是毛式批斗法的升级版。毛式批斗法是以说“理”文斗为主, 暴力武打辅之; 毛式揪毆法则以暴力武斗为主, 即以抄家、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坐喷气式”、奸污、吊打、打死等暴力武斗为主, 辅以说“理”文斗。其中, “坐喷气式”是: 受刑者跪在地上, 或桌上, 腰弯九十度, 施刑者抓住受刑者的头发, 使其脸向前方, 再将其左右两臂高高架起, 伸直, 把受刑者身体扭曲成喷气式飞机那样, 俗称“坐喷气式”。(详见图 07-5)

附 5、1966 年 5 月~7 月自杀身亡者名录表

资料来自《文革受难者纪念馆》、《文革博物馆》、《文革时代》等网站。
令人遗憾的是缺少农村自杀纪录。

编号	姓名	职业	性别	年龄	死亡月份	死亡地点	何种运动、说明
1	邓拓	书记	男		5	北京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杂文家
2	田家英	秘书	男	44	5	北京	毛泽东秘书 在中南海书房中死亡
3	光开敏	教授	男		5	北京	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
4	傅洛焕	教授	男	53	6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5	汪钱	教授	男		6	北京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6	李平心	教授	男		6	上海	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
7	郭敦	演员	女	30	6	山东	山东烟台话剧团演员
8	江隆基	干部	男		6	兰州	兰州大学校长
9	彭蓬	高师	男		6	上海	华东化工学院政治教师
10	徐韬	导演	男	56	6	上海	上影制片厂海燕厂导演
11	许世华	干部	男		6	北京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12	姚溱	干部	男	45	6	北京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3	易光轸	校长			6	北京	北京市 52 中学副校长
14	曾瑞荃	中师	男	40	6	上海	上海市吴淞二中语文老师
15	朱代杰	教授	男		6	北京	北京铁道学院教授，死后妻子自杀。
16	朱 妻		女		6	北京	
17	吴恕求	教授	男	41	7	天津	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
18	董怀允	高师	男		7	北京	北大数学系讲师
19	杜芳梅		女		7	上海	诗人闻捷的妻子
20	高芸生	干部	男		7	北京	北京钢铁学院院长
21	龚起武	员工	男	54	7	西安	西安交大图书馆职工
22	金志雄	员工	女		7	上海	上海复兴中学图书管理员
23	李雪影	中师	男	36	7	上海	上海大同中学教导主任
24	楼文德	厂长	男	50	7	上海	上海沪光工具厂厂长
25	毛青献	高师	男	50	7	上海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
26	毛启爽	教授	男	60	7	上海	上海科技大学教务长
27	缪志纯	医生	男		7	江苏	因家庭出身“地主”，被斗，夫妻投河 自尽于常熟慕城
28	孙惠莲	职员	女		7	江苏	
29	沈丙辰	学生	男	24	7	西安	西安交大真空 31 班
30	沈新儿	学生	男		7	上海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
31	王永婷	学生	女	23	7	西安	西安交大压缩 21 班学生
32	张凤鸣	中师	男	30	7	上海	上海市吴淞二中外语老师
33	张友白	中师	男	30	7	上海	上海市新沪中学数理老师 右派
34	范其鲁	学生	男		?	北京	清华大学毕业
35	方诗聪	中师	男	40	?	上海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
36	李国全	指挥	男		?	北京	中央歌舞剧院副院长
37	李铁民	校长	男		?	上海	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

第 08 章 利用红卫兵再造神

08 章目录

★一. 毛的红卫兵 二. “接见”红卫兵 ★三. 教训红卫兵

★四. “三忠于、四无限” 1. 大跳“忠字舞”

2. 大唱“语录歌”、革命歌曲和样板戏 3. 毛主席像章热 4. 红海洋

5. “三忠于”的来源和消亡 第 08 章附注

一. 毛泽东的红卫兵（图 08-1）



“红卫兵”最早是北京市清华附中几个学生写的一张字报的署名。1966 年 5 月 29 日，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骆小海、张承志等人，首先发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个由工农兵、革命干部等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中学生组成的组织，是个比较自由的团体，年龄多在 13~18 岁之间。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由于比较自由，许多学校便亦步亦趋，纷纷效法，也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来。然而，正是由于比较自由，便与刘，邓派出控制局面的工作组发生尖锐冲突。**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便在工作组与红卫兵之间展开，而且愈演愈烈。由是，许多红卫兵被大权在握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其组织被勒令解散。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中，天才的毛泽东忽然发现，红卫兵组织可以成为他终结刘、邓权力的依靠力量。于是，他决定支持红卫兵组织。6 月 2 日，在他秘密授意下，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在军干子弟卜大华的带动下，100 多个学生在大字报上面签了名。秘密授意是毛泽东发动群众的高招。接着，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鼓动、串连和捉笔、修改下，卜大华等几个中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出了《二论》和《三论》。至此，红卫兵组织已打上了权力的烙印，失去了自发、自由的动力。7 月 28 日，他们把《两论》交给了授意者江青，要她转呈毛泽东。

8 月 1 日，为了挫败刘、邓派工作组控制局面的努力，善于煽动勇敢分子、流氓无产者和痞子起来造反的毛泽东，接到《两论》后，按既定计

划，给十几岁的中学生们写了一封回信，鼓动他们起来向党内右派官僚特权阶级造反。回信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诉，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然而，两年后的1968年8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时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显然，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目的，是叫他们出来“闹一闹”，闹得刘、邓右派集团不得安宁，闹得刘、邓工作组无法控制局面，闹得他能借机镇压异己者，闹得他能借势夺权。这与他高度赞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面对毛在暗箱中的计谋，十几岁的红卫兵怎能理解？

毛泽东的回信，使备受刘、邓工作组压抑的红卫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迅即打出造反旗号，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心甘情愿地当起毛的打手、屠夫来。毛泽东幕后发动和操纵红卫兵的阴、阳两谋，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青少年处在成长期，需要用体现现代文明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启迪他们的智慧，规范他们的言行，使他们成长为恪守社会公德的公民。但在毛泽东封建党阀式的革命式的教育中，一方面，他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说教，压制人类的自由天性，培

养绝对服从的奴性，把青少年驯化成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他用阶级斗争说教，煽动仇恨，使敌视人权、自由的兽性得以张扬，从而使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勇敢分子，心目中充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社会性——是非不分、仁义不恭、理性丧失、出手凶狠。这种驯服工具的反社会性，从当时红卫兵的流行话语中已表现了出来：“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 100% 的修正主义！”他们最热衷的毛泽东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就这样，在毛泽东的调教和鼓舞下，青少年学生“摇身”变成了红卫兵，一大批盲目仇视现代文明、行事残忍的小流氓、小痞子和小刽子手，被毛泽东制造了出来。

毛泽东搞政治运动亦即所谓的“群众运动”，有丰富的经验，是发动群众的行家里手。每次运动前，他都能运筹于暗箱之中，然后发动盲从者和包括痞子、二愣子、勇敢分子、流氓无产者在内的“群众”，为他的政治目的冲锋陷阵。这次，他要借无知青少年红卫兵这口“刀”，砍向政敌——以刘、邓为首的右派集团以及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

毛泽东对《两论》的回信，煽起了反社会的狂热，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这封信所包涵的信息，立刻传遍了全国，各地学生们都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由此风靡全国，震惊世界。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卫兵的组织成分，也从学生，发展到教师、工人、干部、城市居民和农民，年龄也从青少年走向成年，红卫兵与造反派也融合为一体。（痛定思痛，笔者紧急呼吁：北京天安门前，理应竖立一座《**红卫兵受难者纪念碑**》，每年 8 月 1 日，即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回信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的那一天，为纪念碑祭扫日。）

有人说，煽动红卫兵造反是步险棋，是走钢丝，但这正是毛泽东过人之处：集阴谋、煽动与控制于一身。曾任中共党史研究员的高文谦，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之所以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还不想收兵，是因为他深知眼前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刘只是暂时处于下风，并没有真正认错服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刘在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表示“对这次的决定思想上早有准备，完全没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在小组会议的发言中公开抱怨被毛和群众“夹在中间”，“上挤下压”。甚至借检讨之机发泄不满情绪，意在言外地影射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就要被革掉，要让人家革，让人家摸，摸个痛快”。况且，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党内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影响远未肃清，从中央

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党政机构对文革运动普遍存在的消极抵制就是证明。而且在一股群众中，刘少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去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围观的群众中还有人喊“刘少奇万岁”的。因此必须趁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刘在政治上的影响，摧毁他的权力基础。否则的话，刘随时有可能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杀回马枪，进行秋后算账，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那样。这是让毛深为忧虑的。

由于十一中全会上遇到了党内右派集团的巨大阻力，毛泽东决心采取非常之举，“趁势穷追猛打”。他**充分利用**长期封建党阀式奴化教育和阶级斗争熏陶下所制造出来的盲目仇外的民族主义、阶级仇恨主义和仇恨人类文明的汪达尔主义（1）等反社会的狂热，**充分利用**几年来造神运动所营造的个人崇拜氛围，**充分利用**群众对官僚特权阶级的不满情绪和青年师生与工作组之间的尖锐对立，**充分利用**青年学生易于煽动的弱点和无所畏惧的造反精神，特别是**充分利用**他刚刚缔造的红卫兵们的无知和强悍，去冲击中央和各地党政机关对运动的抗拒，把向刘、邓右派集团夺权、镇压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因此，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亲自“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鼓动他们大造党内、外右派集团的反，全力支持他们进行全国大串连，造成“天下大乱”之势，借以把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高峰。（图 08-2）



图 08-2：红卫兵造反派袖标和胸章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天才的毛泽东，利用青、少年人的弱点，适时地把红卫兵捆绑在他设计好的战车上，让他们为他冲锋陷阵，充当炮灰。打上权力烙印的红卫兵们，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望，他们把造反的矛头对准了毛泽东憎恶的知识分子和压抑他们的党内右派官僚特权阶级集团，理所当然地把毛泽东推崇为他们的“红司令”！

在 1957 年反右中，毛泽东把胆敢给他、给中共各级官员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分子，并对其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镇压；但九年后，他却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提出“造反有理”的口号，鼓动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起来造反，批斗中共各级党组织和大小官员。从反右到鼓动造反，使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理无常是”哲学的随意性，看到了他出尔反尔政治手腕的流痞性，从而使人们看到了他为保卫个人权力可以不择手段的卑劣人格，看到了他为保卫个人权力而制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

论”的荒谬性和欺骗性。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使汪达尔人望尘莫及，不能不令汪达尔亡魂隔洋兴叹曰：“后生可畏！”

二、“接见”红卫兵（图 08-3）



为了进一步造神，挑动红卫兵疯狂，毛泽东决定用“接见”的方式鼓舞红卫兵，诏令他们崇拜，鞭策他们造反。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决定，是在十一中全会上由他亲自做出的。全会后，中共便组成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都工作组组长，负责统一指挥北京卫戍区组织、实施、接待红卫兵和安全警卫工作。为便于指挥，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设了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由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北京卫戍区的领导负责现场指挥。

1966 年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来京的约 100 万红卫兵参加了这个庆祝大会。由于以后毛又多次“接见”，这次大会便被改称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通宵未眠的毛泽东，从中央警卫团中找了套合适的军服穿上，18 日早晨 5 点钟，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彻夜未眠的红卫兵，看见城楼上的毛泽东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大会安排在上午 7 时半开始，由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话。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8 月 29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中，第一次播发了“**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口号。

“八一八”“接见”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旺，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大串连”，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与日俱增。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大肆宣扬，

把毛的个人声望拔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踌躇满志的毛泽东，觉得这一招造神很有效，于是在8月31日再次“接见”了50万红卫兵。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的首议和批准，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宣布：“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它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至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由于国家财政支持，衣、食、住、行有了保障，各地红卫兵便大量涌向北京。在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横行的中国，代表国家和集体的雇主和各级政要权贵们，便理直气壮地挥霍起老百姓的劳动成果来！（图 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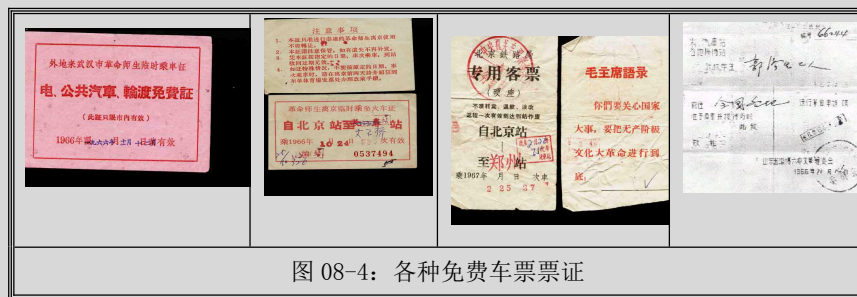


图 08-4：各种免费车票票证

继8月31日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后，又连续进行了六次“接见”。第三次在9月15日，“接见”100万；第四次在10月1日（原本是庆祝国庆大会，也改称“接见”），“接见”150万；第五次在10月18日，“接见”150万；第六次在11月3日，“接见”200万；第七次在11月10、11两天，“接见”200万；第八次在11月25、26两天，“接见”红卫兵250万。三个多月中，毛、林、周等党内左派集团，连续八次共“接见”红卫兵约1,200万人，平均12天多“接见”一次。

在八次“接见”中，最忙碌、最操心的人莫过于倒向左派的中摇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了。

为了保证毛的安全，周恩来费尽心机想了许多“接见”方式，使每次“接见”都不尽相同，而且往往出人意料。

8月18日的“接见”，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领袖”，边走边欢呼着，毛在城楼上以招手回应欢呼，实现

了第一次“接见”。第二、三次，毛先乘敞篷车巡阅在广场和长安大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再招手检阅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第四次，毛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检阅通过天安门的游行方队，晚上，毛乘车到南长安街巡阅参加盛大焰火晚会的红卫兵。10月18日，在从天安门到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约50里长的路线上，摆布了150万将准备被“接见”的红卫兵。沿途投入了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并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兵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等等。12时50分开始，毛、林、周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在12辆警车的引导护卫下，沿50里长的路线上呼啸而过，实现的第五次“接见”。尽管第五次“接见”时间短，有利于毛充分休息，但安全堪忧，周决定第六次“接见”用车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图08-5-左)。于是一声令下，6,000辆军用卡车从北京、沈阳、济南等军区火速云集北京，实现了车载式“接见”。第七次“接见”分两批。第一批150万红卫兵，于11月10日以游行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检阅，第二天11日，第二批50万红卫兵，被摆布在天安门和东西长安街上，毛等中央领导人分乘9辆敞篷吉普车，对其进行巡阅式“接见”。第八次是最后一次“接见”，共“接见”250万红卫兵。因为人数太多，周决定分两批进行“接见”。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再“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9辆敞篷吉普车，对其进行巡阅式“接见”。



作为“接见”总管的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接见”中，发现天安门楼上过于冷清，与楼下的欢呼雀跃气氛形成很大反差。他准确地把握住毛的思想，想出了一个讨毛泽东欢喜的招数，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让他们近距离欢呼雀跃，实现货真价实的接见。(图08-5-右)当1,500名红卫兵代表带上了天安门城楼后，按周的安排，把他们组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泽东接见。周恩来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接见时的注意事项，并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他陪同毛泽东先后到东、西平台同部分红卫兵握了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见。这样安排，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楼上楼下的欢腾融

为一体，万岁的呼声和颂扬的歌声，响彻城楼和广场上空，使毛泽东非常高兴。

进入9月后，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很大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恩来像战争动员那样不断地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他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万名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一八七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

进入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当时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的衣物。这时，周恩来又在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秋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总算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然而，在三个多月的八次“接见”中，最少的一次“接见”50万，多的高达250万，当年既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报刊报导过一起安全事故！人们从《人民日报》等报刊印发的照片上，看到的都是手举“红宝书”、面向“红太阳”的一张张笑脸，从“中央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里，听到的都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人们不能不称赞“接见”组织之周密，不能不承认红卫兵纪律之严明，不能不叹服周恩来管理技艺之高超，因而不能不改写那句成语：**“智者千虑，未必有失。”**

然而，三四十年后，在当局严控文革禁区的情况下，从一些正直知情人的回忆文章中，人们还是在字行间发现了他们披露的一些“接见”之失。

例如，有一位曾准备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回忆说，当时他“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片小小树叶，身体轻飘飘的，头脑晕晕的，在几十万人组成的人海中拼命挣扎，挤过来又撞过去，全身汗水流淌，既高兴极了又非常紧张，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挤倒在地**永远爬不起来**。当时有不少人被挤倒在地，也有因为激动流汗过多中暑倒地的。有的被救出广场，也有的**还没被别人拉出来就被踩在脚下**，所有的红卫兵都一样，嗓子喊哑了，汗水流尽了，鞋被挤掉了，衣服也被撕破了，……”最后他被从东面倾泻而来的人流挤出了天安门广场。当然，他无法知道被**踩死踩伤的人数**。

一位名叫**尹本顺**的红卫兵说，他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

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他在公园里见到衣物堆得像座小山，还有不少金银饰品(据说其中不少是抄家抄来的)，吓了他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袜，简直是大海里捞针？于是，在管理人员指点下，他随便找了一双鞋袜。他看见那衣物山堆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大型的遗物展览会了。

尹本顺说得不假。当时曾八次参加过“接见”的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参谋回忆：“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他谨小慎微地(不排除有人告诫他)避开了伤亡这个敏感话题。

也有不怕坐牢者。例如，一个曾参加过西苑机场“接见”的红卫兵凌耿，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天仇——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中，对西苑机场“接见”悲剧，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十一月二十六日深夜，时钟刚敲过两响，一阵军号声划破了清华园的寂静；接着，四周响起了哨声。排长把我们的寝室的门一脚踢开，开了灯。‘起来！起来！大好的机会来了，毛主席今天要接见你们！’”

在军人的带领下，凌耿和成千上万名青年学生，结队开始了长途跋涉。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往哪儿走。在步行二十多公里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西苑机场。大家精疲力尽地席地而坐。凌耿写道：“警卫人员开始搜查危险物品——像小刀、金属物品和钥匙等。连地上的小石子也被捡走了。”凌耿的女友梅梅头上带着一个漂亮发簪。排长不由分说就把它从她头上拔走，因为它“也可以当凶器用。”

大家等了整整一天，都到下午四点五十分了，太阳已经开始下山，毛泽东的车队才出现在机场的跑道上。凌耿写道：“他(毛泽东)在一辆吉普车上，神色木然，看不出是高兴或是悲哀。他微微撇着嘴，显得对什么都看不起似的，双目死死地瞪着前方，把右手伸到肩膀的高度，僵硬地举了几次。”

这就是人们在半夜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多公里、等候整整一天所得到的“伟大领袖”的所谓“接见”。毛“接见”完毕以后，数十万饥寒交迫的青年人，都急着尽快离场。凌耿写道：“那一天的收场实在可怕。溃散的人群涌向机场出口，带着我踏平了麦苗，撞弯了树木，挤倒了泥草房，四周只见飞扬的尘土，耳边尽是人声呐喊，有时，只觉得踏上了软软的东西，却一直不知那究竟是衣服还是人体。”……凌耿无法告诉我们当天究竟踩死了多少人，中共也从来没有向人民公布过这个数字。当年，如果有人敢冒中共之大不韪，报导“接见”死伤等负面消息，其咎由自取的后果不堪

设想。

接着，凌耿又写道：“突然间，前面传来轰地一响——小河上的木桥垮了。接着是刺耳的尖叫和哭号，这一切离我不过几十步，我觉得自己就像刚刚捡回来一条小命似的。人们开始涉过浅浅的河水，轮到我进入那最深只有一公尺的河床时，发现水已经完全干了。只剩下软软的烂泥。河水被红卫兵的棉袄棉裤吸干了！”对此，总参作战部参谋说：“（西苑机场“接见”）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踩死几个？又语焉不详。

“接见”究竟花了多少钱？生产遭到了多大破坏？给国民经济和群众生活造成了多大灾难？多少人负伤、染病、致残和死亡？在中共一党专政下，这些都是**永远的机密**！

对于毛泽东的“接见”，有学者这么评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所造成的混乱、惊慌、悲痛、损失，超过了一场战争。**”这也许有些夸大，但足以说明损失不小，不然，为什么永远机密下去？

笔者为什么给“接见”打上个引号呢？通常所谓接见，指接见者与被接见者双方的近距离接触、交谈，双方均能清晰地听到、看到对方的音容笑貌，甚至零距离接触，如握手、拥抱等，或若图 08-5（右）所示那样。但毛的“接见”，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红卫兵充其量是接受了毛的检阅：他们看到的仅仅是站在天安门上的“海市蜃楼”和坐在吉甫车上的活体雕塑。毛的“接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接见，而是造神运动的一种新形式。炒作“接见”就是炒作个人崇拜，大唱“接见”赞歌，无非是动员红卫兵打击对手的一种权谋。因此，给毛的所谓“接见”打上个引号，借以拨阴翳，正视听。

三. 教训红卫兵（图 08-6）

图 08-6：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教训红卫兵



在三个多月的八次“接见”中，毛泽东面对林彪等要员，只对红卫兵敕训了一句话：“**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在这里，毛泽东所谓的“思想革命”，是要颠覆真、善、美的儒释道文明和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毛惯用的策略是：由林彪、周恩来等人代表他按照事先决定好的内容讲话，将来不论讲话的后果如何，他都**保有自由评判的主动权**。

人们不会忘记，在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接见”中，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见图8-6-4）。毛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女答：“**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宋答：“是。”毛说：“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母校即高干子弟云集的师大女子附中，也随之改名为“要武中学”。自6月中旬以来，这所贵族学校的红卫兵们，已经以批、斗、抄、打闻名于京师。8月5日下午，她们用棍棒和皮带将年逾五十的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开创了打死校长的先例。领导这个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就是当时**中共政治局后补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千金**，而这位千金，正是那个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第二天改名“宋要武”的**宋彬彬**。（著名学者**千家驹**说，宋彬彬双手沾满了八个人的鲜血，其中包括卞校长的鲜血！一位教过她的老师说：“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但在当局荫底下，这位当年不可一世的千金，文革后为避嫌悄然移居美国，购房置业，在毫无悔意的岁月里闲庭信步，使卞仲耘等受难者不能瞑目——这是后话。）毛泽东倡导的“要武精神”，早在北师大女子附中已开“花”结果；改名“要武学校”后，“要武精神”波涛汹涌，迅速传遍全国。显然，毛泽东鼓动学生造反，就是鼓动学生批、斗、抄、游、打、烧、杀！

在“八一八”第一次“接见”讲话中，林彪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加赞扬。他说：

“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他号召红卫兵：“**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这就是文革中“四敢”、“四个打倒一反对”和“大破四旧”的来历。

在这次讲话中，林彪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高调颂扬毛泽东道：

“毛主席是当代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他要求：“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林彪要红卫兵“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就要“彻底打倒”，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林说的这句话，同毛泽东语录混合在一起，被红卫兵发展成了这样一句口头禅：“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毛泽东思想中隐蔽很深的张献忠主义（2）的正本渊源。

“接见”就是煽风点火，按周恩来的说法，就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在“接见”的煽动下，以高干子弟为主的各路红卫兵，冲出校园，杀向社会。他们从批、到斗、到抄家劫舍、到大打出手，很快发展到充满血腥、使十数万无辜者丧生于“红八月”的大屠杀中，仅北京一地，就夺去了五千多人的生命权——“要武精神”得到了肆无忌惮地宣泄。对此，在“八三一”“接见”大会上，林彪高度赞扬说：

“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在“九一五”“接见”大会上，林彪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再次高度赞扬红卫兵说：

“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

“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接见”及其讲话的“鼓舞”下，以阶级仇恨主义、民族仇恨主义、汪达尔主义和张献忠主义为代表的“要武精神”，被煽动了起来：妒忌、猜疑、争权、弄术和仇恨等人类兽性，找到了宣泄机会；批、斗、抄、游、打、烧、杀等红色暴虐，找到了发泄场合（图 08-7）。“红司令”的表彰，犹如火上浇油，红卫兵便有恃无恐地横行起来，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越烧越大。

图 08-7：红卫兵“做得对！做得好！”“好得很！”



但很快，红卫兵也开始分裂成以革命干部特别是以高级干部、将军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和以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为骨干的平民红卫兵。红卫兵的造反对象也复杂起来：不仅党内外右派干部和知识分子遭殃，一些左派和中摇派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受到了红卫兵的批、斗、抄、游、打、烧、杀。对此，林彪“九一五”讲话中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警告说：

“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毛、林在这里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的政治概念，这将预示：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必将被戴上“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大帽子。

不忘造神的毛泽东，通过林彪之口，向红卫兵发出这样的号召：

“在我们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8月31日起，“四个伟大”从天安门上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叫响全国，又从《人民日报》上传遍全国。“四个伟大”成为人们每天“早请示、

晚汇报”必须颂扬的祝辞，大会、小会上必须高呼的口号。“四个伟大”还成了全国各地墙壁上、车厢上和橱窗上的主要标语（图 08-8），还印在各种报章、书刊、工艺品和各种文件上，刷在介绍信、粮票、布票等用品上。以“四个伟大”为题材设计制作的“毛主席像章”，也有数亿枚之多。

此时已倒向左派的党内中间摇摆派头领周恩来，在“接见”中不甘落后，除“九一五”“接见”中大讲“抓革命，促生产”外，在多次讲话中，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大力赞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他说：

“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



图 08-8：“四个伟大”标语

他也不忘造神，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讲话稿，大讲特讲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说：

“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

“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笔者：这是“四个伟大”的源头之一。）

“（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周恩来在“接见”时代代表毛的讲话，煽起了“造反”、“破四旧”、“打砸抢”、“夺权”和“红八月”杀戮的熊熊烈火，给老百姓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显然，毛泽东和他的左右手林彪、周恩来，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但中共的“主旋律”规定：要无情地揭批林彪，要热情地颂扬毛、周，因此，历史要按“主旋律”的规定打扮。于是，遵命“主旋律”的学者、史学家们，便把灾难的罪责推到林彪一个人的身上。例如，席宣、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一书中写道：“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又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

大会上首先抛出这个新罪名”，等等，又有人为同官方保持一致，漫天撒谎说，“毛泽东晚年错误被林彪利用”，林的这些讲话就是证明云云。

历史果真就是任由权力、任由御用精英们打扮的小姑娘吗？

请听：

8月18日“接见”中林彪说：“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

8月31日“接见”时林彪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9月15日“接见”时林又说：“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问好！”

请看：（图 08-9）

林彪“九一五”讲话时，毛泽东就站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讲稿；而录像显示，“接见”中林彪每次讲话，毛泽东都站在他的身边。



图 08-9：康生、江青、周恩来、林彪（讲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上面的文字和图片能否说明：毛、林、周是三位一体？或者说林、周屈从于毛的命令和压力在“煽风”？或者说林、周别有用心地利用毛的威望在“点火”？请读者自断。

遵命于“主旋律”的学者、史学家们，无法改变历史留下来的文字、图片和声音。但在档案尘封和资料垄断的条件下，他们却能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手法为“主旋律”服务，或根据“主旋律”的要求，有选择地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剪裁，或根据“主旋律”的要求，人为地张扬政治上有利的一面，回避不利的另一面，譬如颂毛、赞周、批判林，借以达到误导舆论的目的。

近些年披露的资料越来越多。资料表明，林彪和周恩来在“接见”会上的讲话，都是“写作班子”按毛的意图起草、经林和周阅读修改、最后呈交毛审定的稿子。这个“写作班子”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部长陶铸组织的，其成员有陈伯达、王任重、张春桥、王力、关锋等。

为了证明林彪利用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煽风点火(刻意回避周恩来)， “主旋律”学者、史学家们说，“四个伟大”的发明人是林彪，并针对林彪

讲话里的“四个伟大”著文说：“毛泽东对这个口号并不赞成”。言外之意是，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他们举例说：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厌！总有一天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的一概辞去。”“辞”者，告别、推让不受也，寓意颇深。

“主旋律”学者、史学家们甚至说毛泽东是被林彪“逼上梁山”的。他们引用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一封信里的话加以证明。在那封信里，“毛泽东”写道：“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那封信是官方正式发布的。有人揭露为“伪而不劣”的假材料，称之为“真实的谎言”。这里姑且不论那封信的真伪，看看毛泽东在林彪讲话时的神态，你能看出他“不高兴”、他“讨厌”吗？从林彪代表他讲“四个伟大”到“不高兴”，经历了5个月又3天，又从“不高兴”到“讨厌”，经历了3年另10个半月。在漫长的数年里，面对“违命者”，他竟束手无策而任其发展？

过来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时代。那是个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是个“毛主席著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时代。在毛说一不二的时代里，谁敢把他“逼上梁山”？试想，他如果正式提出不同意称颂他为“四个伟大”，谁敢不听？曾记否？为了迎合造神高潮，有人曾竭力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毛一句“不赞成”，便把他送了终，硬叫吹拍者碰了一鼻子灰。

谁发明了“四个伟大”？据悉：“四个伟大”最早源于“三个伟大”，那是毛泽东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明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里又增加了“一个伟大”，第一次成就了“四个伟大”；其排列顺序据说是康生敲定的。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社论，根据陈、周的“四个伟大”和康生敲定的排列顺序，第一次把“四个伟大”并列在一起。那篇社论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8月31日，林彪根据陶铸等人起草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批准的讲话稿，在天安门上叫响了“四个伟大”。对此，曾任中央文

革小组成员的穆欣撰文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共有’。”在“主旋律”作用下，趋炎附势的穆欣刻意回避了周恩来的创作权，回避了“四个伟大”的讲话稿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批准的，回避了“四个伟大”是在毛的眼皮底下叫响的、而且还在全国大喊大叫了四五个年头：这些都是穆欣无法篡改的历史事实。史料表明：把“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归于**陈伯达和周恩来**，而把修改、推销权归在**毛、林、陶、康**等人名下，才符合历史的本貌。

从毛泽东表里不一的人格看来，“**我就不高兴**”是故作姿态的“谦”辞，而“**讨嫌**”则是他无可奈何的自我洗刷。

1970年12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已经**召开，毛、林分裂**已经**形成，中共**已经**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经过几年的拼杀，红卫兵和造反派威风**已经**不再，毛的“伟光正”形象因而**已经**严重受损，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也因而**已经**有气无力，面临无可挽回地颓败。大智大勇的毛泽东，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只有自我洗刷并把罪责推给林彪，才能挽回造神运动的颓势。于是，他无可奈何地说了句“**讨嫌**”；但一句“讨嫌”，的确也把“四个伟大”送了终。

不能排除林彪、周恩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有“利用”毛权威的谋图；但毛泽东“利用”林、周、陈、康等的吹拍谄媚的人格、德性，从而达到颠覆刘、邓右派集团的谋图是无法排除的。

四. “三忠于、四无限”

在个人崇拜造神运动中，如果说“学雷锋”是用青少年造神，“学大庆”、“学大寨”是用工人和农民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正名，“学解放军”是紧握军权，属第一波造神，那么，八次“接见”是毛泽东亲自上阵，率领他的左右手、扈从和护驾，利用数千万红卫兵的造反精神造神，借以直接达到颠覆刘、邓右派官僚集团的目的，属第二波造神。

红卫兵的造神同造反密不可分：造神为了造反，造反强化造神。到了1967年，红卫兵演变为造反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裂。

红卫兵不辱使命。在“红司令”毛泽东的率领下，在林彪、周恩来、江青积极策划和督导下，逐渐形成了马列毛宗教行为规范的“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借助“忠字舞”、“语录歌”、“像章热”、“忠字台”、“万岁馆”等五彩缤纷的共产主义宗教形式，把中华大地打扮成了一个红

海洋。

1. 大跳“忠字舞”

据说，唐玄宗李隆基曾命乐工编导过忠字舞《圣寿乐》：宫女们身着五彩衣裙，舞姿婀娜，边唱边舞，敬祝皇帝万岁万万岁；终舞，躺身于地，组成“万岁”二字图案。观后，玄宗龙颜大悦。一千二百多年后的1966年到1968年，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忠字舞”，跳遍了全国城市和乡村，其规模和创意，令在冥府的唐玄宗望舞兴叹，自愧弗如。

毛式“忠字舞”舞蹈语汇，大都来源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是周恩来直接导演下于1964年10月2日首次演出的“杰作”。舞蹈多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和“语录歌”等歌曲伴唱、伴奏，掀起革命热情和制造崇拜氛围。下列各图为常见的舞姿语汇。（图08-10）

图08-10：“忠字舞”



有人说，“忠字舞”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舞姿僵直、生硬，有机械位移之感；虽舞蹈者身心洋溢着朝圣的庄严，激荡着革命的豪情，但舞姿粗

糙、僵硬、稚拙，不能不让人顿生滑稽之感。

湖南人胡遐之曾以诗写照：“忠字舞，手应锣，脚应鼓，一声号令为军伍。忠字舞，心应鼓，口应锣，舞时更唱语录歌。忠字舞，狂且野，飘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左旋右转无己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

毛泽东死后，有人撰文批判“忠字舞”是偶像崇拜的形式主义，是荒诞愚昧的封建流毒，也有人说是林彪搞的政治阴谋，等等。笔者认为，前者“流毒”说尚能说得过去，后者“政治阴谋”说近乎胡说八道。如果“政治阴谋”说成立，“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则难逃其咎。

2. 大唱“语录歌”、革命歌和样板戏

“语录歌”是根据毛泽东语录谱写的歌曲。1966年9月30日、10月12日和10月25日，《人民日报》连续三次以整版篇幅登载“语录歌”后，同类歌曲便大量涌现，充斥华夏。

“语录歌”的代表作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争取胜利》、《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共产党人》、《造反有理》、《世界是你们的》等。（图 08-11）

图 08-11：大唱“语录歌”和革命歌曲



据报导，最早组织部队音乐工作者为《老三篇》语录谱写歌曲的是《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歌曲》编辑部。《老三篇》即《毛泽东选集》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著名作曲家李劫夫曾发过宏愿，要在有生之年把所有毛泽东语录谱成歌曲。据估计，约有1,000余段毛泽东语录被谱成了“语录歌”，林彪为颂扬毛泽东的《永远学

习“老三篇”》也搀合其中。(图 0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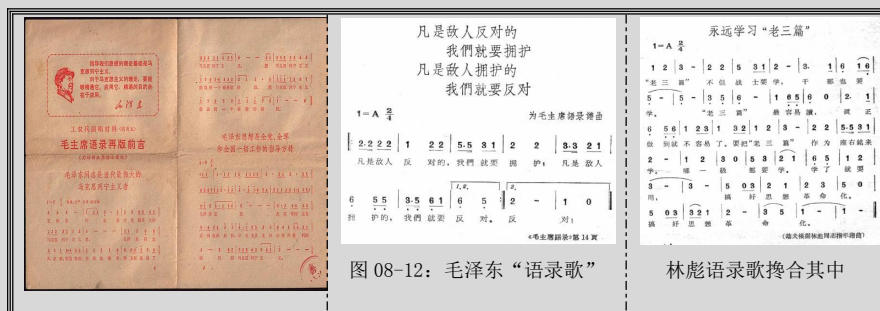


图 08-12：毛泽东“语录歌”

林彪语录歌搀合其中

戏剧界不敢落后，谱写了京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语录京剧”清唱。

外国人也来凑热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语录歌”，是由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谱成的。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过程中，中央音乐学院就主动地、有计划地教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演唱“语录歌”。1966 年底，在安徽省合肥市，工人红卫兵举行了一次毛主席语录歌曲演唱大会。从此，在会议前后，在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在游行行列中，在广播电台和红卫兵高架的高音喇叭里，在列车行进中，在车站码头、工矿商店、军营机关、农村田野……到处都有响亮的“语录歌”歌声。

在那个时代，笔者在北大荒曾多次见过，在火车上、汽车上，大小会上、田间地头，都有演唱“语录歌”活动。报纸、电台天天宣传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越唱毛主席语录歌，就越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但在密山县农村中，笔者经常听到农民低声轻哼的曲调，大多还是“二人转”。

相对生命较长点的是“革命歌曲”，诸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还有流行 2~3 年的《革命造反歌》。歌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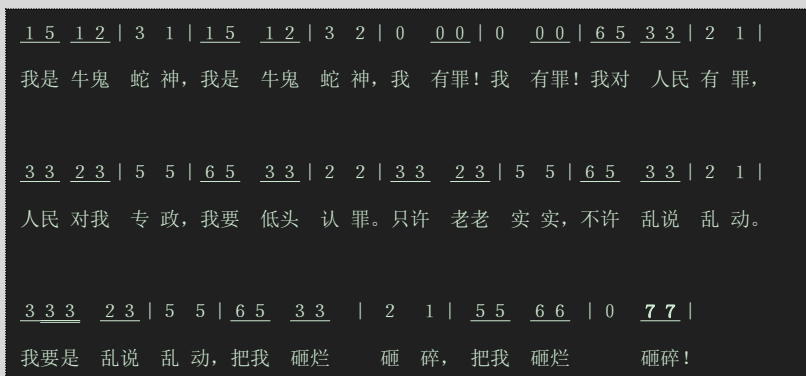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据说《革命造反歌》初创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定型于 7 月 1 日。

当时北大附中，在海淀区各中等学校红卫兵集会上，演唱了此歌。自此，歌声飞出校园，在社会上广为传唱。遗憾的是，笔者当年处于“牛鬼蛇神”边缘，没有资格也没学唱这首歌；写本文之前，也没有找到它的曲谱。

同《革命造反歌》相对的是《鬼嚎歌》：歌声凄凉、惨淡，像是从地狱传出来的。文革中，被打倒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牛鬼蛇神”，在监管人员督促、逼迫下，都要学唱这首《鬼嚎歌》。这是他们继戴高帽子、“坐喷气式飞机”、游街等毛式揪斗体罚后，进一步“触及灵魂”的“革命措施”，让已经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人们屈从于强权。人性的暴戾恣睢和卑鄙恶劣，尽在于斯。据说，许多大作家、学者，都曾受到这种惩罚。

笔者一介无名小卒。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有人怀疑父在台湾因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揪斗，竟同大作家、学者们一样，被迫唱那首凌辱人格的《鬼嚎歌》。记得词曲大致如下（有些音符无法写出）：



“语录歌”旋律简单，节奏容易上口，音域较窄，宜于多数未受专门训练过的群众演唱；但由于语录的论述语句不适于歌曲的音律节奏，又不容许删改，只能迁就，因而唱起来像念经一样，兴味索然。1971年“九一三”林彪摔死后，毛的“伟光正”形象受到沉重打击，“语录歌”、“红宝书”同林彪一样，也折戟沉沙，很快从人民生活中消失。

3. 毛主席像章热

“毛主席像章”亦称“红像章”，是以毛泽东头像为表现主体的像章。据说：最早出自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泽东像章；1945年，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解放”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毛泽东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红像章”狂热，则是在文革中的1966年夏到1971年夏。

文革中，毛泽东像章热最早兴起于部队。“接见”高潮中，红卫兵组织

开始批量向徽章厂订制。随着大串联的扩张,“红像章”南下、北上、东征、西进,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扩张。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佩戴起毛泽东像章时,显然向全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党和政府,要把“红像章”热推向高潮。那时流行这样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是:一跳“忠字舞”,二背“红宝书”,三戴“红像章”。

当时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各省、市、地、县革委会和红卫兵造反派团体,在召开重要大型会议时,都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在像章的设计和制作上,各地都在暗中较劲儿:看谁的设计更“独具匠心”,看谁制作得更加精致,更加豪华。在暗中较劲中,各地都想以此来“证明”:我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我们更加崇信毛泽东思想,我们更加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情侣结婚时,为了表示更加热爱、崇信、紧跟,把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当成了不可逾越的婚规!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多向左),半身像、全身像较少。像章多为红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或林彪的“紧跟”题词。也有以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天安门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也有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像章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大小不等。像章最大直径达20多厘米,因无法用别针,便用绸带挂在胸前。(图08-13)



像章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等20多种材质。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和手书“为人民服务”条形章,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军星儿”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

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万多厂家生产过毛泽东像章;5年间,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种类约4万余种,总数达22亿枚以上;其中,天津一家军需厂

最高日产量超过 10 万枚。

有人统计，文革时制作“红像章”用铝达 6,000 吨以上，相当于几千架米格 21 战斗机的用铝量。当时全国铝材库存告罄，工业生产、飞机制造所用铝原料频频告急，老百姓的日常用的铝锅、铝勺也常脱销，当局不得不凭票按“计划”供应。

1969 年，周恩来针对全国上下的造神运动，提出了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了 7 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多，已做了 22 亿枚。”毛泽东也不得不让步，但让步让得非常“高明”，比说“讨嫌”“四个伟大”技高一筹。他说：“如果把像章的金属材料用来造飞机，保卫国家，将会有用得更多。”他怒斥官员和老百姓说：“还我飞机！”俨然是个“像章热”的反对者。见毛泽东对像章的反对态度如此坚决，中共中央大员们不敢怠慢，便紧紧跟上。1969 年 6 月，他们在下达的《关于宣传毛泽东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中规定：“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泽东像章。”此后，制作像章热便戛然而止。

“还我飞机”，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反潮流的“伟大”精神；“已做了 22 亿枚”，使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周恩来的“严肃”批评。但毛的“伟大”和周的“严肃”来得太晚了，他们竟让“像章热”随着红卫兵造反派猖獗横行了四五个年头。在这四五个年头里，如果他们不是始作俑者，难道没有支持过？如果没有支持过，难道没有默许过？如果没有默许过，难道没有失察过？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失察就应向人民道歉，就应引咎辞职。然而，毛、周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像章热”的反对者、批评者！这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教训人的讲话。面对由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造成的数千万饿殍的惨烈后果，他在那次讲话中毫无歉意地大弹“缺乏经验论”，并把它提升到深奥莫测的理论高度。他教训人道：“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的高谈阔论，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巧言令色？什么叫卑鄙无耻？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独特的、理直气壮的恶叉白赖？相比之下，在“像章热”上保持沉默的林彪，反而使人感到他相对诚实些。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摇旗呐喊的芸芸众生，看到了“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的悲惨下场后，才有所醒悟，“像章热”也随之逐渐冷却下来。毛泽东死后的 1980 年，中共中央在下发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文件中规定：“毛泽东像章要大量回收利用，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遥想当年，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顶着烈日迎“圣像”，冒着风雪购“像章”，有时还要排着

长队等待领导奖授“毛主席像章”。然而，曾几何时，星移斗转，风云变幻，“毛主席像章”竟被当成废品垃圾，用簸箕撮、麻袋装，进行全面清收，其场面令人难以释怀。据说，回收“毛主席像章”的废铝达千吨。

“像章热”真正冷却是在毛泽东死后。文革是个迫害猖獗的时代，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1977年，人们开始为自己、为亲友在文革中所遭受到的迫害鸣冤叫屈；但在“歌颂——迫害——再歌颂——再迫害”这个周而复始怪圈的独裁社会里，戴着毛泽东像章上访，是个怪诞不经的蠢举，对上访不会产生影响。这位农民《上访者》(图 08-14)，看看他穿的那身破烂棉衣，便知道“大救星”毛泽东给了他什么。这不是“像章热”的继续，而是“像章热”的回光返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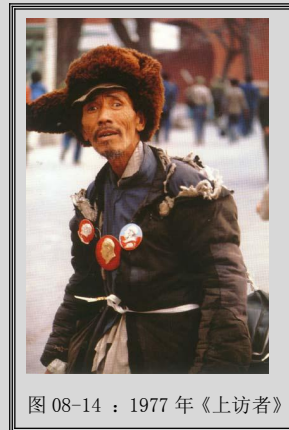


图 08-14：1977 年《上访者》

4、红海洋

1966 年夏季席卷全国的红海洋，是用红油漆将街道两边墙体涂成红色寓意环境“革命化”的风潮。这一时尚的功能，是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为神化毛泽东和渲染造反气氛造势。

《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23 日第一版，发表了《好得很！》的社论。社论号召：“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毛和他的喉舌《人民日报》鼓动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在房屋、院墙墙壁和机关、学校的大门上，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语、口号和毛泽东的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和形式多样的宣传画。(图 08-15)

图 08-15：宣传画种种





于是，这种风潮旋即蔓延到全国城乡。各地商店、机关、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上，以及那里大门、院内、院外、室内、室外，都淹没在毛泽东语录和宣传画的红色油漆中，连厕所也不能幸免。此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牌坊，甚至还搞了许多敬祝毛泽东的神龛、庙堂。

在毛泽东的默许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中共大员们的鼓励下，出现了一代红卫兵的共识：“‘红海洋’可以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每一个角落，激励革命斗志，威慑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资力量，一个红彤彤的、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新世界就会降临！”对此，有人著文评曰：“这是高贵的无知！傲岸的愚昧！”由于“红海洋”泛滥成灾，各地红油漆供销告急，库存告罄。

“红海洋”喧闹了几个月后，毛左当权派们终于发现，这种形式主义虽能推进造神，但这种“红色波谱”的大众艺术，正在被右派们利用，正在转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视线，“阻截了充满批斗精神大字报场地，消蚀了造反派的革命斗志，瓦解了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于是，根据毛泽东的谕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红海洋”遂猝然而终。

5. “三忠于、四无限”的来源和消亡

“三忠于、四无限”把毛泽东个人及其思想、政治选择做为中国党、政府和社会主义事业核心价值。这种立场和行为规范，是一种宗教观念，是马列主义教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必然滋蔓：它用权力剥夺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强迫老百姓像敬神一样去顶礼膜拜它。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初形式是“四忠于”，即“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据说始于1966年7月，后精炼演变为“三忠于”定型格式，结束于1971年4月。但笔者查对资料后认为，说“四忠于”

始于7月已无案可查，但始于1966年8月31日周恩来在天安门上的讲话里，却有据在档。

“四无限”即“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始于1966年5月2日《人民日报》，结束时间稍早，为1969年4月中共九大。

这种宗教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共七大上。那时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五十年代，对毛的个人崇拜就有很大发展，促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疯狂。1958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上，中共第一副主席刘少奇说：“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责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中共中央常委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中共中央常委康生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为了捍卫个人权力，在“搞点个人崇拜”思想指导下，个人崇拜造神运动恶性发展起来。当时的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林彪，紧紧跟上，他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最活”、“顶峰”等等，便应劫而生；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不甘落后，他的“大立毛泽东思想”、“心中的红太阳”、“四忠于”等等，便纷至沓来；甚至处境危险的邓小平也颂扬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图08-16）



由此可见，“三忠于、四无限”的宗教行为规范，不是红卫兵、造反派或“革命群众”的创造，而是毛和他的权贵、御用精英们，按既定马列主义宗教观念和政策进行策划、诱导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的必然。（图08-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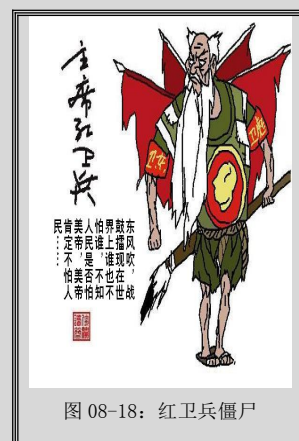
然而，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三年后的 1969 年 6 月 12 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规定：“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的活动。”

为什么呢？因为，被“三忠于、四无限”推上权力峰巅的毛泽东，在“天上宫阙”颐指气使、扬扬得意了几个年头后，渐生“高处不胜寒”之感：在打倒并整死刘少奇后，逐渐又发觉“当面说好话”的林彪要“背后下毒手”了。于是，他在清算林彪前发出“最高指示”说：“‘紧跟’、‘三忠于’、‘四无限’，讨嫌。‘跟’应当跟党走，我历来是路线对了，我支持；错了，我反对，敢于反潮流。‘跟’不要跟个人，个人是会变的……”多少年来主张“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的毛泽东，又一次抡起“反潮流”的大棒，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旋即变成了个人崇拜的反对者——真真一个出尔反尔、变化万端的弄权痞棍！于是，按“主旋律”节拍弹跳的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不敢怠慢，生生地把制造、推行个人崇拜的罪责，一古脑儿推到林彪一人身上，毛死后又延展到“四人帮”身上。——历史就这样被他们任意玩弄、打扮！

毛泽东死后，“三忠于、四无限”遭到了一些批判，被斥为封建化的个人崇拜，奴化和取消人民的自由思想；但批判都没敢触及产生这种邪道的体制根源。

在中共的高层中，真正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大员少之又少，比较突出的就是为人耿直的彭德怀元帅。然而，他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断肋骨，最后伤痛癌症不治，死于囚禁中！

毛泽东一手培植起来的红卫兵，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文革噩运中一群恶魔，给历史留下的是一堆遗臭万年的僵尸。(图 08-18)



第 08 章附注：

附 1、汪达尔主义

汪达尔主义是五世纪汪达尔人的特有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汪达尔人**原先居住于奥得河畔，后经潘诺尼亚（今匈牙利）、高卢和西班牙进入北非。439 年，汪达尔人攻陷迦太基城，建立汪达尔王国。455 年，汪达尔人渡海攻入罗马，疯狂烧杀抢掠：他们藐视文明世界尊重的东西，肆意破坏文明世界视为珍贵的文物艺术，罗马古文物因而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毁灭文化的“**汪达尔主义**”成了野蛮行为的同义语。建国九十五年后，即 534 年，汪达尔王国为拜占廷所灭。

附 2、张献忠主义

张献忠(1606~1646 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1630 年)，张献忠在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1635 年参与荥阳之会，不久与李自成分裂。1638 年，张献忠受招安授副将。1639 年，重举反明大旗。1644 年 8 月 9 日攻破成都，号称秦王，以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国，8 月 16 日称帝。1646 年，张献忠中箭身亡。张献忠性格狡猾诡谲，嗜杀成性。据清史记载，明末四川约有四百万人，被张献忠杀了近三百万（史家对此有较大争议）。因此，张献忠主义就是**刀把子主义、杀伐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语。

上卷完

请继续阅读中、下卷